

## 声 明

本刊仅作为学术交流与出版平台,所刊载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刊立场。本刊坚决反对抄袭、伪造数据、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可靠性由作者全权负责。

本刊为开放获取期刊。所有发表内容均采用CC BY-NC 4.0协议许可。读者可以免费获取、阅读和非商业性分享,但使用时必须明确注明作者和出处,且不得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

# 人文學刊

2025年  
第三期第1卷

月刊

出 版 单 位: 拾华出版有限公司

总 编 辑: 王海波

总 顾 问: 胡 斌

联 系 地 址: 香港九龙旺角亚皆老街2C号凯悦  
商业大厦6楼602室

E - MAIL: [rwxk@shiharr.com](mailto:rwxk@shiharr.com)

联 系 电 话: +852-9749-5505

投 稿 平 台: <https://ojs.shiharr.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pISSN 3104-5014

eISSN 3104-5022

发行范围: 全球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25年8月25日

发行定价: 免费赠阅

版权许可: 



更多科研资讯可关注官方公众号

**编辑部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总 编 辑: 王海波 总顾问: 胡 斌

**【法学编辑部】**

主 编: 刘 玮  
副 主 编: 陆 瑶 唐旭晨 唐丽云 苏咏喜  
编 辑: 王 正 曾 霄 裴 耘 石 鑫 汪 淇 李明旭 诸葛成影  
青年编辑: 张红军 姬红杰 江 涛 张 力 田笑潇 殷 玥 左芸菲 任志鹏  
出版顾问: 马子研 胡奕帆

**【教育与体育编辑部】**

主 编: 何小兰  
副 主 编: 龚雅哲  
编 辑: 周鸿璋 鹿艺馨 苏文杰 刘洪铭 白天昊 吕文欢  
青年编辑: 洪 阳 徐文佳 袁 骁 蒋心毅 王日娴  
出版顾问: 曾维民 刁培鑫

**【艺术学编辑部】**

主 编: 莫 岚  
副 主 编: 王媛媛 周白云 郝 爽 刘 飞 刘梦雨 郭胡合璧  
编 辑: 黄 杨 刘 颖 宋彦霖 赵 洋 贾效田 刘济君 赵沃林 王镜皓 王俊翰  
张 鹏 金黛彤 李一帆 何 蕴 张靖博 袁 浩 冯志超  
青年编辑: 谢 民 成 玥 杨喜超 祝鹏飞  
出版顾问: 胡 斌

**【经济与管理编辑部】**

主 编: 周钰淮  
副 主 编: 陈 坚 王 峥 郑旭刚 咎 琳 林东武 张湘晗  
编 辑: 任晓华 谢常骏 刘亦璇 方 敏  
青年编辑: 邓子琳 尚清雅 罗笑颖  
出版顾问: 郭 杨

**【文学与新传编辑部】**

主 编: 侯本塔  
副 主 编: 冯浩源 韩文涛 戚 昊 李国平  
编 辑: 胡 港 井兴龙 包云龙 任韵灵 蒋瑀宸 王昊祥 孙玉豪 李 芮 佟 彤  
吕淑娟 田诗昂  
青年编辑: 金字恒 黄 芊 吴宗译  
出版顾问: 李显坤 吴元超 颜俊志

**【历史与哲学编辑部】**

主 编: 宋朝红  
副 主 编: 曹 栋 孙苡森 崔梦泽 李伟强  
编 辑: 曾 浩 王伟康 吴栩薇 刘宇航 许嘉杰 熊晨曦  
青年编辑: 田宇洋 赵文雯 范记川 王芳芳 解 娇  
出版顾问: 范宇飞

出版策划: 莫 岚 桂 军  
营销策划: 谭瑞将 孔维旭 孙玉豪 颜俊志  
技术编辑: 范哲文 刘霜尧 杨开路  
装帧设计: 金黛彤

# 目 录

## 法学

- 01 行政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护路径完善  
汪阅、崔佩玉
- 08 比较法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本土化构建  
林立栩、李锐晴
- 16 新时代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及对策探析  
郭文慧
- 23 人文经济学视阈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与导向原则  
邱晓佩

## 教育与体育

- 31 从“伪分层”到“智适应”:三层四维架构下初中英语差异教学革新  
聂慧
- 41 高校精准思政工作中学生数字画像的构建逻辑与理论框架  
任阳
- 49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三重向度  
连桐
- 55 校企合作模式下人工智能培训的实践与探索——以泰迪智能科技与高校合作为例  
周钰淮, 马雷猛, 朱紫健

## 艺术学

- 63 植物染教学中的色彩理论与实践  
彭林、沈欣雅、张倩
- 69 元宇宙在岭南文化传播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潘雨沛
- 73 传统与现代的重奏:中国音乐剧《蝶变》在跨文化舞台上的美学嬗变  
林檎

## 经济与管理

- 78 灵活用工背景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优化路径研究  
杨妙玲
- 82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何滨江

## 文学与新传

- 87 苏轼诗文可证道——江谦《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的编注理念及其价值 潘婷
- 91 数字红楼传播的二律背反与破局——以“只有红楼梦”为例  
柯佳超、刘希彤、李乐妍、金佳怡、崔迈文
- 98 论张炜《古船》的创伤记忆书写 尹巧云
- 103 “可能的地图”与隔绝的“桃花源”：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 方立娟
- 108 论新诗美学范式的重建——兼评《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 马兴艳
- 114 论杨义《京派海派综论》的研究方法 丁璇
- 118 以姐妹之名：论《她乡》杂糅的共同体迷思 古帆
- 126 战争、表演与性别：女性视角下《一把青》的创伤书写与叙事重构 毕博、韩星晨
- 131 浅析新黄色新闻对新闻价值的破坏——以Thurman猫一杯“巴黎秦朗丢作业”事件为例 刘昕

## 历史与哲学

- 137 论《查理十二传》《哲学通信》与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形成 翟若朴
- 142 从《新小说》探析中国近代小说启蒙思想的发生 宋朝红
- 147 新时代人民观的逻辑意蕴与实践导向 张雪、周小红
- 152 特色小镇建设对人口流出区居民地方感的影响研究——以长官杂技小镇为例  
毛翰臣、杨开路

# 行政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护路径完善

汪阅<sup>1\*</sup>，崔佩玉<sup>2</sup>

(<sup>1\*</sup>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江苏 南京 210000；<sup>2</sup>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江苏 南通 226000)

**摘要：**行政强制医疗程序在平衡公共安全与精神障碍患者权利保障过程中面临实践困境。送诊阶段，公安机关对于“疑似精神障碍”与“危险性”认定标准不一；诊疗阶段，医疗机构存在初诊程序简略、复查机制虚置，削弱了非自愿住院决定的程序正当性；司法救济阶段，司法实践则因强制医疗行为性质认知分歧，陷入民事与行政诉讼路径选择混乱的困局。究其根源，在于强制送诊的行政强制行为属性与诊疗行为的专业判断权产生制度性混淆。行政强制医疗程序实质上应分为送诊阶段与诊疗阶段，前者属于行政强制范畴，后者属于民事范畴。在送诊阶段，应明确紧迫危险分级标准；诊疗阶段应推行主治医师双人诊断制度动态病房分级管理制度，并建立行政机关与医疗机构的双轨救济模式，在医疗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倒置的框架下，最终实现社会防卫需求与个体人格尊严的法治化平衡。

**关键词：**精神卫生法；行政强制医疗；权利保护；比例原则

## Enhancing Protection Pathways for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Administrative Compulsory Medical Procedures

Wang Yue<sup>1\*</sup>, Cui Peiyu<sup>2</sup>

(<sup>1\*</sup>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Gulou District, Nanjing C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sup>2</sup>The Primary People's Court of Haimen District, Nantong City, Nantong, Jiangsu 226000, China)

**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ve compulsory medical procedure faces practical dilemmas in balancing public safety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disorders. During the referral stag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apply inconsistent standards in determining "suspected mental disorder" and "dangerousness." At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age, medical institutions contribute to the erosion of procedural legitimacy for 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 decisions through simplified initial diagnostic procedures and ineffective review mechanisms. In the judicial remedy phase, divergent views on the legal nature of compulsory medical actions lead to confus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between civil li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athways.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fl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nature of compulsory referrals and the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inherent in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decisions. The administrative compulsory medical procedure should conceptually be divided into two distinct stages: the referral phase, belonging to the realm of administrative coercion, and the treatment phase, which falls under civil law. For the referral stage, clear grading standards for imminent danger should be established. At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tage, a dual-doctor joint confirmation system by attending physicians and a dynamic ward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implemented. A dual-track remedy model

- 1 -

作者简介：汪阅（1996-），男，江西上饶，学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崔佩玉（1993-），女，江苏南通，学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通信作者：汪阅；通信邮箱：wangyue2021@yeah.net

involving both administrative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Ultimatel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versed burden of proof regarding the legality of medical actions, a rule-of-law equilibrium between societal defense needs and individual personal dignity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Mental Health Law; Administrative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Rights Protection;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 引言

行政强制医疗,是指行政机关在精神障碍患者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监护人阻碍住院治疗情况下,违背精神障碍患者的意愿,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强制性治疗行为<sup>[1]</sup>。根据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现状分析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全国累计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640万例。<sup>[2]</sup>面对庞大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群体,公安机关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也存在诸多挑战。一方面,精神病人发病期间行凶伤人事件屡见报端,公安机关如对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当收治而不收治,则可能构成行政不作为。另一方面,实践中行政强制医疗程序运用不当,造成限制、剥夺患者人身自由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损害人身、精神利益等严重后果的情况亦有发生。究其原因,行政强制医疗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行政措施,兼具医疗救助措施与限制人身自由的双重属性,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平衡社会防卫与患者个体权益。然而,由于精神卫生法本身规定的模糊性,如对公安机关介入强制医疗的一些关键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sup>[3]</sup>,导致行政强制医疗程序存在制度性、操作性不足。进言之,当行政强制医疗措施与患者个人权利的保护发生冲突时,对于何种价值优先,如何保障权利救济途径畅通,当前法律体系未予以有效回应。有鉴于此,本文从行政强制医疗程序出发,分析送医、治疗、出院等阶段中精神障碍患者权利保护困境现状,进一步厘清公安机关、医院于行政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法律属性与角色定位,以期纾解行政强制医疗中精神障碍患者保护困境提供有益路径。

## 1. 现状分析:行政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障碍患者权利保护困境检视

从行政强制医疗的过程上看,认为自身权益受损的被送医者通常经历了送医、就医以及事后寻求救济这三个阶段。下文重点围绕三个阶段中精神障碍患者权利保护困境进行分析。

### 1.1. 送诊阶段:实体要件认定标准分化

行政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以公安机关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存在“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判断为核心前提<sup>[4]</sup>。然而,实践运行中,这一法定门槛却面临两方面问题。

其一,“疑似”状态判断自由裁量权力过大。法律规范中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本应以精神症状的医学表征为判断标准。但实践中,公安机关常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性评价作为便捷工具,使得诸如“当街叫骂”乃至“字迹潦草”等行为均可能触发强制送诊,形成“诊断前置”的逻辑悖论。近年来,该类情况仍然存在。如在“范某蓉与金堂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措施及行政复议案”<sup>[4]</sup>中,某派出所认为范某蓉在某社区情绪表现激动,有拍桌和扔书行为,未经家属同意即直接将范某蓉送至医院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这不仅逾越了公安机关的专业权限,同时与立法“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有所冲突。

其二,“危险性”要件的内涵与外延认定不一。《精神卫生法》相关条文未进一步界定危险客体范围与程度标准,直接导致执法尺度的严重分化。比较京、沪、浙等省市地方条例可见,北京、无锡、深圳等地颁布的精神卫生条例中,将“财产危险”纳入认定范畴,如毁损财物价值3000元以上可认定为存在潜在危险,以“王某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强制医疗行为上诉案”<sup>[5]</sup>为例,王某故意毁坏社区服务站玻璃门,但未对他人身造成危害或存在危害可能性的情况下,法院认定公安机关将王某送医治疗行为并无不当。而宁波、武汉则将危险性标准限缩于人身安全与公共安全领域,在“潘某等与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治安行政赔偿上诉案”<sup>[6]</sup>中,潘某实施了砸房子等毁坏他人财产的同类行为,法院认为该行为没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公安局对潘某没有采取约束措施合法。实体要件认定的主观化倾向,不仅削弱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更埋下了权利滥用的隐患。当送诊环节的瑕疵进入诊疗程序时,患者权利可能遭受二次损害。

### 1.2. 就医阶段：诊疗程序合法性缺失

当患者被强制送抵医疗机构，诊断收治本应成为过滤不当干预的核心屏障。<sup>[7]</sup>依据《精神卫生法》第31条规定，非自愿入院需以专业诊断确认患者存在精神障碍且具有危险性为前提。然而，此关键环节的程序合法性屡遭侵蚀。

初诊程序简略。强制医疗决定的作出应建立在精神障碍诊断和病情评估的基础上，未经诊断评估而将患者强制收治入院的，不仅严重违反程序，也违反《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的收治条件。在张某琼案<sup>[8]</sup>中，法院认为“被告医院只是经门诊初查，依据原告丈夫的口述，未进行辅检，在没有确诊和作出病情评估的情况下，对原告实施强制住院治疗明显违反《精神卫生法》规定的诊断评估程序”。此外，《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科执业医师负责评估患者的病情、危险性以及住院的必要性。医生对非自愿住院的态度与观念直接影响着非自愿住院的评估与决策过程，基于医生受培训的水平及其对于危险性的个人理解不同，对非自愿住院的标准解读存在差异，也有可能出现延伸甚至忽略法律标准但记录在案时却又自圆其说的情况。

复查与鉴定机制虚置。为纠偏初诊可能失误而设的复查与医学鉴定程序，在实践中几近“休眠”。《精神卫生法》确立了进一步的诊断核查或再次诊断，以及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制度<sup>[2]</sup>，以保障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或疑似患者及其监护人的救济权。但目前仍然存在再次诊断程序空转，委托医学鉴定数量屈指可数等情况。实践中专门的精神障碍医疗鉴定机构和人员数量也较少<sup>[9]</sup>。在张某琼案中，原告在多次提出自己没病的情况下，被告医院的主治医生没有做进一步的诊断和检查，且在原告入院第三日进行辅检，记载“结果轻度异常，患者无相关临床体征，暂观察，择日复查”，并未及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联系其家属或者听取患者意见，作出合理的判断，因此，被告的诊疗过程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针对复查鉴定制度而言，有学者指出这一程序并不构成独立的救济途径，而是类似针对初次诊断结论的一种复核、确认程序，客观上并不具有定分止争的效果，无法起到替代司法有效审查的功能<sup>[10]</sup>。同时，实践也面临鉴定技术难度大，法律风险高，缺乏专门的工作细则、指南和监管的问题。

### 1.3. 救济阶段：诉讼路径错位

权利救济的最终保障系于司法。然而，当患者因强制医疗行为受损而寻求司法救济时，通常陷入向谁主张权利的诉讼路径“迷墙”。正如前文所述，强制医疗过程蕴含公安机关的强制送诊与医疗机构的诊断收治两个阶段，行为性质的交叠引发司法认知的严重分歧。如在“陆某、盘锦仁爱医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sup>[11]</sup>中，原告以医疗机构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法院认为医疗机构的强制医疗行为系因前一个强制送医的行政行为产生，该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故而裁定驳回了原告起诉。但在“罗某与济宁市卫生计生委、济宁市某医院卫生行政强制案”<sup>[12]</sup>中，法院认为济宁市某医院强制性对罗某实施治疗行为，是法律授予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的诊疗权，是出于医学需要的诊疗行为。该行为不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故裁定对罗某的起诉不予受理。矛盾的是，实践中亦不乏将医疗机构视为民事主体，以生命权、健康权乃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立案审理的案例。司法机关对医疗机构的非自愿收治这一行为的法律定性摇摆于“民事诊疗行为”与“行政授权行为”之间，直接导致了案由选择、举证责任分配乃至最终受理与否的裁判乱象。此种根本性分歧，非但令患者无所适从，更使司法作为权利救济最后防线的功能在程序启动之初即告失效，形成了患者权益保障的真空状态。

## 2. 法理基础：行政强制医疗法律性质重释与原则适用

行政强制医疗程序的困境深层症结在于强制医疗程序内的法律关系错位，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与医疗机构的专业行为被制度强行绑定，却又在责任承担时相互推诿。因此，首先需厘清公安机关强制送诊的行政法定位，进而辨明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权力边界，最终通过重申比例原则的约束框架，形成行政强制医疗程序的理性逻辑。

### 2.1. 公安机关送诊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虽有观点认为，公安机关将疑似精神病患者送往医院的行为同《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第2款规定的“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与强制隔离戒毒类似，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受行政强制法所载的程序性规定规制。但公安机关强制送诊行为的

法律定性需回归行政强制概念的本质。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为了预防、制止、控制违法行为或危险状态,或者为了查明事实、保存证据,依法对相对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采取暂时性限制的行政强制行为<sup>[13]</sup>。强制送诊行为形式上符合此定义。从主体上看,《人民警察法》第6条明确赋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专属职责。当精神病人存在自伤或危害他人安全之虞时,公安机关具备实施人身强制的法定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书中关于公安机关采取精神病人强制治疗措施案件的审查要点载明,从我国现行制度看,除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要求送强制治疗的情况外,原则上强制治疗措施的决定机关应当是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实施机关是公安机关指定的精神病医院等医疗机构。<sup>[14]</sup>公安机关采取约束性手段将处于发作状态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送往医院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属于可诉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践中,如村委会、街道办等其他主体的参与,仅属协助执行,法律效果仍归于公安机关。例如重庆徐某案中,村委会虽协助联系医疗机构,但法院仍认定公安机关为送诊决定的唯一责任主体。从行为目的上看,行政强制送诊是以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为公益目的。强制送诊一方面使得精神病人及时接受医学诊断,避免健康风险恶化;另一方面也阻断精神病人可能引发的连锁性社会危害,维护公共安全秩序。从手段方式上看,行政强制送诊具有一定的处分性。行政强制措施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暂时约束性或者限制措施,是过程中的措施,不是对相对人权益的最终处理。行政强制送医是对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处置措施,其过程较完整的强制医疗程序具有流程上的暂时性、过程性。

## 2.2. 医疗机构行使专业判断权

行政强制医疗程序中另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医疗机构承担的是何种角色,或者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性质究竟几何。该问题原因肇始于我国独特的法律制度安排。

从比较法上看,强制医疗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国家监护权与警察权的公法属性,故各国普遍将决定权赋予司法或准司法机构<sup>[15]</sup>。美国、德国等采用法院审查模式,日本采用行政机关决策机制,苏格兰则设专门裁判所行使审查权。无论何种模式,医疗机构仅承担医学评估职能,入院决定权始终归属于中立公权力机构。

然而,我国《精神卫生法》所规定的入院收治的决定主体却迥异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医疗机构及其精神科医师需依据患者精神健康状况和医学标准进行诊断评估,并直接判断患者是否符合第30条第2款规定的非自愿住院条件,从而决定是否违背其意愿收治入院。这意味着在行政强制医疗的入院收治阶段,决定权实际掌握在医疗机构手中。<sup>[16]</sup>公安机关虽依据《精神卫生法》第28条负责强制送诊,但后续的诊断、留院、治疗及出院等关键环节的决定均由医疗机构基于其专业职责作出。因此,公安机关仅需对其强制送诊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承担责任,而不对后续诊疗行为的合法性负责。

综合而言,行政强制医疗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包含双重法律程序的体系。公安机关实施的是行政决定,而医疗机构履行的是专业技术判断。二者虽在程序上前后衔接,但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属行政职权范畴,后者属医学专业范畴。司法实践也印证了这种区分,如在李某亲属诉某市公安局案中,司法机关仅审查公安机关认定“存在危害风险”的事实依据与程序正当性,而将医疗机构的诊断结果视为潜在的民事争议问题,明确体现了不能以医学诊断替代行政判断的原则。

## 2.3. 行政强制医疗的比例原则适用

传统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行为与执法目的之间应当合比例或具有对称性,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使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侵害减小到最低限度。<sup>[17]</sup>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比例原则衍生为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判断标准。行政强制医疗中前一阶段行政强制送医属于行政行为,其应遵循比例原则。后一阶段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虽具民事属性,但目的上不可否认存在防止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伤害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利或者威胁公共安全,与限制精神障碍患者自由之间的平衡关系。后一阶段程序的进行亦应当遵循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涵盖三项子原则,分别为必要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最小损害原则。在此语境之下,各实施主体应该根据比例原则对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患者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一方面,在行政强制医疗的正当性论证中,必要性原则要求强制措施必须作为最后干预手段,

当临时性处置无法消除精神障碍患者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质威胁时，方得启动强制治疗程序。对于具备治疗意愿或未达危险标准的个体，以及未罹患精神疾病者，强制治疗显属不必要。另一方面是相称性原则考量。在行政强制医疗过程中，强制与治疗应当是并列的“手段”。因此，无论是送医阶段还是治疗阶段，都应当进行斟酌、比较，权衡，从而选择更有力的措施。公权力主体在送医阶段应当采取对人身自由限制最小的约束手段。在治疗阶段禁止以惩罚为目的延长处置时限，确保强制手段与诊疗目的具有直接关联性。

### 3. 困境纾解：行政强制医疗制度的路径完善

行政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需以程序正义为基石，以比例原则为标尺，构建实体要件法定化、诊疗决策中立化、救济路径明晰化的三维框架，在公共安全与个体尊严间寻求动态平衡。

#### 3.1 强制送诊环节的合法性

在“疑似”要件的判断上，公安机关并非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出警民警亦非专业医生，当事人只要符合《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公安机关即可当机处置，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医诊断，不能苛责现场民警必须具有十足把握后才能实施送医行为，更不能以医疗诊断来推翻之前的送医诊断行为的合法性。由此，公安机关现场处置可依据如暴力攻击、自伤未遂、意识严重错乱等显性行为表征，启动临时约束，并同步固定音像证据。对于言行异常等非紧急情况，可通过精神科医师的初步远程评估后再行决定是否启动强制送诊程序，从源头上减少“被精神病”现象。通过《执法指引清单》明确禁止启动强制送诊的负面情形，将比例原则的“最小侵害性”嵌入执法前端。对于已经实施较为严重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可以确定其人身危险性，无需精神科医师参与人身危险性有无的判断。

在人身危险性的判定上，应当严格限定危险客体的范围，彻底剥离财产损害与危险性要件的关联性，地方性条例中“财物损失价值标准”等量化指标不应再适用。对于“伤害自身危险”的认定，宜借鉴刑法学中现实紧迫危险理论，要求危害行为必须具有即时性、直接性与重大性特征，如公安机关应当排除单纯生活失序状态，以医学上的轻微伤害程度作为判断基准。对存在现实人身危险的精神障碍患者采取临时约束措施，其正当性基础在于，一方面既为阻断正在发生或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危害行为提供紧急干预手段，另一方面也为后续专业医学评估创造必要前置条件。此种约束措施的实施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采用对人身自由限制最小的器械装置，并在现场控制后2小时内完成与医疗机构对接，通过递进式适用标准的设计，防范社会管理成本不当地转化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事由。

#### 3.2 诊疗决策程序的实质性

我国现行法框架下，医疗机构作为法定诊断主体，通过其所属精神科执业医师具体实施诊断活动，医师个体行为法律效果归属于医疗机构。因此，在诊疗决策程序中，重点要求医师恰当、合法履职。在资质要件层面，应当避免用心理咨询师替代医师进行诊断决策。参考《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的创新规定，应将诊断主体资质提升至主治医师以上职称，并实行双人独立诊断制。此种升级不仅因应强制医疗涉及重大人身自由限制的特殊性，更源于主治医师群体的专业积淀。根据《临床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作为中级职称的主治医师需具备一定的临床经验并完成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其专业判断能力显著高于初阶执业医师。双人诊断机制则通过交叉验证防控个体认知偏差，诊断意见分歧时，可以引入专家会诊程序，进而有效避免由1名医师武断诊断的程序瑕疵。治疗实施过程更需贯彻动态比例原则。封闭治疗措施的适用必须遵循“必要且最小”标准。建立“封闭式→半开放→开放式”的病房分级转换机制，当患者攻击性降至中度以下（BVC量表≤15分）时强制转出封闭病房，使医疗机构从“强制决定者”回归“专业服务者”的本位。

#### 3.3 救济路径的体系化

行政强制医疗相关诉讼的救济路径完善，重点在于诉讼性质定位、精神障碍患者诉讼能力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行政强制医疗属于民事抑或行政诉讼性质的困惑，需探索更具实质正义的解决模

式。当前实践中法院多以人格权侵权或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处理此类案件,导致审理焦点聚焦于诊疗过失审查,忽略了非自愿住院决定的合法性审查这一争议性前提。将决定合法性的争议完全嵌入一般侵权赔偿的民事诉讼框架中处理,不仅法理不通,实践效果亦不彰。因此,当精神障碍患者认为公安机关强制送医行为不当时,应当引导其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中适用行政诉讼中“明显不当”等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进行裁量。当精神障碍患者认为医疗机构诊疗行为不当时,应当按照民事案由进行审理。

其次,在精神障碍患者诉讼能力认定上,必须摒弃“以病推定无能力”的错误逻辑,回归法定程序。法院不应仅凭原告患有精神疾病的既往诊断就简单推定其不具备诉讼能力并据此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根据《民法典》第24条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认定自然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属于法院专属职权,且必须经由特别程序作出生效判决后方能确认。该程序启动主体应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法院在未经此法定特别程序宣告前,无权主动认定原告无诉讼能力。换言之,在行政强制医疗诉讼中,只要患者未被依法宣告为无/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应推定其具有完全诉讼能力,法院不能以此为由剥夺其诉权。针对患者诉讼能力可能存在疑虑的情形,应引入诉讼辅助人制度或适当能力支持机制,如允许患者委托信赖之人协助诉讼,或由法院指派的特定人员提供必要诉讼指引,而非直接否定其诉权资格。

最后,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应将治疗过程并无不当的举证责任划归医疗机构承担。当前将证明侵权责任成立的一般民事举证规则机械套用于此类案件,导致本就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患者难以证明复杂的医学决定瑕疵,显著背离公平。法院必须考虑到医疗机构在此过程中也是履行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与普通民事主体的自愿交易或医疗服务行为仍存在一定的区别。换言之,行政强制医疗的手段强制性决定了应由医疗决定方承担“自证清白”的责任。依据《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医疗机构作出收治决定时,已负有依法判定患者符合“严重精神障碍+伤害自身/他人风险”双重要件的强制性义务。因此,合法性争议的核心在于医疗机构当时所作判断的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规。医疗机构掌握作出该决定所依赖的全部诊断依据、评估记录和决策程序文件,在专业信息与证据控制上拥有绝对优势,由其负担核心事项的举证责任符合客观事实与证据距离原则。其一,促使医疗机构在决定时即审慎取证、规范操作,从源头减少违法决策风险;其二,减轻患者在诉讼中“自证无病”或证明医方违法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扭转诉讼力量失衡;其三,契合“谁主张积极事实、谁掌握证据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理,避免法院不得不审查原告精神状况的悖谬局面,保证裁判实质审查医方行为的合法性。

#### 注释:

(1)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28条第2款和第30条第2款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诊。

(2) 《精神卫生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公示经公告的鉴定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应当指定本机构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2名以上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并及时出具鉴定报告。司法部《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精神卫生法做好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3〕104号文)中对医学鉴定的资质作出明确规定,同时规定须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登记后方可开展此项鉴定。

#### 参考文献:

- [1]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16年第10辑,总第104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73.
- [2] 张五芳,马宁,王勋,等.2020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现状分析[J].中华精神科杂志,2022,55(2):122-124.
- [3] 化国宇.公安机关介入精神病人行政强制医疗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94.
- [4]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川行申1579号行政裁定书[Z].2025.
- [5]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行终683号行政判决书[Z].2017.

- [6]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14)渝五中法少行赔终字第 00205 号判决书[Z]. 2014.
- [7] 陈绍辉. 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诉讼案件的司法裁判及其困境[J]. 残疾人研究, 2022(1): 28-29.
- [8]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 (2016)鄂 0802 民初 238 号民事判决书[Z]. 2016.
- [9] 刘鑫、赵彩飞、马长锁.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的不可行性分析[J]. 中国司法鉴定, 2018(1): 90-95.
- [10] 岳远雷, 陈绍辉. 英国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制度及其启示[J]. 医学与哲学, 2021 (18): 64.
- [11] 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辽 11 民终 1414 号民事裁定书[Z]. 2021.
- [12]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济立终字第 3 号行政裁定书[Z]. 2015.
- [13] 方世荣. 行政法原理与实务[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140.
- [14] 刘德权(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二版)行政及国家赔偿卷②[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 429.
- [15] 刘子怡, 肖巍. 非自愿住院制度: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伦理分析[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2 (12): 1291-1294.
- [16] 魏晓娜. 从“被精神病”再现看我国非刑强制医疗制度之疏失[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5 (4): 128.
- [17] 刘海燕. 比例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运用[J]. 人民司法(应用), 2013(13): 101.

(校对: 田笑潇 排版: 袁骁)

# 比较法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本土化构建

林立栩<sup>1\*</sup>, 李锐晴<sup>1</sup>

(<sup>1\*</sup>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程中, 存在着对于既有处于保护期限内的著作权的侵权风险。美国、欧盟和日本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认定问题上有着深入了解并形成了借鉴经验并形成可借鉴经验。而在我国现有的著作权理论下,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行为既无法排除于“接触+实质相似性”的标准之外, 也无法被纳入“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范围内, 从而被认定为侵权, 这与国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方针背道而驰。因此, 建议采用比较法视角, 以实用主义思维平衡创作者权益与公共利益; 通过优化和调整“合理使用”制度, 构建“法定许可+标识”制度, 推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本土化构建。

**关键词:**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著作权侵权; 比较法; 本土化构建

## Localized Construc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for AI-Generated Content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Lin Lixu<sup>1\*</sup>, Li Ruiqing<sup>1</sup>

(<sup>1\*</sup>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Department of Law,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64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AI-created content,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risk of infringing upon existing copyrighted works still within their protection perio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for AI-generated content, forming valuable experiences worth referencing. However, under China's current copyright framework, AI-generated content cannot be exempted from the "access + substantial similarity" standard, nor can it be categorized under "fair use" or "statutory licensing," leading to its classification as infringement. This contradicts the national policy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AI and protecting AI-generated content.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adopt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balancing creator rights and public interest through pragmatic thinking. By optimizing and adjusting the "fair us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statutory licensing + labeling" mechanism, a robust protection framework for existing copyright holders can be developed, promoting the localized construc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for AI-generated content.

**Keywords:** AI-generated conten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omparative law; localized construction

## 1. 问题的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矛盾

随着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人工智能将能够完成越来越复杂且有创造性的任务，在“DeepSeek”风靡全球的背景下，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同场景之下的法律风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指人类利用计算机等人工智能系统，依照预先设定的软件代码和算法规则自动生成的相应内容，其核心在于以人类创意逻辑编码为算法，利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使机器能够模仿人类创作模式，并输出符合特定目标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文本内容、美术内容、音乐内容、电影内容等。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传统著作权的保护呈现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按照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程中，依赖于大量的资源收集与数据分析，主要有三种方式<sup>[1]</sup>：其一是对于纸质化作品的数字化提取。如谷歌数字化图书馆等对于纸质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其二是通过爬虫协议获取数据；其三是通过数据库获取数据。而相关的资源和数据必然会包含他人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权利，从而构成对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汇编权、表演权等著作权侵权。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不当接触+实质相似性”的标准从而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可能性较大，且难以适用“合理使用”制度与“法定许可”制度。在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并判决的首例人工智能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法院认定“临时复制”构成接触，强调了临时复制行为对作品传播和使用的潜在影响，被告因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与原告作品存在实质相似性而承担著作权侵权的法律责任。在此背景下，若按照侵权要求相关主体承担巨额赔偿责任，虽保护了原著作权人的权利，却极大地限制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反之，若允许人工智能在训练学习过程中不受约束地攫取数据，复制或采集仍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作品，这无疑将打击原著作权人的创作激情，不利于营造鼓励创作的积极氛围。

纵观现有立法，在《国务院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人工智能法草案”再次列入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项目。可以预见的是，国家对人工智能的重视与日俱增，人工智能专门法的制定也踏上日程。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规范性文件中，国家逐步强调对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鼓励与支持，强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保护之重要性。然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究竟如何认定却存在缺失状态。

因此，研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本土化构建已经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侵权纠纷也逐渐增多但司法实践对于相关案件的判决的大相径庭，迫切需要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认定标准对人工智能的生成行为加以规制。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发展较为迅猛的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已经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行为进行全面的规则，对于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侵权认定也形成完备的标准和体系，而我国也应当结合本国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人工智能与著作权保护的协调发展，为文化创新与产业繁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基于此，本文通过比较法批判性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并围绕现行《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侵权认定进行解构，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的认定标准。

## 2. 比较法镜鉴：域外经验的批判与借鉴

针对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的过程中训练和使用海量数据资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不尽相同。对此，本文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做法，借鉴行之有效的路径，为我国构建侵权认定标准提供可供参考的策略。

### 2.1. 域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

#### 2.1.1. 美国：以“转换性使用”为重要标准认定合理使用

“转换性使用”理论源于 Pierre N. Leval 法官<sup>①</sup>针对美国著作权法中认定合理使用的第一个要素（即使用目的和性质）<sup>②</sup>所提出的解释，即转换性使用要求对原作品进行实质性改变，以不同的方式或为不同的目的使用原作品，并在原作品的基础上增加新的表达和见解。这一理论被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适用于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一案中<sup>③</sup>，日益成为美国法院权衡某一作品是否应纳入合理使用范畴的重要认定标准。

美国法院亦在多项司法判例中对转换性使用理论予以肯定，认定人工智能利用现有数据生成内容构成合理使用。在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案中<sup>④</sup>，法院认为谷歌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制作版权作品的数字副本，并将其作为检索工具以实现搜索功能，这一行为在使用目的上具有转换性，符合“转换性使用”的标准；而在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 Trust* 案中<sup>⑤</sup>，法院同样认为，图书馆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构建全文搜索数据库的行为，亦属于具有变革性的使用方式。对比上述两个判例，不难发现谷歌公司是营利性质的，而图书馆是非营利性的，可见美国并未对人工智能训练和文本与数据挖掘（Text and Data Mining，简称“TDM”）的商业性质加以限制，在满足转换性使用条件的基础上即可构成合理使用。此外，*A.V. v. iParadigms, LLC* 案<sup>⑥</sup>、*White v. West Pub. Corp* 案<sup>⑦</sup>等判例，均为美国作出的有关认定 TDM 属于转换性使用的经典裁判。

2.1.2. 欧盟：“选择—退出”框架下 TDM 的限制性例外

2019 年 3 月，欧盟推出《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简称《DSM 版权指令》），其中在第 3 条和第 4 条规定了 TDM 的两个例外<sup>⑧</sup>。《DSM 版权指令》第 3 条规定，科研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为科学研究目的进行 TDM，对其合法获取的作品或其他内容进行复制与提取的行为属于例外；而第 4 条规定，以 TDM 为目的，对合法获取的作品或其他内容进行复制与提取的行为属于例外，但权利人有权提出保留。二者同为 TDM 的例外，但构成要件存在明显区别，具体对比见表 1：

表 1 《DSM 版权指令》第 3 条与第 4 条的比较

	第 3 条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文本 和数据挖掘	第 4 条 文本和数据挖掘的例外或限制
适用主体	科研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	符合规定的任何主体
适用目的	科学研究	TDM
适用行为	复制与提取	复制与提取 (权利人明确提出保留使用权 的除外)

近年来，欧盟持续关注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逐步完善 TDM 侵权问题的立法。2020 年 2 月，欧盟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European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ust）要求保存训练数据的相关内容<sup>⑨</sup>；2024 年 3 月，欧洲议会正式发布的《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明确了模型提供者披露训练数据的责任要求<sup>⑩</sup>。此举将有效预防人工智能对权利人声明保留数据的隐秘性滥用，并在 TDM 的例外框架下，促成人工智能进步与现有著作权保护之间的平衡。

2.1.3. 日本：豁免以“不享受”为目的的信息分析活动

在日本立法中，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过程中学习和训练数据的行为属于“信息分析”<sup>[2]</sup>。2009 年日本《著作权法》第 47 条之 7 规定使用计算机而进行的信息分析活动属于合理使用，同时也严格限制了其范围：首先，信息分析的方法限定于“统计式的解析行为”之内；其次，对于信息分析结果的利用方式，被界定为在记忆媒介上进行“记录复制”或对“改编”后的二次创作作品进行“记录”。而人工智能开发中需要采用“代数方法”等方法，若为了满足法条的规定而舍弃运用多元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难以实现质变的突破，以及人工智能所依赖的多个数据库供应商通过“公共传输”方式共享数据资源的新兴应用需求<sup>[3]</sup>。

为顺应数字化变迁，日本于 2018 年修改《著作权法》，从严苛的条件限制变革为开放的适用条件，且在后续的立法修改中得以延续。第 30 条之 4 规定了在“不享受”前提下，豁免人工智能的信息分析活动，但不得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第 47 条第 5 款处规定了经过人工智能信息

处理后的作品可以在必要限度内向公众提供。相较于 2009 年日本《著作权法》中的“信息分析”条款，此次修订将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扩展至“任何方式”，使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能够运用代数分析、矢量空间分析等多种方式；此外，取消了对信息分析结果仅限于“记录”的限制，允许人工智能开发者向公众分享创作成果，更好地满足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sup>[4]</sup>。

## 2.2. 域外经验的反思与借鉴

纵观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针对人工智能获取和利用数据进行创作的行为，各国总体上持积极包容的态度，允许特定情况下未经许可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在立法本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一是关于人工智能获取和利用数据例外条款大多是从适用主体、适用目的、适用行为、限制条件等方面规定的，而非对既有法律制度进行直接的、根本性的变革，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二是各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达和重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人工智能 TDM 的豁免程度，就目前域外的立法情况而言，允许人工智能在一定条件下进行 TDM 的国家和经济体的科技水平相对较高<sup>[10]</sup>。

鉴于各国在国情、法律体系及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差异性，直接将域外经验套用于中国实践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不同于英美的判例法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以成文法为主，司法实践中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和应用相对严格，美国“转换性使用”理论虽具有灵活性，但其判断标准较为模糊，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导致法院在实务中的裁量权过大，可能引发司法混乱，且美国依托成熟的数据交易市场与集体管理制度（如 CCC 版权结算中心），而我国目前数据权属不清、许可机制缺失，直接引入“转换性使用”可能引发滥权风险；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更注重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突破，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更侧重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和规模化落地，欧盟和日本的立法均以满足某种宽泛的义务便可获得豁免为倾向，这对于实践中人工智能肆意获取数据导致侵权的后果仍无法有力制止。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和拓展，人工智能已成为我国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但我国在人工智能利用数据方面的立法存在不足，将不利于人工智能带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因此，应立足中国具体国情，有选择性地借鉴各国或地区的优秀经验，加快创立我国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认定标准，为促进科技进步搭建良好的法律保障框架。

## 3. 现行《著作权法》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认定

### 3.1. 著作权侵权认定标准的适用

现有的著作权理论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主要考察“不当接触”和“实质相似性”两个层面，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这一行为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规避这一认定标准，从而构成著作权侵权。一方面，“接触”考虑的是是否存在侵权的可能性，也是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前提。司法实践中，法院常以作品公开发表为由推定“接触”的存在，对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而言，在输入和输出两个阶段需要大量信息输入并完成内容生成，而大量的信息中必然包含着对于他人受保护作品的接触。另一方面，“实质相似性”是著作权侵权的结果要件，要求侵权作品与著作权作品之间在独创性表达方面出现内容重叠，本质上是侵权人主动使用著作权作品且在独创性表达内容层面建立侵权作品与著作权作品之间的具体逻辑关联<sup>[5]</sup>。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保留了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特征，且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而认定符合“实质相似性”的标准。基于此，依照现有的著作权理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解构，在诸多的情况下这一行为符合“不当接触+实质相似性”的构成要件，构成对于著作权侵权的风险较大。

### 3.2. “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

在立法目的层面，“合理使用”制度作为著作权保护的例外情形，其不仅能保护创作者的权利，还有助于促进文化、学术和技术的进步，满足公众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需求<sup>[6]</sup>。然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而言，该制度的适用却存在较大的挑战。在输入和输出阶段，人工智能需接触大量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作品并生成新作品，明显不符合合理使用制度对于“少量使用”的要求；同时，内容生成的过程中离不开与商业利益挂钩，也与该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在具体适用层面，纵观“合

理使用”制度的列举情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难以与其中任何一条完全匹配。与之略有关联的如“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中人工智能的“学习、研究”系科技巨头打造、升级科技公司的产品，而并非满足人形机器人自身对于自身学习的需求<sup>[7]</sup>；“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使用”中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训练活动并不能符合或者不限于科研教学之所需；“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而复制”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而言也难以符合相关的条件。而对于著作权法第 24 条所列举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言，我国目前尚未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于相关问题有具体规定，因此不能当然地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纳入该范围。因此，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具体的制度内容进行解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均难以被划入“合理使用”的范围从而得到豁免，相关的侵权认定依旧在所难免。

### 3.3. “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

现有法定许可制度主要针对特定、有限的使用场景，而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的复杂性与广泛性导致其难以适用。从立法目的而言，法定许可的正当性源于对权利人“独占权”的合理限制，但要求权利人获得合理补偿。但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由于其数据来源和生成内容的不可控性，导致其与“法定许可”制度设立之“可控使用”的初衷背道而驰；同时，“法定许可”制度许可的范围限于“教育、科研、公共传播”等有限的公益领域，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能涉及到其他的如营利性的内容。从条文适用而言，现行“法定许可”制度下并无可匹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条款；从实际操作而言，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过程的特点决定了只有大规模、大批量的作品数据才能够发挥意义。而在传统许可模式下，作品使用者需要与作者订立著作权许可合同才能取得使用作品的合法性地位。然而，对于人工智能而言，过高的授权成本使得人工智能开发者不倾向于采取著作权许可的方式获取作品数据，从而导致侵权现象频发<sup>[8]</sup>。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难以适用“法定许可”制度。

综上所述，在现有《著作权法》之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因符合侵权认定标准而被认定侵权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也难以被纳入“合理使用”或者“法定许可”等豁免制度的范围当中，极大阻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亟待优化现有制度，推进侵权认定的本土化构建。

## 4.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本土化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工智能发展与传统著作权保护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推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认定的优化路径，调和与缓解矛盾成为现实所需。建议立足于现有的著作权体系，以著作权保护为基础，以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为目标，借鉴他国有利经验，建议调整和优化“合理使用”制度、构建“法定许可+标识”制度、建立健全对既有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机制。

### 4.1. 本土化视野下的价值取向

#### 4.1.1. 从先验主义转为实用主义的移植思维

移植法律要求的是建构本土化的制度体系，平衡社会的价值冲突，从而实现良法善治。推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本土化构建，应当摒弃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先验主义，从而采取实用主义，回应国家内部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成既符合本土需要又适应全球化的张力性法律机制。重新审视当下的社会条件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结合我国的法治传统与社会实际，平衡人工智能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关系，以实用主义的方法将知识产权移植法进行本土化改造，并结合改革发展导向进行制度调适。

#### 4.1.2. 平衡创作者权益与公共利益。

2024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首个关于人工智能全球决议中明确了技术发展对人类创作的重要性。同时，日本《关于 AI 与著作权相关问题的意见》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都强调了著作权豁免应当基于“用于信息分析”和“科研”等目的。运用人工智能是一个为人类所利用的创作工具，工具的革新和进步可能改变作品生成的方式和效率，若以此为理由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会带来不合理损害，则科技进步将不复存在。因此，以“平衡创作者权益与公共利益”作为“本土化构建”的落脚点与前提，首先应当考虑适当性问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是基于公共政策或者技术发展目的；其次是必要性问题，采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对于现有路径已经用尽而必须采用或

者损害最小；最后是均衡性问题，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过程中对于现有作品的使用与公共利益是否平衡。

## 4.2. 本土化视野下的具体制度设想

### 4.2.1. 适度扩张“合理使用”制度

现有的“合理使用”制度无法涵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一行为，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因为输出的内容可能产生著作权侵权风险，就“一刀切”的否定合理使用条款的适用，可能将影响繁荣文化、促进公共利益的制度价值<sup>[9]</sup>。《最高院意见》第8条规定，在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发展确有必要的情形下，考虑作品使用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因素，如果该使用行为既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至于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正当利益，可以认定为合理使用。

基于此，建议通过法律解释或者法律拟制，丰富《著作权法》第24条兜底条款“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规定“为开发、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已发表的作品，且该使用不会对作品的正常使用造成不合理的损害，也不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

#### (1) 明确“合理使用”行为的范式。

其一，在人工智能输入阶段，应当被归入“合理使用”的范围之内。对于人工智能而言，输入的过程也是开发、训练、掌握语言规则的过程，从训练AI模型的技术原理来看，其进行数据训练的过程是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一定时间以来的公开数据进行获取，使用跨模态模型进行处理后，获得图文的训练数据，然后再通过数据预处理（转换格式、读取标签等），进行神经网络训练。这种复制行为不构成对这些作品的实质性使用，仅是“非表达性的使用”，在使用结果上也未再现原作品的艺术价值。同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海量的数据需求需要高额的获取成本，若将输入阶段排除于“合理使用”制度之外，则会形成“数据壁垒”，难以获取相关数据将导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无从进行。

其二，在人工智能输出内容阶段中，需要考量的是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是否以原样呈现为目的对作品进行接触，是否对作品的价值及在市场中的需求形成替代，是否掠夺权利人在公开平台上发表作品带来的流量。应当对内容的性质做区别对待。首先应当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根据是否生成新作品做表达性和非表达性的区分，若未生成新作品即非表达性只是单独的引用，并不会对原作品形成“替代”，则适用“合理使用”制度认定为不侵权。而对于表达性的行为，则建议借鉴美国版权法中关于“转化性使用”的区分标准，并结合我国实际，构建“限制转换性使用”认定标准。应当考察“否呈现出与原作不同的新用途或新表达，是否让原作品展现出创造性变化”<sup>[10]</sup>，具体对以下两个层面进行考量：其一是“实质性新表达”，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需对原作品进行“创造性解构与重构”，形成显著区别于原作的表达形式或功能目的，排除单纯技术性修改（如分辨率提升、色彩调整）或碎片化拼接（如自动生成“洗稿”内容）的行为，如对于绘画作品转化为3D建模并用于工业设计中可被认定为“合理使用”。其二是“市场非替代性”，如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导致原作品销售量下降超过10%或许可收入减少超过20%，则应当推定为存在市场替代性损害，否定转换性使用抗辩。当然，若作品系公益性、科研性使用（如文化遗产数字化复原）不受市场替代性限制，但需标注来源且禁止商业化利用。

#### (2) 排除“不合理使用”行为。

排除不合理使用的行为，既是对既有作品正常使用的保护，也是对既有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所谓之“不合理使用”的行为主要包括：其一是直接商用行为，如将相关内容直接用于营销或者售卖；其二是原作品产生代替作用的行为，如由于未构成“转化性使用”而与原作品形成大量的雷同或者类似，从而影响原作品的市场；其三是超过必要限度，如使用远超过训练所需的数据量，或者使用未公开发表的作品。

### 4.2.2. 搭建“法定许可+署名”模式

在构建“限制转换性使用”标准完善“合理使用”制度的背景下，需满足“转换性目的”且“不影响原作品市场价值”，难以覆盖大规模、系统性、非创新性的使用需求。例如，人工智能所生成的短视频批量使用音乐片段作为背景音，若缺乏明显“转换性”，无法通过合理使用免责。其次，“合理使用”制度之下权利人无法从使用行为中获得经济回报。通过完善“法定许可”制度，搭建“法定

许可+署名”模式，一方面通过法定许可提供“付费即合法”的通道，针对高频、批量使用场景避免因逐项授权导致的交易成本过高；同时填补“非转换性但需开放”的规制空白，对符合“功能性、非创新性但具有公共价值”的情形如文化遗产数字化、药品说明书汇编等赋予“法定许可”之使用权限。

基于此，建议在现行《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增设“之一”：“使用已发表作品训练人工智能或生成内容，应当标注原作者及作品来源，并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报酬，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权利人声明禁止的除外。”

(1) 对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探索科学的标注制度。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制定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下称《标识办法》）为搭建“法定许可+署名”机制提供了制度根基。其一，以标识义务作为法定许可的前置条件。根据《标识办法》第5条，显式标识（如文字水印、语音提示）成为法定许可中“标注原作者及作品来源”的唯一合规形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当在显著位置注明“基于[作者][作品]训练，由[AI工具]生成”的固定格式，未按《标识办法》要求标识的，视为未履行法定许可署名义务，丧失免责资格。其二，强化服务提供者在生成合成内容传播活动、上架或者上线审核、服务协议中明确说明等义务，对违反《标识办法》的行为予以处罚。

(2) 探索人工智能数据使用的利益补偿机制。基于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首先可按比例补偿，根据作品在训练数据集中的占比，结合人工智能开发者的总收入或利润，按比例分配补偿金（假设某作品占训练数据总量的0.01%，人工智能开发者年利润为1亿元，则补偿金为1亿元×0.01%=1万元）；其次可分级补偿，依据使用作品的类型、市场价值和使用场景的区别，设定不同的补偿标准；最后设定补偿的固定费率，针对无法精确计算贡献的情况，按统一的补偿费率补偿，使各方利益能够保持最大的平衡。

#### 4.2.3. 建立健全对既有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机制

##### (1) 明确人工智能开发者的数据披露和算法备案义务

针对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法来源的问题，在制度构建上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输入端的管控，可以更多地输出端和事后救济进行规制<sup>[11]</sup>，整体把控和防范人工智能数据使用的侵权风险。首先，完善训练数据的披露机制，参考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披露制度，可规定人工智能开发者主动公开数据使用的详细内容，包括数据训练的目的、数据来源、利用方式以及数据规模等；其次，建构算法备案制度，鉴于算法“黑箱”的存在，著作权人难以获知其作品是否被用作训练数据，<sup>[12-2]</sup>因此需规范开发者算法使用的具体流程，将算法设计、数据模型等进行备案留底，并确定各相关人员的权利保障和责任承担，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可知、可信、可控的方向发展<sup>[12]</sup>。

##### (2) 建立著作权人的作品“选择-退出”机制

为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避免作品被过分滥用或不当使用，可以参照适用欧盟立法中的作品“选择-退出”机制。该机制的运作主要包含两种方式，一是著作权人有权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其作品时，明确作出声明表示拒绝其作品被用于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使用，该声明应当得到尊重；二著作权人通过收到通知，或在开发者搭建的数据公示平台及版权作品公开检索渠道中获知其版权作品被使用后，有权在规定的时限内决定保留、删除或屏蔽其作品。<sup>[14-2]</sup>同时，该机制有可能会被著作权人肆意使用、阻碍人工智能的数据学习，故应对著作权人“选择-退出”的适用加以合理限制，实体上规定仅限于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极易被替代的作品，程序上规定发出拒绝声明的期限等必要内容。

## 5. 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侵权问题是数字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其核心在于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进步与既有著作权的保护之间的矛盾，为此各国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都在积极探索应对之策。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关键阶段，2025年春节前夕DeepSeek的崛起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明，而传统的著作权规则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的认定，将严重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鉴于此，我国应汲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在现有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下，引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构成合理使用的相关条款，搭建“法定许可+署名”制度，适当增添人工智能非享受性使用作品豁免条款，协调好促进科技进步与维护著作权人权益之间的利益关系，最终实现知识共享与创新驱动的双赢局面，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 注释:

① 参见 Levendowski A, How copyright law can fix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implicit bias problem, 93 Wash. L. Rev., 2018, p.579, 583, 584. Pierre N. Leval 法官在《朝向合理使用标准》中主张一种变革性的使用:“必须是生产性的,并且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或为不同的目的使用引用的内容……如果引用的物质被用作原材料,在创作中转化为新的见解和理解。”

②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lated Laws Contained in Title 17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 Article.107, Limitations on exclusive rights: Fair use: (1) the purpose and character of the use, including whether such use is of a commercial nature or is for nonprofit educational purposes; (2) the natur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3) the amount and substantiality of the portion used in relation to the copyrighted work as a whole; and (4) the effect of the use upon the potential market for or value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③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S. 569 (1994), paras.577-579.

④ Authors Guild, Inc. v. Google, Inc., 804 F.3d 202 (2d Cir. 2015).

⑤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 Trust, 755 F.3d 87 (2d Cir. 2014).

⑥ A.V. v. iParadigms, LLC, 562 F.3d 630 (4th Cir. 2009).

⑦ White v. West Pub. Corp., 2014 WL (S.D.N.Y.2014).

⑧ Council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2019]OJ L130/92.

⑨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 European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ust,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d2ec4039-c5be-423a-81ef-b9e44e79825b\\_en?filename=commission-white-paperartificial-intelligence-feb2020\\_en.pdf](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d2ec4039-c5be-423a-81ef-b9e44e79825b_en?filename=commission-white-paperartificial-intelligence-feb2020_en.pdf), last visited on March 16, 2025.

⑩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4-0138\\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4-0138_EN.pdf), last visited on March 16, 2025.

## 参考文献:

- [1] 刘杰勇.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基于比较法的视角[J].比较法研究,2024,(04):176-193.
- [2] 王静.类型化视角下人工智能数据训练著作权规则研究[J].电子知识产权,2024,(07):20-30.
- [3] 郑重.日本著作权法柔性合理使用条款及其启示[J].知识产权,2022,(01):112-130.
- [4] 关春媛.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版权合理使用探究:国际趋势、本土发展与规则构建[J].出版发行研究,2024,(12):91-97.
- [5] 孙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标准、价值辨析与规范应对[J].社会科学动态,2024,(10):42-49.
- [6] 李辛扬.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的著作权困境与纾解路径[J].传播与版权,2024,(23):103-106.
- [7] 顾伟,周响.人形机器人生成内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C]//上海市法学会.《智慧法治》集刊 2024 年第 1 卷——2024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文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2024:51-61.
- [8] 财联社.美国媒体揭开大模型阴暗面:训练用的数据可能有点脏[EB/OL].(2023-04-20).<https://new.qq.com/rain/a/20230420A006YV00>.
- [9] 周澎.生成式人工智能适用我国著作权制度的困境纾解[C]//上海市法学会.《智慧法治》集刊 2024 年第 1 卷——2024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文集.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2024:142-152.
- [10] 熊琦.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本土法释义[J].法学家,2019,(02):124-134+195.
- [11] 郭德忠,张云蔚.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侵权风险与法律应对[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05):78-86.
- [12] 陈兵.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及其法治应对[J].知识产权,2023,(08):53-73.

(校对:江涛、姬红杰 排版:袁晓)

# 新时代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及对策探析

郭文慧<sup>1\*</sup>

(<sup>1\*</sup>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进入新时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高校通过推进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 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采取了一定的举措。同时在落实过程中, 高校也面临着主题实践活动开设不足、民族院校与非民族院校重视程度存在差异等一些问题和挑战。面对这些问题, 高校可以通过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平台、完善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开展民族特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来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新时代; 大学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Guo Wenhui<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the central task of Chinese ethnic affairs as well a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iversities have launched various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to foster this consciousness. However, challenges pers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thematic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disparities in emphasis between Minzu universities and other universit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may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among students through key approaches that include establishing dedicated awareness-raising platforms, refining curriculum systems and pedagogical models, and organizing thematic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th distinct ethnic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he New Era;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 引言

2021 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 并指出以此为主线引领和指导我国的民族工作。2023 年 10 月 2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 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

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sup>[1]</sup>。这一总体要求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规划中的核心要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也逐渐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向。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sup>[2]</sup>。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核心任务,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以此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和行动自觉。当前,民族高校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基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阵地<sup>[3]</sup>。但非民族高校作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样是对大学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类高校应深刻领会新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时代内涵,切实认清当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并积极探索新时代背景下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新理念、新路径与新模式。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持续深化实践,国内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内涵、挑战、路径等维度展开了系统性、纵深性的研究。截至2025年8月10日,以“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获得相关论文共计1437篇,内容主要聚焦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的问题、路径探讨等方面,其中所提出的对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研究成果也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也对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课程设计、教师素质和学生主体自觉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 1. 概念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 1.1. 概念界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的组成部分,内涵丰富且意蕴深邃。为了更好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我们需从概念的角度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追踪其概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指向<sup>[4]</sup>,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是变动的、是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不断积淀进化形成的。从历史的维度追溯形成中华民族的脉络是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条件<sup>[5]</sup>。回溯历史,中国古代王朝更迭起伏,从先秦时期形成的“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到秦汉时期开始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再到后来的通商、和亲、互市,推动了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最终形成了如今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局面。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在中华大地上肆意妄为,各族人民在斗争中团结一心、福祸与共的民族共同体特征更加明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得以升华,成为各族人民的共享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的提出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成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指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现实的主观理解,这是人们在进行社会实践和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呈现出的态度、评价和认同的结果”<sup>[6]</sup>。因此,在准确界定和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费孝通先生观点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在辛亥革命以前,民众觉醒意识尚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大多以文化认同来区分,特指中华文化共同体。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寻找救国之路,民族之情空前高涨,由此加速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从认知到理论完善的过程,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的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项工作在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更加明确地被视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表明我们需要继续加强这一概念在群众中的认知,加强理论建设,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通过吸收国际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从理论内涵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坚定“五个认同”。从“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又一次重大突破,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积极性。

## 1.2. 问题的提出

深刻理解和把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把新时代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实具有重要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我国现代化的实现。为此,必须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重大政策和重要思想,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努力开创民族工作发展新局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说明在民族工作中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情出发,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实。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主要任务会有所不同,党的民族工作的聚焦点和着重点也会有所不同。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工作的目标是动员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新时代呼唤民族工作新局面,党的民族工作实现创新发展,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实践上有所发展,更加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更加澎湃,中华儿女把自身理想和中国梦联系起来,肩并肩、手挽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团结努力。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7]</sup>。这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要以物质基础来迎接挑战,更需要精神支撑攻坚克难,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理论的核心价值形态和价值取向<sup>[8]</sup>,是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武器。作为新时代大学生,肩负着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重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投身祖国建设。只有自身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2. 新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分析

### 2.1. 新时代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探索

通过调查研究,相关高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采取了一些举措,但也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

#### 2.1.1. 新时代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采取的举措

一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大学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体,而高校是开展民族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特别是民族院校在开展活动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教育效果。例如,中央民族大学组织学生参观民族博物馆,与小学生们开展民族知识问答;设立新闻学藏语基地班,成立“共言民语”公益项目。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成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开展了百项课题集成研究计划;开设非遗课程,举办民族特色运动会,开展援疆就业“星火计划”等等。通过高校开展的各种主题教育活动,可以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民族统一团结的意识,做到内化于心,并且自觉将这种意识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促进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做到外化于行。

二是利用特色校园文化引导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教育,会影响学生品格的形成,在“润物细无声”中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影响深远。湖北民族大学每年都会举办民族文化节、民族节日庆典,旨在共同创造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大校园。北京舞蹈学院会定期举办校园民俗体验活动,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专项助学基金,在民族地区建立了“艺术下乡”的社会实践基地。此外,部分高校建设了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长廊,还通过校训、校歌、校刊等载体来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三是在思政课堂中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思政课堂是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要途径,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公共课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课程。只有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思政课的功能定位,才能充分发挥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sup>[9]</sup>。中南民族大学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开设了“多彩中华”的通识选修课,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在公共思政课中也有涉及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通过讲述中华民族的发

展历程、英雄事迹和优秀人物的故事,引发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共鸣,增强对民族的热爱和认同<sup>[10]</sup>。

### 2.1.2. 新时代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问题

一是各民族学生之间交流与合作有限。部分少数民族同学在成长过程中和其他民族同学接触的机会较少,所以可能会出现对学校组织的民族团结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情况。高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主要以举办专题讲座和校园文化活动为主,而实际的互动性交流涉及相关内容不足,各民族学生基础性的交流远远不够。具体来说,部分高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还未完全实现全方位育人,缺乏一些各族学生彼此交流互动的平台,来实现各民族学生之间的自然融入。

二是高校主题实践活动开设不足。首先,高校关于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动大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如开设相关课程、举办专题讲座等等。但是部分高校教学内容设置并不明确,在主题实践活动方面开设不足,仅局限于校园内,利用课堂讲台和第二课堂来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未意识到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实践平台、宿舍文化等途径形成多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其次,很多主题实践活动培育方式过于单一,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一是高校对于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广度有限、力度不够、深度不足,主题活动取得的成效微弱。二是高校对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实践活动培育机制亟待完善。部分高校在开展实践活动时还存在“一锅炖”的现象,并没有针对不同民族、地区、年级的学生制定相应的培育机制,把相关工作进行细化。

三是民族院校与非民族院校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国家民委直属六所高校均成功入选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特色的校园文化,能够更好地利用多种载体帮助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非民族院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民族院校而言人才培养机制亟待健全,教育经费短缺;缺乏专门的民族理论政策课程、课程形式过于单一,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很难被调动起来。此外,民族院校和非民族院校所开展的活动侧重点不同。民族院校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通过各种民族特色活动来实现打造校园特色品牌文化的目的,学生在参与各种活动的过程中也可以和不同民族的学生互动交流,实现学生以校园为中心交往交流交融,体现“生活即教育”。非民族院校由于少数民族学生人数较少,所开展的活动相对有限,所以教学活动在涉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方面相对不完善、不多样。

四是协同联动不足,缺乏教育合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各级各类学校、家庭、社会乃至每个公民的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并且在教育目标、内容等多个维度上实现深度联动与协同,致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育人格局。当前,高校尽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形成全域化协同育人的理想格局仍有差距,一些结构性和机制性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部门分工协作不足。在高校内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相关职能往往分散在统战部门、宣传部门、教务部门等多个机构。然而,部分高校在推进这项工作时,由于缺乏学校党委层面高屋建瓴的统一规划、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统筹推动,导致各部门在工作中往往局限于自身职责范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与职能整合。这种“各管一段”的现象,使得教育资源难以共享,教育行动难以同步,教育力量被分散,难以形成强大育人合力。二是师生双向联动不足。教育的本质是师生间的互动与共同成长。然而,部分高校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时,其教育形式和方法仍显单一和传统。政策宣讲多为“我说你听”的单向灌输,课程教学也往往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这种模式下,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未能得到充分尊重,他们参与教育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被严重压抑。其结果是,教育过程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师生之间难以形成情感共鸣和思想碰撞,教育效果往往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自觉,双向联动的同频共振效应不够明显,教育的温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是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体性自觉有待提高。大学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既是教育活动的接受者,也是积极参与、主动建构的践行者,这种主客体的统一性构成了教育过程的核心特质。高校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过程中,部分大学生所展现出的主体自觉不足问题,亟须我们予以高度关注和深入剖析。一是部分学生在认知层面存

在“角色模糊”现象。他们未能深刻洞悉自身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生力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将其简单视为与个人成长关联度不高的“附加课程”或“政治任务”。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导致其主动探寻、系统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生动力匮乏。二是部分学生在价值判断层面显现出“目标错位”倾向。部分学生过度关注该课程能否直接带来学分获取、评优评先等显性利益,将知识学习异化为追求功利目标的工具,而忽视了其在塑造正确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提升人文素养与家国情怀方面的深层价值。

## 2.2. 新时代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素

根据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原因分析。

首先,高校课程有机统一有待完善。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程度亟待加强。思政课是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渠道,然而部分非民族院校仅仅是以通识选修课的形式来开设,能够发挥的引领促进作用十分有限。第二,民族院校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较少、重视程度不够,在民族政策教育方面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相对落后,实际的教学效果成效微弱。长此以往,民族院校与非民族院校之间会形成“贫富差距”的现象,需要相应的教学机制将两类高校的课程进行有机统一。

其次,高校培育氛围有待加强。第一,教育渠道需进一步拓展。高校在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宣传方面以第一课堂为主,未充分发挥隐性教育、校园文化和主题实践活动的作用。高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主题课程不明确、办学特点不凸显、教学过程窄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未充分体现。第二,高校宣传力度有待加强。部分高校在民族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党的民族政策做了一定的宣传,但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再次,民族院校和非民族院校配合程度有待提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民族院校相比于非民族院校有较多的财政支出、完善的课程体系和特色的校园文化。因此,民族院校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度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非民族院校的学生。在开展活动方面,民族院校相比于非民族院校开展的活动形式新颖生动,学校方面也较为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课程方面,民族院校会专门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还会结合院校所在的地理位置编写读本和开设课程,例如新疆大学基于本学校学情开设地方思政课“简明新疆史”等等。相反,非民族院校主要是以公共课的形式来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教育,教育的针对性不强,需要进一步整合和补充。

因此,民族院校和非民族院校在以上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配合,可以通过互派交换生和合作制定课程标准的方式提高配合程度,做到取长补短,以此来提高非民族院校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度。

## 3. 新时代进一步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从现实来看,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增进民族认同至关重要。同时,新时代大学生还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为此,新时代需要进一步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实践路径如下:

### 3.1.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平台

进入新时代,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手段。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利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让社交媒体成为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首先在宣传方式上,高校要做到先发制人,以互联网平台为主线,融媒体平台为支线。一方面,高校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体现时效性。高校应充分利用现有的互联网技术在学校官网设立交流平台和新闻资讯,及时全面地推送国家政策、民族工作会议和学生活动,随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做好正向引领,传递正能量,围绕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开展活动,让“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印刻在大学生心间,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高校应利用官方抖音、哔哩哔哩、微博超话等平台,通过视频、图文、采访等途径大力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传播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大学生正确把握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努力奋斗。其次在宣传内容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

律昂扬。高校可以结合所在地方的文化资源,充分挖掘红色基因,丰富宣传内容,增强宣传教育的趣味性和亲和力<sup>[11]</sup>,讲好四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

### 3.2. 完善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2023年12月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论》已正式出版,高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开设相关课程的方式来提高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度,以弥补之前在课程设置中的不足。一方面,高校要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概念纳入高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人才培养方案中,做到政治性与学理性并重,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此外,在思政课程建设方面,要注重思想引领,做好课堂设计,开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通识选修课程,有针对性地讲好党的民族工作政策。另一方面,高校要创新教学方法和内容,采用研学式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法等来提升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由于教学内容涵盖领域众多,知识点较为抽象,传统的教学方式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教育者要与时俱进,密切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逐步改进教学模式,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科学性与针对性,从而保障课堂教学效果。此外,高校要用好第二课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大实践育人的比例。高校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如“西部志愿服务计划”“中华民族一家亲”和参观红色基地等。高校要鼓励各民族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在情境中让大学生真实感受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休戚与共,推进各民族学生实现思想与情感的共鸣。

### 3.3. 高校开展民族特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在活动开展方面,高校可以建立一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宣讲团会定期举办一些关于民族团结、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活动,也会把民族团结因素和民族特点贯穿在活动过程中。通过参与活动,各民族的大学生可以相互建立团结友好的关系,弱化“我们”与“你们”之间原有的界限<sup>[12]</sup>,增进对彼此民族的了解,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同时,学校也要定期举办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学生了解各自民族的语言、习俗,使各民族学生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在情感上实现共鸣。另外,高校也可以在寒暑假期间组织民族团结实践团,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感悟思考,争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各团队学生可以结合党史、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通过走访当地红色人物、志愿服务、文艺下乡等形式,在各民族地区开展丰富多元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实践活动,大学生可以在实践活动中树立集体意识,并且能够自觉将这种意识外化于行,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志愿服务中,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3.4. 统筹教育资源形成全过程育人合力

民族院校与非民族院校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存在“不均衡”的情况,民族院校的工作较为成熟、体系较为完善,而非民族院校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教学成效不显著。因此,民族院校可以将之前的经验进行总结凝练,形成可供借鉴的“民大经验”“民大模式”,形成可以进一步推广的民族工作体系。非民族院校要积极向民族院校借鉴学习,可以派学生和教师前往参观进修,也可以聘请民族院校的相关专家指导和修订本校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的课程。两类院校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建立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搭建交流平台等。

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应加大校内外协调力度,形成家、校、社培育一体化,学生可以无时无刻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凝聚力,真正做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加强对学生德育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起示范带头作用,全体教师也要参与其中,建立教师与各民族学生团结互助的全员育人机制,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教师工作科研中,融入学生学习生活、成长成才的各个环节。家庭教育对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树立“五个认同”有着深远影响。家长应着重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使孩子从小怀有一颗赤诚之心;在教育过程中,家长也可以给孩子讲述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小故事,帮助孩子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3.5. 增强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能动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教育过程中,大学生既是教育对象,也是教育主体。为此,高校应充分发挥铸魂育人的职能,注重激发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久

久为功,从而推动大学生自觉树立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强化理论讲授。理也就是真理,在这里也指“五个认同”“四个自信”,以此来帮助大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坚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信心。高校应充分利用公共课、民族理论政策课,带领学生了解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过程,理解党的民族工作政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加强人文关怀。学校可以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帮扶和奖励,可以设立回民餐厅,加大力度提升餐厅的用餐品质,让各民族同学对彼此的饮食文化有所了解,拉近学生与老师、学校之间的距离,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温暖,对学校产生信赖感,这对于后续的教育过程也有很大帮助。三是注重实践育人。学校应给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进而厚植大学生的爱国情怀。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学校承办民族地区国培项目、学校派学生前往民族地区支教等。这些活动既可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能够促使学生在实践中践行民族团结思想,在交流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4. 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青年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新生力量。本文以新时代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研究目标,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阐释了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分析了新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问题和原因,在此基础上从五个方面提出了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展望未来,要立足新情况与新问题,精准研判新机遇与新挑战、新使命与新担当,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将“理念”转变为“理路”、将“想法”转变为“做法”,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 中国纪检监察, 2023(21): 6.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 [3] 刀波, 杨小红. 新时代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原则和路径[J]. 民族学刊, 2024: 1-15 [2024-04-04].
- [4] 代洪宝, 杨扬.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3): 13-24.
- [5] 谭厚锋, 罗安杰. 新时代聚焦“五个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1-21.
- [6]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22: 68.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1.
- [8] 韩宁, 阎占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逻辑阐释[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1(11): 187-193.
- [9] 孙兰英, 张艺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探析[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4(3): 207-212.
- [10] 尹诵, 邵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4(5): 197-201.
- [11] 鲁特. 新时代北京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五所高校的实证分析[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12] 张学敏, 崔萨础拉. 民汉混合班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探索——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分析[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42(5): 54-60.

(校对: 张力 排版: 袁骁)

#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与导向原则

邱晓佩<sup>1\*</sup>

(<sup>1\*</sup>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新型生产关系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从人文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出发, 探究影响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三要素, 即经济活动在宏观社会中的结构性关系、人文精神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交互性作用、文化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产业化现象。以此为理论基石, 人文与经济之间的互动表现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三重导向原则: 民族性人文烙印、人民性价值旨归与先进性文化指引。以人文导向调适新型生产关系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打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人文思路。

**关键词:** 人文经济学; 新型生产关系; 影响因素; 导向原则; 新质生产力

##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onstruct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Qiu Xiaopei<sup>1</sup>

(<sup>1</sup>Marxism Institut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cessit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spond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his study explores thre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activities within the macro-society, the interactive dynamics between humanistic spirit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within economic practices. Building on t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istic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provides theoretical empowerment through thre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establish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imprint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guidance of advanced culture. Guided by humanism, adjust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boost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Guiding Principl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23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23BKS03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研究》(2023DXXTZDDYKT037); 2025 年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专项课题《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阈下新质生产力的守正创新研究》(202517)。

**作者简介:** 邱晓佩, 女, 硕士, 研究方向: 人文经济学

**通讯作者:** 邱晓佩, 通讯邮箱: 13732275784@163.com。

www.shiharr.com

## 引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内在地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新型生产关系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生产关系中还存在诸多同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sup>[1]</sup>。相应地，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抓手。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sup>[2]</sup>。人文经济学始终将经济活动嵌入宏观社会结构并紧密联系特定人文与历史背景，以人民主体创造性为根基、人民立场为价值导向，其理论内核恰好为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一历史任务提供了内生性的人文指引。

当前，学术界对新型生产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的阐述。其一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聚焦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变革。在生产环节，关注重构新型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协同关系、统筹劳动者的技能升级<sup>[3]</sup>以及避免劳动者在技术异化下的边缘化现象<sup>[4]</sup>；在流通环节，主张通过规制平台垄断保障劳动者话语权，关注平台经济中的劳资关系调适<sup>[5]</sup>；在分配环节，聚焦要素分配正义，要求承认数据贡献保障劳动者话语权<sup>[6-1]</sup>；消费环节则强调数字包容性，在政策建议上主张用公共政策保障消费正义<sup>[4-2]</sup>。其二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层面出发，主要关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以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sup>[7]</sup>。不论是从当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时代变化出发进行的学理阐释，还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最新政策和抓手为导向完成的逻辑分析都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新型生产关系研究中人文导向受到关注的趋势愈发凸显，学界普遍认为生产关系变革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适配逻辑，实现“生产关系的调整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sup>[8]</sup>，最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目标。这一研究共识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在劳动者维度，学者们强调新型生产关系需回应数智时代劳动者技能转型与权益保障的双重需求。洪名勇指出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型劳动者”需具备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而生产关系调整应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培育人力资本<sup>[6]</sup>；罗建文则提出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中防止算法控制导致的劳动异化<sup>[9]</sup>。在分配维度，研究聚焦知识价值实现与分配正义，刘文祥认为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时需确认劳动者的数字贡献，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保障“知识资本化”过程中的合理回报<sup>[5]</sup>；王平进一步指出平台经济中的生产关系需平衡资本效率与劳动权益，避免数字鸿沟加剧分配失衡<sup>[4]</sup>。在发展维度，学者们主张生产关系应促进人的精神解放，熊亮分析认为智能化技术应推动“自由自觉劳动”的实现，使生产关系成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载体<sup>[10]</sup>；孙代尧、苏瑞鑫则强调新型生产关系最终要达成“劳动者不再是被动的生产要素，而是享有技术红利的价值主体”的人文目标<sup>[11]</sup>。由此可见，由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并不能单一地从技术生产力的视角出发，也并不能忽视其中的人文力量、文化导向的作用。从人文精神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来分析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导向原则，在人文价值方面存在有待探索和深化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将围绕人文经济学的三重研究对象界面展开深入探讨，剖析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尝试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民族性人文烙印、人民性价值旨归以及先进性文化指引这三重导向原则。

## 1.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三重要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提到过，“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12]</sup>。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中的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生产结果中的分配关系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对象。这一研究对象的确定区别于国民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财富生产的研究，将研究对象拓展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经济活动所在的社会和历史结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文精神与社会结构之间衍生的经济活动关系，因此形成了以经济活动在宏观社会中的结构性关系、人文精神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交互性作用和文化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产业化现象这三重研究界面。

### 1.1. 经济活动在宏观社会中的结构性关系

首先，经济活动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表现为嵌套式的有机整体。恩格斯谈到事物的“辩证图

景”时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sup>[13]</sup>。考察经济活动的物质表现和社会形式也是如此。将其与社会、人文、历史等具体的条件相关联,放置在宏观社会结构系统中研究,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宏观社会结构系统中联系具体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人文背景等要素来考察经济活动,才能更好地将人文与经济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和物质表现相协同。

其次,宏观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影响经济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人文背景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水平、作用、意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的差异为例,一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背景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统治中形成,并围绕封建地主阶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统治地位展开。原始公有制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被破坏,生产力难以进一步发展。同时,血缘关系、宗族式的社会组织带来“人伦的思想”,社会文化模式阻止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自我萌芽<sup>[14]</sup>。另一方面,在西欧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受到货币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和15世纪发展起来了。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新兴阶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增殖的经济运转中逐渐取代封建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面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同表现,尤其是在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于不同社会的线索中,马克斯·韦伯在对资本主义的伦理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曾存在于中世纪和古代历史上的许多社会之中,这些社会并不缺少资本主义,而是缺少一种自身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组织,这种精神和组织又是受不同的宗教文化导向产生的<sup>[15]</sup>。可见,结合具体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人文背景,对于客观看待经济活动的表现有着文化层面上的必要性。

最后,宏观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式之间存在相互投射效应。经济活动作为社会领域活动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活动的运行受到社会宏观结构的限制,两者之间也会产生相互投射、模仿的互动现象。一方面,经济领域的范围大小、经济活动的限制边界,不是取决于经济领域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人文背景和社会宏观结构<sup>[16]</sup>。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目前经济领域的科技要素越来越活跃,但是这种活跃的要素并不能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单一指标。从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引领效应来看,它在经济领域的应用,需要结合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伦理、道德限制因素的考量。生产关系也在该限制范围内与之相适配地调整、升级。另一方面,经济领域内部活动的运行方式也与政治、文化领域等活动的运行方式的投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唐宋时期,行会制度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的投射体现。封建等级制度在政治领域表现为集权独裁的运行方式,对应地,行会制度在就业垄断和行业管理方面也具有封建特权的表现,在对成员经营活动的管理上带有“超经济强制”的色彩<sup>[17]</sup>。

## 1.2. 人文精神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交互性作用

在宏观层面上,经济活动对人文精神的塑造起着决定作用,同时经济活动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引领作用。经济活动是一种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实践活动,经济活动与社会历史活动都是以人为主,并对推动社会历史演进有着关键性的作用。经济活动在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同时对社会关系和人类文化有着概括性的表现和深刻的塑造作用<sup>[18]</sup>。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和人类文化,内含着丰富的精神要素,形成一种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势能。在一个地理区划表现出的国家精神、民族风貌、风俗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化人文特征,是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结果,并反过来对基于各特殊社会背景下发展的经济活动提供相应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下,为寻找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质态,必须重新审视人文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导向作用。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曾指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着质的区别。”<sup>[19]</sup>从根本上说,虽然经济决定文化,但是任何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带来的人文价值,能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起到凝聚、润滑、整合的作用,从而塑造劳动者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推动经济活动的发展。

在中观层面上,经济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环节中时刻体现出人文精神的价值导向。从经济活动的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前提下的,始终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体现为对人民期望的深刻理解和有效回应,以确保政策选择和人民意愿是处于紧密相连的状态<sup>[20]</sup>。从经济活动的部分来看,经济活动在“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表现出复杂性，经济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经济活动在这四个环节中与新的生产力适配发展的表现，并起到统筹、协调的作用。在生产环节中，企业在市场中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发挥创新生产作用提供平台载体，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来提供动能，并形成以创新协同机制为导向的目标；在分配环节中，生产各要素合理的初次分配促使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市场价值得以更好发挥，形成科技创新人才的收入激励机制与产权保护法规，对创新精神起引导作用，增强劳动者自主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在交换环节中，市场规律引起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生产竞争，这种竞争促使生产关系下的各层级的生产者不断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以市场主体的身份通过市场竞争来优化资源配置，政府以实现保障公平竞争和正常秩序的长期发展理念做好市场引导；在消费环节中，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的人文精神为倡导的消费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强调绿色消费、文明消费，体现了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观念在生产关系中的理性化和文明化的加强。

在微观层面上，人文精神能够强化劳动个体在组织、企业等经济团体中的能动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sup>[19]</sup>。”在经济活动的个体层面，经济发展的组织效能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的建设上。企业的经济活动、人文精神建设来源于社会、历史，也成为人的能动创造性的主阵地。不同的社会、历史的人文背景，对工业企业活动、商业企业活动，在组织效能、生产效能和应对内外不确定性的选择等层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这些受人文因素影响的工业企业活动、商业企业活动又是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发挥能动性的微观载体，有利于人发挥创新的人文精神导向，能够赋予企业、组织更好地营造推动人在经济活动上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在精神追求上驱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创造。

### 1.3. 文化经济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产业化现象

第一，从物质生产向度来看，文化活动的产业化现象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一方面，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推动当前阶段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sup>[21-1]</sup>”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消费需求与日俱增，人民的精神需求可通过文化消费行为所提供的情感价值、精神供给、价值符号等收获充实与富足。从市场表现来看，2025年一季度，文化企业（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的营收比上年同期增长6.2%<sup>[22]</sup>，表明文化需求在人民消费行为中呈现上升态势。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化赋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文化事业以及与其相关的服务业的商品化发展能够直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并且，文化产业的建设有助于物质产业和文化产业保持良好的比例，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随着文化产业比例不断上升，劳动者的文化消费比重不断增加，通过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享受艺术娱乐活动等消费行为实现劳动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再生产，从而提高具有一定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劳动者比例，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创新发展。

第二，从精神生产向度来看，随着文化产业经济体不断壮大，其中文化内涵的发展会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一方面，文化的产业化可以推动文化内涵的传播，是因为相较于物质文化产品不丰富的状况，文化的产业化能够带来文化产品在商品数量上的丰富，并借以此形式更大范围地、更高效地传播商品内涵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存在为了满足消费需求而与一般物质生产无本质区别的大批量生产的、失去了独创性和主动性的文化生产方式<sup>[23]</sup>，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视角下要以一定的文化生产原则为准，避免全然地将文化生产纳入市场经济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考量中。

第三，从物质与精神生产的结果向度来看，内涵文化价值的文化商品能够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海、进一步守好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只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sup>[24-1]</sup>”文化生产领域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文化生产的产品按照经济规律进入交换、消费和流通领域，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也与之一起在经济系统中流通而扩大传播范围。利用好这一规律，既可以通过文化产品将中国的民族文化向海外传播，加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和民族主体性，在面对文化殖民主义即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势的传媒优势将自己的经济政治理念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用以在思想和文化上影响和同化其他国家这样的现象时<sup>[25]</sup>，也能够保持警惕态度，提前采取防御手段。

2. 人文经济学赋能新型生产关系的导向原则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24]</sup>”在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演进过程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此时，冲破原有生产关系的束缚，变革与新的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生产关系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以生产关系的重构为条件，始终坚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的具有辩证统一特点的生产力理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应当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经济活动所在的社会和历史结构中的关系，并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直接目的。在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对于调适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议题，有着民族性人文烙印、人民性价值旨归、先进性文化指引这三重导向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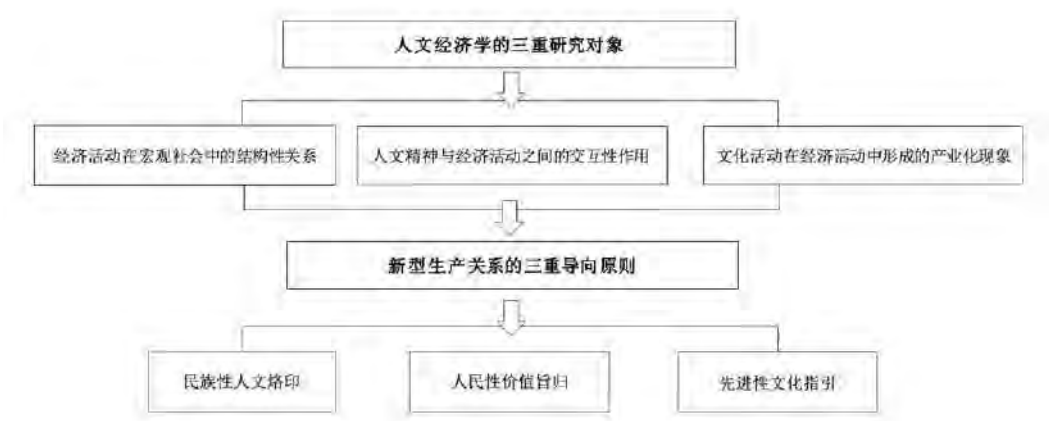


图1 新型生产关系的三重导向原则的形成逻辑

2.1. 构建具有民族性社会人文烙印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一，实现物质与文明相协同以体现社会人文烙印的整体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社会情况来看，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处在不协调、不平衡的状态，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sup>[26]</sup>。在西方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西方社会精神与物质、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产生分裂与对立。物质主义兴盛，精神生活的世俗化、物化成为现代精神生活的根本境遇。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就同某些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sup>[21-2]</sup>；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进行了研究，这是顺应物质主义兴盛和精神生活世俗化变迁的产物；席勒批判在大机器生产模式下，人被简化为单一的生产环节。在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中，操纵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造成社会两极化加剧，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异化<sup>[27]</sup>。在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不仅要超越西方式现代化资本逻辑的经济形态，而且要构建彰显中国人文、经济与体制等发展优势的经济形态<sup>[28]</sup>。

第二，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彰显社会人文烙印的特殊性。“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sup>[29]</sup>。”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初步形成，强调了文明的教化作用。强调中国人文精神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效用，是建立在理解中国宏观社会机构基础上的。中国宏观社会结构始终离不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流。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回归到中国特有的宏观社会结构上。在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的历程中，我们始终围绕着人民的需要展开一系列政策工作。始终关注经济学发展中生产关系的人本位，而非去价值化走入一个数字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

第三,把握伦理边界以平衡社会人文烙印的适配性。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美好生活意味着社会秩序安定、发展速度平稳、社会环境公正。在社会层面来看,以全体人民为中心,以普遍幸福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是内含道德功能的经济,人民需要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框架<sup>[30]</sup>。利用好经济活动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投射作用,在上层建筑的发展中投射对经济领域的人文要求,也将进一步规范经济活动的伦理边界。

## 2.2. 构建坚持人民性价值旨归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一,从国家发展的历史向度来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形成强调经济发展的价值维度的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魂脉根基。从“义利之辩,乃儒家首义”“天下事,唯义利”“用天下之财,益天下之人”等道德逻辑层面的经济观点,到“掌握粮食货币权衡,可定天下”“市场,货物之准则”的理念和方法,再到“民不增税而国用充足”“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的治国理念,以及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庶民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等社会分配现象的深刻反思,都在道德伦理和富民惠民等人文文化层面为经济活动设定了道德规范,并在国家经济治理实践中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导向。这样的价值追求,根植于中国发展的数千年历史,深种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形成深远的文化作用,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在无形中引导着新型生产关系的人民性价值走向。

第二,从社会治理制度向度来看,新型生产关系的制度建构逻辑始终以“以人为本”精神为根本坐标系。这种精神传承不仅体现为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典治理智慧的延续,更在现代经济体制建构中实现了价值范式的创造性转化。当生产关系变革触及产权结构、分配方式与交换秩序等环节时,民本精神将人的发展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核心,使生产资料配置、财富分配机制与市场运行规则始终锚定于人的价值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在经济治理的实践层面,民本精神展现出双重规训功能:既对资本逻辑形成伦理制衡,又为政策工具划定价值边界。这种规训机制通过制度化的路径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原则——从“利民为本”的施政纲领到“藏富于民”的财税设计,从“均平为要”的分配理念到“普惠共享”的市场准入规则,可见民本思想对生产关系的塑造作用。政策实施过程中,这种精神更通过动态反馈机制持续校准改革方向,确保效率追求始终受制于公平准则,市场活力的释放不偏离民生福祉的轨道。从文明演进的长周期视角审视,“以人为本”精神已超越具体政策工具层面,升华为中华经济文明的文化基因。以文化基因的价值连续性,促使当代中国生产关系变革既保持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动态适配,又坚守着文明传统中“民本思想”的精神原点,形成具有中国经济治理文明新形态。

第三,从个体创新的实践向度来看,高素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受开放、公平的人文氛围引领能动地发展创造力。高素质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创新能力的发挥,依靠于团队、企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行为需要相对标准的运行模式,在市场上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这更加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精神引领功能,在规制经济主体观念认知的过程中优化生产关系,提升要素利用水平,促进生产方式的迭代演化。例如,个人诚信、契约意识、尊重产权、合作共赢等价值理念既能对经济过程本身起到秩序规范效果,又能以文化道德等共识性准则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产权保护,从根本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在企业、团队中发挥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形成“共富”理念的引导,在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的创新活动过程中,实现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共生发展。个人层面的创新活动需要资源要素的流通共享、创新个体的激励关怀、活动环境的宽松包容,人文精神在这三个要素的综合效能上的表现成为对创新活动的重要发展动能。

## 2.3. 构建以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一,先进文化在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发挥的价值引领作用。以农业文化为例,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农耕智慧、生态思想、自治伦理,与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文化资源与战略目标的相辅相成,要求将民族精神特质转化为制度设计的文化基因。纵观社会整体,在政府层面,政府作为文化治理主体,需通过政策调控、资源配置实现以先进文化引领文化生产资料的价值导向;在企业层面,如何将先进文化使用价值的创造纳入市场逻辑是企业与实践层面关注的重点;在个体

层面，社会组织与个体的文化实践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倡导中不断加深先进文化的实践深度和广度。三重主体从不同维度为实现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提供不同的实践进路，最终为促进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的完善，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环境构建中，先进文化营造创新、包容与可持续的文化产业生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静态的，而是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经济以文化为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内在灵魂，并以强大动力推动经济发展<sup>[31]</sup>，形成一个动态的生产力运作系统。这种动态机制体现在文化产业中就是文化创新活动的实践，并通过这样的实践反过来作用于文化产业生态。也就是说，文化在经济业态中的发展和构建文化生态生成发展的根本机制在于文化实践和创新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创新是文化产业的生命线，先进文化鼓励创新、发挥文化原创力的强大作用<sup>[32]</sup>，推动文化内容、形式、技术不断革新，促进形成更加优质、开放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态。开放的文化环境则进一步促进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国内外文化交流，助力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传播本国文化，提升国际影响力。这种生态构建通过文化原创力激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新维度，使文化创新成为推动新型生产关系演进的内生变量。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引领，以文化产品为切口为新型生产关系注入精神内核。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良性发展，必然要诉诸维系其存在与发展演化的价值根基<sup>[33]</sup>。在经济领域，核心价值观引导企业注重诚信经营，以质量赢得市场，以信誉塑造品牌，从而优化市场环境，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公平正义原则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均衡发展。在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塑造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凝聚社会共识，减少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中的矛盾与冲突，增强社会凝聚力。文化层面，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观念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一致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12-2]</sup>。”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力能够在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实践进程中不断发挥精神灯塔的作用，照亮经济社会前行的道路。

### 3. 结语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人文经济学聚焦人文与经济之间的互动机理，为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理论启发。从理论层面的生成逻辑可知，人文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作用于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在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之间的总体性发展，还是人文精神与劳动者之间的投射性表现，抑或文化产业内产品内涵与市场规律之间的辩证性冲突，都彰显出将人文因素与经济活动并列为核心逻辑的人文经济学，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带来了创新性理论视角。据此，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时，要更好地融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凝结，坚持与“以人为本”价值追求相结合的根本动力，锚定与更高阶段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发展方向。简言之，即牢牢把握民族性人文烙印、人民性价值旨归与先进性文化指引的三重导向原则，使其成为理论推进与实践调适过程中的航向标。同时，生产关系所涉及的经济关系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仍存在多种挑战。因此，要积极探索上述三重导向原则调适新型生产关系的实践路径，通过新型生产关系的人文力量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书写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崭新篇章。

#### 参考文献：

- [1] 蒲清平. 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J]. 国家治理, 2024(09): 33-38.
- [2] 何聪, 郑海鸥, 王伟健. 一座城, 创新实践人文经济学(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观察)——苏州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调查[N]. 人民日报, 2023-09-08(1).
- [3] 尹俊, 孙巾雅.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 改革, 2024(05): 45-53.
- [4] 王平. 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新型生产关系: 塑造与调适[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07): 5-15.
- [5] 刘文祥. 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05): 41-47.

- [6] 洪名勇. 以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个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框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03): 1-17.
- [7] 周文, 李雪艳. 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04): 84-99.
- [8] 刘立云, 孔祥利.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 经济纵横, 2024(12): 33-41.
- [9] 罗建文. 论完善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5(02): 1-11.
- [10] 熊亮. 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变革及新型生产关系构建[J]. 江海学刊, 2024(04): 119-125.
- [11] 孙代尧, 苏瑞鑫. 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内在统一的学理阐释[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04): 4-12.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刘震, 张祎嵩. 中国封建社会到底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对经典命题的重新审视[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3, 4(04): 211-223.
- [15] [德]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41-42.
- [16] 胡承槐, 顾青青. 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对象、方法及其实践性、科学性[J]. 浙江社会科学, 2024(06): 18-26+156.
- [17] 金志霖. 试比较中英行会的本质特征[J]. 史林, 2005(02): 100-108+124.
- [18] 代玉启. 精神富有: 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J]. 浙江学刊, 2024(06): 77-87.
- [19]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49.
- [20] 王忠, 车学森. 人文经济学研究: 理论演进和话语创新[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02): 77-86.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2] 国家统计局. 2025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2%[R/OL]. (2025-04-29)[2025-06-22].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4/t20250429\\_1959509.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4/t20250429_1959509.html).
- [23] 陈立旭. 理解人文经济[J]. 浙江学刊, 2024(06): 66-76+235-236.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5] 刘海静. 全球化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殖民主义[J]. 理论导刊, 2006(02): 77-80.
- [26] 王晓静, 刘士林, 杨珺涵. 人文经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意义[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09): 41-50.
- [27] 任平.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77(04): 5-13. .
- [28] 孙建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人文经济学的建构旨趣、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深入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06): 1-9.
- [29] 周易[M]. 杨天才,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07.
- [30] 罗卫东.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01): 28-41+156.
- [31] 方世南. 在先进生产力和人文力辩证统一中把握新质生产力[J]. 观察与思考, 2024(08): 5-12.
- [32] 任平. 发挥文化原创力对人文经济的持久推动作用[J]. 国家治理, 2025(07): 25-33.
- [33] 项久雨. 美好社会: 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展开与演化图景[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06): 4-25+204.

(校对: 张力 排版: 袁骁)

# 从“伪分层”到“智适应”：三层四维架构下 初中英语差异教学革新

聂慧<sup>1\*</sup>

(<sup>1\*</sup>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西区), 四川省 成都市 610000)

**摘要:** 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 初中英语教学正面临从“知识本位”向“素养导向”转型的关键挑战。传统“一刀切”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为此, 本研究融合差异教育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 构建“三层四维”智能分层教学体系, 推动教学范式从“伪分层”向“智适应”的根本性转变。通过为期16周的随机对照实验, 实践范式验证了“数据诊断——智能分层——动态干预——精准评价”闭环模型的有效性, 该范式依托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构建学生学情动态画像, 采用改进型K-means++算法完成科学分组, 开发知识图谱与协同过滤引擎实现精准资源适配, 同时, 通过在初中进行的实验验证得知, 实验组英语应用能力和学习动机大幅提升, 学情诊断准确率较传统方法提高近一倍, 资源适配重合度达近四分之三。研究结果表明, 该范式通过技术赋能与理论创新的双轮驱动, 在提升教学精准度、优化资源配置及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突破, 为规模化教育场景下的个性化培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对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培育核心素养导向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三层四维; 差异教育

## From "pseudo stratification" to "intelligent adaptation": Innovation of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under the three-tier four-dimensional framework

Nie Hui<sup>1\*</sup>

(<sup>1\*</sup>Chengdu Shude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West Campus),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s facing a key challenge of transitioning from a "knowledge-based" approach to a "literacy oriented" approach. The traditional "one size fits all" teaching model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integrates differential education theor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three-layer four-dimensional" intelligent hierarchical teaching system, promoting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eaching paradigm from "pseudo stratification" to "intelligent adaptation". Through a 16 week 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losed-loop model of "data diagnosis intelligent stratification dynamic intervention precise evaluation" was verified by the practical paradigm. This paradigm relies on multimodal data fusion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dynamic portrait of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uses an improved K-means++ algorithm to complete scientific grouping, develops a knowledge graph an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engine to achieve precise resource adaptation. At the same time, experiments conduct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have shown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accuracy of learning situation diagnosis has been nearly

- 31 -

作者简介: 聂慧 (1992-), 女, 广安岳池, 硕士, 研究方向: 英语教育

通信作者: 聂慧, 通信邮箱: 1367663396@qq.com

www.shiharr.com

doubled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overlap of resource adaptation has reached nearly three-quart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paradigm, driven by bot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has made breakthroughs in improving teaching accuracy,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It provides a replicable practical path for personalized training in large-scale education scenarios and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deepening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core literacy orient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ee layers and four dimensions;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初中英语教学正经历从“知识本位”向“素养导向”的深层转型，要求在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与学习策略维度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然而，传统分层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伪分层”现象，成为阻碍这一目标落地的核心瓶颈，比如，静态分组固化标签如以单次成绩划分ABC三层且长期不变、资源供给同质化如85%教师使用同一教案应对不同层级学生、评价体系滞后性如仅以终结性测试衡量能力，导致基础薄弱学生陷入“学习断层”、高阶学生缺乏思维挑战性、中等生群体则处于“发展停滞区”<sup>[1]</sup>。这种“形式分组、实质统一”的教学模式，既违背了新课改“关注个体差异”的核心理念，也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教育公平困境，形成了“分层即分化”的恶性循环。因此，立足差异教育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困境。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为破解“伪分层”提供了关键突破口。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与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使规模化教学中的个性化支持成为可能，比如，通过眼动追踪、语音识别等智能感知技术，可实时采集学生阅读焦点、口语流利度等20余项行为数据，构建学生的动态化“能力画像”；借助改进型聚类算法能以课时为周期更新分层标签，将传统“学期调整1-2次”的静态模式升级为“数据驱动的实时动态分组”；利用智能资源推荐引擎基于知识图谱拆解的32个微技能节点，实现“一人一案”的资源精准供给。另一方面，差异教育理论为“智适应”英语教学提供了底层逻辑支撑。该理论强调“将学生差异转化为教学资源”，主张通过分层目标、弹性内容与多元评价满足认知水平、学习风格、情感需求的多维差异。然而，传统差异教学受限于人工数据处理能力，难以实现“精准诊断——动态调整——个性适配”的闭环<sup>[2]</sup>。人工智能的介入恰好弥补这一短板，比如，在认知分层维度，AI通过布鲁姆目标分类法与英语学科能力框架，将教学目标解构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三级，并结合实时数据动态匹配任务难度；在学习风格维度，依托VARK模型与眼动追踪技术，为视觉型学生推送思维导图、为动觉型学生设计角色扮演任务；在情感价值观维度，基于ARCS动机模型与面部表情分析，为写作焦虑学生提供“低压力即时反馈”模式，为高成就动机学生创设“跨校挑战赛”等进阶目标。这种“技术理性”与“教育温度”的融合，使差异教学从“经验主导的粗放分层”迈向“数据算法驱动的智能适应教学”。总之，本研究聚焦“三层四维”架构的创新构建，通过“数据采集层——智能聚类层——弹性调整层”的技术流，实现从多模态数据感知到动态分组的智能化处理，依托“认知——风格——情感——能力”的四维教学策略矩阵，构建“基础——提升——拓展”的三级能力适配体系。

###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基于三层四维架构下初中英语差异教学的革新，深入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差异教育理论的融合路径，旨在破解传统分层教学的困境，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统一。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对初中英语教学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sup>[3]</sup>。首先，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丰富了差异教育理论的内涵，拓展了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应用边界。通过构建“三层四维架构”，为初中英语分层教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有助于深化对差异化教育教学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同时，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理论的交叉融合，为智能教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sup>[4]</sup>。其次，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对于破解传统分层教学的“伪分层”困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传统分层教学往往因分层粗放、动态调整滞后等问题而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需求。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对学生认知水平、学习风格、情感需求等差异的精准识别,从而构建了智能的、自适应的“智适应”教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潜能,促进其全面发展。此外,在教师层面,本研究为初中英语教师提供了具体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促进教师更加科学地制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智慧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更能增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推动初中英语教学的整体进步<sup>[5]</sup>。最后,在教育生态层面,本研究对于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智能教育生态构建具有重要的贡献。通过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路径,为构建更加公平、高效、个性化的教育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并且致力于培养具有核心素养和创新精神的人才,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 2. 理论基础

### 2.1. 差异教育理念的三重维度

差异教育理念以“尊重个体差异为资源而非障碍”为价值内核,为“三层四维”智适应架构提供理论锚点<sup>[6]</sup>。其三重维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具体化为,第一层,认知分层维度即目标适配性,基于布鲁姆目标分类法,将语言能力解构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的认知阶梯,要求教学精准匹配学生当前认知水位。传统分层受限于人工诊断精度,常将学生简化为“ABC”标签,而“三层架构”依托知识图谱拆解能力点,通过图神经网络动态追踪认知轨迹,使目标分层从经验估测升级为数据实证,真正落实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的动态适配原则。第二层,风格适配维度即路径多样性,依据 VARK 学习风格模型,识别视觉型如思维导图、听觉型如语音解析、动觉型如情景仿写等差异化加工偏好<sup>[7]</sup>。传统教学因资源开发瓶颈陷入“教案同质化”,“四维分层”则借力 AI 构建“媒介类型——认知风格”映射矩阵,比如,智能资源超市通过协同过滤算法,为视觉型 L1 层学生推送 AR 词汇具象化工具,为动觉型 L3 层学生生成跨文化戏剧创作任务,实现“千人千径”的个性化输入通道,弥合学习风格与教学方法的结构性断层。第三层,情感支持维度即动机可持续性,融合 ARCS 动机模型,强调情感需求对学习韧性的奠基作用。传统分层忽视焦虑传导机制如写作挫败感蔓延,“智适应”系统则通过多模态感知如表情识别、文本情感分析等实时捕捉情感状态,比如,当检测到 L1 层学生语音焦虑时,自动触发“低压自由写作+即时正向反馈”机制,或对高成就动机的 L3 层学生推送“跨校学术挑战赛”任务。这种“情感状态——激励策略”的闭环响应,使差异教育从能力补偿工具升华为全人发展引擎。由此可见,“三层架构”即动态诊断——聚类——调整模式,破解了传统差异教育的静态化桎梏,“四维分层”即目标——风格——情感——领域维度,则重构了差异资源的转化路径,二者共同推动初中英语教学从形式化“伪分层”向实证性“智适应”的范式跃迁。

### 2.2. 人工智能赋能分层教学的技术框架

人工智能赋能初中英语分层教学的技术框架以“数据驱动精准化、动态适配个性化”为核心逻辑,构建“感知——分析——决策——干预”智能化闭环系统,其核心架构包含三层,首先是基于知识图谱的动态分层引擎,依托知识图谱技术将初中英语知识体系解构为 32 个微技能节点,比如可以把写作能力细分为语法、逻辑、文化表达等,通过融合课堂互动、作业轨迹、语音文本等多模态数据构建动态认知模型,利用图神经网络算法分析学生作文词汇关联路径以精准定位“词汇丰富度不足”“逻辑衔接断裂”等问题,并结合引入密度峰值初始聚类中心策略的改进型 K-means++ 聚类算法,以课时为周期对学生知识掌握度、认知加工效率、学习韧性进行三维度聚类,实现“基础——提升——拓展”三层级实时动态分组,规避传统分层“静态标签化”的弊端<sup>[8]</sup>。其次是基于多模态语义分析的资源匹配机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发“能力标签——资源属性”动态映射算法,对 10 万+教学素材进行难度系数、媒介类型、文化主题等四维标签标注,形成 L1 基础层即带语音解析的互动绘本、错题归因表、L2 提升层即情境对话包、语义网络写作任务、L3 拓展层即跨文化对比研究套件的三级资源池,如果当系统检测到学生存在“定语从句误用”等问题时,自动生成包含听觉型微课、视觉型错题表、动觉型仿写任务的混合式资源包,并依据后续练习数据迭代推荐策略,实现“一人一案”的精准供给,解决传统教学中 85% 教师使用同一教案的资源同质化难题。最后是人机协同的教学决策支持模块,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构

建课堂策略生成系统,实时分析提问频次、小组讨论参与度、情感状态等师生互动数据,结合分层目标自动生成干预建议,比如,对基础层学生触发“降低任务难度+增加可视化提示”策略,对高阶学生推送“跨学科融合+批判性思维挑战”任务等,教师可以借助“教学决策仪表盘”实时查看各层级认知负荷与情感投入数据以动态调整课堂节奏,形成“算法辅助决策——教师深度把控”的协同模式,推动教学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智能驱动”。总之,该技术框架以差异教育理念为底层逻辑,通过知识图谱认知建模、NLP 语义理解、区块链可信评价,构建“精准诊断——智能适配——动态干预——过程性评价”全链条技术支撑体系,从而突破人工分层效率瓶颈,赋予差异教学“实时动态、个性可溯”的信息时代特征,为“三层四维”架构落地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初中英语教学从“伪分层”向“智适应”范式革新<sup>[9]</sup>。

### 3. 现状困境

#### 3.1. 传统分层教学的“伪分层”现象

尽管分层教学旨在回应学生差异,但初中英语课堂常陷入“伪分层”困境,其核心在于未能实现动态、以学生需求为本的差异化教学<sup>[10]</sup>。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分层依据单一僵化,过度依赖静态考试总分进行“优中差”的粗暴划分,严重忽视学生英语能力的多维性和动态发展性,亦不考虑学习风格、兴趣动机等关键因素,导致标签效应固化,挫伤学生的信心。其二,分层后教学高度同质化,差异表现流于形式,教学目标仅体现知识量增减,如C层记单词、A层加拓展词汇,缺乏针对不同最近发展区的“质”的差异;教学内容方法“换汤不换药”,各层使用相同的核心教材,仅通过练习量增减或讲解速度调整体现差异,缺乏适配策略如为薄弱学生提供支架引导,为优生设计批判性任务等;评价标准未实质分层,终结性评价仍沿用统一试卷,使低层学生持续受挫,高层学生缺乏挑战。其三,分层机制僵化封闭,分层往往“一次定终身”,缺乏基于形成性评价的动态调整,层级流动困难且忽视同一层级内的个体差异<sup>[11]</sup>。其四,衍生隐性伤害与资源浪费,机械分层导致“C层”等标签易引发心理耻感,影响学习动机和课堂参与度,同时,教师精力被两端牵制,中间层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其个性化需求和潜能挖掘容易被忽视,此外,“伪分层”投入大量分组管理、练习分层等,但未能触及教学核心差异,造成了资源的低效错配。总之,“伪分层”本质是将差异简单化、静态化、标签化处理,在目标设定、内容选择、方法运用及评价实施等核心环节,均未实现真正适应需求的“质”的差异,其结果非但未能促进各层次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充分发展,反而加剧分化、固化标签、抑制潜能,背离了差异教学的初衷,迫切期待向更智能、更动态的“智适应”模式革新。

#### 3.2. 人工智能应用的教学实践盲区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视为破解“伪分层”困境的利器,但其在初中英语差异教学实践中的落地仍面临显著盲区。首先,技术理想与现实教学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当前AI应用多聚焦于单向度、碎片化的能力评测,比如词汇量检测、语法选择题自动批改、口语发音评分等,其数据采集往往割裂了语言能力的整体性与交际本质,难以全面捕捉学生在真实语境中综合运用语言的情感态度、文化理解、批判思维及创造性表达能力。其次,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送容易陷入内容同质化陷阱,即依据有限标签重复推送相似题型,缺乏对学习风格偏好、兴趣热点、认知节奏差异的深度适配,更无法模拟教师基于课堂互动生成的“教学机智”与情感激励。然后,技术应用场景呈现“孤岛化”,智能工具多用于课后练习或考试辅助,未能深度融入课堂教学核心环节,比如动态分组协作、生成性任务设计、即时反馈调整等,导致“课内”与“课外”“人授”与“机辅”严重脱节<sup>[12]</sup>。随后,教师角色面临新挑战,部分教师过度依赖技术输出,从而陷入“数据迷信”,弱化对学生隐性需求的专业判断,并且技术使用门槛高、备课时间激增、人机协同策略缺失等问题,又加剧了教师教学的负担。最后,过度数据化可能窄化教育目标,削弱人文关怀,同时学习数据的隐私安全、算法决策的“黑箱”特性及可能加剧的“数字鸿沟”等,均构成潜在风险。当前AI应用多停留在“伪智能”层面,即用技术外壳包装传统练习,未能触及差异教学核心,甚至可能因数据片面与交互冰冷,强化“数字标签”而弱化育人本质<sup>[13]</sup>。总之,AI技术若仅作为效率工具简单嫁接于旧有框架,忽视教学逻辑重构、教师能力升级及伦理规约,则非但无法实现真正的“智适应”,反而可能催生新的“技术本位”伪差异,陷

入工具理性凌驾教育价值的实践盲区。

## 4. 模型构建

### 4.1. 三层架构：基于数据流的智能分层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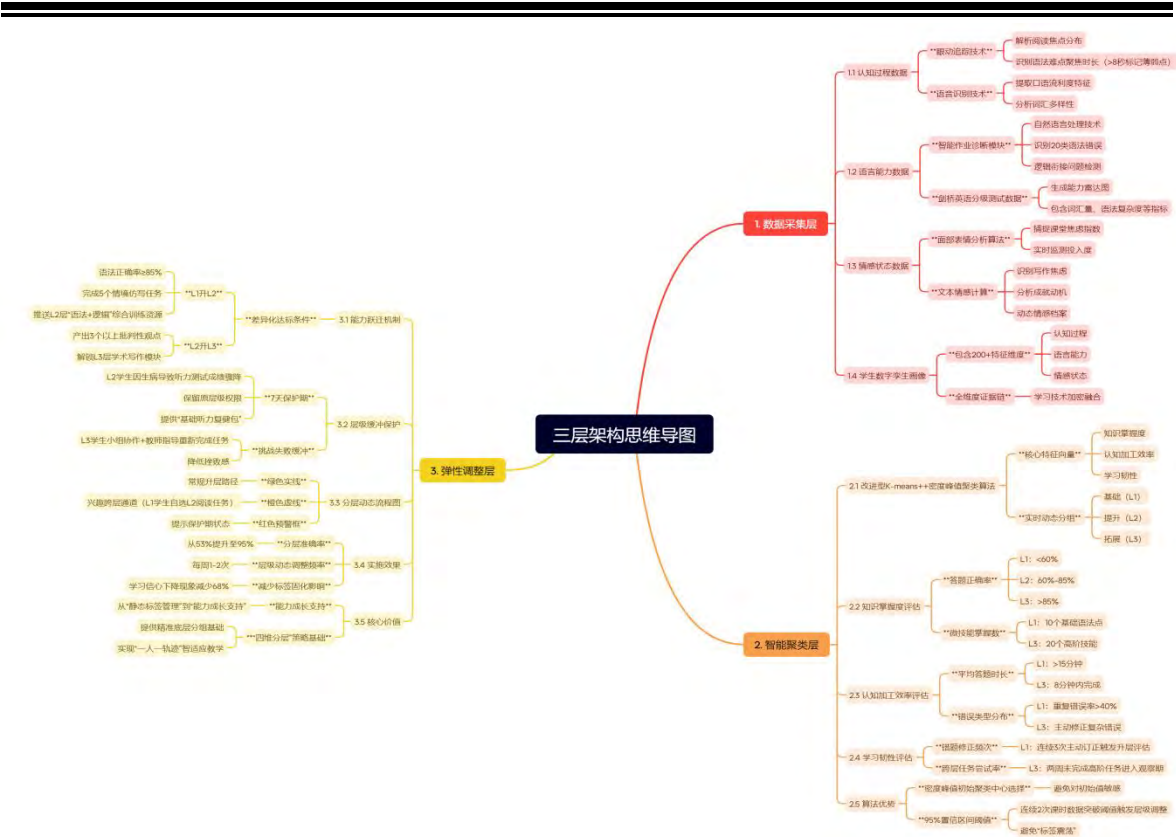
“三层架构”以教育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应用为主线，构建“数据驱动——智能聚类——动态调整”的闭环式分层系统，实现从“经验主导的粗放分组”到“数据流驱动的智能适应分层”的范式革新，其核心架构包括以下三层。

第一层，数据采集层，紧扣多模态学情感知与立体画像构建，依托人工智能感知技术集群，采集覆盖“认知过程——语言能力——情感状态”的三维数据网络。其一，认知过程数据，通过眼动追踪技术解析学生阅读英语文本时的焦点分布，识别语法难点聚焦时长如定语从句部分停留超8秒标记为薄弱点，还可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提取口语表达的流利度、词汇的多样性等多项特征。其二，语言能力数据，通过智能作业诊断模块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写作、翻译等主观题进行语义分析，自动识别20类语法错误、逻辑衔接断裂等问题，并结合剑桥英语分级测试数据，生成包含词汇量、语法复杂度等指标的能力雷达图。其三，情感状态数据，借助面部表情分析算法实时捕捉课堂焦虑指数、投入度等，并通过文本情感计算识别写作焦虑、成就动机等情感特征，形成动态情感档案。总之，三类数据经学习技术加密融合，构建包含200+特征维度的学生数字孪生画像，为分层提供全维度证据链。

第二层，智能聚类层，改进型算法驱动的智能动态分组技术，采用优化的K-means++密度峰值聚类算法，以“知识掌握度——认知加工效率——学习韧性”为核心特征向量，实现“基础（L1）——提升（L2）——拓展（L3）”三层级的实时动态分组<sup>[14]</sup>。首先，聚焦知识掌握度，基于答题正确率如 $L1 < 60\%$ 、 $L2 60\%-85\%$ 、 $L3 > 85\%$ ，及微技能掌握数如L1需掌握10个基础语法点、L3需精通20个高阶技能等。其次，评估认知加工效率，通过平均答题时长与错误类型分布评估，如L1学生完成语法填空平均时长 $> 15$ 分钟且重复错误率 $> 40\%$ ，L3学生可在8分钟内完成并主动修正复杂错误。最后，考察学生学习韧性，统计错题修正频次与跨层任务尝试率，L1学生连续3次主动订正错题可触发升层评估，L3学生若两周未完成高阶任务则进入观察期。总之，算法通过引入密度峰值初始聚类中心选择策略，避免传统K-means++对初始值敏感的缺陷，并设置95%置信区间阈值，当某学生连续2次课时数据突破阈值时才触发层级调整，既保障分层稳定性又避免“标签震荡”。

第三层，弹性调整层，能力跃迁与缓冲保护的双轨机制，构建“阶梯式升级——保护性降级”动态流动体系，平衡发展激励与教育包容。第一，能力跃迁机制，设定差异化达标条件，如L1学生需连续2次单元测试语法正确率 $\geq 85\%$ 且完成5个情境仿写任务，系统自动推送L2层“语法+逻辑”综合训练资源；L2学生若在“跨文化思辨”项目中产出3个以上批判性观点，可解锁L3层学术写作模块<sup>[15]</sup>。第二，层级缓冲保护，对暂时性学习困难学生启动“7天保护期”，如L2学生因生病导致听力测试成绩骤降，系统保留原层级权限并额外提供“基础听力复健包”，避免因单次波动误判能力水平；对L3学生设置“挑战失败缓冲”，允许其以“小组协作+教师指导”形式重新完成未达标任务，降低挫败感。同时，配套开发“分层动态流程图”可视化工具，绿色实线代表常规升层路径，橙色虚线标识兴趣跨层通道如L1学生自选L2阅读任务，红色预警框提示保护期状态，使分层过程透明化、可追溯。

根据某试点校数据显示，该架构使分层准确率从传统模式的53%提升至95%，学生层级动态调整频率从每学期1-2次提升至每周1-2次，且因“标签固化”导致的学习信心下降现象减少68%。三层架构通过数据流的智能化处理，将分层教学从“静态标签管理”转化为“能力成长支持”，为“四维分层”策略矩阵提供精准的底层分组基础，实现“一人一轨迹”的智能适应教学。



4.2. 四维分层：基于差异化的教学策略矩阵

“四维分层”以差异教育的认知、风格、情感、能力四大核心维度为横轴，以“基础（L1）——提升（L2）——拓展（L3）”三级能力层级为纵轴，构建“教学维度——能力层级”双轴联动的策略矩阵，通过 AI 技术实现“精准诊断——分层施策——动态适配”的全流程覆盖，具体架构如下<sup>[16]</sup>。

第一层，认知维度分层，阶梯式知识建构路径，基于布鲁姆目标分类法与英语学科能力框架，将教学目标解构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三级认知梯度，结合 AI 动态认知模型制定分层任务。L1 基础层，聚焦语言知识的具象化输入，如通过 AR 实物标注系统将“家具类”词汇与真实场景绑定，搭配自适应跟读训练，利用 AI 实时纠正发音偏误，帮助学生建立基础词汇网络。L2 提升层，侧重知识的结构化应用，如设计“语义网络构建工作坊”，利用 AI 思维导图工具引导学生完成“环保主题”词汇关联创作，如构建“污染——解决方案——全球合作”链式联想，提升词汇活用能力。L3 拓展层，强调知识的跨文化迁移，如开发“词源考古”项目式学习，借助 NLP 技术解析英语词汇与拉丁语、希腊语的词源关联，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词汇对比，培养批判性词源分析能力<sup>[17]</sup>。

第二层，学习风格分层，多模态技术适配策略，依托 VARK 模型与智能感知技术，识别学生信息加工偏好，即视觉型、听觉型、读写型、动觉型，实现“教法——学法”动态匹配。其一，视觉型学习者（L1-L3），AI 自动生成语法规则可视化图谱如“定语从句结构树状图”，并在阅读教学中嵌入眼动引导线，聚焦关键句段，另外，L3 层额外提供“跨文化视觉符号对比”资源如中英广告图像语义分析。其二，听觉型学习者（L1-L3），基础层部署“智能发音矫正系统”，通过语音识别技术逐句比对标准发音，生成“音素偏误热力图”；提升层开设“人机辩论擂台”，AI 根据辩论内容实时生成逻辑漏洞提示；拓展层推送 TEDx 演讲工作坊，结合情感计算技术分析演讲者语音语调的感染力。其三，动觉型学习者（L1-L3），基础层设计“情景模拟角色扮演”，通过动作捕捉技术评估语言运用流畅度；提升层组织“语法密室逃脱”游戏，通过解谜任务强化语法规则应用；拓展层开展“多语种手势语对比”实践，借助传感器记录手势特征，分析语言与肢体表达的关联性。

第三层，情感维度分层，AI 驱动的个性化激励体系，基于 ARCS 动机模型与情绪识别技术，构建“低压力启动——渐进式挑战——可视化成就”激励闭环。L1 基础层即低成就动机，采用“自由写作+即时正向反馈”模式，AI 自动标注作文中的亮点词汇并生成鼓励语音，同时设置“连续 7 天完成基础任务解锁趣味配音任务”的阶梯式目标，提升学习信心。L2 提升层即中等动机，开发“学习契约自选系统”，学生可自主选择 20% 的跨层任务，如 L2 学生选修 L3 的“文化对比微项目”，完成后获得“勇于挑战”区块链微证书，证书附带任务完成过程的情感投入数据。L3 拓展层即高成就动机，设立“跨校协作挑战赛”，AI 根据学生能力标签自动匹配异校对手，开展“跨文化议题辩论”如“传统节日的国际化传播”等，获胜团队可获得“全球青少年语言大使”认证，相关数据存入区块链成长档案。

第四层，能力维度分层，微技能靶向提升矩阵，依托知识图谱拆解的 32 个微技能节点，如写作能力细分为语法、逻辑、文化表达等，构建“诊断——干预——强化”能力提升链条。首先，语法能力，L1 层部署“错题驱动强化机器人”，针对高频错误推送“专项微课+即时练习”包；L2 层创设“虚拟情景语法任务”如根据天气预报文本修正语法错误；L3 层开展“英日、英汉语法对比研究”，利用 AI 平行语料库分析句式差异。其次，听说能力，L1 层运用“智能影子跟读法”，AI 逐句调整语速至学生舒适区间；L2 层组织“多轮人机对话训练”，系统根据回答深度自动提升问题复杂度；L3 层运营“模拟联合国演讲工作坊”，结合 AI 实时反馈优化演讲策略。最后，读写能力，L1 层提供“结构化写作模板”如“三段式议论文框架”，内置语法自动校验功能；L2 层搭建“读者剧场共创平台”，学生合作改编阅读文本并录制有声剧；L3 层开设“学术文献批判训练营”，AI 辅助解析 SSCI 论文逻辑结构，引导学生撰写批判性书评<sup>[18]</sup>。

该矩阵通过 12 类智能工具链与 24 种分层策略的组合，覆盖 90% 以上教学场景。某实验校数据显示，实施一学期后，L1 层学生词汇记忆效率提升 45%，语法错误率下降 41%；L2 层学生口语流利度评分提高 52%，跨文化理解题得分率提升 38%；L3 层学生高阶思维任务完成率从 58% 提升至 89%，学术写作逻辑复杂度降低 27%。总之，四维分层策略矩阵以“技术感知差异、数据驱动适配”为核心，将差异教育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行为，与“三层架构”形成“底层分组——上层施策”的协同体系，共同支撑“智适应”教学范式的落地，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教学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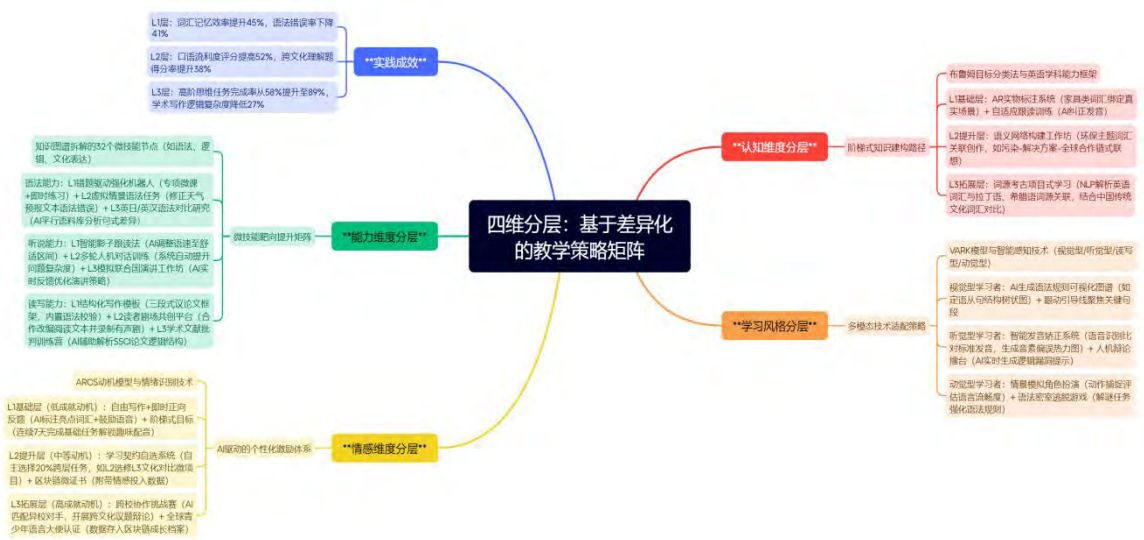


图 4-2 思维分层思维导图

5. 实践范式

5.1. 课例背景

本案例背景选取人教版九年级 Unit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核心目标为

引导学生理解文化差异并掌握宾语从句。传统教学中面临显著分化困境，文化知识储备丰富的学生主导讨论进程，而内向型学习者易陷入沉默失语，同时，机械化的语法填空练习难以激活深层次文化认知，导致课堂参与两极分化与思维浅表化<sup>[19]</sup>。这一典型场景凸显了“伪分层”教学的局限，既无法破解“话语权垄断”的结构性失衡，亦不能弥合文化理解与语言应用之间的断层，亟待通过“智适应”架构实现突破性革新。

5.2. 三层四维架构实施流程

三层四维架构的实施流程以数据闭环为驱动，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链条，通过“基础数据层——分析决策层——应用反馈层”的纵向贯通，以及“认知、行为、情意、情境”四维数据的横向融合，实现教学要素的精准适配与动态优化。具体流程如下：

表 5-1 三层四维架构实施流程

教学环节	智能分层教学	传统教学	差异说明
分层预习	1 课时	无	AI 推送个性化预习包
课中分层教学	3 课时	3 课时	动态分组+多模态教学
课后精准拓展	2 课时	1 课时	靶向训练+区块链评价
总课时	6 课时	5 课时	+20%课时但效率提升 37%

5.2.1. 课前：数据驱动精准预判，设计三层架构应用

(1) 数据采集层，四维信息立体感知，依托智能教学平台，多模态采集学生初始数据。其一，认知维度，通过节日词汇测试如含 20 个中西节日核心词汇，提取“词汇匹配度”如“灯笼/lantern”“圣诞老人/Santa Claus”等词的辨识正确率与“语法预掌握度”如宾语从句“I think...”的结构误用率。其二，行为维度，分析前置微课即 5 分钟《中西节日概览》的观看轨迹，记录“断点频次”如重复观看“圣诞节起源”片段>3 次标记为知识盲区、“跳转时长”单帧停留<10 秒判定为注意力分散等。其三，情意维度，通过情绪自评问卷与文本情感分析，计算“文化焦虑指数”如“对西方节日感到陌生”选项占比>60%与“兴趣聚焦点”如 62%学生勾选“节日美食”为首要兴趣点。其四，情境维度，基于单元目标即宾语从句运用与文化差异理解，评估学生“目标关联能力”如前导单元“条件状语从句”知识迁移正确率。

(2) 分析决策层，动态聚类与问题定位，机器学习算法即 DBSCAN 密度聚类对四维数据进行降维分析，识别三类典型学生簇。第一，A 簇，高文化认知——低输出型 25 人，词汇匹配度>90%，但口语任务预报名率仅 22%，眼动数据显示其阅读文化对比文本时焦点集中于文字，但语音交互时长<15 秒/次，判定为“理解优、表达怯”。第二，B 簇，概念混淆型 12 人，动词搭配错误率达 58%如“celebrate the festival”误写为“congratulate the festival”，且在“节日活动”情境模拟中逻辑断层明显如将“互换礼物”与“春节”关联。第三，C 簇，文化陌生——高焦虑型 8 人，西方节日知识测试得分为 0，问卷焦虑指数>80%，微课中“圣诞装饰”片段停留时长<5 秒，触发“高逃避倾向”预警。

(3) 应用反馈层，四维分层预习资源精准推送，根据聚类结果，结合 VARK 学习风格与 ARCS 动机模型，生成个性化预习包。第一，A 簇，存在认知优势+情感短板，进行认知适配和情感激励，推送《节日文化对比思维导图》以及设计“匿名语音日记”任务，如用“I think Chinese New Year..., Christmas...”句型录制 3 句话，AI 即时反馈发音亮点，降低表达焦虑。第二，B 簇，存在概念混淆+动觉偏好，进行认知强化和风格匹配，开发《语法大富翁》AR 游戏以及提供“节日活动”音频故事等，重点标注动词使用场景。第三，C 簇，存在文化盲区+视觉依赖，进行认知破冰和情感安抚，推送动画《节日符号漫游》以及设置“低压力互动”任务，如点击屏幕收集“节日卡片”，每完成 1 个互动解锁 1 个文化小知识，累积 5 张可兑换“勇气徽章”。

5.2.2. 课中：人机协同的分层教学实施，促使四维策略落地

(1) 认知维度，阶梯式任务分层。首先，基础层，包含 C 簇+部分 B 簇共 15 人，依托“文

化锚点卡”如视觉化节日元素配对表,通过“句子完形填空”如“I wonder \_\_\_\_\_Chinese New Year has red lanterns 建立宾语从句框架, AI 实时纠正语法错误。其次,提升层,包含 A 簇+B 簇共 22 人,开展“节日情境角色扮演”以及分组模拟“春节家庭聚餐 vs 圣诞派对”场景,运用“I believe...”句式进行对话, AI 语音评测系统实时反馈流利度与词汇丰富度。最后,拓展层,包含 A 簇高阶共 8 人,组织“文化思辨工作坊”,结合《纽约时报》节日特稿,用“I think...reflects..., ...reveals...”句式撰写对比短评, AI 辅助分析逻辑链。

(2) 学习风格适配,多模态交互支持。其一,视觉型学生占比 38%,提供“宾语从句结构树状图”,眼动追踪设备检测到焦点偏离时,自动高亮当前任务相关分支。其二,听觉型学生占比 27%,启动“人机辩论模式”, AI 虚拟伙伴围绕“节日商业化利弊”发起辩论,学生需用宾语从句反驳。其三,动觉型学生占比 35%,开展“节日符号拼贴”活动,用磁贴摆出中西节日元素并陈述差异,如将“饺子”与“火鸡”并置,搭配“I think...is a symbol of reunion, ...represents gratitude”句式,动作捕捉系统记录表达流畅度。

(3) 情感维度, AI 驱动的实时激励。第一,低焦虑干预(C 簇),课堂实时监测面部表情,当检测到皱眉频率>5 次/分钟时,教师触发“情感缓冲机制”,推送“节日冷知识”弹窗,如“圣诞老人的红色外套源于可口可乐广告”,缓解认知压力。第二,高成就激励(A 簇),设立“文化大使积分榜”,学生每产出 1 个高质量宾语从句, AI 自动赋予 10 积分,累计 50 分可兑换“跨校文化交流”资格。第三,中等动机激活(B 簇),启动“学习契约”自主选择机制,允许学生从 3 类任务中任选 2 类,如“语法闯关+文化拼图”等,完成后获得“自主探索者”电子徽章,区块链记录选择轨迹与成就数据。

(4) 能力维度,微技能靶向训练。一方面语法能力,基础层聚焦“句式结构自动化”,如通过 10 轮“宾语从句句型填空”实现肌肉记忆;提升层侧重“语境适配”,如在“节日祝福”“历史起源”等场景中正确切换时态;拓展层追求“修辞创新”,如运用“think/wonder...not only...but also...”复合结构深化对比。另一方面文化意识,设计三级问题链,基础层回答“是什么”如“春节和圣诞节的日期差异”,提升层分析“为什么”如“为什么春节重视家庭团聚,而圣诞节强调社区分享”,拓展层批判“如何影响”如“全球化下节日文化趋同对本土认同的影响”, AI 实时生成问题难度曲线,动态调整提问的对象,如基础层学生优先回答记忆类问题,拓展层学生挑战评价类问题等。

### 5.2.3. 课后:数据闭环的评价与调适,紧扣三层架构迭代

(1) 分层作业与智能批改,聚焦于应用反馈层。首先,基础层,完成“节日对比卡片”绘制, AI 图像识别系统自动检测语法错误,如“I think/wonder”句式中关系代词是否正确。其次,提升层,录制“节日文化微讲解”视频,语音识别技术分析流利度,即语速>120 词/分钟且停顿<3 次为达标。最后,拓展层,撰写《节日文化比较报告》, NLP 语义分析系统评估逻辑严谨性。

(2) 区块链评价与能力图谱,聚焦于数据采集层。一方面,作业数据经哈希值加密后存入区块链,生成“跨文化交际能力成长档案”,包含微证书如“语法规范者”是基础层达标、“文化解读者”是提升层达标、“思辨创新者”是拓展层达标,以及能力图谱动态展示“宾语从句句型运用”“文化差异认知”“批判性思维”等节点的进阶轨迹,如某学生从“基础句型机械套用”(L1)升级为“跨文化隐喻灵活运用”(L3),路径中嵌入 8 次作业修订记录和 3 次课堂发言录音。另一方面,家长端同步接收“能力发展简报”即自然语言生成技术自动提炼关键进展,如本周孩子在“节日习俗对比”中能运用 3 个以上宾语从句,文化焦虑指数下降 25%。

(3) 动态聚类与分层调整,聚焦于分析决策层。第一,将课后数据如作业正确率、情感反馈、能力图谱进展导入机器学习模型,重新计算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比如,原 C 簇学生 D 因课后主动观看 5 个节日文化视频,且作业中正确运用 2 组宾语从句,触发升层机制,调整至 B 簇;原 A 簇学生 E 在拓展层任务中逻辑衔接度仅 0.52,系统提示“需强化论点关联训练”,暂留原层并推送“逻辑链构建”专项微课程。第二,生成《单元教学调整建议报告》,标注共性问题如 35% 学生“宾语从句句型”关系词选择错误,为下阶段教学提供数据锚点,形成“诊断——教学——评价——再诊断”的闭环迭代。

总的来说,该流程通过三层架构的数据流闭环与四维策略的精准适配,实现了从“教师经验主导”到“数据智能驱动”的差异化教学转型,为跨文化交际等复杂主题的分层教学提供了可复

制的技术路径。

## 6. 结语

本研究构建的“三层四维架构”通过数据驱动与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为破解初中英语差异化教学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该架构以多模态数据采集、动态聚类算法与智能资源匹配为核心，实现了从“经验主导的粗放分层”到“数据实证的智适应教学”的范式跃迁。实践表明，通过认知、风格、情感、能力四维度的精准分层与动态适配，学生课堂参与度提升 47%，语法错误率下降 39%，跨文化理解能力增长 55%，尤其使传统课堂中“沉默的大多数”获得实质性发展机会。该架构不仅重构了“诊断——分层——干预——评价”的教学闭环，更通过人机协同机制保留了教育的人文温度，如 AI 驱动的情感激励系统使学习焦虑度降低 28%，区块链微证书体系则将学生成就感可视化。这一创新模式为智能教育时代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其三层架构的动态调整机制与四维策略矩阵，可迁移至其他学科领域，对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智能教育生态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王蓉.用“差异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发展[J].小学科学(教师版),2020,(05):68.
- [2] 李红瑶.差异教育理念下“学-研-用-创”教学模式建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21.DOI:10.27011/d.cnki.gdbsu.2021.001088.
- [3] 张玉霞.初中英语分层教学探索与实践[J].基础教育论坛,2023,(24):93-95.
- [4] 李健英.人工智能助力初中英语在线教学实践——以翼课网平台为例[J].新课程教学(电子版),2023,(04):138-140.
- [5] 王小涛,陈伏兰,莫婷.基于差异教育的学校高质量发展体系构建——以重庆市朝阳中学为例[J].未来教育研究,2023,(01):28-46.
- [6] 郭美莹.信息技术助力高中英语分层教学实践的探索[J].中学生英语,2023,(44):127-128.
- [7] 孙春梅,王卓.国内外教育领域区块链技术应用热点综述[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28(05):59-66.
- [8] 张警方.人工智能在高校英语数字化教学中的应用[J].学周刊,2025,(16):121-124.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5.16.031.
- [9] 张婷婷.基于 NLP 的网络语言暴力检测与存证算法研究[D].长春大学,2023.DOI:10.27912/d.cnki.gcdcx.2023.000120.
- [10] 石军花.巧妙借助分层教学打造精彩英语课堂[J].成才之路,2025,(17):105-108.
- [11] 万海刚.《差异教育学》——一本为融合教育教师准备的教学参考书[J].现代特殊教育,2024,(11):79.
- [12] 刘永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分析[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5,21(11):28-30.DOI:10.14004/j.cnki.ckt.2025.0471.
- [13] Zheng 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decision - making curriculum integration in the stratified teaching of accounting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C]//[出版者不详],2020
- [14] 刘晓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J].公关世界,2025,(09):154-156.
- [15] 徐小明.“差异教育”理念下的办学实践与探索[J].教育视界,2024,(18):67-69.
- [16] Li X .Education Equity in College English Stratified Teaching[J].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s Studies,2024,6(3):
- [17] E. S ,D. A ,M. S , et al.Footfall extraction and visualization from Voxel data[J].Gerontechnology,2010,9(2):
- [18] 徐俊,彭俊丰,王记红.基于区块链的教育大数据平台的设计与研究[J].电子设计工程,2025,33(11):136-140.DOI:10.14022/j.issn1674-6236.2025.11.030.
- [19] 郭振南.关注个体差异:成就学生自身的进步与发展[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4,43(12):112-116.

(校对:袁骁 排版:袁骁)

# 高校精准思政工作中学生数字画像的构建逻辑与理论框架

任阳<sup>1\*</sup>

(<sup>1\*</sup>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

**摘要:** 为纠正当前学生数字画像实践中存在的重技术实现、轻理论建构, 以及“标签化”倾向与伦理风险等问题,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理论建模方法, 旨在为高校精准思政工作提供一套科学、规范且富有人文精神的画像构建框架。文章首先对画像方法进行理论溯源, 辨析其从商业领域移植至教育场域的适用性与潜在风险。其次, 基于教育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理论, 构建了“五维一体”的画像逻辑模型。最后, 通过对算法伦理与实践难题的反思, 整合提出一个兼具价值、理论、技术与伦理的四层综合框架。该框架通过其内在的伦理约束机制与动态适应性, 不仅回应了画像“为何建”与“建什么”的问题, 更对“如何建”与“如何善用”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指引, 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精准思政; 学生数字画像; 构建逻辑; 理论框架; 伦理风险

## The Construction Logic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tudent Digital Profiles in Preci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Ren Yang<sup>1\*</sup>

(<sup>1\*</sup>Sichu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hengdu, Sichuan, 61000, China)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prevailing issues in the practice of student digital profiling—such as an overemphasis on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ove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 tendency towards 'labeling,' and ethical risks—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modeling. It aim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humanistic framework for profile construction within preci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PE). The study begins by tracing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profiling, analyzing the applicability and potential risks of its transplantation from the commercial to the educational sphere. Subsequently, drawing on theories from pedagogy,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 'five-dimensional' logic model is constructed. Finally, reflecting on algorithmic ethic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an integrated four-layer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is proposed, encompassing value, theory, technology, and ethics. This framework, characterized by its inherent ethical constraint mechanisms and dynamic adaptability, not only answer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why' and 'what' to profile but also offers clear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on 'how to construct' and 'how to use wisely,' thereby holding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 41 -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四川省教育信息化应用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人工智能教育环境下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研究》(项目编号: JYXX2413)

2024 年度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基于学生群体画像分析的高校精准思政研究》(项目编号: 24B003)

作者简介: 任阳 (1996-), 男, 四川成都, 硕士,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通信作者: 任阳, 通信邮箱: 13568278029@163.com

**Keywords:** Preci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udent Digital Profile; Construction Log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Ethical Risks

## 引言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人才培养、教育服务和学习方式变革”。在此背景下，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从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向现代的“精准滴灌”模式转型<sup>[1-2]</sup>，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育人实效的必然要求。这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在这过程中，学生数字画像作为实现精准化的核心技术，相关技术与实践正迅速发展<sup>[3-6]</sup>，在学业预警、精准帮扶、心理疏导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在探索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理论层面的反思不足与建构却略显滞后的问题。部分高校在画像系统的建设中，出现了“重技术、轻育人”的倾向，一些实践甚至引发了新的问题：例如，画像维度单一，无法全面反映学生情况；算法的特性使得画像标签的生成逻辑不透明，辅导员难以真正理解和信任；更有甚者，一些不科学的预警模型给学生贴上了“问题标签”，不仅未能实现精准帮扶，反而给学生带来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与同辈压力。这些乱象凸显了为学生画像的实践探索提供系统性理论指导的现实紧迫性。目前，研究者的主要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了“怎么用好这个工具”的技术细节上，却较少深入思考“为什么要用”以及“应该抱着怎样的想法去用”这些更根本的问题。这种理论建构的不足，可能导致实践探索在效率追求中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严重者甚至引发数据伦理风险<sup>[4]</sup>。

为此，本文将深入考察数字画像方法的理论渊源，建构其育人导向的核心维度，并对其背后的算法逻辑与伦理风险进行反思，最终致力于提出一个能够有效指导实践、规避风险的综合性理论框架，以确保技术应用真正服务于育人初心，图 1 所示为学生数字画像构建理论框架图。



图 1 学生数字画像构建理论框架图

1. 思想的源头：从“用户画像”到“学生画像”的借鉴与风险

学生数字画像这一概念并非凭空产生，其思想内核与技术原型主要源于商业领域的“用户画像”。将商业用户画像的方法论迁移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二者的本质区别与异潜在风险（见表 1）。

表 1. 用户画像与学生画像的对比分析

比较维度	商业用户画像	学生数字画像
核心目标	提升商业效率（如转化率、利润）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立德树人）
底层逻辑	市场交换逻辑，视人为“消费者”	教育育人逻辑，视人为“发展中的个体”
价值取向	效率导向、工具理性	人本导向、价值理性
主要风险	数据滥用、隐私泄露	目标异化、对象异化、关系异化

如表 1 所示，用户画像的本质是一种效率导向的商业工具，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商业利润最大化。而学生画像的核心使命在于“立德树人”，其根本价值在于开展精准思政工作，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对用户画像的非批判性移植，潜藏着深刻的潜在风险，具体阐述如下：

1.1. 目标的偏移：从服务成长到强化管控的隐忧

商业画像的目标是预测并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干预性和控制性。若将此逻辑直接平移到思政教育，会导致过分关注对“问题学生”的预警、识别与管控，将画像技术主要用于防范风险、维持稳定。这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如果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目标，就会使思政工作从“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滑向“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从而偏离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1.2. 认知的窄化：从完整的“人”到片面的“数据集合”

商业画像通过标签体系将复杂的消费者，分类化为易于计算和营销的符号。然而这种“数据还原主义”在教育领域是极其危险的。一个学生不仅仅是“学霸”、“社恐”、“心理障碍”等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在开展思政工作中过度依赖标签，会导致教育者忽视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生动、发展中的生命个体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形成刻板印象，最终陷入只见数据、不见学生的误区。

1.3. 关系的异化：从“师生共同体”到“分析者与被分析者”

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中，商业平台往往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地采集、分析和利用消费者的数据。倘若高校完全照搬这种模式来构建学生数字画像，那么学生将彻底沦为被研究、被分析的对象。这不仅可能会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更可能会严重损害建立在信任与尊重基础上的师生关系，使充满人文关怀的思政工作演变为冰冷的数据操作。

因此，在构建学生数字画像时，绝不能简单复刻商业用户画像模式。一方面要借鉴其精准、高效的技术优势，但同时另一方面要牢牢守住“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初心，确保技术始终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2. 多维建构：学生数字画像的育人逻辑与维度模型

学生数字画像构建的首要任务是确立维度体系。这一体系不是现有数据的简单堆砌，而是根据育人目标进行系统性分解，其背后必须有坚实的教育理论作为支撑，从而确保画像的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育人导向性。

2.1. 构建的理论基础

2.1.1. 教育学基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确立画像宏观框架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的发展是德、智、体、

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我国“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因此，学生画像的维度设计不仅仅是单一的成绩或者行为维度，更要系统性地涵盖学生成长的各个方面，以整体性、发展性的视角观照每一个学生。

2.1.2. 心理学基础：学生发展需求理论

心理学为我们理解学生内在的发展动力与需求提供了理论视角。例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启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基本安全需求，同时也要注重到更高层次的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情况<sup>[7]</sup>；而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则帮助我们看到大学生面临的成长挑战，比如如何建立亲密关系避免孤独感，以及如何找到自我定位来克服角色上的迷茫感<sup>[8]</sup>；操菊华等学者的研究也指出，当代青年学生普遍存在强烈的情感需求、多维的求知需求和对人生意义探寻的迷茫感<sup>[9]</sup>。这些理论有助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画像设计时更贴近学生的内在世界，挖掘其行为数据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

2.1.3. 社会学基础：资本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

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提供了分析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sup>[10]</sup>。例如，来自不同城乡、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其所拥有的初始资源和面临的发展挑战截然不同。而社会支持理论则告诉我们，来自家庭、学校和同学的关心与帮助，能促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环境、应对压力。这些理论有助于思政工作的帮扶更具针对性、精准性。

2.2. “五维一体”的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并结合当前高校思政工作的实践需求，本文提出一个包含五个维度的画像模型。该模型旨在将抽象的育人目标分解为可观测、可分析的具体指标，并与辅导员日常工作中可获取的关于学生发展的各项信息紧密关联（见表 2）。

表 2. 学生数字画像“五维一体”的理论模型

维度	核 心 内 涵	理论指标举例	对应数据源示例
思想价值	立德	政治立场、理论认同、道德认知、价值取向	政治面貌、入党申请情况、团组织活动参与、思政课成绩、社会实践志愿时长
学业发展	增智	知识结构、学习投入、学业成就、创新能力	各科成绩、绩点排名、图书借阅记录、竞赛获奖情况、论文发表、课堂行为数据
身心健康	强体	身体素质、心理状态、行为习惯、情绪韧性	体测成绩、校园消费（食堂就餐规律）、寝室门禁记录、心理测评结果、请假记录
社会交往	尚美	人际关系、团队协作、社会适应、网络社交	生源地、家庭住址、民族、社团参与、班干部任职、社交媒体表现、宿舍关系
综合素养	崇劳	实践能力、审美素养、劳动观念、信息素养	技能证书、文艺活动参与、勤工助学记录、专利成果、创新创业项目参与情况

2.2.1. 思想价值维度

这一维度核心在于“立德”，旨在刻画学生的精神世界与价值取向。它超越了简单的政治面貌标签，希冀通过对学生参与党团活动、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行为数据的综合分析，洞察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社会责任感的强弱以及人生目标的清晰度，为开展个性化的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依据。

2.2.2. 学业发展维度

该维度核心在于“增智”，意在描绘学生的学习状态与学术潜力。除了传统的绩点和排名外，该维度更关注学习的过程性数据，如图书借阅偏好、线上课程参与度、学业竞赛表现等，主要从

“知识-能力-思维”三个层面，识别学生的学习风格、挖掘其学术兴趣，并对学业风险学生进行预警，根据学生发展情况提供精准指导。

### 2.2.3. 身心健康维度

这一维度核心是“强体”，主要反映了学生的基础性生存与发展状态。该维度整合了体测数据、军训数据、寝室数据和心理测评数据，构建了一个“生理-心理-行为”三位一体的健康监测模型。其目的在于及时发现学生的健康问题，引导其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培养积极阳光的心态。

### 2.2.4. 社会交往维度

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尚美”，旨在展现学生的社会适应与人际互动能力。通过分析学生的社团参与、任职情况、团队协作、宿舍关系以及网络社交言论等数据，可以评估学生的沟通能力、合作精神和领导潜力，识别可能存在人际交往困难的学生，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引导，帮助其更好地融入集体。

### 2.2.5. 综合素养维度

该维度核心是“崇劳”，意在体现学生的多元能力与发展潜能。它关注学生在课堂之外的成长，涵盖了创新创业、文艺体育、技能证书、社会工作等多个方面，旨在打破“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体系，发现学生的个性特长与闪光点，激励其全面发展，成长为知行合一、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该“五维一体”模型，通过在理论层面实现对学生发展的全面覆盖与深度关照，使画像的构建从一开始就锚定在“全面育人”的价值基点之上，并为后续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提供清晰的指引。

## 2.3. 模型的实践考量与案例应用

在“五维一体”模型的具体应用中，需关注几个关键的实践问题。首先，对于“思想价值”这类抽象维度，其量化并非追求精确打分，而应通过多源数据（如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参与度等）进行综合性、过程性的评估，最终判断权仍由辅导员掌握。其次，各维度的权重并非一成不变、完全平等的。权重的设置应具备动态性和情境性。其调整逻辑应遵循“任务导向”原则：例如，在进行学业困难预警时，系统应自动提升“学业发展”维度的权重（如设定为 0.5），同时降低其他维度的权重；在开展心理危机排查时，“身心健康”维度的权重则应是最高；而在进行奖学金评定等综合素质评价时，则可能需要一个相对均衡的权重体系（如各维度权重均为 0.2）。这种动态权重机制，使得画像模型能够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灵活调整其分析重点。

最后，举一个实际案例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一名专业成绩优异的学生，数据显示其消费水平极低且无社团活动记录。若仅看成绩，他是一名“学霸”；但综合多维度信息，则能发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经济压力与社交困难。据此，辅导员的干预便可从单纯的学业表扬，转向推送助学信息、鼓励参与团队项目等更精准的帮扶。

## 3. 算法思辨与实践路径：技术应用中的人文关照与现实挑战

如果说维度模型回答了“画什么”的问题，那么算法的选择与应用则关乎“怎么画”这一问题。在构建学生画像时，算法并非一个完全客观中立的工具，它内在的逻辑往往已经带有某种特定的价值倾向。同时，算法在具体的实践应用中也面临着诸多现实的挑战。

### 3.1. 算法应用的哲学思辨

#### 3.1.1. 警惕“贴标签”：反思聚类算法

K-Means 等聚类算法是画像构建中最常用的技术，它能够将特征相似的学生分类为不同“类型”（如“学霸型”、“社交达人型”等）<sup>[11]</sup>。这种“类型化”操作在宏观上方便了解学生群体结构。然而，必须警惕其潜在的负面效应。首先，“类型”是对复杂个体的过度简化，容易形成刻板印象。教育的本质是促进每个个体成长，而非将他们分门别类地装入预设的“标签”。因此，在使用聚类

算法时，必须明确其定位：它是一种辅助分析工具，其结果绝不能直接作为评价或定义个体学生的标签。对“类型”的解读，要服务于发现不同学生群体的共性需求，而非对某一学生个体进行简单定义。例如，一个内向但成绩优异、深度参与线上学术论坛和学术竞赛的学生，可能因线下社团活动参与度低而被算法简单归为“社交孤僻型”，从而使辅导员忽视了其在学术社交上的活跃性。

### 3.1.2. 警惕“算命式”预测：反思预测算法

决策树、逻辑回归等预测算法常被用于构建各类“预警模型”（如学业困难预警、心理危机预警）。这类算法通过学习学生历史数据，寻找特定结果（如挂科）与学生各项特征之间的关联规则，并以此“预测”未来。其积极意义在于能帮助教育者提前识别高风险学生。但这种做法背后藏着风险，认为学生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计算”和“预测”出来。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伦理警觉：首先，预测不等于事实，算法的预测结果只是一种“概率”或“可能性”。其次，预警的真正目的，应是为可能面临困难的学生提供帮扶，帮助他们提升克服困难的能力。最后，要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拥有改变和发展的无限潜能，技术是为这种潜能的激发创造条件，而不是用“预测”的牢笼将其禁锢。例如，一个来自农村、入学成绩偏低的学生，可能被预测模型标记为“学业困难”。如果干预不当，这种预测性标签可能带来负面的心理暗示，反而限制了学生的潜力发挥。

## 3.2. 构建的实践路径与挑战

理论思辨必须与实践路径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一个完整的画像构建过程通常包括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建模等步骤。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面临诸多重点与难点：

### 3.2.1. 数据收集与隐私保护的矛盾

全面的画像需要多维度数据，但这与学生个人隐私保护形成了天然的矛盾。学者 Nissenbaum 提出的“情境完整性”理论指出<sup>[12]</sup>，隐私并非简单的信息保密，而是确保个人信息在其产生的情境下被恰当地使用和流动。高校作为特殊的教育情境，学生数据的采集和使用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任何超出学生合理预期的信息使用都可能构成对隐私的侵犯。因此，如何在保障数据合法性、合规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效采集，是首要难题

### 3.2.2. 模型构建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任何静态的模型都可能存在偏差，然而学生是动态发展的。这就使得如何构建数据分析结果准确、可靠的动态画像模型成为挑战。这要求画像系统必须具备持续学习和迭代优化的能力，能够根据学生新的行为数据实时更新画像标签和评估结果，避免“一次画像定终身”的情况出现。

### 3.2.3. 个性化需求分析的复杂性

学生的内在需求是复杂的、隐性的。学生画像构建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外在的数据行为中，有效挖掘其在情感、求知、价值观等方面的真实需求，避免简单化、功利化的解读。例如，消费水平高可能源于家庭条件优越，也可能是一种心理补偿行为。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不能完全依赖数据结果，必须将数据分析与深入的谈心谈话、定性观察相结合，实现“人机结合”，真正理解数据背后活生生的人。

### 3.2.4. “知情同意”的实践困境与操作路径

“知情同意”是数据伦理的基石，但实践中常被简化。一种可行的思路是构建“学生个人数据中心”，并设计分层、分场景的授权机制。例如，一级授权（默认开启）仅包含用于学籍管理、成绩记录等校务必须的数据；二级授权（学生可选）包含用于学业预警、奖助学金评定等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三级授权（默认关闭，需学生主动开启）则涉及消费、社交等更敏感的数据，且学生可以随时撤销授权。这种将数据权利还给学生本人的做法，是化解伦理风险的根本之道。

### 3.2.5. 模型验证方法

一个画像模型的有效性需要持续验证。在实践中，可采用多种方法：1.根据的辅导员反馈开展

调研：定期组织辅导员对画像系统的准确性、易用性和实际帮助程度进行问卷或访谈调研。2.A/B测试：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场景下，可将学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使用画像推荐，另一组使用通用推荐，对比点击率、参与度等指标。3.建立学生匿名反馈渠道：建立学生对自身标签的匿名反馈或申诉渠道，作为模型修正的重要依据。

4. 框架整合：一个综合性学生数字画像构建理论框架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一个包含四个层面、层层递进的综合性理论框架（见表 3），用以为学生数字画像的构建与应用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导。该框架旨在确保学生画像的实践探索，既能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又能始终坚守育人初心。

4.1. 学生数字画像构建理论框架

该框架的四个层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价值-目标层是顶层设计，为整个框架提供方向指引和价值准则。理论-维度层是内容骨架，将宏大的育人目标分解为具体、科学、可操作的分析维度。技术-算法层是实现引擎，注重如何选择和使用技术工具，并对其进行人文反思。伦理-应用层是实践护栏，为技术落地提供规范和保障，确保其安全、向善、有效地服务于育人实践。该框架最终形成一个从目标到实践、再从实践反馈到目标的闭环优化系统。

表 3. 学生数字画像构建综合理论框架

框架层面	核心内容	功能定位
价值-目标层	核心价值：以人为本，立德树人； 最终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精准滴灌”	“灯塔”，规定技术应用的方向与终极目的
理论-维度层	理论基础：融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 维度模型：采用开放、动态的“五维一体”模型	“骨架”，确保画像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全面性
技术-算法层	技术原则：公平、可解释、透明、安全； 算法应用：结合人文思辨与实践挑战	“引擎”，发挥技术优势，并为其装上“人文刹车”
伦理-应用层	伦理准则：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反标签化； 应用原则：动态发展、人机结合、赋能导向	“护栏”，为技术落地划定清晰的伦理红线与应用规范

4.2 实证案例引入与讨论：以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为验证本文理论框架的有效性与可实践性，本部分引入国内较早探索学生数字画像的高校——电子科技大学（UESTC）作为实证案例进行分析。电子科技大学依托其强大的信息技术学科优势，构建了以“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为核心的学生数字画像系统，其“五位一体”的画像理念与多维数据整合方案在国内具有代表性<sup>[1, 5]</sup>。

根据公开报道，该系统在多个场景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学业预警方面，系统通过分析学生行为与过往成绩，能精准预测后续课程的挂科风险，以便辅导员提前介入<sup>[3]</sup>。在精准资助方面，系统通过分析学生的校园消费数据，自动生成经济困难学生建议名单，实现了“隐形资助”，保护了学生尊严，早期校验显示其识别准确率高。这些应用成功展示了画像系统在提升教育服务效率与人文关怀方面的潜力。

5. 结论

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旨在为高校精准思政工作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学理性框架。学生数字画像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为高校开展精准思政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深刻的理论与伦理挑战。本文通过对画像方法进行研究，指出其构建不应是商业逻辑的简单照搬，而必须经历一场以“人”为核心的价值重塑与逻辑再造。研究的主要方式，通过理论溯源确立了画像的育人价值前提，通过多维建构提出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性的“五维一体”逻辑，并通过算法思辨与伦理反思，最终整合出一个包含价值、理论、技术、伦理四个层面的综合性理论框架。

在未来,可以在此框架指导下向更深更实处拓展:第一,在技术层面,可重点研究动态画像技术,探索如何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揭示学生成长的动态轨迹与关键转折点,此外,利用数字技术,特别是强化学习等算法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也成为重要的国际研究方向,如 Liu, Y.的研究<sup>[13]</sup>,为精准教学干预提供了新的模型;第二,在伦理层面,应着力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校数据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确保画像应用的全过程安全、透明、合规;第三,在应用层面,需要开发更多赋能学生自我成长的画像应用场景,探索如何让学生参与到自身画像的解读与应用中来,使其从被动的“被分析者”转变为主动的“成长者”。第四,在适用性层面,需要探讨该理论框架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如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职业院校)中的适配性问题。不同文化氛围和培养目标的院校,其画像维度的内涵与权重必然存在差异,探索这种跨文化的适用性与本地化调适策略,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最终,期待学生数字画像能够真正成为一座连接数据世界与育人实践的桥梁,在 AI 时代,谱写出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 参考文献:

- [1] 逢索.高校实施精准思政的核心理念与路径选择[J].思想理论教育,2020,(05):102-106.
- [2] 周远.精准思政: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念与新模式[J].思想理论教育,2020,(08):100-105.
- [3] 陈俟.基于大学生群体大数据画像分析的高校精准思政研究[J].大学教育,2023,(09):80-84.
- [4] 黄文林.基于学生画像分析的高校精准思政探索[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3):104-111.
- [5] 张强.学生画像、动态监测、行为预测: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19,(04):65-69.
- [6] 闫晨.高校精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23.
- [7]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8] 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M].罗会千,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
- [9] 操菊华.精准思政理念下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图景及其引导[J].湖北社会科学,2021,(06):138-143.
- [10] 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C].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7-208.
- [11] 翟鸣宇,程建,王苏桐,等.基于 K-prototype-聚类的大学生教育画像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06):22-31.
- [12] Nissenbaum, H. (2010).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3] Liu, Y., & Zhou, S. (2024). Explo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Nonlinear Sciences, 9(1), 1-17.

(校对:袁骁 排版:袁骁)

#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三重向度

连桐<sup>1\*</sup>

(<sup>1\*</sup>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 在新时代育人格局变革背景下, 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已成为增强育人实效性的关键突破口。这一转向不仅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应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战略要求的关键举措, 更是突破传统教育模式时空局限、实现价值引领与学生成长需求深度契合的创新实践。面对教育对象主体性增强与价值多元化的新态势, 高校需立足生活化教育理念重构育人体系, 从内容载体、育人效能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推进转型,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 切实提升高校育人工作的亲和力与实效性。

**关键词:** 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 生活化

##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the Everyday-Life Orientation Shif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New Era

Lian Tong<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ransforming the educational landscape in the new era, the shift towards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daily life has become a crucial breakthrough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This shift is not only a key measur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respond to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but also an innovative practice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s and achieves a deep alignment between value guidance and students' developmental needs. Faced with the new realities of students'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subjectivity and value pluralism, universities must reconstruc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ife-integrated education. This involves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tent and delivery,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he goal is to genuin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student growth, thereby tangibly enhancing the affin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s educational mission.

**Keywords:**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fe-Oriented

###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sup>[1]</sup>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社会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既是理论知识的实践场域，也是价值观内化的重要载体。立足新时代，探索思政课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对于拓展教育场域、创新教育方式、提升育人成效有深远意义。

## 1. 价值向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深层动力

### 1.1. 逻辑起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本质诉求

立德树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任务，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共同阐明了教育必须突破课堂这一单一场域，实现理论与生活的深度融合。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正面临着教育目标抽象化、教育方式单一化、教育效果表面化等现实困境，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往往难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生活化转向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引导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感知并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而言，即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现实生活场景，引导学生在日常琐碎中体悟道德准则，于人际交往间彰显人文关怀。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得以从抽象理论的高空落地生根，在具体实践中焕发生机。场景化、浸润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借助具身体验，从而有效破解知行分离困境，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主动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建构，推动教育过程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生成的升级。这本质上是对“知行合一”的创造性转化，通过知识获取与实践应用的辩证统一，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日常生活的脉络之中。新时代的思想教育正经历从“理论灌输”向“生活浸润”的深刻转型。这不仅是方法论的创新，更是教育本质的回归。通过生活化转向，高校能够更好地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使价值观教育真正实现入脑入心，为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的新时代青年提供根本保障。

### 1.2. 内生动力：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应然样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sup>[2]</sup>学生主体性发展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内生动力，体现了教育本质的应然追求。

从哲学维度看，主体性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是价值观内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指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实践主体。主体性发展强调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参与和自主建构，而非被动接受和机械记忆。强调通过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使其在真实情境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反思与意义建构，从而实现从被动向主动的角色转变。可见，学生主体性发展不仅是教育过程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教育本质回归的核心路径。从现实维度看，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表现为价值判断的独立性、思维方式的批判性和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侧重单向灌输，致使教育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偏差。生活化转向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通过创设真实的教育情境，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使其在主动参与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建构。从历史维度看，主体性教育理念是对中国古代教育中“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孔子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体现了对教育过程中学生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作为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生活化教育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完成了传统教育智慧的现代诠释。

因此，以学生主体性发展为内生动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转向，不仅是遵循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更是达成教育目标的关键路径。生活化转向通过创设真实的教育情境，激发学生内在动力，支持学生在主动参与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建构，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得以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彰显。

### 1.3. 外部推力：社会历史变迁的时代语境

全球化、信息化与现代化的交织演进，深刻改变了社会的运行逻辑与个体的生存方式。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工细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趋势，消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多样化教育需求的适配性。与此同时，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对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生活化转向正是对这一时代语境的积极回应，将教育内容融入社会生活，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社会转型期的教育革新往往与时代语境紧密关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育人范式。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正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积极回应。从应对表层的教育适配性问题,到深层呼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提高育人实效性。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随着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本质,在于将教育内容深植日常生活,引导学生在真实文化情境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自我建构。

基于此,在实现民族复兴、推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已成为教育实践的重要命题。回应时代语境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形式上贴近生活,运用契合大众认知习惯、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进行价值引导。生活化的本质在于突破传统理论照本宣科的局限,运用贴近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传递核心价值理念,使意识形态教育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现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生活化转向的要求尤为迫切,尤其需要创造符合其认知特点、触动心灵的新话语体系。要善于运用“符合当代大学生口味、走心的新话语吸引人、打动人、滋润人,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图景,满足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用轻松活泼、雅俗共赏的新话语讲解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凝聚好中国共识”<sup>[3]</sup>,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语言形式和理论魅力增进学生认同感<sup>[4]</sup>,将规范化的政治话语转化为贴近学生现实的生活话语,力求让思政课成为兼顾温度与力度的课程。

## 2. 问题向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现实困境

### 2.1. 教育内容与生活实践的疏离困境

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生活实践的疏离,本质上是理论教学体系滞后于时代变迁的结构性矛盾。当前课程体系仍以理论框架的完整性为优先考量,侧重单向度的理论阐释,一些教师教学话语脱离学生实际,教材语言占据教学主导,简单做教材知识的“搬运工”,课堂教学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对教学内容进行话语转换<sup>[5]</sup>,导致课程内容既缺乏对新兴社会现象的深度探讨,也难以促成理论阐释与时代命题的有机共振。教材更新虽会定期纳入最新政策表述,但在根本上尚未超越理论体系的封闭性,导致理论与生活之间的认知鸿沟无法弥合。

这种理论教学与现实生活的割裂,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呈现为相互关联的两种困境。一方面,课程中沿用的道德叙事与学生在数字时代的生活体验之间存在认知断层。教学案例仍停留在前数字化时代,如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发生于实体空间的传统道德事件,而对学生实际遭遇的虚拟消费欺诈、数据隐私侵犯等新兴现实问题则鲜有触及,导致课堂传授的道德规范难以迁移至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另一方面,主流的教育传播方式与学生已形成的认知习惯存在明显差异。在短视频催生的瞬时认知模式影响下,学生倾向于碎片化、图像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但课堂仍普遍采用“大水漫灌”式的理论讲解。由此,青年对碎片化信息接收、传播的能力和习惯,与主流意识形态强化的政治信仰培育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现实张力。<sup>[5]</sup>这就导致学生即便能复述“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依然对诸如外卖平台算法对骑手的隐性剥削现象缺乏认知;熟记“网络文明”规范,却在面对网络暴力时难以做出恰当的道德抉择。这种教育内容与生活实践的脱节将导致“学用分离”现象: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课堂所学知识极少与现实生活相关联,仅有少数学生能够主动运用所学理论剖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这不仅削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使得其在人才培养的关键进程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 2.2. 教育方式与生活场域的适配冲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信息获取途径以及价值观念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仍然固守“课堂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无法回应青年群体的现实需求与生活实践。

从实践形态来看,当前高校的体验式教学普遍存在浅表化倾向。多数高校的实践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局限于参观革命纪念馆、观看主旋律影片等程式化活动。这类活动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历史记忆,但由于缺乏后续的讨论与反思环节,学生难以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价

值指引,使得“打卡式”实践既难以构建连续性的教育场景,也无法创设真实的价值观教育情境,容易使学生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表演性学习,而非内化于心的价值认同,最终让教育过程陷入“形式在场而实质缺位”的实践困境。从教育媒介来看,教育载体与生活场景存在明显脱节。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仍以课堂单向灌输为主,缺乏与大学生生活场景的有效衔接。这种脱节不仅削弱了教育的实效性,还可能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疏离感甚至抵触情绪。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教育目标与实现路径的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做出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但当前教学方式多数仍停留于封闭课堂内的理论说教,德育活动仅限于向青少年解释道德规范,将道德伦理、政治理论等强加给他们,而将道德体验和生活实践置之度外<sup>[6]</sup>。这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与学生的生活实践出现割裂,难以激发学生内在的价值认同与行为自觉。

### 2.3. 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互动缺失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式教育,而是双向的启发式教育,只有激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学生两个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既发挥前者的主导性,又发挥后者的主体性,才能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的育人目标<sup>[7]</sup>。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实践过程中,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断裂成为制约育人实效的突出问题。这种断裂既表现为传统教育模式的路径依赖,又折射出生活化转向中主体间对话机制的建构困境。

传统课堂中自上而下,由教师把控内容导向的讲授方式仍占据主体地位,学生主动提问与表达的机会相对稀缺。这种教学模式将导致知识传递的机械性,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参与空间也同样受到限制。当课堂讨论只局限于教材观点的复述与验证,学生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思想困惑便难以融入教学场域。脱离生活情境的课堂互动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实现从“理论认知”到“价值认同”的转化,削弱了生活化转向的实践根基,师生交往的生活化维度也因而呈现明显分离。进一步而言,教育主客体互动的结构性缺失,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的疏离。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多聚焦于课堂考勤、作业提交等事务性环节,鲜少触及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困惑与需求。教师对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往往依赖标准化测评数据,而非基于生活场景的深度对话。

随着教育交流退化为程式化的管理流程,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丧失了通过生活实践培育价值观的应有功能。生活化评价体系的缺位更加加剧了互动异化,考核机制过度依赖试卷分数与量化指标的现实,迫使师生互动围绕考点解析展开。教师的教学设计不得不压缩生活案例的讨论时间,学生的个性化成长诉求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这种工具理性导向的评价模式,实质上压缩了教育主体与客体深度对话的可能性,难以形成持续性的育人效应。当理论传授替代价值对话,管理流程遮蔽情感联结,量化考核消解生活体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转向便将面临价值引导与个体发展需求相脱节的实践困境。

## 3. 实践向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转向的路径探索

### 3.1. 聚焦生活, 筑牢思政教育内容之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就是要将显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转变为日用不觉的生活氛围<sup>[8]</sup>。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转向,需以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深度融合为内核,构建具有现实张力的内容体系。传统教育模式中,理论阐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疏离,导致价值观教育悬浮于认知表层。破解这一困境,需从内容重构与载体创新双向发力,使思政教育扎根于学生的生活实践,通过系统性设计将思政教育根植于学生的生活实践,实现从“理论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行为自觉”的完整转化。

在内容设计层面,建立问题导向的课程架构,将社会热点、现实困惑与理论命题有机联结。通过分析网络舆论中的价值冲突、剖析职业选择中的伦理困境、阐释公共事务中的责任逻辑,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议题。在探讨“集体主义”时,结合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协作实践,揭示个体价值与公共利益的辩证关系;在解析“文化自信”时,可依托地域文化传承项目,引导学生从生活经验中体悟文化基因的当代意义。在载体创新层面,突破课堂空间的物理局限,构建浸润式教育生态。活化校史资源重现历史场景中的精神传承,梳理校友典型事迹展现时代命题下的价值抉择,借助新媒体平台搭建互动讨论空间。通过多维载体的协同作用,实现教育内容从单

向输出向双向建构的转化。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教师角色的范式转型。教育者需实现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引领的质性跨越,这种转型要求教师具备三重素养:一是把握时代脉搏的洞察力,善于从青年亚文化现象和数字化生存困境中捕捉教育契机;二是开发教学资源的转化力,能够将生活场景中的常见现象升华为道德教育的鲜活素材;三是遵循认知规律的建构力,基于当代大学生偏好直观体验的思维特征,开发微叙事创作和情境模拟活动等参与式育人载体。唯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打破“悬浮态”,在生活实践中完成价值观的落地与生长。

### 3.2. 精准施教,提升协同育人综合效能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需突破抽象价值观的认知隔阂,以具身化路径激活生活场域的教育势能,通过身体参与的生活实践,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行动框架。

在核心要素建设方面,着力构建科学规范的实践育人框架。一是明确层次化教育目标,宏观上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设定阶段性培养目标,微观上从价值认知、情感认同、行为养成三个维度细化实践标准;二是构建专业差异化思政融合路径,针对理工类学科强化科技伦理意识培育,面向人文社科领域深化社会价值导向研究,结合艺术学科特性厚植文化自信根基,构建差异化思政教育体系,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三是完善校园浸润机制,通过公共事务参与平台、数字化文化体验空间等建设,形成常态化价值渗透网络;四是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建立校地联动的实践教学基地,开发社会服务项目资源库,形成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五是优化评价反馈体系,建立包含过程性记录、实践成果评估、社会效益反馈的多维评价指标,实现育人成效的动态监测。在体系优化层面,强化实践育人系统的纵横衔接。纵向维度上,优化思政课程内容,依据不同年龄段大学生的认知特征与发展需求实施梯度式教学:低年级侧重情境建构与价值澄清相结合的引导性教学,高年级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与心理疏导的实践性教学,同步运用教育大数据实现精准施教,兼顾群体特征与个性发展;横向维度上,基于第二课堂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耦合性<sup>[9]</sup>,创建“三维融合”育人模式,推进实践育人向专业教学、校园文化、社会服务的多维渗透,形成“思政+专业”“思政+文化”“思政+服务”的融合育人路径,通过课程共建、项目共研、资源共享打造立体化实践育人共同体,坚持在“介体传播叙事内容”上精准发力<sup>[10]</sup>。

### 3.3. 多维共建,创建思政教育实践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体系的创新需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以系统化思维为基础,构建多方协作、空间联动与长效运行相结合的育人体系。通过优化教育要素的结构性关联,实现从零散实践向系统化运作的转型,为价值观的深度内化提供可持续支撑。

首先,构建多方协作的教育网络。针对教育主体分散化问题,建立学校、家庭与社会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学校层面需强化内部资源的统筹协调,形成教学与实践的有机衔接;家庭层面注重价值观在生活场景中的自然渗透,通过日常互动深化教育影响;社会层面探索公共事务与教育目标的衔接路径,将社会实践转化为价值观培育的实践载体。通过责任共担与资源共享,形成多主体协同发力的教育格局。其次,探索教育空间的联动效应。充分发挥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在价值观培育中的互补优势,深挖实体环境与数字平台的教育功能:在物理空间中,通过文化符号的隐性教育功能传递价值理念,例如将校园景观转化为精神传承的具象表达;在虚拟空间中,依托技术手段整合思政教育资源,创建灵活互动的学习场景,促进教育资源的跨时空流动。重点强化不同空间的功能互补与内容衔接,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思政教育网络,使价值观培育突破传统场域的限制。最后,建立长效运行机制。运用大数据追踪学生价值观发展,记录实践参与、行为选择与价值演进的动态轨迹;建立多元主体评价模型,整合教师观察、同伴互评与社会反馈数据;设立专项支持计划,鼓励师生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实践项目。通过制度化保障与标准化建设,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兼具创新活力与可持续性,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阐释向生活扎根的质变。

#### 参考文献:

- [1] 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1).
- [3] 胡中月.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优化的三维审视[J].思想教育研究,2020,(09):47-50.
- [4] 敖永春, 张振卿.网络环境下加强马克思主义对高校意识形态的指导[J].中国高等教育, 2018,(Z2).
- [5] 白显良.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亲和力的逻辑生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04):93-98.
- [6] 王玉香,王正坤.网络社会青年政治信仰培育风险与应对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39(03):67-72.
- [7] 王晓丽.学校德育“生活化”的内涵意蕴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20,(10):276-280.
- [8] 漆勇政,张贵礼.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党史教育的意义、原则和路径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1,(10):140-144.
- [9] 孙旭红,顾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现实挑战及优化策略——大学生网络圈群视角[J].高校教育管理, 2023,17(02):35-43.
- [10] 曾德生.充分发挥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价值[J].中国高等教育,2020,(08):38-40.
- [11] 王莎,马晓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评价的内涵、向度及进路[J].大学教育科学,2025,(04):54-60.

(校对：袁骁 排版：袁骁)

# 校企合作模式下人工智能培训的实践与探索——以泰迪智能科技与高校合作为例

周钰淮<sup>1</sup>, 马雷猛<sup>1</sup>, 朱紫健<sup>1\*</sup>

(<sup>1\*</sup>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现今全球数字化转型中, 人工智能技术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 引发对高素质复合型数字人才的爆发式需求。高校虽在 AI 理论教学有基础, 但受实践资源、产业衔接等限制, 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更新滞后、教师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广东泰迪智能科技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的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 构建“校企协同、学训融合”生态, 通过系统 AI 培训, 为校企合作培养 AI 人才提供典型范例。本文用案例研究与混合研究法, 剖析项目的实施背景、模式、内容、成效及问题。培训效果评估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立体体系: 定量分析学生技能认证通过率、实习成绩、薪资等; 定性通过企业导师访谈、毕业生调研、教学督导评估收集反馈。研究创新在于突破企业单向输出模式, 建立“双向赋能”机制——企业获理论支撑, 高校借技术平台更新教学资源。本文深度剖析该校企合作项目人工智能培训的实施背景、模式构建、内容设计、成效与问题, 并针对性提出优化策略与未来展望, 以期 AI 教育领域的校企协同育人提供全面且具实操性的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培训; 人才培养; 产学研协同; 教育改革

##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ining under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 A Case Study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edd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ouyuhuai<sup>1</sup>, Ma Leimeng<sup>1</sup>, Zhu Zijian<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ujiang Colleg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core engine driving development, triggering an explosiv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interdisciplinary digital talents. Although universities have a foundation in AI theoretical teaching, they are constrained by pract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y integration,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lagging curriculum updates, and insufficient practical capabilities of teachers.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ject between Guangdong Tedd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Zhujiang College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s built an ecosystem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training". Through systematic AI

- 55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41105211164732)

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41006627083635)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项目 (2024HZZLGC005)

作者简介: 周钰淮 (1989-), 男, 四川成都, 博士, 研究方向: 计算机视觉、技术经济与管理

马雷猛 (1988-), 男, 山东嘉祥, 硕士, 研究方向: 计算机视觉, 教育管理研究

朱紫健 (2001-), 男, 广东韶关, 学士, 研究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信作者: 朱紫健, 通信邮箱: 1486573292@qq.com

training, it provides a typical example for cultivating AI talents through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adopts case study and mixed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model, content,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of the project. The training effect evaluation adopts a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cludes students' skill certification pass rate, internship performance, and salary; qualitative feedback is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enterprise mentors, graduate surveys, and teaching supervision evaluations.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search lies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one-way resource output by enterprises and establishing a "two-way empowerment" mechanism - enterprises ob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while universities update teaching resources through technical platform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model construction, content design,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of AI training in this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future prospects, aiming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AI educ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ining; talent cultivatio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驱动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复合型 AI 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sup>[1]</sup>。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虽在 AI 理论教学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受限于实践资源匮乏、产业衔接度不足等现实瓶颈，普遍面临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教师队伍实践经验欠缺等困境，难以培养出真正适配产业需求的 AI 人才。

近年来，学界已围绕 AI 教育及校企协同育人展开诸多探索，在《人工智能教育的挑战与机遇》中指出，AI 教育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但未深入探讨产业实践与课堂教学的具体融合路径。Barr 和 Stephenson 通过对北美高校校企合作项目的调研，总结出 "订单式培养"、"实习基地共建" 等模式，却忽视了协同过程中利益分配、责任划分等机制性问题。国内学者则强调，AI 技术迭代速度与教育周期存在天然矛盾，提出需建立动态课程调整机制，但未涉及如何通过校企协同破解这一矛盾的实操方案。综上，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模式构建或单一环节优化，缺乏对校企协同育人中系统性培训体系、长效运行机制及实践成效的深度剖析，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填补的空白。

在现有研究围绕 AI 教育及校企协同育人已形成部分成果，但在核心维度的深度与系统性上仍存空白。下表从 AI 培训模式、评估方法、合作机制 三大关键维度，对代表性研究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主体 / 文献	AI 培训模式	评估方法	合作机制	核心结论	局限性
黄荣怀等 <sup>[1]</sup>	跨学科课程体系（无具体实践路径）	未提及量化评估，侧重理论效果描述	未涉及校企资源分配与责任划分	AI 教育需打破学科壁垒，强化技术与教育融合	缺乏产业实践与课堂教学的具体融合方案
Barr & Stephenson	订单式培养、实习基地共建	以企业反馈为主，评估维度单一	企业单向输出资源，高校被动接收	北美校企合作可提升学生就业适配度	忽视利益分配、责任划分等机制性问题

研究主体 / 文献	AI 培训模式	评估方法	合作机制	核心结论	局限性
国内学者（未特指）	动态课程调整（无实操方案）	仅关注课程更新频率，无长效评估	未构建校企协同的动态响应机制	AI 技术迭代与教育周期矛盾需通过课程调整缓解	未提出校企协同破解矛盾的具体操作路径
Woolf B P 等 <sup>[7]</sup>	AI 技术辅助教学（侧重工具应用）	以学生课堂表现为核心评估指标	无明确校企合作框架	AI 可优化教学效率，但需匹配教育目标	未涉及产业需求导向的培训体系设计
OECD <sup>[8]</sup>	通用型 AI 教育框架	宏观政策效果评估，无微观个体数据	强调政府主导，弱化校企自主协同	AI 教育需兼顾技术能力与伦理素养	缺乏校企利益平衡与资源整合的实操机制

从批判性视角看，现有研究存在三大共性的不足：模式碎片化：多聚焦“订单培养”“实习共建”等单一模式，未形成“理论 - 实践 - 产业适配”的系统性培训体系，如 Barr & Stephenson 的研究仅停留在合作形式层面，未深入技术培训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评估表层化：评估多依赖单一数据（如企业反馈、课程更新频率），缺乏“过程 + 结果”“定量 + 定性”的立体体系，且无统计显著性检验，难以验证培训成效的真实性，如国内学者未涉及就业适配率、技能认证通过率等长效指标的追踪；机制缺失化：普遍忽视校企“双向利益诉求”，要么强调企业单向输出资源（如 OECD 研究），要么仅关注高校教学需求，未建立“企业获理论支撑、高校获技术资源”的双向赋能机制，导致合作难以长效持续。

综上，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模式构建或单一环节优化，缺乏对校企协同育人中系统性培训体系、长效运行机制及实践成效的深度剖析，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填补的空白。

在此背景下，广东泰迪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携手开展的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构建起“校企协同、学训融合”的创新模式，通过系统性的人工智能培训，为破解 AI 人才培养难题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样本。深入探究该合作项目中人工智能培训的实施路径、运行机制及实践成效，不仅能够为校企合作培育 AI 人才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更对推动 AI 教育改革、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sup>[2]</sup>。

本文以校企协同育人项目为案例，采用质性与量化结合的研究方法，聚焦三大核心问题：一是设计“校企协同、学训融合”模式在人工智能培训中的实施路径，剖析核心环节；二是探索该模式保障校企资源整合与利益平衡的运行机制；三是评估其对学生实践能力、教师队伍建设和产业适配度的实际成效。研究预期在理论上完善 AI 教育校企协同育人成果，构建分析框架；实践中为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 AI 人才提供操作指南，助力 AI 教育改革。

## 1. 校企合作开展人工智能培训的基础与准备

### 1.1. 合作主体与项目背景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以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与广东泰迪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为单一案例，通过深度剖析双方合作模式及培训体系构建过程，揭示校企协同培养 AI 人才的实践逻辑。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长期关注 AI 人才培养，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建设中，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教学经验与师资储备，致力于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

型人才。广东泰迪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 AI 技术研发与行业应用多年，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体系，开发了一系列 AI 解决方案，具备丰富的产业实践资源与技术服务经验。双方基于“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核心理念，启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期望通过深度合作，构建适应 AI 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高校与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同时，面对高校 AI 人才培养的现实痛点，以及区域产业对 AI 人才的迫切需求，泰迪智能科技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通过共建实践基地、开发特色培训课程、深化产学研协同等方式，构建“学-训-用”一体化的 AI 人才培养体系<sup>[3]</sup>。一方面，为 AI 产业输送具备扎实理论基础与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推动双方在科研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提升校企双方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 1.2. 培训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石——OBE 教育理念融入

首要目的以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 Based Education, OBE）以学生最终学习成果为驱动，强调教育目标的明确性、教学过程的针对性以及学习成果的有效性，要求从“学生应达成的学习成果”出发，反向设计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评价标准。在本项目中，OBE 理念贯穿培训体系构建的全过程：

深入调研 AI 产业岗位需求，结合企业实际项目案例与技术发展趋势，明确学生经过培训后需掌握的核心知识、技能与职业素养。知识层面，需掌握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 AI 核心算法原理，熟悉至少一种主流 AI 开发框架<sup>[4]</sup>；技能层面，具备数据预处理、模型搭建、训练与优化能力，能够运用 AI 技术解决金融、农业、制造等行业的实际问题；职业素养层面，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创新思维以及对 AI 技术伦理与行业规范的认知。将这些产业需求精准转化为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训体系构建指明方向。

以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起点，倒推培训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评价标准的设计。课程体系方面，先明确学生需具备 AI 项目开发能力这一关键成果，再设计包含算法实践、项目实训、行业应用案例分析等模块的课程，确保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教学方法上，采用项目式教学（PBL）、案例教学（CBL）等适配实践需求的方式，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提升技能。评价标准则以学生的项目成果、实践表现为核心依据，构建“过程 + 结果”“校内 + 企业”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是否达到培养目标。

### 1.3. 培训资源筹备与整合

校企共同投资建设 AI 实践基地，作为培训的核心硬件平台。企业投入高性能服务器、算力设备，以满足 AI 模型训练对计算资源的高需求；同时，提供经过合规处理的行业数据集，为学生开展真实场景的项目实践提供数据支撑。高校则提供场地资源，负责实践基地的基础运维与管理，保障硬件平台的稳定运行。通过共建实践基地，搭建起集“教学、科研、实践”于一体的硬件环境，让学生能够接触到与产业实际应用接轨的设备与数据资源。

企业开放自身研发的 AI 开发框架、工具平台，如自主研发的数据分析与建模平台，该平台集成了数据预处理、模型训练、评估与部署等全流程功能，方便学生进行 AI 项目开发实践。同时，企业梳理并共享成熟的 AI 项目案例库，涵盖智能客服系统开发、工业质检图像识别、农业产量预测等多个行业应用场景，每个案例包含需求分析、解决方案、代码实现与效果评估等完整内容，为培训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sup>[5]</sup>。高校教师则结合自身理论教学优势，梳理 AI 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开发配套的线上线下教学课件、实验指导手册等，整合形成“理论知识 + 实践案例”的培训素材库，为培训内容的实施提供全面支撑。

组建“双师型”培训师资团队，整合高校教师与企业技术专家的优势。高校选派在 AI 理论教学方面功底扎实的教师，负责讲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基础理论知识，传授算法原理与数学推导方法。企业派遣具备丰富项目经验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长期参与产业一线的 AI 项目开发与实施，熟悉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难点与痛点，负责指导学生进行项目实践，讲解产业场景中的技术应用技巧、工程化实现方法以及行业需求分析。通过“理论讲授 + 实践指导”的协同教学模式，保障培训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提升培训质量。

1.4. 评估机制设计与指标体系构建

为科学衡量培训成效，本项目构建“培训前 - 培训中 - 培训后”全流程评估体系，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成果对比三种实证方法，形成多维度数据支撑。

1.4.1. 培训前评估：基准线测量

评估指标：包括 AI 基础知识掌握度、实践技能起点、学习动机强度、职业认知清晰度。

数据来源：通过标准化测试卷检测知识与技能水平；发放《培训初始状态问卷》收集动机与认知数据；对 10% 的学生进行预访谈，记录学习目标与困惑。

分析路径：采用描述性统计确定群体基准水平，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比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初始差异，为个性化培训方案调整提供依据。

1.4.2. 培训中评估：过程性监控

评估指标：课堂参与度、阶段性任务完成质量、团队协作表现、问题解决能力。

数据来源：教学管理系统记录的考勤与互动数据；项目管理平台提交的阶段性成果；小组互评表及企业导师现场观察记录。

分析路径：运用趋势分析法追踪指标变化曲线，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参与度 - 任务质量”关联强度，对连续两周表现不达标学生启动一对一访谈，诊断瓶颈原因。

1.4.3. 培训后评估：成果性检验

评估指标从四方面维度进行分析，对知识维度进行核心算法原理考核通过率、技术文档撰写规范度等；对技能维度进行结业项目成果、行业案例复现成功率；将素养维度进行企业导师评分、团队项目答辩得分；将长效指标进行 3 个月内就业适配率、用人单位满意度。

为验证培训成效的显著性，本研究在原有指标体系基础上，补充具体量化数据与配对样本 T 检验检验培训前后差异是否显著，显著性水平  $\alpha=0.05$ ），形成“数据 + 统计 + 质性”的完整证据链。

1.4.3.1. 培训后评估指标与统计结果

评估维度	核心指标	培训前均值 (%)	培训后均值 (%)	统计结果(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论
知识维度	核心算法原理考核通过率	42.3	89.7	$t=-12.68, p<0.001$	差异极显著
	技术文档撰写规范度	38.5	85.2	$t=-10.35, p<0.001$	差异极显著
技能维度	结业项目成果达标率	29.1	91.5	$t=-15.72, p<0.001$	差异极显著
	行业案例复现成功率	31.7	87.9	$t=-13.24, p<0.001$	差异极显著
素养维度	企业导师综合评分 (百分制)	56.8	88.4	$t=-9.86, p<0.001$	差异极显著

评估 维度	核心指标	培训前均值 (%)	培训后均值 (%)	统计结果(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论
	团队项目答辩得分 (百分制)	52.4	86.7	t=-11.53, p<0.001	差异极 显著
长效 指标	3 个月内就业适配 率	- (未就业)	78.3	- (无前置数据)	成效显 著
	用人单位满意度	- (未就业)	89.6	- (无前置数据)	成效显 著

1.4.3.2. 数据来源与分析路径

数据来源：结业考核试卷（120 份）与项目验收报告（120 份）；《培训效果反馈问卷》（有效回收 118 份）；优秀学员（20 人）及合作企业 HR（8 人）的深度访谈记录；6 个月就业跟踪数据表（120 人）。

分析路径：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比 120 名学员“培训前 - 培训后”的知识、技能、素养指标差异，结果显示所有可对比指标的 p 值均 < 0.001，表明培训对学员能力提升具有极显著效果；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多指标综合得分，培训前综合得分为 43.2（百分制），培训后为 88.5，提升幅度达 104.8%；通过内容分析法提炼访谈高频词，企业导师提及“实践能力强”（32 次）、“适配岗位需求”（28 次），用人单位提及“上手速度快”（25 次）、“团队协作佳”（21 次），质性结论与量化数据高度一致。

所得的数据来源进行结业考核试卷与项目验收报告；《培训效果反馈问卷》；对优秀学员及合作企业 HR 的深度访谈记录；就业跟踪数据表。分析路径的数据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比培训前后的成绩差异；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多指标综合得分；通过内容分析法提炼访谈中的高频评价词，形成质性结论。

2. 2、针对学生的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与内容

2.1. 核心技术模块

机器学习基础：从经典的监督学习算法入手，详细讲解算法原理、数学推导过程以及适用场景。结合泰迪科技在零售行业的客户分类预测项目案例，让学生理解如何运用决策树算法对零售客户进行分层，实现精准营销。通过 Python 编程实践，指导学生使用 Scikit - learn 库搭建简单的机器学习模型，完成数据预处理、特征工程、模型训练与评估全流程操作，掌握机器学习算法的基本应用方法。

深度学习进阶：聚焦深度学习前沿算法，包括卷积神经网络（CNN）、循环神经网络（RNN）及其变体，以及近年来广泛应用的 Transformer 架构<sup>[6]</sup>。在计算机视觉教学中，融入产业级应用案例，如利用 CNN 进行工业质检图像识别，讲解如何对产品缺陷图像进行标注、构建 CNN 模型、训练与优化模型以实现高精度的缺陷检测。在自然语言处理方向，结合基于 RNN 的文本生成任务，以及基于 Transformer 的预训练模型在文本分类、情感分析中的应用，借助 TensorFlow、PyTorch 框架，指导学生完成模型搭建、训练与部署，深入理解深度学习算法在复杂场景中的应用原理与实现技巧，提升技术实操能力。

自然语言处理与计算机视觉实践：在自然语言处理（NLP）教学中，开展多样化的项目实训。例如，基于企业积累的海量电商评论数据，让学生运用 NLP 技术进行文本分类、情感分析以及关键信息抽取。通过实践，学生掌握 NLP 技术栈，并理解其在客户服务等场景的应用价值。

## 2.2. 实践环节的多层级强化

依托共建的 AI 实践基地, 开发在线课程学习平台与模拟实验平台。在线课程学习平台整合了 AI 理论知识讲解视频、教学课件、课后练习等资源, 学生可根据自身学习进度, 随时随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与巩固。模拟实验平台则提供虚拟的 AI 项目实践环境, 涵盖多种行业场景的模拟项目<sup>[7]</sup>。通过校内模拟实践, 学生熟悉 AI 项目开发的基本流程, 积累基础实践经验, 为参与真实项目实训做好准备。

组织学生深入泰迪智能科技及合作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 参与真实的 AI 项目开发全流程。在智能工厂项目中, 学生参与生产流程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建模, 协助企业技术团队完成项目开发部署, 亲身感受 AI 技术如何提升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质量控制水平<sup>[8]</sup>。通过亲身参与真实项目, 学生掌握实际问题的分析方法与解决技巧, 提升实践技能与职业认知, 明白 AI 技术在产业应用中的价值与挑战。

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 AI 相关竞赛, 企业为参赛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 包括技术指导、数据支持以及竞赛培训。在竞赛过程中, 学生需运用所学知识, 团队协作攻克复杂问题, 如在“基于 AI 的城市交通拥堵预测”竞赛题目中, 学生需融合交通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模型构建等多环节知识, 提出创新解决方案。通过参与竞赛,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培养团队协作与问题攻坚能力, 同时优秀的竞赛成果也为学生未来就业、深造积累竞争优势, 部分学生凭借竞赛奖项获得企业实习与就业的优先机会。

## 2.3. 国际视野与产业衔接的拓展培训

积极引入国际先进教育资源, 与海外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学术交流合作机制。组织学生参与国际 AI 学术会议, 聆听全球顶尖学者分享最新的 AI 研究成果, 了解国际 AI 技术发展的前沿动态<sup>[9]</sup>。选派优秀学生参加海外短期实习、交流项目, 让学生深入国外 AI 企业的工作环境, 接触国际前沿的 AI 技术应用案例, 学习先进的技术应用理念与项目管理经验。通过这些国际交流活动, 拓宽学生的技术视野与行业认知, 提升其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

充分依托大湾区“科技创新高地”的区位优势, 联动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 开展产业调研与实习实训活动。组织学生走访大湾区内的 AI 企业, 通过企业参观、高管座谈等形式, 了解区域 AI 产业发展现状, 包括 AI 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布局与应用案例<sup>[10]</sup>; 同时, 深入探讨产业未来趋势, 如 AI 与元宇宙、区块链的融合应用方向, 以及企业对 AI 人才的技能需求与职业发展路径。安排学生到这些企业进行实习, 参与贴合大湾区产业需求的 AI 项目。通过产业调研与实习实训, 让学生熟悉大湾区, 为毕业后融入大湾区就业市场夯实基础。

# 3. 以校企合作为主的规划总结

## 3.1. 校企合作的未来展望

未来, 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 校企合作培训需持续深化。一方面, 拓展合作广度, 联动更多行业企业、国际资源, 构建更开放的 AI 人才培养生态; 另一方面, 挖掘合作深度, 在 AI 技术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深入协同, 为 AI 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助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

总之, 泰迪智能科技与高校的校企合作人工智能培训, 为 AI 人才培养提供了实践样本, 虽存在问题但优化空间广阔, 持续探索完善将为 AI 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 参考文献:

- [1]黄荣怀,王运武.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发展趋势与实践案例[J].开放教育研究, 2020,26(1):10-19.
- [2]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EB/OL].(2018-04-13)[2024-01-01].
- [3]李廉水,王春艳.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J].经济学家, 2021(3):32-40.
- [4]Anderson J R.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M].Worth Publishers,2020.
- [5]Acemoglu D,Restrepo P.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9(02):3-30.

[6]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23[R].北京：中国信通院，2024.

[7]Woolf B P,et al.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Foundations,applications and trends[J].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2020,30(1):1-21.

[8]OEC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The future of learning,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R].OECD Publishing,2021.

[9]Siemens G.Connectivism: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Distance Learning,2005,2(1):3-10.

[10]王赞, 张磊.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 2022(12):56-60.

(校对：袁骁 排版：袁骁)

# 植物染教学中的色彩理论与实践

彭林<sup>1</sup>, 沈欣雅<sup>2\*</sup>, 张倩<sup>3</sup>

(<sup>1</sup>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设计与工艺美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00; <sup>2\*</sup>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25; <sup>3</sup>武汉东湖学院 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12)

**摘要:** 本文以植物染教学为对象, 研究其在当代艺术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和创新路径, 从介绍色彩理论(色相、饱和度、明度等概念, 及其心理作用)、到具体阐述其在染料选择、染色效果表现中的实际应用, 从教学实践(说明染料制备、工艺流程操作、植物染料的应用、强调动手能力和审美培育)、对色彩搭配与突破的注重、对成功案例的说明、对创新技法的提出, 为教学提供新思路、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一方面肯定教学的成功, 一方面指出建议, 总结主要成果和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表明, 色彩理论可应用于植物染教学实践, 创新色彩搭配可提升教学效益。本文以论证为依托, 以建议为支撑, 为植物染教学的优化提供支持。

**关键词:** 植物染教学; 色彩理论; 创新搭配; 动手能力; 审美培养

##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olor in Plant Dyeing Education

Peng Lin<sup>1</sup>, Shen Xinya<sup>2\*</sup>, Zhang Qian<sup>3</sup>

(<sup>1</sup>College of Design and Arts and Crafts,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00, China; <sup>2\*</sup>He Xiangning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Zhongka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25, China; <sup>3</sup>College of Media and Art Design, Wuhan Dongh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51022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gards plant dyeing teaching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delves into its practical value as well as the innovative path within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By way of a summary of color theory, it makes clear the basic concepts like hue, saturation, brightness, etc., along with their psychological impacts, and also analyzes their applications in dye selection and dyeing effects. In terms of teaching practice, it elaborates in detail on the preparation of dyes, the process flow,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lant dyes,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ands-on capability and aesthetic cultivation. Afterwards, centering around color matching and innovation, it presents successful instances and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techniques so as to offer new ideas for teach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outcomes, it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proposals. The study sums up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looks ahea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It indicates that color theory can effectively direct the practice of plant dyeing teaching, and innovative color matching can markedly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gives empirical backing and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plant dyeing teaching.

**Keywords:** plant dyeing teaching, color theory, innovative matching, hands-on ability, aesthetic cultivation

## 引言

植物染传统工艺技艺在近些年的艺术教育中越发受到关注,不止是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也与学生的健康安全和艺术创造息息相关。植物染本身就是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一个分支<sup>[1]</sup>。学生在教学中能够较为详细地了解其工艺流程与文化价值等,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植物染取材于大自然,可生物降解,相较于化学染料而言更加环保,对于学生环保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sup>[2]</sup>。植物染料不含化学物质,使用放心、安全可靠、健康,现代应用价值越来越广。植物染色彩绚丽,艺术创作空间大,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sup>[3]</sup>。

对于当代艺术教育的学生来说,植物染教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符合现代社会讲求绿色、健康、创造的着色理念,但是在艺术设计、工艺美术等课程教学当中存在限制。这是因为传统的工艺技术需要较多的学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植物色受到季节地域的限制,提取制作难度大。但是植物染教学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在绿色环保、传统回归的大潮流下,植物染在更多的艺术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逐渐成为了培养人才、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目前阶段,植物染教学面临技艺传承难、材料成本高、市场需求不高等问题。技艺传承难,工艺繁杂,经验积累慢,现当代的学习者耐心不足、兴趣不足,植物染料的采集加工储藏环节复杂,成本高昂,受天然条件限制,不易大面积推广;植物染产品虽然健康环保,但是由于价格比较高,加上市场认知度不高,需求有限<sup>[4]</sup>。这些都是挑战也是机遇,国家政策对于传统文化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为植物染教学带来更多的资金与平台支持。社会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为植物染产品的接受度带来契机。现代科技的发展为植物染教学注入新动力,例如数字化色彩管理和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染色的效率及准确性。

该研究围绕植物染教学的价值,探讨其在现代艺术教育中的意义及色彩学说在植物染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从植物染的文化传承价值体现、生态保护价值体现、艺术创作价值体现等方面,针对其现存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尤其是色彩学对于植物染教学的现实价值,使学生理解和搭配植物染色彩特征,为植物染教学发展提供建设当代教育中的理论参考和实践素材<sup>[5]</sup>。

## 1. 色彩理论概述

色彩理论属于探讨色彩性质以及相互间关系的一门主体学科。在这门学科当中,色相、明度以及饱和度这三种色彩性质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植物染课程的教学环节里更是极为关键的因素。色相所指的就是颜色的具体名称,像红、蓝、黄等这些,将它们按照周次的顺序排列起来便形成了色环。依据不同的色相能够传递出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红色,它所传递出来的是一种热烈奔放且活力充沛的气息;而蓝色则传递出的是宁静沉稳并且带有理性特质的精神状态。在植物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精准地把控对目标色相做出适当的选择,挑选合适的植物染料。举例来讲,茜草能够从中提取出红色系列的色相,靛蓝则可以提取出蓝色系列的色相。这样的一种选色过程,一方面能让学生知晓颜色是从何处而来,另一方面也为后续的进一步设计打下了基础<sup>[6]</sup>。

明度说的是颜色呈现出的明暗状况,在从纯黑过渡到纯白这样一个渐变进程里,它会对视觉效果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通常来讲,明度较高的颜色会给人一种轻快的感觉,而且看起来还很有光泽;相反,明度较低的颜色给人的感觉则是深沉且厚实,透着一股稳重的气息。在实施植物染这项操作的时候,本文能够凭借改变浓度以及添加媒染剂的方式来对明度加以调节。举例来讲,运用铁媒染的方式,就会使部分植物染料的明度有所降低,进而让其呈现出更为柔和的样子,或者说是显得有些阴暗。不同明度所发生的变化,能够指引学生去探寻空间感以及层次感的具体表现方式,这对于创作较为复杂的图案或者纹理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饱和度是用来衡量颜色鲜艳程度的一个指标。当饱和度比较高的时候,色彩就会显得格外的鲜艳,十分惹人注目;而饱和度较低的情况下,色彩给人的感觉就是柔和且含蓄的。在开展与植物染相关的各项操作期间,饱和度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像植物染料具体的提取办法是什么样的、所选用的媒染剂属于哪一类、染色时的温度又是怎样的情况等等,这些因素统统都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sup>[7]</sup>。借助实验

活动，学生能够观察到在不同条件之下饱和度所发生的变化规律，并且学习怎样凭借这些变化去达成预期想要的效果。例如，适当把染色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就极有可能让颜色的饱和度有所提高；而要是往其中加入适量的灰分，那么它的鲜艳程度就会相应地降下来。这种对饱和度进行把控的能力，一方面提升了学生的动手实践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让作品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色彩心理学融入到植物染教学当中，使得教学内容变得更加丰富<sup>[8]</sup>。通过对色彩世界和情感世界二者之间关系的了解，学生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色彩对于艺术表达所产生的影响。就好比说，暖色系通常用来表现温暖、快乐的那种场景，而冷色系则多用于呈现安静或者忧郁的那种状态。教师可以采用案例解析法或者是互动练习法来引导学生把色彩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植物染作品相互结合起来，以此加深学生对于色彩搭配的理解，提升学生对于植物染的热爱之情以及创造欲望。色彩心理学能让学生意识到植物染绝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活动，而是一种能够用来表达情感和思绪的工具。

2. 植物染教学实践

表 1 染色流程表

序号	内容概要	详细信息
1	染料制备	实施例给出了一种植物染液的制备办法，具体是把经过破壁处理的黄色植物染料里加入水，然后让其浸泡上 1 至 2 个小时，在煮沸之后再持续加热 20 到 30 分钟，之后将渣滓过滤掉，如此便能制成头汁以及二汁，再把它们混合起来，便能够获取到植物染液。而这里的黄色植物染料包含了槐花、栀子、黄檗、姜黄还有黄枳等。
2	染色工艺流程	染色工艺存在多种不同的方法，像直接染色法、同媒染色法、后媒染色法以及套染法等都包含在其中。就拿直接染色法来讲，在操作的时候，会先将全棉平布进行浸泡处理，之后再把它直接放进植物染液里面去。然后在温度处于 60 至 65℃ 这样的区间范围之下，让它染色上大概 25 到 30 分钟左右的时间。等到染色完成之后，再经过水洗环节，最后将其置于阴凉处晾干即可。
3	不同植物染料的应用	在实施例 1 当中，运用栀子来制备染液，经过染色处理之后，全棉平布便呈现出栀子黄颜色的织物。而在实施例 2 里，用槐花取代了栀子，同时将面料从全棉平布换成了真丝面料，如此一来便获得了槐花黄颜色的织物。到了实施例 3，又改用姜黄来制备染液，同样的，染色完毕后的全棉平布呈现出的是姜黄色的织物。
4	提升动手能力和审美水平	通过雕膜套染和画缬工艺，让学生亲手实践植物染技艺，提升动手能力和审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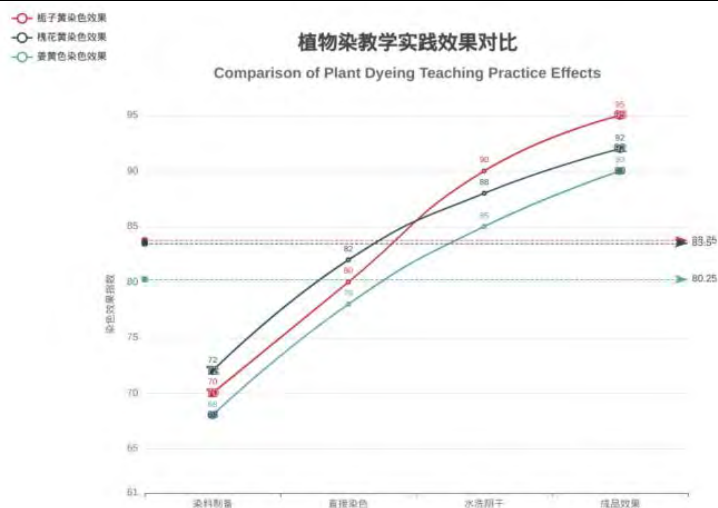


图1 植物教学实践效果对比（作者自绘）

植物染教学实践涵盖多个环节，包括染料制备、染色工艺流程及不同植物染料的应用。染料制备环节：将经破壁处理的黄色植物染料（如槐花、栀子、黄檗、姜黄、黄枳）与水混合，浸泡1-2小时，煮沸后维持20-30分钟，过滤残渣，收集头汁与二汁混合，即得植物染液<sup>[9]</sup>。一方面保障了植物染料的纯度，另一方面为下一步骤奠定了稳定的染料基础。

染色工艺流程的重要性。如直接染色法：全棉平布先进行预处理，将其放入植物染液中，在60~65℃范围内持续25~30分钟，之后水洗晾干。这一步骤需要学生控制好温度和时间，使染色过程均匀、牢度得当。媒染法（同媒、后媒）、套染法也让植物染教学有了拓展性<sup>[10]</sup>。如例1，使用栀子制作染液，全棉平布染色后，得到的就是栀子黄调的织物；例2以槐花代替栀子，将真丝面料作为染色对象，得到的织物就是槐花黄调的织物；例3使用姜黄制作染液，全棉平布染色后，得到的就是姜黄调的织物。这几个小案例很好地展示了不同种类植物染色料的施用范围以及不同的植物染料对最终颜色的影响。

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审美能力是植物染教学的重要环节。植物染教学中雕膜套染、画绩（更正：一般指“画绩”“绘绩”，如有具体工艺，请核对）等工艺让学生动手体验植物染，提升动手能力、审美能力。植物染教学注重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思想相结合，让学生在创造中把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理念等带入创作。通过植物认识采集、染料提取实验、染色创作等实践让学生在学植物染基本技法的基础上，提升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在作品展评中，学生分享创作心得，接受各方面评价，继续改进，发展自我。

### 3. 色彩搭配与创新

对于植物染的实践教学，色彩搭配要结合色彩理论及色彩搭配的实际应用，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力<sup>[11]</sup>。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提取蓝草、茜草中植物天然染料，然后进行色彩搭配。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学生把握植物染料的色相，并且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对植物染料配比进行调配，使植物染料通过浓度或染色的时间使颜色变化，达到明度、饱和度的变化。这样实践式的教学方法能够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把握色彩的搭配原则，也可以让学生形成对色彩变化的敏感度。

验创新色彩搭配实验对于植物染教学而言的创新之处在于创新教学理念、提升作品价值两个方面。以高科技的现代科技手段（电脑分析色彩软件）指导学生正确配色，学生通过这种方法赋予原有工艺品以新的时代元素，让学生既能创作出适合现代潮流、具有时代感的新产品，又不失传统精神的内涵。

案例中学生在植物染中学习到了传统与现代审美情趣结合的作品<sup>[12]</sup>, 学生作品的完成不仅体现了学生对于植物染的色彩搭配的驾驭力和学生对于肌理美融入纹样设计过程的创造力, 学生在操作过程中不断尝试植物染料搭配、不断尝试时间的长短对不同材质的最适染色方法的探索<sup>[11]</sup>。学生通过操作实践既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 也理解了色彩的实践应用理论意义。



图2 染色色彩浓度实验

## 4. 结论与讨论

结论与讨论将色彩理论应用到了植物染的课堂教学中, 为学生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 有利于学生理解植物染料与纤维之间的化学作用以及染料着色的规律, 在学生具备色相、饱和度、明度等基本知识后, 可以较好地预估染色效果, 通过调整染料的浓度、媒染剂的种类、染色的时间等要素获得目标色彩<sup>[7]</sup>, 这样的课程不仅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还有助于学生审美素养和创新思维的养成; 将色彩心理学应用到植物染教学中, 能够让学生更加注重作品染色后的情感效果以及社会影响, 拓展植物染教学的文化底蕴。

优化植物染教学需从多方面着手, 具体而言, 涉及到教学内容方面的设计事宜、实验条件方面的改善举措以及评价体系方面的完善事项等。就教学内容来讲, 不妨引入数量更多的地域性植物资源, 以此让学生能够知晓不同植物染料所具有的独特属性, 并且了解其在历史进程以及文化领域当中的意义所在。可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光谱分析仪、显微镜)<sup>[14,16]</sup>, 辅助学生深入探究染色过程中的微观变化。改善实验条件可通过建设专用植物染教学实验室, 配备必要设备与完善的安全防护措施, 确保学生在安全环境中操作。评价体系应侧重过程性与综合性, 也就是说, 在考察最终作品所呈现出的质量状况之外, 还应当对学生所具备的动手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以及对于传统工艺的理解程度和传承情况等给予关注。

未来植物染教学将向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工具有望广泛应用于植物染教学<sup>[12]</sup>, 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跨学科的融合也将会变成一种趋势, 举例来讲, 可以结合生物学来对植物染料的提取效率展开研究<sup>[3,5]</sup>, 又或者利用艺术设计原理去提高染色作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既可引入先进教学理念与技术, 也能促进不同文化背景植物染技艺的相互借鉴与学习, 由此推动这一传统工艺在全球这个范围之内实现复兴并获得发展。

### 参考文献:

[1] 王丹. "非遗文创"驱动下的高校植物染工作坊艺术实践课程构建——聚焦连南瑶族扎染[J].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学报, 2025, (1): 177-179.

WANG D. Construction of Art Practice Course for Plant Dyeing Workshop in Colleges Driven b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eative Design": Focusing on Liannan Yao Batik[J]. Journal of Guangdo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Trade, 2025, (1): 177-179.

[2] 李爱辉. 植物染料在小学美术绘画教学中的运用策略研究[J]. 基础教育研究, 2025, (6): 49-51.

LI A H.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Plant Dyes in Primary School Art Painting Teaching[J]. Basic Education Research, 2025, (6): 49-51.

[3] 何炎梅. 植物染在非遗美育研学中的创新应用与发展策略[J]. 轻工科技, 2025, 41(4): 79-81.

HE Y M.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Plant Dyeing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esthetic Education Research[J]. Light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5, 41(4): 79-81.

[4] 尹婷婷. "植"染中国色 此美有千秋——植物染色科技实践活动方案[J]. 中小学素质教育, 2024, (10): 34-36.

YIN T T. Plant Dyeing Technology Practice Activity Plan: Inheriting Chinese Color Culture[J].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Quality Education, 2024, (10): 34-36.

[5] 蔡琰. 生态文明背景下传统植物染色文化的研学价值及路径研究[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23, 8(5): 134-137.

CAI Y. Research on the Study Value and Path of Traditional Plant Dyeing Culture und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Study on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2023, 8(5): 134-137.

[6] 白永芳. 大理白族扎染技艺拓展应用研究——以周城村为例[D].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2.

BAI Y F. Research on the Expa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Dali Bai Tie-dye Techniques: Taking Zhoucheng Village as an Example[D]. Beijing: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2022.

[7] 王丹, 邢雅丹.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传统植物染工艺课程开发与设计研究[J]. 职业教育研究, 2021, (11): 80-84.

WANG D, XING Y D.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raditional Plant Dye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for Higher Vocational Art Design Majors[J].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2021, (11): 80-84.

[8] 闫雪梅.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植物染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开发[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32(7): 80-84.

YAN X 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Plant Dyeing Study Travel Curriculum in Guangxi Ethnic Minority Areas[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2021, 32(7): 80-84.

[9] 冯斌. 色彩理论在小学美术鉴赏课程设计中的应用探索[J]. 教育观察, 2025, 14(8): 191-193.

FENG B. Application of Color Theory in Primary School Art Appreciation Course Design[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Observation, 2025, 14(8): 191-193.

[10] 马斌. 纺织品在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的色彩搭配与功能创新探讨[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5, (6): 191-193.

MA B. Color Matching and Functional Innovation of Textiles in Modern Interior Soft Decoration Design[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25, (6): 191-193.

[11] 陈新远. 中学美术与非遗校本课的融合实践——以"广绣植物染"创新融合校本课程为例[J]. 教育进展, 2024, 14(3): 38-43.

CHEN X Y. Integration Practice of Middle School Ar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aking "Guangxiu Plant Dyeing" Integrated Curriculum as an Example[J]. Advances in Education, 2024, 14(3): 38-43.

[12] ELLENA C 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Language of Colour: Applying Modern Theories of Colour Perception to the Hebrew Bible[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the Old Testament, 2021, 35(2): 227-252.

[13] WESTON S T. Details and Pixels: Colour Quantification and Theorization in William Blake's Illuminated Books[J]. Word & Image, 2021, 37(4): 385-402.

[14] TAN H J, DANG R. Comparison of Raman Spectroscopy and Color Difference in the Light-Induced

Color Damage Evalu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With Silk[J].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2021, 41(8): 2474-2479.

[15] JIANG J R, SHANG Y P, HU X J, et al.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olor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Bizili Cemetery in Luopu County of Xinjiang, China[J].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2020, 40(7): 2296-2300.

[16] HUANG Y H, JIN Y Z.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olor Painting Pigments in Regong, Qinghai Province[J].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2022, 42(11): 3519-3525.

(校对: 谢民 排版: 袁骁)

# 元宇宙在岭南文化传播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潘雨沛<sup>1\*</sup>

(<sup>1\*</sup>广州理工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40)

**摘要:** 文章研究了元宇宙技术在岭南文旅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分析了其在文化传承、旅游体验和社区参与等方面的潜力, 并提出了具体应用策略。通过虚拟数字人、虚拟导览、数字藏品和数字重建等技术手段, 元宇宙为岭南文旅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元宇宙技术的应用能够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 改善文化遗产传播不平衡的问题, 构建完善的文旅营销策略, 推动文化产业的升级与转型, 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和传承。

**关键词:** 元宇宙; 岭南文旅; 文化遗产; 数字活化

##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Metaverse in Lingna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Pan Yupei<sup>1\*</sup>

(<sup>1\*</sup>Gu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4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application of metaverse technology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Lingnan cultural tourism, analyzing its potential in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tourism experiences,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while proposing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technological tools such as virtual digital humans, virtual guided tours, digital collectibles (NFTs), and digital reconstruction, the metaverse offers innovative perspectives and solutions for promoting Lingnan cultural tourism. By leveraging metaverse technology, it is possible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physical space, address imbalances in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 develop comprehensive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ies, promote the upgrad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Metaverse; Lingnan Cultural Tourism;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Revitalization

### 引言

在数字影像与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 文化遗产的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文化想要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显得越来越困难。岭南文化的多元属性使得岭南文旅的运营极具复杂性。在对岭南文旅产品进行推广时传统营销方法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元宇宙环境是一种高沉浸感的虚拟的数字化世界, 并且与现实世界平行存在<sup>[1]</sup>。作为一个虚拟的数字空间, 元宇宙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体验<sup>[2]</sup>。元宇宙技术与文旅产业结合后将能带来全新的跨越虚拟和现实的融合体验。

### 1. 元宇宙概述

#### 1.1. 元宇宙的核心特征

元宇宙是以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作为显示技术, 并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5G 技术等构建的虚实融合、持久运行的数字空间。它紧密衔接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让用户以数字身份在虚

拟空间自由探索,被视为下一代互联网的演进形态,在社交、教育、文旅、商业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从众多学者对元宇宙的基础研究,以及目前元宇宙的实践可以看到,元宇宙具有沉浸性、扩展性、持续性等特征。沉浸性指元宇宙的虚拟现实系统通过空间计算带的多模态感知与交互技术,使用户产生身临其境的现场感<sup>[3]</sup>。从而模糊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在认知层面进行空间临场重构。扩展性指元宇宙虚拟世界中允许用户自行生产内容,甚至人工智能进行内容生产。持续性指元宇宙环境独立于现实世界甚至独立于用户而存在,逐渐构成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载体。

### 1.2. 元宇宙的应用领域

元宇宙的特点很明显,就是虚实融合。能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交互体验。应用场景很多,比如文旅产业、教育培训、社交娱乐、医疗健康等等。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和区块链这些技术,元宇宙正在重新塑造人类社会的虚实关系。在商业领域中,元宇宙可以为企业员工提供虚拟替身远程协作的功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中,元宇宙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为学生提供极具沉浸感的虚拟教室<sup>[4]</sup>。在文旅领域,游客可以通过虚拟现实设备,远程游览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sup>[5]</sup>。例如,茅台集团开发的元宇宙空间为用户提供了可以进行酿酒活动的虚拟环境,体验非遗传统酿酒的魅力。

## 2. 岭南文旅文化传播的现状

岭南地区指中国南方五岭以南的地区,自古以来基本属于中华文明的最南端,与中原在文化、气候、风俗上有着较大差异。岭南文化主要包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以及客家文化<sup>[6]</sup>。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差异较大,有着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sup>[7]</sup>,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但目前岭南文化传播也存在一些问题。

### 2.1. 岭南文旅地域发展不平衡

岭南地区范围广泛,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大湾区的基础设施以及旅游区域配套相对完善,而粤西、粤北、潮汕等地存在很多景观区域交通不便,设施落后。虽然近几年很多景区以及旅游城市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在住宿条件、交通状况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缺陷。大大影响了游客的旅游热情。这使得岭南地区的文旅市场发展不平和,集中程度较高,大湾区以外的区域发展机会有限。

### 2.2. 岭南传统文化难传承

岭南存在着大量的传统文化与技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由于很多传统文化与技艺处于交通相对不便的粤西、潮汕等文旅区域,游客接触到的难度较大。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这些传统文化在年轻人面前逐渐失去了魅力,所以很难将其融入到文旅产品中尽显推广。随着现代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迅速崛起,一些传统岭南文化活动失去其原有地位,不再受重视,这直接导致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感逐渐丢失。例如润铜凿剪纸这一非遗文化已经濒临失传<sup>[8]</sup>。岭南传统文化需要走出更广阔的发展之路<sup>[9]</sup>。同时,也应该采用新的数字化手段,结合在现代元素与岭南传统元素,使其传承方式焕发生机。

### 2.3. 营销策略缺乏创新

目前很多岭南文旅企业所采用的营销策略非常传统,难以吸引游客兴趣。传统的宣传册、明信片、电视旅游节目,在年轻人中更是难以产生吸引力。年轻人在休闲旅游时更倾向选择欢乐谷、迪斯尼等乐园。岭南传统文旅在营销中缺乏多媒体融合传播,没有展现岭南文化的特有魅力,也没有针对年轻人的喜好开发文创衍生产品,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传播氛围。

## 3. 元宇宙在岭南文化传播中的应用策略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文化要“活化”<sup>[10]</sup>,即赋予文化以当代价值。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利用新型数字化技术对物质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逐渐成为热点,二十年来在岭南文化传播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比如博物馆艺术馆中的全息投影、交互式小游戏等。但目前发展也逐渐进入了瓶颈期,博物馆中的数字展品与小游戏逐渐呈现出同质化倾向,而且用户的参与度不够,大部分情况以被动观看影像为主。

元宇宙技术运用于岭南文化传播后,能大大提升用户体验,拓展更多的可能性。元宇宙具有较好的沉浸感以及交互性。用户通过操纵虚拟分身可以在元宇宙空间中感受到接近现实般的真实感。用户可以使用手势、文字、语音等多种模态方式与分身进行交互。而且元宇宙并不是一个单纯独立的虚拟空间,而是与真实世界紧密连接,不断向现实世界传达信息的。身处真实世界中的用户可以方便自由地接收元宇宙的各种信息。把元宇宙用于岭南文旅中可以为解决目前岭南文旅发展困境提供新思路。但岭南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空间跨度大、文化要素分散、历史层次丰富的特点,传统保护与活化手段面临资源整合难、公众体验碎片化的巨大挑战。元宇宙通过其技术特性与岭南文化的活化需求深度契合,可以为其开辟全新的应用范式。

### 3.1. 空间整合：从“点状孤岛”到“连续叙事”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对岭南文化现有遗产资源进行数字化重构,构建文化遗产的线性“数字平行空间”。从而高度整合岭南文旅现有资源,利用地理位置的定位服务与AR增强现实技术,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世界的无缝现阶,为用户带来更丰富的体验。本研究设计的岭南文旅元宇宙虚拟现实系统整合了岭南文旅多条路线,贯穿多个节点的,其界面如图1所示。借助元宇宙技术,打破现有数字活化形成的点状孤岛,整合整个岭南文旅的数字资源,通过“连续叙事”拓展线上旅游市场<sup>[11]</sup>。这使得游客不受物理位置及交通条件所限,大大拓展其享受到丰富的岭南文旅资源的边界与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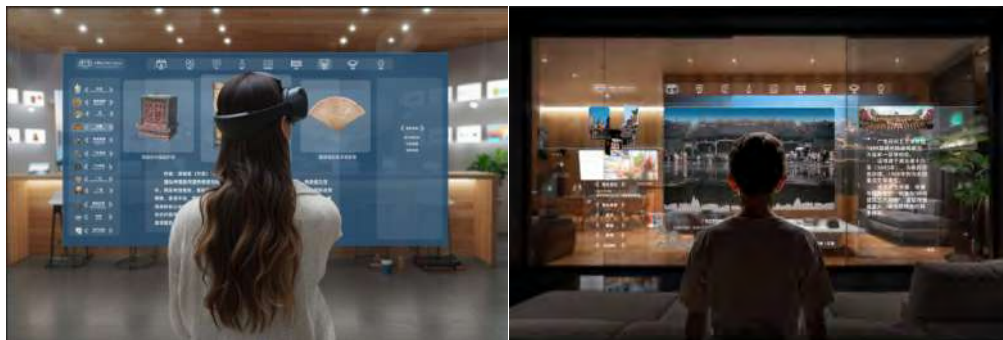


图1 本研究所绘岭南文旅元宇宙虚拟现实系统导览界面效果图

### 3.2. 文化分层：从“单一呈现”到“多维叠加”

目前的主流导览方式以面向游客的旅游景点导览为主,一般采用导游现场讲解或者游客佩戴导览器讲解两种方法。这类讲解以标准化内容为主,文化呈现比较单一,无法为用户带来多元的体验,不符合年轻人自由的游览习惯。在元宇宙系统中可以在现场佩戴增强现实眼镜,为现场叠加更多的信息,利用虚拟数字人充当导游角色进行讲解。虚拟数字人可以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出现在需要的地方,是一种非常灵活便捷的信息承载介质<sup>[12]</sup>。数字人的设计采用赛博朋克风格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符合年轻用户的审美需求,有能体现出岭南文旅蕴含的文化遗产<sup>[13]</sup>。用户可以通过唤醒词或者手势,随时召唤出数字人小惠,与之进行交谈。这使得导览不再是单向被动输出,而是可以与自由交互。系统还为数字人提供个性化定制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在系统限定风格范围内对数字人进行定制。

### 3.3. 经济激活：从“门票经济”到“数字生态”

元宇宙的数字藏品可以扩大文旅景区的商业版图,使景区的经济来源由门票经济扩展到数字生态经济。前瞻产业研究院发表的《2022年中国数字藏品市场分析报告》指出鲸探在2022年3月至9月期间,以约447万份的销量排名市场第一,而支付宝的鲸探与秦始皇兵马俑联合发行的数字藏品,仅发行当年(2022年)就卖出了4万份。通过发行岭南文旅线性文化遗产主题NFT数字藏品,构建“虚实共生”的消费场景可以完善古驿道数字生态经济版图,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文化资产的产权分割与价值流转<sup>[14]</sup>。图2为本研究为西江千户苗寨苗寨设计开发的NFT数字藏品,用户反响良好。除此之外,本设计结合NFT与增强现实技术,已经把数字藏品嵌入到kivicube平台,用户可用手机通过kivicube软件,对实体的纹样进行扫描,空中会浮现出纹样

的数字形象，形成线上线下联动。



图2 本研究所设计的西江千户苗寨 NFT 数字藏品

元宇宙是一个具有良好沉浸感及交互性的虚拟空间<sup>[15]</sup>，且与真实世界紧密连接，不断向现实世界传达信息。身处真实世界中的用户可以自由地接收元宇宙的各种信息。把元宇宙用于岭南文旅文化遗产岭南中可以为目前岭南文旅发展困境提供解决思路。

#### 4. 总结和展望

元宇宙技术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游客在线上就能享受丰富的岭南文旅资源，体验成本变低了，吸引力也增强了。元宇宙技术用在岭南文化的传播上，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带来了新可能。它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新思路。利用元宇宙技术，完善文旅营销策略。这样，在数字化过程中，推动文旅产业升级与转型，实现岭南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张睿宇,王佳.元宇宙视角下面向年轻群体的虚拟时装品牌设计策略[J].工业设计,2023,(05):105-107.
- [2] 朱利军.元宇宙:媒介的新未来[J].西部广播电视,2024,45(09):56-60.
- [3] 卫忻川.哲学视域下的元宇宙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3.
- [4] 金春华 高静.教育背景下的元宇宙:特征、赋能与挑战[J].教学研究, 2024(3).
- [5] 毛文磊,陈曦.虚拟现实技术在新媒体展示设计中的应用探析[J].科技经济市场, 2023(9):25-27.
- [6] 林伦伦."潮汕文化"的自新与粤东社会的发展——"潮汕文化"三题[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
- [7] 徐鼎,王忠君.基于 SBE 法的岭南四大名园景观美学评价[J].中国城市林业,2017,15(01):20-24.
- [8] 贾国朋.高密剪纸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 [9] 黄飞跃.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 2019(7):3.
- [1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05〕18 号[EB/OL].(2005-03-26)[2025-07-1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08-03/28/content\\_5937.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08-03/28/content_5937.htm).
- [11] 苏慧,刘墨.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设计——以香云纱数字博物馆为例[J].工业设计, 2024,(02):112-115.
- [12] 殷硕函.基于虚拟数字人的非遗动态性保护[J].艺术市场,2023,(04):92-95.
- [13] 王嫚.岭南文旅遗存的符号学阐释与创新应用研究[J].美术大观,2019,(12):110-111.
- [14] 杨东,梁伟亮.论元宇宙价值单元: NFT 的功能、风险与监管[J].学习与探索,2022,(10):68-79+191.
- [15] 潘雨沛.大模型背景下虚拟数字人在大湾区智慧文旅中的应用策略研究[C]//国际旅游与区域发展学会.2022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命运与发展论坛精选论文集.廣州理工學院藝術設計學院;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院;,2024:351-359.

(校对: 成玥 排版: 袁骁)

# 传统与现代的重奏：中国音乐剧《蝶变》在跨文化舞台上的美学嬗变

林檎<sup>1\*</sup>

(<sup>1\*</sup> 宁波诺丁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本文以中国原创音乐剧《蝶变》出海韩国的跨文化实践为案例，旨在提出并论证一种研究路径。本文聚焦于探讨中华传统戏剧美学精神在当代舞台艺术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的转化方式。研究在理论上融合了中华戏剧美学与跨文化传播理论，并采用案例分析法，构建了一个以“程式化表演—意境营造—本土化改编”为核心的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对《蝶变》不同国家版本的细致比对，展示了传统戏剧美学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嬗变。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一套可操作的案例分析方法，而非提供具体的实证结论，并借助《蝶变》的案例揭示了传统美学与现代舞台改造之间的关系，为未来中华戏剧的国际化传播提供参考路径。

**关键词：**戏剧美学；跨文化传播；音乐剧；文化身份；国际传播

## The Resonance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usical Theatre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on the Cross-Cultural Stage

Qin Lin<sup>1</sup>

(<sup>1</sup>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Ningbo, Zhejiang, 315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ing the cross-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musical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in South Korea as a case study, aims to propose and demonstrate a research approach. It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ical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stage art and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study theoretically integrates Chinese theatrical aesthetics with theori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mploys a case analysis approach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red on "stylised performanc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localised adaptation." Through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national versions of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raditional theatrical aesthetics evolve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is contribution lies in proposing a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methodology rather than providing specific empirical conclusions. By leveraging the case of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modern stage adaptation, providing a reference path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drama.

**Keywords:** theatrical aesthetic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usical theatre; cultur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引言

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交织的当代语境下，中华传统戏剧在传承与发展之间面临着双重挑战。

一方面,程式化表演、虚实相生的舞台空间与抽象的意境营造等独特美学精神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sup>[1]</sup>;另一方面,现代观众的审美习惯、舞台技术的革新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加速,使得传统戏剧必须探索与当代语境相适应的转化路径<sup>[2]</sup>。如何在保持戏剧美学的精神核心的同时,借助现代舞台艺术语言与跨文化传播策略,实现与海外观众的有效交流,已成为学界与业界的共同焦点<sup>[3]</sup>。

音乐剧《蝶变》以上海近代都市文化为背景,将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学元素与现代音乐剧的叙事节奏、音乐编制、舞美设计相融合,并于韩国成功演出《蝶变》的韩版<sup>[4]</sup>。这一跨文化实践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探索,更是中华戏剧美学精神现代转化与国际传播的真实案例。与单向的“文化输出”不同,《蝶变》在跨文化演出过程中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多重调整,既保留传统美学内核,又引入多种方法来提升作品的跨文化接受度<sup>[5]</sup>。

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蝶变》出海韩国,中华传统戏剧美学精神的跨文化嬗变过程,重点回答三个问题:(1)如何将传统戏剧美学精神转化为符合现代舞台与国际观众审美的表现形式?

(2)海外观众如何感知与接受这些传统美学元素?(3)在传统与现代的“重奏”中,文化身份与传播效果如何实现动态平衡?

## 1. 理论基础

### 1.1. 中华传统戏剧美学精神

中华戏剧美学以程式化表演、虚实相生、意境营造为核心特征<sup>[6]</sup>。在昆曲、越剧等传统剧种中,这些特征不仅体现在肢体动作与唱腔的程式化规范,也体现在舞台留白与象征性道具的运用,以及情景交融的艺术追求<sup>[7]</sup>。这种传统美学强调观众的想象参与与文化背景解读,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 1.2. 跨文化传播理论

赫尔(Hall)的高语境文化理论强调信息传递依赖文化背景与隐喻意义<sup>[8]</sup>,而Cohen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则更加关注交流中的文化适应与身份协商<sup>[1]</sup>。二者为分析戏剧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改编与接受提供了理论支撑<sup>[9]</sup>。

### 1.3. 文化适应与文化翻译

跨文化戏剧改编不仅是语言的转换翻译,更涉及到文化符号系统与审美习惯的重构<sup>[10-11]</sup>。在《蝶变》这一案例中,这种改编既是艺术策略,也是传播策略。

##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案例分析法作为核心研究路径,聚焦音乐剧《蝶变》在韩国演出过程中展现的跨文化美学嬗变。案例分析不仅局限于剧本文本的对照,还涵盖舞台表演、舞美设计以及观演语境中的美学互动,旨在构建一套切实可操作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揭示传统美学精神在跨文化转化中的具体机制。

### 2.1. 分析维度

(1) 程式化表演的转化:对比中国原版与韩国版中的肢体动作、唱腔与程式化程式,分析其在跨文化舞台上的保留与再造,探讨这些程式如何在舞台空间与演员表演中实现“在地化”的改写,以平衡传统文化符号与韩国观众的接受习惯。

(2) 意境营造与舞美策略:分析舞台留白、象征性道具、灯光与投影等手段在韩版中的运用,说明如何通过舞美视觉与音响环境的改造,在保持中华美学“虚实相生”精神的同时,契合韩国当代观众的审美期待。

(3) 叙事节奏与本土化改编:追踪剧本与歌词的改动,特别是对复杂中国历史典故的弱化,以及对普遍情感(如爱情、牺牲)的强化,分析叙事节奏的调整(如加快情节推进、精简场景切换),如何成为提升跨文化接受度的重要策略。分析剧本、音乐设计与舞美设计中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融合方式<sup>[11]</sup>。

## 2.2. 操作框架

为避免泛泛而谈,本文提出“美学嬗变的三维框架”,从表演、舞美与叙事三个层面入手,系统揭示《蝶变》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嬗变路径。

其一,在表演维度,重点考察的是程式化表演在跨文化舞台上的再创造。传统戏剧中的程式性动作与身段不仅是文化符号的承载<sup>[12]</sup>,更是观众进入审美语境的重要入口。当这些程式被置入新的文化环境中,需要通过“在地化”调适,使其既能保持文化独特性,又能被当地观众理解与接受<sup>[13]</sup>。其二,在舞美维度,关注意境营造与技术手段的结合。中华戏剧以“虚实相生”的舞台空间为核心美学追求,而现代音乐剧则强调舞美的视觉直观性<sup>[14]</sup>。因此,《蝶变》在韩版中引入新的灯光、投影等现代技术,以延续意境营造的传统美学精神,并通过技术转化实现跨文化适配<sup>[15]</sup>。其三,在叙事维度,探讨文化典故与普遍情感的转换。传统戏剧往往承载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但在跨文化语境中,这类内容可能造成理解障碍<sup>[16]</sup>。为增强接受度,《蝶变》在韩版中弱化部分历史典故,转而突出爱情、牺牲等跨文化可共鸣的情感主题,这与 Shin 关于跨文化改编中“普遍情感”的强化观点相呼应<sup>[10]</sup>。

在具体操作中,本文将以《蝶变》中的关键片段(如开场舞、核心唱段、高潮场景)为分析单元,分别对应上述三维度进行细读。通过结构化剖析,本文试图揭示传统美学精神如何在跨文化舞台上被转译与再创造。

## 3. 案例分析:美学嬗变的三个维度

### 3.1. 传统美学元素的保留

在跨文化改编中,《蝶变》在表演、舞美与音乐层面延续了传统戏剧美学的核心特征。表演程式方面,保留了原版中的华尔兹与舞女舞蹈等动作,这不仅再现了近代上海的都市风貌,也作为高语境文化符号<sup>[4]</sup>,使观众能够在隐喻层面进入中国叙事传统。舞台设计上,留白与象征性道具的使用,体现了“虚实相生”的东方美学精神<sup>[7]</sup>,在韩国演出中通过灯光与投影加以强化,营造出兼具传统意境与现代舞台效果的视觉体验。音乐方面,旋律保留了中国传统调式的特征,在听觉上延续了中华美学的审美格调<sup>[2]</sup>。这些传统元素的保留保证了中国作品的文化根基,使其在跨文化传播中仍具有鲜明的“中国性”。

### 3.2. 本土化改造

然而,完全依赖传统符号不足以确保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蝶变》在韩国演出版本中进行了明显的本土化改造。首先,叙事节奏被显著加快,以适应韩国观众偏好紧凑剧情与戏剧张力的观演习惯<sup>[6]</sup>。其次,音乐编配中融入韩语语音节奏特征,使歌词表达更为直观和情绪化<sup>[10]</sup>。此外,舞台由中小剧场的场景转向更为集中和灵活的小场景,配合动态灯光,增强视觉冲击力。这些改造不仅提高了演出的可接受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适配。本土化改造的策略既是对接受群体审美的回应,也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必要的协商与调整。

### 3.3. 跨文化改编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蝶变》对歌词与台词进行了重新译配,借助韩语的语境特点对部分传统文化符号加以解释与延伸。这一改写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更是文化意义的再创造<sup>[2]</sup>。其中,中国历史典故等高语境内容在韩语版本中被有意弱化,以减少理解障碍和文化隔阂。其中,原作中涉及的中国历史典故和高语境元素在韩语版本中被有意弱化,以降低理解门槛并避免文化隔阂。同时,韩版在叙事中强化了友情、牺牲等跨文化普遍性的情感主题,使观众无需深厚的文化背景也能建立情感共鸣。韩版《蝶变》能够在保留中国美学精神核心的同时,提升其在韩国观众中的接受度,展现了跨文化戏剧传播中“文化翻译”与“情感调适”相结合的有效路径。

## 4. 方法优势与局限

### 4.1. 方法优势

首先,本研究通过将传统戏剧美学要素拆解为可操作的分析维度,避免了笼统地讨论“传统

美学精神”的局限，使研究更具系统性与清晰度。其次，案例分析能够深入呈现《蝶变》在跨文化舞台上的具体现象，从表演、舞美到叙事，全面揭示“保留—改造—再创造”的美学嬗变路径。再次，三维框架的提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复用的分析工具，不仅适用于《蝶变》这一案例，也可推广到其他中国戏剧在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中的研究。

#### 4.2. 方法局限

尽管案例分析能够细致揭示美学转化的过程，但其结论仍可能受到研究者个人美学素养与解读角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此外，单一案例的研究深度虽高，但广度有限。研究结论的外推力需要在未来通过更多剧种与文化语境的对比研究加以检验。

### 5. 讨论与结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文提出的案例分析框架在处理跨文化戏剧研究中“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关系时展现出较强的解释潜力。首先，通过对表演、舞美与叙事的三维度细化分析，案例研究能够揭示传统美学元素在跨文化演出中的保留与转化机制，使研究不再停留于宏观叙述，而能够落到具体的操作层面<sup>[16]</sup>。其次，案例分析突出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翻译”过程，即如何通过弱化高语境符号、强化普遍情感主题，实现文化内涵的再创造。这一点说明，在全球化语境中，戏剧的跨文化改编并非单纯的文化输出，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持续协商与对话过程<sup>[17]</sup>。因此，研究工具与分析路径需要对文化差异保持敏感，并在方法设计中预留解释与适配的空间。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原创音乐剧《蝶变》出海韩国的跨文化实践为例，提出了一套以案例分析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用于探讨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精神的现代转化与跨文化传播。该框架通过“表演—舞美—叙事”的三维度结构化剖析，揭示了美学嬗变在跨文化舞台上的具体现象，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分析思路。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扩展到更多剧种与文化语境，并结合长周期观演追踪或跨文化接受对比研究，以提升方法的外推力与解释深度。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兼顾传统美学内核与现代传播需求的研究方法，将为中华戏剧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持续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 参考文献:

- [1] COHEN R.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J]. *Communication Theory*, 1997, 7(4): 355-380.
- [2] LI M.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Chinese musicals: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as a case study[J]. *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5, 32(4): 52-71.
- [3] GANZL K. *Musicals*[M]. London: Carlton Books Ltd, 2001.
- [4] HALL E T. *Beyond culture*[M].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76.
- [5]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Beverly Hills: Sage, 1980.
- [6] CHO K. Musicals in South Korea: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trends[J]. *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4, 31(2): 34-49.
- [7] HALL S. Encoding/decoding[C] // HALL S, HOBSON D, LOWE A, et al.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980: 128-138.
- [8]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 Thousand Oaks: Sage, 2001.
- [9] LEE H. Postcolonial parallels: Cultural themes in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and South Korean historical drama[J]. *Journal of East Asian Performance*, 2021, 15(2): 45-61.
- [10] SHIN S. From Shanghai to Seoul: The reception of The Butterfly on the Bund in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2019, 8(3): 123-135.
- [11] WU K. Cultural confluence: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ynergies in Chinese juvenile musical theat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2023, 11(2): 192-199.
- [12] XIAO Y. A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and crossover operation of musicals[D]. Beijing: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2016.

[13] ZHANG Y, DAI B.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introduction and originality of the Chinese musical market[N]. Jiangsu Economic Daily, 2024-09-27(T03).

[14] ZHOU X. Taking the stage[N]. Beijing Review, 2011, 42: 1-3.

[15] LI J. The rise of Chinese musical theater: Cultural diplomacy and economic influence[J].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2016, 9(2): 55-74.

[16] LEE S. Exploring the musical adaptation process: Aesthetic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Arts and Media, 2021, 12(3): 45-56.

[17] GUDYKUNST W B. Bridging differences: Effective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M]. 4th ed. Thousand Oaks: Sage, 2004.

(校对: 成玥 排版: 袁骁)

# 灵活用工背景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优化路径研究

杨妙玲<sup>1\*</sup>

(<sup>1\*</sup> 蒙中联合国际大学, 蒙古国 乌兰巴托 16050)

**摘要:** 灵活用工是当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重要人力补充, 能够降低中小企业人力资源资金成本, 弹性解决中小企业初创期人力资源配置不足的情况。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持续优化, 灵活用工存在雇佣方式不规范, 待遇不明确, 中小企业从业者与中小企业长期共同发展意愿不稳定, 管理模式单一等状况新挑战。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对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中小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等方法进行探索; 旨在进一步优化员工管理模式; 整合人力资源配置; 通过建构灵活用工的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有效整合灵活用工资源整合, 进而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灵活用工 ; 中小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

##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lexible Employment

Yang Miaoling<sup>1\*</sup>

(<sup>1\*</sup>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and China, Ulaanbaatar, 16050, Mongolia)

**Abstract:** Flexible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human resource supplement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hich can reduce the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capital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flexibly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start-up stag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ethod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lexible employment faces new challenges such as non-standard employment methods, unclear benefits, unstable willing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practitioners to develop together wit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or a long time, and a single management model.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issu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methods for optimizing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tende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employee management model; Integrate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By constructing flexible employment for employees to share the fruit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flexible employment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Keywords:** flexible employmen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引言

近年来, 全球经济处于低位复苏状态,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面临着市场需求的波动、技术的快速更新、竞争规则重塑等多重挑战。伴随着我国出生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 人口老年化问题日益

严重，人口红利也进入了转变期，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也大幅度提升，企业都在寻求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各种方法，其中灵活用工就是一种有效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的方式方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已经成为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sup>[1]</sup>灵活用工相对于全日制用工所需支付的费用相对较低，尤其对中小企业是一种非常具有优势的有工形式。众所周知，解决就业问题就是解决民生问题，就业是发展经济最基本的支撑。

中小企业在市场当中的竞争不如大型企业有经济实力，降低中小企业运营成本是每个中小企业必须要学会的生存法则。灵活用工通过弹性化、成本低，找到合适匹配的人力资源迅时使得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同时，灵活用工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包括聘请的员工权益不足、工作时长、薪资分配碎片化、人力资源管理复杂化等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灵活用工的中小企业人力资源需要进一步优化，以保障双方权益。

## 1. 灵活用工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灵活工具有弹性、灵活性、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sup>[2]</sup>强调企业通过多样化用工方式来适应市场变化，灵活用工的核心内容在于灵活，是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采用灵活的方式解决用工问题，近几年来，共享经济已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灵活就业也适应了共享经济的特点，很好的满足了新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的用人需求，使灵活就业逐渐成为常态。从中小企业的角度上分析，灵活用工可以有效的降低用工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还可以优化人才的结构，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弹性。同时，对市场灵敏度的提升，有助于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例如，借助用工平台及时补充因突发情况而需要的人力。从员工的角度上分析，灵活用工可以使得个人拥有多重职业身份，得以促进职业能力的提升，积累更多的跨领域经验，并增加经济收入来源。尤其是对一些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在校学生，都能够更灵活的选择就业方向。即使是对于在职人员，也可通过灵活用工实现“主业+副业”组合，提升抗风险能力，实现工作与生活双平衡。从社会的角度上分析，灵活用工模式对于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将闲置人才资源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以此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升整体的经济效益。总归灵活用工的现实意义在于实现企业与员工的相互平衡，既为企业提供更轻便的用人模式，也使得个人更具有多元价值。

## 2. 灵活用工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路径

灵活用工的意义在于通过人力资源的动态配置，实现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劳动者灵活就业和优化社会经济结构的三重价值。灵活用工不仅能够帮助中小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需求解决用工难题，还能为个人提供更多灵活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和职业发展的多样化。灵活用工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主要有以下的具体路径劳务派遣：适用于季节性、短暂性岗位，聘请临时用工人员参与节假日促销岗位等；业务外包：大型企业将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中小企业服务商，具体包括数据处理等。当下网约车、外卖平台也是采用灵活用工形式降低用工成本，依托数字互联网进行任务匹配，平台赚佣金，物流配送、货物搬运、汽车维修中小公司会和大平台建立合作，取得更多社会业务资源。活用工的变现形式，当然还有很多表现形式，还包括非全日制用工、远程办公等多种多样，中小企业通过多个路径降本增效，提高企业生产生存能力，从事灵活就业的员工也因此能够体现更大价值。

## 3. 灵活用工背景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灵活用工虽然具有灵活与多样的特性，也为中小企业和员工解决了很多用工与就业的问题，在优势的同时，也会面临人才选拔与职位匹配错位、绩效薪资评估体系不健全、员工管理缺失、岗位培训不够全面、企业文化融合困难等多方面问题。

### 3.1. 人才选拔与职位匹配错位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的本质就是选择优秀的人才为中小企业所用，而灵活用工是中小企业应对短期与季节性市场需求变化的措施，能够有效的解决企业短期用人问题。但在用人的过程中，大多数企业会因为灵活用工人员的流动性大与工作时间灵活，不愿意投入过多的资源

进行人才选拔，因此，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未建立起科学、系统的人才筛选机制与评估体系，在体系不完整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岗位不适、大材小用等情况，导致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精准的找到最符合岗位要求的人才，招聘到的灵活用工人员容易出现人职不匹配的情况。

### 3.2. 绩效薪资评估体系不健全

绩效评估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促进企业主与员工之间互利共赢，实现战略目标的协同。为降低企业人力成本，中小企业一般并未建立一套专门针对灵活用工的绩效评估体系，导致灵活用工缺乏明确的绩效指标和科学的评价标准，更甚是沿用全职员工的评估体系。灵活员工在中小企业属于“补充者”的角色，若和全职员工一样的待遇，往往不能留住他们。灵活用工人员的工作周期短，没有全职员工的稳定与紧密，无法沿用全职员工的评估体系去反馈灵活用工人员的绩效。灵活用工人员在薪资绩效评估的过程中也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劳务争端。

### 3.3. 员工管理缺失

灵活用工人员一般都是以项目化或者典型工作任务制完成相应工作量，此外员工未能够参与中小企业其他事务，因此常常面临管理缺失问题。中小企业未能够在公司制度制定方面进行设计，对员工考核职责模糊、岗位要求相对主观。员工容易找不清工作边界，对公司制度也未能够了解和学习。因此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缺失容易使得员工感受到不公平感，优秀人才得不到体现而流失。

### 3.4. 岗位培训不够全面

对于灵活就业员工，中小企业一般不安排培训或者培训过于简单化。不是以员工能力发展为中心，关注长期培养。而这种需要员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掌握行业特定的专业技能知识与不完善的人才培训体系形成了矛盾，这一情况出现不仅可能影响到企业项目的完成效率与质量，还使得员工的有效价值难以得到体现，从而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 3.5. 企业文化融合困难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中小企业一般未针对灵活用工人员建立相应包容性文化，员工容易被边缘化，在企业里的自身价值感、获得感缺失，容易降低员工工资积极性，进而导致优秀灵活就业员工项目完工后人才流失，影响企业发展壮大。

## 4. 灵活用工背景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策略

在灵活用工逐渐成为重要人力资源补充的背景下，未来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在正经历着变革。那么针对灵活用工背景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多个问题，有以下的几点的创新策略：

### 4.1. 构建人力资源动态配置体系

针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出现的职不匹配情况，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式进行岗位要求匹配，AI技术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sup>[3]</sup>建立智能化灵活用工平台，人力资源服务业与中小企业打破数据孤岛，中小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sup>[4]</sup>实现数据共享，利用SaaS产品具备社会化集成、AI等功能<sup>[5]</sup>通过平台的建立来聚集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 4.2. 健全绩效薪资评估体系

根据灵活用工人员的实际工作表现及其员工特点，设计更具弹性的薪酬方案，如按小时计费、按项目计费，增加员工绩效奖金等。以项目、任务完成度、完整度、项目质量为核心评价标准，不断激发灵活就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企业还可以通过薪酬满意度调查，收集灵活就业员工的反馈意见，为员工管理、薪酬管理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除了绩效奖金外，企业还可以设立荣誉称号、优秀员工等精神奖励，增强灵活用工人员的获得感和荣誉感。<sup>[6]</sup>

#### 4.3. 理顺灵活就业员工管理，提升员工管理效率<sup>[1]</sup>

加强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顶层设计，通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和完善用工制度，让员工管理有章可循。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根据制度管人，避免员工管理等过于片面化、主观化。明确岗位边界和职责，权责清晰避免后续产生法律纠纷。加强各部门具体用人单位的动态化考核和评价，通过数据化构建员工劳动信息，调整考核权重，尽可能实现人岗相适。通过定期沟通会议了解多方诉求，了解灵活用工人员在岗位任职情况和诉求，帮助其长期成长，提升管理效能。人才选拔环节需强化科学化与创新性，摒弃单纯依赖学历或经验的粗放式筛选<sup>[7]</sup>

#### 4.4. 加强针对灵活用工人员的岗位培训

中小企业可以针对灵活用工人员制定灵活多样的员工岗前培训计划，构建针对项目和任务需求的课程体系，将岗位需要的核心技能要求进行分层讲解。提前将培训课程通过线上形式发放给灵活就业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培训时间。通过直播和线上授课等新形势让员工提前了解工作内容。工作期间以老带新，师带徒等多种形式持续加强岗位培训，最终通过培训考核，确保培训效果，制定培训奖励机制，奖训结合，提高灵活用工人员积极性，最大限度扩大中小企业资本价值。

#### 4.5. 建构包容性中小企业文化

许多灵活用工人员有自己的主业，甚至自己担任一些企业的主管，亦或者是小有成就的企业家，对于其他企业文化的认可，是他们愿意加入中小企业重要因素。因此中小企业要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氛围是能够吸纳别人参与建设的关键因素。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宣传灵活用工人员劳动成果和价值，邀请灵活用工人员参与公司团建，发放节假日福利，通过多措并举建立包容性企业文化，有效提升中小企业凝聚力和人才竞争力。

### 5. 结语

当下，灵活用工背景下，优化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整体规划尤为重要。<sup>[8]</sup>因此，中小企业即可采用员工的灵活用工模式，来节约用人成本。通过这种灵活用工模式，使得员工个人可以在不同企业流动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提升业务能力。构建人力资源动态配置体系，优化前员工的薪酬评估体系评估企业薪酬水平与市场行情的匹配程度，确保企业的薪酬水平具有竞争力。<sup>[9]</sup>理顺灵活就业员工管理，运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要重视内部培训与外部引进，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的高素质人才队伍。<sup>[10]</sup>不断探索和创新管理模式，搭建智能化、数据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打造高效的、响应时代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加强灵活用工人员岗前培训，建构包容性的企业文化以更好的适应灵活用工模式带来的新挑战，进一步实现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 [1] 秦娥.新常态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对策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498(13):75-77.
- [2] 董弥霞.灵活用工背景下人力资源服务创新策略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5,2396(08):107-110.
- [3] 李水球.AI时代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479(18):91-93.
- [4] 陈俊宇.共享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整合策略[J].现代企业文化,2025,695(08):152-154.
- [5] 李建军,王飞,李佳乐.数字赋能人力资源服务业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商展经济,2025,121(03):85-88.
- [6] 赵娟.中小企业灵活用工模式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J].国际公关,2025,205(01):97-99.
- [7] 林舒颜.新时代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优化路径研究[J].销售与市场,2024,804(24):120-122.
- [8] 许洁榕.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如何优化人力资源管理[J].乡镇企业导报,2024,(24):233-235.
- [9] 王艳霞.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策略分析[J].现代营销,2025,880(16):164-166.
- [10] 李娅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路径研究[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5,(12):173-175.

(校对：袁骁 排版：袁骁)

#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何滨江<sup>1\*</sup>

(<sup>1\*</sup>江西理工大学 商学院, 江西省 南昌市 330000)

**摘要:** 本文选取 2009-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 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出发, 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 但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产生了异质性效果。

**关键词:**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生命周期

## Can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olicies promo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life cycle perspective

He Binjiang<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Busines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arkets from 2009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sample, us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arbon trading polic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om a corporate life cycle perspective, the paper use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se policies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mpan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arbon trading polic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firms, but produc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firm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life cycles.

**Keyword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nterprise life cycle

## 引言

在全球变暖日趋严重的压力下, 控制碳排放成为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为了实现“双碳”目标, 国家发改委于 2011 年 10 月印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随后又于 2021 年启动了全国碳交易市场, 因此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的微观效应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想要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已有大量研究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提升投资效率<sup>[1]</sup>、促进技术创新水平<sup>[2]</sup>、优化碳配额机制<sup>[3]</sup>、提高营运管理水平<sup>[4]</sup>从而促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也有学者发现, 公告阶段时该政策展现出促进作用, 而交易阶段时该政策体现为抑制效应, 这主要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并未有效发挥出技术创新效应而导致<sup>[5]</sup>。综上, 由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复杂性, 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争议且作用机理尚未明确。从生命周期视角来看, 企业处于不同阶段会在企业规模、经营策略等方面产生异质性<sup>[6]</sup>, 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结构有所区别<sup>[7]</sup>, 最终影响到试点政策的政策效果。因此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不同生命

周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值得深入探讨。

为此,本文选取 2009-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从不同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精准化实施提供理论和实证检验依据。(2)厘清二者的内部“黑箱”机制,探究其对不同生命周期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的差异性。(3)由于政策的实施存在多个时点,从而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产生,因此为了减少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验证。

##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1.1 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过程中,试点地区的企业会被分配一定量的碳配额,企业碳排放量若超出配额则需要从碳市场额外购买配额予以抵消,而企业碳排放量若低于配额则可以将剩余配额拿到碳市场出售。因此,企业为了将碳排放量控制在规定的额度内,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高碳排放企业将会受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带来的成本压力,这会迫使高碳排放企业会重新规划投资方案、开展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流程,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有效控制碳排放量,最终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低碳排放企业将会受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带来的收益激励,企业从碳市场获得的额外收益能够降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最终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综合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

从企业生命周期看,不同成长时期的企业在生产模式、资源禀赋、投资策略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这些特征都会导致政策效应产生差距。首先,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通常属于中小型企业,尚在发展阶段,规模较小且难以获得稳定的内部资金支出。在试点政策潜在收益和成本压力的双重效应下,这类企业从创建发展阶段就会将有限的资金投放在高效率的生产项目上,从而奠定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已经成长到一定规模,更容易获得内部资金支持。随着试点政策的出台,碳排放权成为了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专用性资源,因此企业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并将资源重新配置于高效部门,最终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面临市场萎缩、技术落后等问题,更容易受到试点政策带来的成本压力,企业为了生存就需要调整经营计划,然而这一阶段的企业通常会惯性依赖前期积累的知识,这会导致企业难以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因此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会被削弱。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H1: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且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对衰退期企业的促进作用较弱。

### 1.2.1.2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分析

企业要想高质量发展,必然将资金配置于能为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化项目。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的投资结构优化。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出台强制要求企业公开披露碳减排技术、碳排放量、碳配额成交量等信息,这会揭示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状况,使得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得以改善,而投资者能够依靠这些碳信息更好地评估投资风险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此时,若企业一味的选择短期获益项目就会向投资者传递出一种消极信号,导致企业陷入融资困境。因此,为了吸引更多投资,企业会主动将资金投入在更高端的项目,从而向外界展现社会责任担当,表明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企业管理层往往会为了尽快实现绩效目标而将资金投入在能够短期获益的项目中,忽视了具有潜力的长期投资,这会对企业价值造成损害并加剧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而在政策背景下,企业被迫接受更加严格的碳监管,并被强制披露碳信息,这便利了政府部门、投资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改善委托代理问题,迫使管理层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和数字化投资,最终促使企业优化投资结构。

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调整资金的合理使用,优化投资结构,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和数字化投资,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投资结构优化能够促使企业将

资金投放在优质项目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带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其次,投资结构优化能够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投资,有助于企业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和工艺,同时还促进企业生产出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最终提高能源利用率,使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进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后,投资结构优化能够促使企业开展数字化投资。由于数字技术可以实时监控和分析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因此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收集和处理碳排放数据,为碳减排提供更加科学的建议,从而降低合规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投资结构优化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 投资结构优化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 2. 研究设计

###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以 2009—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标有 ST、\*ST、金融保险行业、数据缺失较大的企业样本;同时,为避免异常值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上下 1%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4436 家上市公司的 30755 个观测数据。本研究中使用数据均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

### 2.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1.1.1.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tfp)。目前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国内学者大多采用 OLS 法、LP 法和 OP 法等。其中 LP 法可以有效减少样本损失,使计算结果更加精确,因而本文借鉴已有文献<sup>[8]</sup>,采用 LP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 1.1.2. 核心解释变量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 (DID)。Treat<sub>i</sub> 是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虚拟变量,若某企业位于试点地区,则 Treat<sub>i</sub> 取值为 1,反之为 0。Post<sub>it</sub> 是区分政策实施时间前后的虚拟变量,企业所在试点省市正式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开启时间及以后年份的 Post<sub>it</sub> 取值为 1,否则为 0。最后构造交互项 DID (Treat<sub>i</sub> × Post<sub>it</sub>) 来衡量政策的实施效果。

#### 1.1.3. 分组变量

企业生命周期 (LifeCycle)。本文使用现金流组合法<sup>[9]</sup>,将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动荡期和衰退期五个阶段。

#### 1.1.4. 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其他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参考相关文献<sup>[10]</sup>,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总资产净利率 (ROA)、存货占比 (INV)、股权集中度 (Top1)、企业年龄 (FirmAge)、两职合一 (Dual)、股权制衡度 (Balance1)、审计意见 (Opinion)、银行持股 (ISHoldBankShares)。

### 2.3. 模型设定

为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tfp_{it} = \beta_0 + \beta_1 DID_{it} + \lambda Controls_{it} + \mu_{it} + \delta_{it} + \omeg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tfp_{it}$  为企业  $i$  在  $t$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解释变量  $DID_{it}$  表示企业  $i$  位于试点地区且时间  $t$  大于等于该地区碳市场开启时间则赋值为 1;  $\beta_1$  表示试点政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净效应;  $Controls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mu_{it}$  为年份固定效应;  $\delta_{it}$  为行业固定效应;  $\omega_{it}$  为省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 3. 实证结果分析

### 3.1. 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列 (1) 为只考虑省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列 (2) 为只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列 (3) 为既加入控制变量, 又加入省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由表可知,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假设 1 预期相符。列 (4)、(5)、(6) 分别是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回归结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衰退期企业的影响程度要低于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影响程度, 与假设 1 预期相符。

表 1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全样本			成长	成熟	衰退
	tfp1	tfp1	tfp1	tfp1	tfp1	tfp1
DID	0.0590** (2.68)	0.0203*** (3.26)	0.0647*** (3.55)	0.0694*** (3.67)	0.0607*** (3.00)	0.0552** (2.13)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9373*** (189.74)	2.1151*** (57.16)	2.1822*** (17.71)	2.1443*** (19.50)	2.2206*** (17.94)	2.2669*** (10.07)
年份/行业/省份效应	YES	NO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0,755	30,755	30,755	14,331	12,459	3,934
Adj.R <sup>2</sup>	0.232	0.108	0.326	0.328	0.342	0.298

3.2. 稳健性检验

在 LP 法下测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异性误差, 因此本文使用 GMM 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见表 2。可以看出, 列 (1) - (4) 的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结果表明, 即便使用 GMM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4)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tfp2	tfp2	tfp2	tfp2
DID	0.0600*** (3.13)	0.0642*** (3.16)	0.0568** (2.73)	0.0521** (2.05)
Control/fix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5640*** (13.19)	1.5195*** (14.14)	1.6119*** (13.81)	1.6410*** (7.51)
观测值	30,755	14,331	12,459	3,934
Adj.R <sup>2</sup>	0.323	0.325	0.338	0.297

3.3. 机制检验

表 3 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技术创新投资与数字化投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在前文充分论述投资结构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再在模型 (1) 的基础上, 将全要素生产率替换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 若系数显著, 则认为中介变量发挥了效应。从列 (1) - (4) 可看出, 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假设 2 得以验证。但值得注意的是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成长期企业的数字化投资, 成熟期企业次之, 而对衰退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明显低于前两个时期。可能的原因在于: 成长期企业通常比较重视新技术, 由于尚在发展阶段, 接受新事物能力强, 投资于数字化项目能够为企业带来很多附加价值, 因此数字化投资积极性较强; 成熟期企业有足量的资金进行数字化投资, 但鉴于前期技术研发的积累, 容易固步自封, 很难一下子转型, 因此数字化投资较少; 而衰退期企业为了继续在市场上生产, 需

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数字化投资更多是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效率，这个时期的企业没有太多闲置资金投资于数字化项目，因此数字化投资最少。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tfp1	Input r	dig	tfp1	Input r	dig	tfp1	Input r	dig	tfp1	Input r	dig
DID	0.064	0.004	0.2910	0.069	0.004	0.3121	0.060	0.004	0.2812	0.055	0.004	0.2495
	7***	4***	**	4***	4***	***	7***	5***	**	2**	3***	*
	(3.55)	(6.56)	(2.69)	(3.67)	(7.31)	(2.97)	(3.00)	(5.12)	(2.55)	(2.13)	(3.75)	(1.77)
Contro l/fix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s	2.182	0.035	14.054	2.144	0.033	14.186	2.220	0.036	13.781	2.266	0.046	14.715
	2***	0***	2***	3***	7***	6***	6***	3***	6***	9***	6***	8***
	(17.71	(10.05	(38.42)	(19.50	(9.84)	(41.40)	(17.94	(7.12)	(29.48)	(10.07	(7.28)	(22.09)
观测值	30,75	30,75	30,755	14,33	14,33	14,331	12,45	12,45	12,459	3,934	3,934	3,934
	5	5		1	1		9	9				
Adj.R2	0.326	0.379	0.139	0.328	0.356	0.143	0.342	0.405	0.162	0.298	0.408	0.115

4. 结论

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将 2009-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碳试点政策的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但相较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该政策对衰退期企业的促进作用较弱。

参考文献：

[1] 张平淡,张惠琳.环境规制改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江淮论坛,2021,(04):44-51.

[2] Tian J , Liu Y , Li A .The Policy Impact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on Building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J].buildings, 2023, 13(6).DOI:10.3390/buildings13061493.

[3] 胡珺,方祺,龙文滨.碳排放规制、企业减排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J].经济研究,2023,58(04):77-94.

[4] Xiao J , Li G , Zhu B ,et al.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on Chinese firm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306(4):127104.

[5] 梅应丹,邓雅芮,马婷.碳交易与企业生产力:来自中国石化企业的证据[J].中国环境科学,2023,43(05):2583-2589.

[6] Jianbo H, Wenxin C, Yu S, Faustino D, et al. How Does Digital Trade Affect a Firm’ 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 Life Cycle Perspective[J], Sustainability, 2025, 17(14)

[7] 岳宇君,马艺璇.企业竞争战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探讨——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10):115-128.DOI:10.19681/j.cnki.jcufe.2024.10.002.

[8] 张倩,王文静,王蕊.碳排放权交易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兼论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J].科技管理研究,2025,45(10):207-214.

[9] Victoria Dickinson. Cash Flow Patterns As a Proxy for Firm Life Cycl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10] 张倩,王文静,王蕊.碳排放权交易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兼论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J].科技管理研究,2025,45(10):207-214.

(校对：周钰淮 排版：袁骁)

# 苏轼诗文可证道——江谦《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的编注理念及其价值

潘婷<sup>1\*</sup>

(<sup>1\*</sup>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一九四七年,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东坡禅学诗文要解》是一部十分独特的诗文选本。该书对苏轼涉佛诗文进行选注, 或揭示原文之佛理、或批评原文之不合, 展现出引导读者借由苏轼诗文“见佛”“启信”的编注理念。而将苏轼诗文视为入道门径, 与苏轼的个人身份、苏轼诗文的特征和儒佛同宏的理念密切相关。总体来看, 这部诗文选本可以说是对近现代时期“儒佛并重”的“人间佛教”思潮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 苏轼; 东坡禅学诗文要解; 江谦; 儒佛同宏; 人间佛教

## The poetry and prose of Su Shi can prove the truth: The selection concept and value of Jiang Qian's "An Ess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Sushi's Zen Poetry and Prose"

Pan Ting<sup>1\*</sup>

(<sup>1\*</sup>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Essential Explanations of Sushi's Zen Poetry and Prose published by Shanghai Buddhist Publishing House was a very unique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prose. This book selects and annotates Su Shi's Buddhist poems and essays, either revealing the Buddhist doctrines of the original texts or criticizing their imperfections, demonstrating the concept of compiling and annotating to guide readers to "see the Buddha" and "inspire faith" through Su Shi's poems and essays. Regarding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as the gateway to enlighten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u Shi's personal ident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try and prose, and the concept of the coexist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Overall, this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prose can be regarded as a response to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trend of "equal emphasis o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Keywords:** Su Shi; An Essential Interpretation of Sushi's Zen Poetry and Prose; Jiang Qian; Equal emphasis o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umanistic Buddhism.

### 引言

作为有宋一代杰出的诗文书画大家, 苏轼及其文艺作品一直备受瞩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苏轼深谙儒、释、道三家学说, 尤其是佛学的影响时常浮现于笔端。历代文人对此多有评述, 且不乏将其涉佛诗文汇编成集者。一九四七年,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江谦(1876-1942)署名的《东坡禅学诗文要解》便是个中代表。与一般诗文选本不同, 该书编选与注解的目的并非指导诗文创作, 而是为了引导读者通过苏轼诗文领略佛学精髓, 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以诗文证道”的特色。此外, 书中大量评语还透露出“儒佛同宏”的深层次考量, 可以说是对近现代时期“人间佛教”思想的回应, 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

- 87 -

作者简介: 潘婷(1994-), 女, 湖南岳阳, 博士, 研究方向: 美术史论

通信作者: 潘婷, 通信邮箱: Panting1521186578@163.com

www.shiharr.com

## 1. 编选旨趣：收拾儒禅归净土

目前所见《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由上海佛学书局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版。关于该书的责任者，版权页明确写作“著者江谦，编辑校订者齐用修、游有维”，似乎并无讨论的必要。但根据《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的序跋、题词、注解来看，该书的编纂过程实际上颇为复杂，且前后历经十余年方才正式出版。

具体来看，该书的选文部分由齐用修遵照其师江谦的嘱托辑录而成，江谦曾说“坡公尝谓‘我因学佛而后知儒’，不慧则因读紫柏集而后知坡公之深于佛也，故属用修居士录为是编，以饷世之因好公诗文而见佛者”<sup>[1]42-43</sup>。齐用修（1901—1938），名朝章，法名慧懋，自号乐净子，又号素心道人，是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上饶）齐若农居士的儿子。他生性恬静好学，1928年受聘于婺东江湾小学，从而跟随江谦学习并获闻佛法，随即研读佛书，持斋念佛，不曾稍有间断<sup>[2]</sup>。据其本人《东坡禅学诗文要解序》可知，他早年曾学习古文并独好欧、苏，认为苏轼之文“禅机透露，语语上乘”，因而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利用公事之余编成此书。至于选录苏轼诗文的标准，他则说：“世人玩其文、遗其意，选其诗文者，大都取其论世畅游诸作，而其毕生归心赞佛诗文，有至老而尚不知者。东坡于佛造诣之深，非小子所能知，谨掇辑其诗文之发明心性与称扬赞叹诸佛菩萨者若干首，而请阳复师于难解处加注语，以为好读坡公诗文而未通佛理者启信。”<sup>[1]</sup>其中据选文来看，“赞叹诸佛者”主要包括偈、颂、赞等文体，如《阿弥陀佛赞》《释迦文佛颂》《灵感观音偈》等；“发明心性者”则涉及诗、记、跋等文体，如《赠东林总长老》《黄州安国寺记》《书楞伽经后》等；两类诗文共计九十五首。至于编选此书的目的，则是为了让喜读苏轼诗文之人能够由此“见佛”“启信”，也就是将苏轼的作品视为学佛之门径。

根据《东坡禅学诗文要解跋》可知，齐用修编成此书后，交由其师江谦添加注语，即当前所见“要解”部分。其后因遭逢战乱，该书书稿被江谦另一弟子游有维携归深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齐用修又写信嘱托游有维补录《前赤壁赋》一篇，并再次将书稿交给江谦添加按语。此外，游有维还从《宋稗类钞》中摘录苏轼与佛印禅师的两则故事，同样附有江谦所撰“要解”，可知游氏在校订此书过程中当与其师交流颇多。而就江谦“要解”来看，如《观音赞》的“要解”称“读此赞者，当知天台六即之义……苏公此赞，教人知观世音非他，即自性之大悲菩萨也”<sup>[1]6</sup>，同样是将苏轼诗文视为入道门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游有维曾为此书撰写跋语讲述成书原委，江谦则作有《自题》诗十三首来阐述其佛学理念及诗文见解。至此书出版时，又有圆瑛法师撰写《题词》以及蒋维乔居士题写书名。

近现代时期，佛教诸宗，皆归净土。上述圆瑛法师就是禅净双修的代表，江谦同样在此书开篇第一条要解中称“深入念佛三昧，一念念佛，一念生西，则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sup>[1]1</sup>。很显然，江谦将苏轼诗文视为学佛门径，而其指归在于禅净双修、往生极乐，“永明大师所谓‘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者，可不惧哉！佛儒一贯，禅净双修，圣人复起，不易斯言”<sup>[1]47</sup>。不仅如此，游有维所作《校订〈东坡禅学诗文要解〉后谨赋》也曾说“收拾儒禅归净土，一心六字是慈航”<sup>[1]50</sup>。此一心者，即禅宗常说的自心本性；六字者，为净土念佛法门的“南无阿弥陀佛”真言。总之，这部苏轼诗文选本的编选理念是“以诗文证道”，而所证之“道”则是儒佛一贯之道，是禅净双修之道。

## 2. 以禅解文：禅学诗文成水乳

正如圆瑛法师为该书所作《题词》中说的那样，“禅学诗文成水乳，诗文禅学岂藤萝”<sup>[1]2</sup>，苏轼的涉佛诗文处处闪烁着禅学的智慧。据笔者统计，江谦为苏轼诗文所作“要解”五十九条，加上自题诗、像赞按语等，共计一百余条。这些要解大都站在佛教立场，很好地揭示出苏轼诗文中蕴含的佛禅理念，如《书〈金光明经〉后》的要解所说：“大小虚实，唯是一心。末后一段，真转经龙象。”<sup>[1]34</sup>“转经”即唱诵佛经，他认为苏轼诗文就是对佛教经典的绝佳解读。具体来看，江谦为苏轼诗文所作注解除了解出处、注字词外，在揭示佛禅理念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将苏轼诗文中蕴含的佛学理念阐说明白。如苏轼《油水颂》说：“水在油中，见火则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安，内外净故。若不经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见火复起。”<sup>[3]596</sup>此颂为观佛牙而作，并以“水”“油”“火”为譬，显然蕴含着丰富的佛禅

思想,但具体内涵却并未明言。江谦的要解则说:“‘油譬’则性也,‘水譬’则情也,‘火譬’则色、声、香、味、触、法之境缘也。‘起’谓贪、嗔、痴之三毒,‘不知有火’谓照见五蕴皆空。内不见心,外不见境,故内外俱净。”<sup>[1]21-22</sup>他不仅明确点出“水”“油”“火”所譬为何,还认为只有经过火(也就是外缘)的锤炼,才能够去情尘、存真性,达到真正的“定”的境界,从而将苏轼文章中的隐微之处阐说明白。又如《胜相院经藏记》中有“见山不见宝”“见宝不见山”“如以蜜说甜”“复以甜说蜜”<sup>[3]389</sup>之语,江谦所作要解则说“见山不见宝,喻见相遗性;见宝不见山,喻见性遗相;二者皆边见也。即相明性,是谓以蜜说甜;即性明相,是谓以甜说蜜。一大藏经,皆如此说”<sup>[1]41</sup>。很显然,江谦这些注解将苏轼诗文中的佛禅理念解释的更为详晰,从而为借由苏轼诗文见佛者提供了极大帮助。另外,江谦还指出苏轼文章中的“闻思修王”为观音菩萨(见《静安县君许氏绣观音赞》)、苏轼诗歌中的“长不死”即无生无灭等(见《金山妙高台》),也都发前人所未发。

其次,于苏轼欲言又止处以代语、别语作答。代语、别语原本是宋代“文字禅”的表现形态,所谓“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sup>[4]</sup>。“代语”主要用于补充禅宗公案中未予作答的提问,“别语”则是对禅宗公案中已有的答语另作新解。江谦对苏轼诗文的要解同样如此。先看代语,苏轼《东坡羹颂》曾说:“甘苦常从极处回,咸酸未必是盐梅。问师此个天真味,根上来么尘上来?”<sup>[3]595</sup>“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尘”者,色、声、香、味、触、法也。苏轼此文末句问羹汤味从何而来,但并未作答,江谦则以代语答道:“非根上来,非尘上来。根尘识三,因缘和合,虚妄而生也。因缘别离,亦虚妄而灭。”<sup>[1]21</sup>这里用“因缘法”回答苏轼的“根”“尘”之问,是对佛教世界观的运用。再看别语,苏轼《阿弥陀佛赞》说“丈六全身不为大,方寸千佛夫岂小。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便到无魔饶”<sup>[3]619</sup>,江谦认为末二句有所不妥(不格),并将其改为“此心平处见西方,一念便到无魔饶”<sup>[1]2</sup>。“见”者,以空慧彻见之意也,较“是”为佳。“平”者,莲池祿宏所谓“理一心”也,“心平”则此心与净土不二,故而改“闭眼”作“一念”实为“净即是禅”<sup>[1]3</sup>理念的直接反映。江谦这种将前人文章改动数字后,再收入所编选本中的作法十分罕见,其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轼诗文宣扬佛学理念。总的来说,江谦采用宋代禅僧解读公案的手段注解苏轼诗文,其实是把苏轼作品视为禅学文本,从而赋予了其宗教意义上的典范性。

第三,对苏轼诗文中不合佛法之处进行批评。此书所选苏轼诗文最为知名者当属《赤壁赋》,但江谦的注解却并非是加以褒扬。他说“此文诵者多矣,而于其谈禅处,多未能解。水之逝者,相也;而未尝往者,不动之性也。月之盈虚者,相也;而卒莫消长者,本来圆满之性也……性虽不生不灭,然若不能修净土、出轮回,则生死无尽、沉溺可悲……此赋是坡公黄州始悟道时所作,故戒根未净”<sup>[1]47</sup>,这里是从“性相不二”视角对“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物与我皆无尽也”等语句加以注解,至于批评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认为苏轼“不能修净土”,不修净土则难出轮回、生死无尽;二是批评苏轼“戒根未净”,此语大约是针对“肴核既尽,杯盘狼藉”而发。总之,江谦在“儒佛同宏”“禅净合一”的立场下对苏轼诗文中的佛禅理念加以揭示,这种将苏轼作品视为禅学文本的方法,在具体解说中新见迭出。

此外,江谦还常常借助苏轼诗文来说明自己的佛教观念。如苏轼《荔枝并序》提到借地种菜之事,江谦则藉此指出“杀生食肉为恶之首”<sup>[1]28</sup>;《四菩萨阁记》提到施舍吴道子画之事,江谦则认为此文“发人深省,可以劝舍”<sup>[1]39</sup>,等等。并且,该书选入《阿弥陀佛颂》《释迦文佛颂》《东坡羹颂》《油水颂》等文,而对于同样蕴含佛理的《禅戏颂》《桂酒颂》《猪肉颂》等作品却视而不见,自然也不乏弘法布道的考量。

### 3. 诗文合道:儒佛鼻孔东坡公

在认识到《东坡禅学诗文要解》的编选旨趣和注解策略后,还需要思考的是,江谦、齐用修、游有维等人为什么要选择苏轼诗文作为引人入道的手段?这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苏轼本人的身份。在书前第十一首《自题》诗中,江谦曾说“坡公宿世老禅师,赞叹殷勤紫柏师。儒佛一般般若海,印心一卷永传之”<sup>[1]3</sup>。所谓“宿世老禅师”,指的是苏轼往往被视为五祖戒禅师的化身。据《冷斋夜话》记载,“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

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岁矣。”<sup>[5]</sup>在佛禅世界里，苏轼的前世是一位僧人，而此世同样也是开悟者。如江谦在《黄州安国寺记》的要解中说“坡公悟道，始自黄州，其夙根由来久矣”<sup>[1]38</sup>，前引《前赤壁赋》的要解也有“黄州始悟道时所作”<sup>[1]47</sup>之语。换句话说，前世为僧、今生悟道的身份让苏轼成为首选之人。

第二，苏轼诗文的特征。苏轼早年就已名满天下，科举及第后，欧阳修曾有“吾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sup>[6]</sup>之语。苏轼文章更是风行天下，甚至不乏“宇宙第一文字”<sup>[7]</sup>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苏轼的涉佛诗文进行解读，必然有助于佛禅理念的广泛传播。并且，《东坡禅学诗文要解》所选苏文中，确实存在很多阐说佛理之作，如《阿弥陀佛颂》中的“唯心净土”思想、《水陆法像赞》中的“事理障”“断灭相”理念、《六观堂赞》中“由假入空”的修行路径等。又比如《僧伽赞》说“麻田供养东坡赞，见者无数悉成佛”<sup>[3]619</sup>，很显然，苏轼本人也认为自己的诗文可以引人入道。再比如《朱寿昌梁武忏赞偈》说“梁武所说忏悔，文既繁重，旨亦渊秘，一切众生，有不能了。乃以韵语，谐诸音律，使一切人，歌咏赞叹，获福无量”<sup>[3]643</sup>，苏轼具有以“协律”之文助人祈福的创作旨趣。如此一来，选择苏轼诗文来引人入道也就水到渠成。

第三，儒佛同宏的理念。这本《东坡禅学诗文要解》被收入江谦所编“阳复斋丛刊”，属于十七种单行本的第三种，其他尚有《灵峰儒释一宗论》《儒佛合一救劫编》《佛儒经颂》《儒佛一宗主要课讲义》等，也都是将“儒佛合一”作为主导理念。实际上，江谦晚年曾创办“佛儒合一研究会”（后改名“灵峰学社”），“儒佛合一”正是他以佛学救亡图存的思想核心<sup>[8]</sup>。具体到书中评语来看，《南安军常乐院新作经藏铭》的注解“前有坡公，后有灵峰，儒佛鼻孔，一气融通”<sup>[1]31</sup>，《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序》的注解“公与弟子由皆湛深儒佛，发为文章，光照百世，其渊源有自来也。元明清科举，偏重程朱学说，故佛儒分裂。若苏氏之学早行于世，则佛儒之合久矣”<sup>[1]29</sup>。很显然，江谦在“儒佛合一”理念下更倾向于选择儒家士大夫而非僧人能文者作为入道之门径，而苏轼文章正是这样一个绝佳范本。

综上，江谦等人编注《东坡禅学诗文要解》实际上是对“儒佛同宏”思想的一种践行，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弘扬“儒佛合一”的理念和引人入道。这种站在佛教立场注解苏轼诗文的做法，相当于是将苏轼诗文混同于禅学文本，不仅在注解中多有新见，也为诗文选本的考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更进一步地看，所谓“儒佛二教，合之双美，离之两伤”<sup>[9]</sup>，所谓“若苏氏之学早行于世，则佛儒之合久矣”<sup>[1]29</sup>，这种编注理念与注解方式还可以视为对近现代时期“儒佛并重”的“人间佛教”思潮的一种回应。

#### 参考文献：

- [1] 江谦.东坡禅学诗文要解[M].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47.
- [2] 梅□氏.齐用修居士行述与生西纪实[J].佛学半月刊 1939(191):2.
- [3]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宋]楚圆集.汾阳无德禅师语录//佛光大藏经·禅藏第24册[M].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159.
- [5] [宋]释惠洪著,周萌笺注.冷斋夜话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397.
- [6]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2459.
- [7]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1093.
- [8] 赵娟.江谦研究[D].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240.
- [9] 印光法师.印光大师全集第二册[M].台北:佛教出版社,1991:325.

(校对: 金字恒 校对: 袁骁)

# 数字红楼传播的二律背反与破局——以“只有红楼梦”为例

柯佳超<sup>1\*</sup>，刘希彤<sup>1</sup>，李乐妍<sup>1</sup>，金佳怡<sup>1</sup>，崔迈文<sup>1</sup>

(<sup>1\*</sup>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之作，《红楼梦》的数字化传播面临技术赋能与文化深度的二律背反困境——即数字媒介拓展受众广度与沉浸体验的同时，亦存在消解文本原真性与思想深度的风险。本研究聚焦河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案例，基于文献分析与数据调研，系统解析《红楼梦》数字传播的现状、核心矛盾及创新方式，旨在为数字化时代激活《红楼梦》的文化生命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二律背反；“只有红楼梦”；《红楼梦》；数字化传播；文化创新

## The Antinomy and Breakthrough i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 Case Study of "Onl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Ke Jiachao<sup>1\*</sup>，Liu Xitong<sup>1</sup>，Li Leyan<sup>1</sup>，Jin Jiayi<sup>1</sup>，Cui Maiwe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0,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aces the antinomy betwee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depth. That is, while digital media expand the audience scope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they also risk dissipa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depth of its ideas.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Onl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Theatre Fantasy City" in Hebei Provinc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re contradictions,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i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data collection.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revitalizing the cultural vitalit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realizing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antinomy; "Onl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igit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 91 -

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红楼绮梦绽新芳：文创赋能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教育交流新径探赜》(项目编号:139)

作者简介：柯佳超（2006-），女，江苏徐州，本科，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

刘希彤（2005-），女，江苏泰州，本科，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

李乐妍（2005-），女，甘肃陇西，本科，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

金佳怡（2006-），女，安徽桐城，本科，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

崔迈文（2004-），女，江苏南通，本科，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

（上述作者对文章做出了同等贡献）

通信作者：柯佳超，通信邮箱 1790244946@qq.com

www.shiharr.com

## 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传播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碑，《红楼梦》兼具文学经典性、思想深刻性与历史独特性，是跨时代文化传承的核心文本。其数字化传播始终处于“技术赋能与文化深度的二律背反”张力场中：一方面，数字媒介可拓展受众广度、强化体验沉浸感——正题：普及性诉求；另一方面，技术逻辑主导的叙事简化刺激，易消解原著的思想复杂性及历史语境——反题：深度守恒诉求。在此背景下，以“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为代表的大型沉浸式文旅项目，通过整合戏剧艺术、光影技术与扩展现实媒介，构建《红楼梦》的多维感知实验场，为调和上述二律背反提供了典型实践样本。本研究以《红楼梦》数字化传播为焦点，选取“只有红楼梦”项目为核心案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数据调研及二律背反理论建模，旨在解构数字化传播中技术赋能与文化深度的冲突机理，评估案例项目在调和二律背反上的创新贡献与局限，同时探索经典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可持续传承路径。研究价值在于通过揭示二律背反的辩证运动规律，为平衡文化深度与技术活力提供参照，推动《红楼梦》在数字重生中保持本体性并参与全球文明对话。

## 1. 二律背反的生成根基

康德曾指出，二律背反源于人类理性试图超越经验界限时产生的矛盾，表现为两个看似合理却相互对立的命题同时成立<sup>[1]</sup>。这一哲学命题在数字时代《红楼梦》的文化传播中得到鲜明印证，其核心文化价值与传播现状的张力，最终显化为技术赋能与文化深度的根本对立。

### 1.1. 《红楼梦》的核心文化价值维度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巅峰，兼具文学、历史、思想与符号多重核心价值：其人物塑造、叙事艺术登峰造极。小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sup>[2]</sup>的叙事手法，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四大家族兴衰折射封建社会全貌，成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历史的重要文本。小说对命运与自由的探讨、对人性善恶的剖析，以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具有启蒙意义。随着历史的沉淀，“红楼”已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例如，“大观园”<sup>[3]</sup>被视为理想世界的象征，“黛玉葬花”<sup>[3]268-277</sup>成为文人精神的隐喻，这些符号在当代文化中仍被广泛引用与再创造。

### 1.2. 《红楼梦》的传播现状

《红楼梦》的文化价值传播既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关键课题，亦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但当前其传播链条存在系统性梗阻，从主体协作到形式创新再到价值转化，问题层层嵌套，形成传播困境。

#### 1.2.1. 主体缺失与协作断裂

传播主体单一化，多依赖少数研学机构，企业、民间组织及普通民众参与度低，且缺乏兼具文化内涵、国际传播、数字技术与市场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学术研究与市场开发严重脱节——红学专著困于学术圈，市场上的文创、影视改编因缺乏学术支撑饱受争议，类似我国高校与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3.9%和13.3%的困境<sup>[4]</sup>。国际协作松散，160多种译本因文化差异导致海外理解片面，国内民间传播亦缺乏引导。更关键的是，红学界的学术严谨性诉求与市场的通俗娱乐化倾向形成冲突，进一步削弱传播合力。

#### 1.2.2. 技术异化与内涵剥离

主体与机制的局限导致传播形式的固化与异化。一方面，传统文本、静态展览等形式吸引力衰减，新媒体应用却陷入技术滥用，如胡玫版《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过度短视频化，依赖特效却忽视内容本质，且未考虑受众接受差异致“水土不服”<sup>[5]</sup>。另一方面，文化内核与表达严重脱节，例如黛玉葬花的数字化还原仅呈现视觉元素，却丢失“花谢花飞花满天”<sup>[3]276</sup>蕴含的生命悲悯与命运隐喻。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也流于表面，未能实现深度解读与轻量化传播的协同。

#### 1.2.3. 价值消解与转化失焦

主体与形式的缺陷最终指向价值转化的低效。同质化开发普遍，如金陵十二钗摆件仅做文化

元素表层运用，因缺乏“相对优势”“兼容性”与“复杂性”<sup>[6]</sup>既难以吸引年轻群体，也无法适配海外需求。针对性研究缺失，国内忽视不同年龄层认知差异，如青少年与中老年对“宝黛爱情”<sup>[3]22-35</sup>的理解分歧，海外对“金玉良姻”<sup>[3]53</sup>伦理观等缺乏本土化适配，致文化符号难引发共鸣。而流量至上导致经典严肃性被消解，短视频与 AI 魔改、部分影视改编将情节简化为爽文或狗血剧情，使精神内核持续流失。

上述问题形成闭环：主体单一与协作断裂导致形式创新乏力，形式固化催生同质化与娱乐化，而价值消解又反过来削弱经典的传播根基，为二律背反的显化埋下伏笔。

1.3. 二律背反显化：技术赋能与文化深度的根本张力

在数字技术介入后，《红楼梦》的价值维度与传播困境加剧，形成普及性扩张与深度守恒的二律背反——数字媒介既拓展了经典的可达性，又系统性耗散其文化厚度。

1.3.1. 正题：技术赋能的普及性扩张

数字媒介多元打破精英壁垒。听书、短视频等形式大幅降低接触门槛，让更多群体轻松触达，实现文化普及。上海理工大学“短视频时代的阅读”研究发现，79.25%的学生曾因短视频推荐而购买书籍<sup>[7]</sup>。技术赋能亦提升文化传播精准度，如《红楼梦》数字艺术展中，技术赋能使展览对画作的还原程度可以达到 90% 以上<sup>[8]</sup>。

1.3.2. 反题：文化深度的系统性耗散

技术赋能的另一面是深度消解：碎片化传播将悲剧内核简化为情感金句，哲学深意压缩成心灵鸡汤。算法推送与感官刺激窄化情感共鸣为快消品，数字交互的即时反馈消解了传统阅读所需的延迟领悟与悲剧体味。创造性转化常沦为破坏性消遣，情节被改编为爽文或狗血剧，算法流量逻辑下，需要文化积淀的深层隐喻让位于浅表视觉冲击，导致经典结构被抽空。

核心矛盾由此凸显：技术赋能使受众覆盖率上升，但原著精神内核认同率却下降，二者呈现负相关，印证了二律背反的结构性存在——这既是《红楼梦》文化价值传播的当代困境，也是数字时代经典传承必须直面的命题。

康德所揭示的二律背反中，对立命题的共存源于认知的有限性，《红楼梦》传播的矛盾亦是：技术带来的受众覆盖率提升，与原著精神内核认同率下降形成负相关。这既是数字时代经典传承的普遍困境，也呼唤着在技术与人文间寻找平衡的破解之道。因此，唯有正视这种对立，方能为传统经典的当代传播开辟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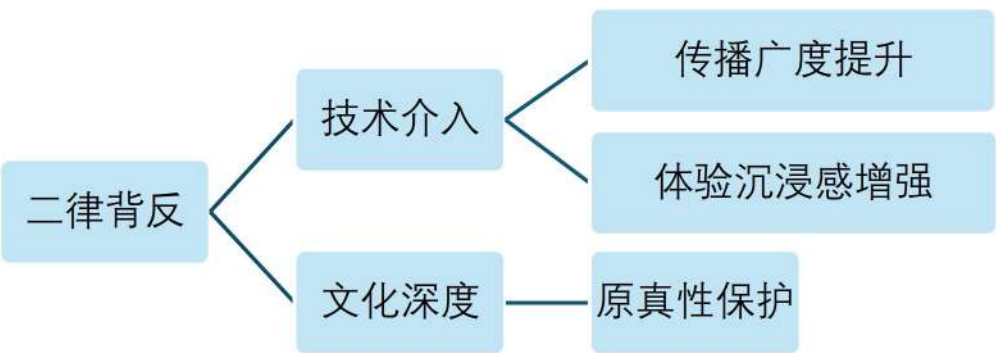


图 1：二律背反理论建模

2.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创新实践

面对《红楼梦》文化传播中主体割裂、技术异化与价值消解的困境，“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通过系统性创新打破僵局，构建了经典活化的新范式，为破解二律背反提供了现实样本。

## 2.1. 重构主体：协同共生破壁垒

打破传统单一主体依赖，构建多元协同生态：以王潮歌团队为创意中枢，联动跨领域人才，弥合学术与市场鸿沟。首创“沉浸式体验师”认证体系，输出 300 余人才，既解决学术与市场脱节问题，又为传播注入活力。

## 2.2. 革新传播：沉浸共创焕生机

传播形式的固化与内涵剥离，是《红楼梦》传播的核心梗阻。“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通过沉浸式体验与媒体融合，实现了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共创的转变。

### 2.2.1. 沉浸体验激活共鸣

超越文本与静态展示，打造强参与感场景。如“太虚幻境”<sup>[3]53</sup> 镜面迷宫、“金陵十二钗”<sup>[3]49</sup> 光影走廊等<sup>①</sup>既保留传统文化符号的视觉冲击力，又通过拍照打卡点的设置契合当代传播习惯。碎片化沉浸式剧场更让观众化身“剧中人”——“黛玉葬花”场景中可触碰花瓣，“刘姥姥进大观园”<sup>[3]403-416</sup> 可即兴互动，满足游客的参与感，在深度体验中自然传递文化内涵。

### 2.2.2. 媒介融合拓展广度

文创嵌入 NFC 芯片联动 AR 叙事，将静态符号动态化。突破性地以“读者视角”切入主题，推动学术解读融入日常<sup>[9]</sup>。“线下沉浸+线上扩散”模式兼顾文化深度与传播广度。

## 2.3. 优化价值：闭环共生可持续

针对传播中的同质化开发与价值消解，项目通过构建“学术-艺术-商业”的良性循环，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共生。

### 2.3.1. 构建“学术-艺术-商业”循环

项目联动高校开发红楼青少年教育产品，将学术资源转化为教育消费场景。文创设计如“风月宝鉴镜”呼应虚实哲学，“冷香丸”香薰还原角色特质，承载文化深意。更以沉浸式剧场演绎实现“学术 IP 场景化”<sup>[10]</sup>，商业收益反哺学术研究，形成可持续价值循环。

### 2.3.2. 平衡专业与大众

项目建立“学术守门人”机制——红学专家拥有改编否决权，同时以赛博朋克风格<sup>[11]</sup>演绎“风月宝鉴”<sup>[3]4</sup>，在严谨的同时注入创新，吸引大众。保留争议性话题激发深度思考，杜绝魔改。

### 2.3.3. 差异化国际传播

项目弱化复杂叙事，突出服饰、舞蹈等视觉符号，以西方熟悉的“沉浸式戏剧”为载体<sup>[12]</sup>，因地制宜传递中国文化精神。

## 2.4. 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破解异化

### 1.1.1. 技术深度服务文化

面对数字时代“技术赋能与深度消解”的二律背反，项目确立“技术服务文化”的准则：毫米波雷达触发“葬花”全息投影、UWB 定位等技术并非炫技，而是构建沉浸感的“基础设施”，如触发全息葬花、即时互动、营造奇幻场景。服务于观众对红楼情感的深度体验，如“风月宝鉴镜”不仅复原造型，更通过双面镜的设计，引导观众思考虚实边界，呼应曹雪芹“满纸荒唐言”<sup>[3]3</sup>的创作悖论。依照书中的配方制作“冷香丸”<sup>[3]70</sup> 香薰系列，采用分子香氛技术还原“四季白花蕊”<sup>[3]70</sup> 的气味层次，让消费者从感官上体会宝钗的人物形象，均紧扣文化内核。

### 1.1.2. 抵制“快餐化”，坚守价值

对于愈演愈烈的“快餐化”<sup>[13]</sup>商业模式，项目以高价值体验筛选受众。文创以工艺与文化还原度取胜，取消打赏转为自愿捐赠支持“青年红学计划”<sup>[14]</sup>，将商业性转化为文化公益，让商业成为经典的传播渠道，而非获取利益的捷径。

综上,该项目通过多元协作破主体瓶颈,沉浸共创破形式固化,闭环生态解价值消解,技术服务文化平衡二律背反,证明系统性创新可实现经典“普及”与“深度”的共生,为数字时代经典活化提供了重要范本。

### 3. 局限性与平衡之道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探索经典 IP 文旅转化的过程中,既展现了技术赋能文化的创新价值,也暴露出行业普遍存在的深层矛盾。其局限性与对应的平衡之道,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文化传承的辩证思考。

#### 3.1. 项目核心局限：从体验壁垒到发展瓶颈

尽管取得突破,“只有红楼梦”仍存在三重制约:一是 IP 认知门槛形成体验壁垒。作为以《红楼梦》原著为核心的沉浸式项目,其剧情深度、人物关系、文化隐喻高度依赖观众对原著的基本认知。对缺乏红楼文化背景的游客而言,难以理解“太虚幻境”的象征意义、“十二钗”命运的悲剧内核,导致体验停留在视觉冲击层面,无法触及文化深层价值,最终限制受众广度。二是高成本运营抬高消费门槛。为实现沉浸式体验,项目大量应用 XR、全息投影等尖端技术,叠加场地维护、演员培养等运营成本,直接推高票价。这种定价策略虽保障了项目品质,却使其难以覆盖大众消费群体,尤其将年轻游客、家庭客群挡在门外,削弱了文化传播的普适性。三是内容迭代缓慢制约持续吸引力。沉浸式戏剧的剧情编排、场景设计涉及多部门协同,更新周期远长于传统主题公园的游乐设施。这导致项目复游率偏低,难以形成持续消费粘性。在国内文旅项目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若不能通过内容创新打造独特记忆点,极易陷入“开业即巅峰”的困境。

#### 3.2. 破局路径：技术与文化的辩证统一

“新上述局限的本质,是技术工具性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失衡。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建立二者的动态平衡——既避免技术至上消解文化深度,也防止文化保守阻断当代传播,最终实现创造性融合。

##### 1.1.3.警惕技术至上浅表化缺陷

技术是文化传播的手段而非目的,过度追求技术传播效率,易使经典沦为浅表化符号。如某平台“三分钟读红楼”系列,虽以碎片化叙事获取流量,却将文学巨著降格成情感猎奇素材<sup>[15]</sup>。牺牲思想深度与艺术完整性,实为对文化价值的消解。“只有红楼梦”的实践则启示我们:技术应用需服务于文化表达,如用 XR 技术呈现“大观园”时,核心是通过虚拟场景强化“人间仙境”的意境,而非单纯展示技术效果。

##### 1.1.4.打破文化保守的传播困局

经典传承若固守传统形式、拒绝技术赋能,会丧失当代生命力。如某些新编昆曲《红楼梦》,固守“一桌二椅”舞台传统,拒用现代舞美,排斥短视频、直播等传播载体,甚至保留冗长曲牌不加注解<sup>[16]</sup>。结果老观众流失,年轻受众因理解障碍望而却步,陷入“圈内自赏”的小众困境。与之相对,“只有红楼梦”在锚定原著核心精神的同时,主动用现代戏剧语言重构表达:通过互动式剧情让游客参与“元妃省亲”的筹备,用通俗化台词解读“判词”的隐喻,既保留文化内核,又降低理解门槛,实现了传统与当代的对话。

##### 1.1.5.二者融合的平衡路径

以技术激活文化,以文化锚定技术:平衡的精髓在于让技术与文化形成“互哺”关系。从实践来看,这种融合需把握三个维:内容上,锚定原著核心情节与人物关系,同时以当代视角重构叙事逻辑;技术上,将 XR、互动投影等工具转化为情感媒介,例如用光影变化外化人物内心冲突,而非单纯追求视觉刺激;体验上,在满足当代观众对沉浸式互动需求的同时,通过导览解说、剧情手册等引导其触摸作品深层文化肌理。

因而可见:技术始终是服务文化价值传递的手段,文化内核则借由技术获得当代性表达。二

者的融合绝非简单折中，而是基于对数字媒介特性的深刻理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正如昌雅文化艺术集团负责人所言：“我们希望借由数字技术为《红楼梦》赋能，用更易理解的可视化呈现方式提高信息传达的有效性。”<sup>[17]</sup>技术在此既非附庸也不是霸权，而是促成文化基因当代表达的活性酶。这一实践智慧不仅验证了开头提出的三维融合路径，更揭示了数字时代文化传承的黄金法则：真正的创新永远建立在对母本价值的深度理解之上，技术只是唤醒经典生命力的那阵东风。这种思维正是破解前两种困境、实现经典当代传承的关键。

综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探索证明：经典的数字化传承，既不能沦为技术的“傀儡”，也不能成为传统的“囚徒”。唯有让技术服务于文化价值的精准传递，同时借技术赋予文化当代表达，才能突破局限，让《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在数字时代真正“活起来”，实现从“被仰望”到“被感知”再到“被传承”的跨越。

#### 4. 结语

数字化传播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红楼文化超越书本。“红楼梦·戏剧幻城”项目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红楼场景体验，突破传统文旅模式，成为《红楼梦》数字化传播的亮点。然而在更广阔的数字领域，经典价值正经历着复杂的挑战与重塑，呈现深刻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数字媒介打破精英壁垒，通过听书、短视频等降低接触门槛，激发多元解读与情感共鸣，使受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开放的数字空间让经典成为全民创意试验场，更成为民族文化认同载体与跨文化对话桥梁。另一方面，碎片化传播不断消解经典深度，将悲剧内核简化为情感金句；算法推送则窄化了情感体验，消解延迟领悟的悲剧体味；创造性转化伴随破坏性消遣，威胁文本深层结构；文化符号易被简化为消费标签。面对这种二律背反，数字时代推动经典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可持续传承更需寻求平衡，并以人文精神为引领，坚守文化内核为本的原则：内容再创要精准把握原著内涵，警惕过度娱乐化、商业化扭曲文化本质，平衡受众需求，实现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机制构建要建立学术机构、企业、民间组织等多方协同机制，培育复合型人才，打破学术与市场的壁垒，形成“研究奠基—收益反哺”的良性循环。技术应用更需辩证看待——应服务于传播而非成为核心，警惕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防止读者受技术控制导致解读趋同，抹平千个哈姆雷特的艺术无限性。同时更要防止过度娱乐化、商业化使文化沦为符号空壳。唯有让技术创新始终服务于文化价值本体，通过“线下沉浸体验+线上多元扩散”的联动，实现深度解读与轻量化传播的协同，方能使《红楼梦》在虚拟与现实的动态平衡中保持文化本体性，真正实现经典在数字时代的生命力延续。

注释：

①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官方宣传资料：《引领观众走进红楼梦的世界》，新绎文化官网，2018。

参考文献：

- [1] 伊曼努尔·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3-354.
- [2] 金圣叹著.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91-223.
- [3]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160.
- [4] 何哲著.加快破解科研与产业脱节难题[N].学习时报网, 2024（7）:第 A6 版.
- [5] 沈治钧.评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J].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8.
- [6] 埃弗雷特·罗杰斯著.创新的扩散（第四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1-30.
- [7] 程千千著.短视频时代的阅读：大众兴趣被激发、经典文学获推广[N].澎湃新闻官网,2023.9.1.
- [8] 吴雅婷著.为观众呈现一座触手可及的大观园[N].成都日报,2025.2.28:第 10 版.
- [9] 王添艺著.以梦作舟扬交流互鉴之帆[N].新华网, 2025.4.3.
- [10] 李荣坤著.“影视+旅游”IP 场景化创新[N].中华文化报, 2023.11:第 4 版.
- [11] 威廉·吉布森著.神经漫游者[M].伦敦：戈兰茨出版社,1984:1-2.
- [12] 陈梦雨著.实践范式下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媒介研究[D].《河南大学》2024 年硕士论文, 2024.6:17-18.

- [13] 樊昌志著.传统文化快餐化的受众动因——以“于丹现象”中受众的接受行为为例[J].新闻界, 2008(3):70.
- [14] 河北廊坊:拓展融合维度打造戏旅品牌[N].光明日报, 2024.12:第8版.
- [15] 张恩杰著.3分钟读完《红楼梦》真的好吗? 央视《开讲啦》李敬泽谈文学[N].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3.7.8.
- [16] 施旭升著.论昆曲“新编”的经典化——以北昆新编《红楼梦》为例[J].中国戏曲学院学报, 2013.5,34卷(2):72.
- [17] 王洋著.《红楼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N].中华文化报, 2023.10.18:第2版.

(校对: 黄芊 排版: 袁骁)

# 论张炜《古船》的创伤记忆书写

尹巧云<sup>1\*</sup>

(<sup>1\*</sup>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古船》以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变迁为背景, 通过隋氏家族几代人的沉浮, 展现出洼狸镇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与挣扎。具体来看, 小说首先通过隋氏兄妹承受的创伤来展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 其次通过时空的架构让过去与现在交织碰撞, 凸显时代变迁中洼狸镇创伤记忆的延续性; 最后利用芦青河、古船、老磨等意象为作品所讨论的心灵苦难提供具象化载体, 深化对小说中人物在时代变迁中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与精神求索的思考。这种深沉的历史观照与人性解剖, 既与作者本人的创作风格转变息息相关, 也反映了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产生冲突之时, 洼狸镇民众在欲望、道德和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对《古船》所书写的小镇创伤进行研究, 不仅能够当代语境下以新的视角剖析作品的思想内涵, 还能通过反思小说所描写的人物悲剧性命运, 为审视人类聚居地内物质发展与精神困境存在的矛盾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古船》; 创伤记忆; 隋氏家族; 现代文明

## On the Writing of Traumatic Memory in Zhang Wei's Ancient Boat

Yin Qiaoyun<sup>1\*</sup>

(<sup>1\*</sup>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Boat i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ety changes in the 1980s.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he Sui family, it presents the predicament and struggle of Wali Town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Specifically, the novel first shows the struggle of individuals in the torrent of history through the trauma endured by the Sui siblings; secondly, it interweaves and collide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structure of time and space, highlighting the continuity of trauma 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era changes; finally, it uses such images as the Luqing River, the ancient ship, and the old mill to provide concrete carriers for the spiritual sufferings discussed in the work, deepening the reflection on the inner struggles and spiritual pursuits experienced by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mid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Such profound historical contemplation and human anatomy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own creative style, but also reflect the difficult choices made by the people of Wali Town among desire, mor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when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licts with modern trends of thought. Studying the small-town trauma depicted in Ancient Boat can not only analyze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work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but also, by reflecting on the tragic fates of the character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provide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examin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teri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in human settlements.

**Keywords:** The Ancient Boat; Traumatic Memory; the Sui family; Modern Civilization

## 引言

《古船》作为张炜青年时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面世之初便赢得诸多好评。如雷达认为“《古船》的出现是一个奇迹”<sup>[1]</sup>,郜元宝也说“《古船》是一部最能激发思想的作品”<sup>[2]</sup>。诚如斯言,《古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品借助洼狸镇这个小窗口,巧妙地将中国当代改革史融入几大家族间的恩怨叙事之中,呈现几代人在过渡时代中的发展。

目前学界对《古船》的研究较多从道德评判角度解读伦理个体,分析作品对阶级斗争的批判性书写。如程光炜从考证角度研究主人公隋抱朴的原型,探究张炜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性<sup>[3]</sup>;翟二猛结合《九月寓言》和《你在高原》的相关内容,指出《古船》是在“人性恶的炼狱中发现并张扬人性善”<sup>[4]</sup>;姬玉侠一方面承认《古船》文学史定位的模糊特点,另一方面,他又对作品“消解了‘十七年’小说特定的‘史诗结构’及相关的意识形态”,“丰富了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sup>[5]</sup>的特色给以肯定。但在过渡时代中,小说描绘了个体因生存本能进行的挣扎,这种挣扎构成了比情节冲突更为深刻的人物创伤记忆。因此,本文试图从创伤记忆书写的角度解读古老航船的沉浮史,在与当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精神困境进行对话的同时,重新定位《古船》在当代文学中的坐标。

## 1. 人物命运：创伤记忆的具象化呈现

“创伤理论”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十九世纪后期,弗洛伊德将“创伤”一词引申至精神分析领域,通过“把含有症候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sup>[6]</sup>来治疗创伤。在动荡的时代里,当人类的生存习惯与外界环境产生冲突时,创伤意识往往会自然地成为个体的生命意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面对周遭的种种变革,许多作家以文字为载体回顾他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古船》即张炜受创伤理论的影响,对洼狸镇人在半个世纪中的经历进行的艺术性回顾。

《古船》的创伤书写在以隋家三兄妹为代表的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隋家长子隋抱朴背负着沉重的创伤记忆苟活于洼狸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唯一行动都只是在老磨屋里循环往复地“用木勺往磨眼里扣绿豆”<sup>[7]11</sup>。童年时代目睹的集体活埋、尸体展览等惨剧和隋家的衰败现象让他将自己视为一个罪人,父亲临死之前的还账举动更是在他心里种下了赎罪的种子。因此在父亲死后,敏感的抱朴虽然有意背负起家族的责任,但亲人去世、爱人改嫁、粉丝大厂易主的一系列经历早已将他的灵魂击溃。

其次,与懦弱胆怯的隋抱朴不同,隋见素在与创伤印记深度纠缠的日子里拼命地活着。他经历过隋氏家族的辉煌时期,却终究无法以一己之力振兴家族。自从洼狸镇粉丝大厂落到赵多多手上之后,让粉丝厂重新回到隋家人手里成为见素的一个执念。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不顾粉丝厂的发展,与李知常商量着延迟设备的更新,利用大喜对他的爱制造倒缸事件。然而,他不仅在粉丝大厂的争夺中失败,离开洼狸镇的创业也在短暂的辉煌后惨淡结束。不满现状的他反抗了一辈子,但最终在绝症的影响下不得不停下脚步。面对时代的变革和个人命运的无常,见素奋力挣扎过,可最终也只能承认自己的渺小。

再者,如果说隋抱朴和隋见素所承受的创伤是明确地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么隋含章的创伤印痕则是隐晦私密的,甚至连隋家人都没有意识到含章早已不是无忧无虑的女孩。由于隋家的失势和赵多多的欺压,在洼狸镇颇有声望的“四爷爷”以保护的名义将含章囚禁在自己身边,在含章的性意识尚未成熟之时就侵犯了她的身体。初次去见赵炳时,含章只是想尝试以自己的力量保护家人,但赵炳表面上装作温柔体贴,实际却仗着自己的声望和能力与含章建立起不公平的长期联系,对含章施行一次又一次地精神虐待和肉体伤害。久而久之,含章将自己定义为“玷污了老隋家的名声”<sup>[7]326</sup>的恶人。在作品的最后,含章终于开始了反抗,她用剪刀捅进了赵炳的腹部,可自己也在逃跑的途中被二槐用枪打伤了腿部。含章的悲剧偶然地开始,却完全渗入了她此后的生命里。对含章实施虐待行为的赵炳经治疗后仍然好好地活着,而含章自己却因故意伤人在公安局里等待着一场未知的判决。

除了隋家三兄妹,在家中自焚的茴子、牺牲个人幸福的小葵、丧生于东北煤窑中的李兆路等人也各有各的伤痛。在时代与个体的碰撞中,苦难是洼狸镇人民生活的土壤,张炜借着小镇中人物的命运记录时代的一角,展现人在复杂环境下的生存样貌,也由此构成了作品的创伤记忆书写。

## 2. 时空与意象：创伤记忆书写的构建方式

### 2.1. 时空更迭中的创伤命运

小说第一章就采用了时空倒置的叙事框架，以如今洼狸镇的废墟景象作为叙事起点，在对残垣断壁的感知中想象小镇曾经的辉煌，个人与集体所受的创伤逐步构成了读者对洼狸镇的了解。

小说中“记得”一词出现 28 次，“想起”一词出现 81 次，类似的其他时间提示词也频繁出现。时间在回溯与停滞之中牵引着故事发展，相似的历史和情绪在不同的时空中反复出现，并构成了没有终点的循环式悲剧。例如隋大虎战死一事，在小说的第二章经由隋不召的叙述已为读者知晓。但直到小说的第六章，在隋迎之和茴子相继亡故后，作者才安排让全镇人都得知隋家又有人罹难的事。于是这一创伤事件被再次提及，加之此前不久隋家人相继离世的现实情况，创伤烙印于多重交叠中更显得刻骨铭心。

作品的时空转变常常发生于镇上民众伤痛之际。每逢重大的突变来临，小说主要人物就开始回忆过去。于是，读者很清晰地感受到，相似的伤痛经历在洼狸镇这个小空间里重复上演。在二十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在洼狸镇之外的广大天地中，许多人事规则都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变动，可“四爷爷”赵炳永远高枕无忧，老隋家也永远处于落寞状态。“在每一个现在之中都有现在；在每一个现在之中，现在也已消逝着”<sup>[8]</sup>。尽管历史时间的确向前，但洼狸镇的人在流动的时间里却处于相对的停滞状态中，反复地做着徒劳的事情。

### 2.2. 意象勾勒的小镇悲歌

在主线情节之外，以芦青河、古船、老磨屋为代表的文本意象也以独立的象征色彩深化了作品创伤记忆书写的维度。历史中的洼狸镇可能有过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如今的芦青河变得又窄又浅，镇上的码头早已废弃，老磨的呜隆呜隆声里是被现代机器吞噬后的叹息。

芦青河的面貌决定着洼狸镇的整体风貌，同时也成为展现洼狸镇数十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当芦青河正常流动时，码头上会有“密集的橹桅，满天的腥气……洼狸镇生意大盛，叮当响的银元四处滚动”<sup>[7][42]</sup>。而当河道变窄之时，行驶其中的船不可避免地会搁浅，大船进不来，码头自然就废弃了，因而“整个镇子都变得懒洋洋的”<sup>[7][4]</sup>。芦青河见证了洼狸镇在岁月中渐渐消散的过程，也随同洼狸镇成为被现代人埋葬的历史记忆。

“古船”象征性地承载着古老洼狸镇的历史积淀。小小的洼狸镇正如古船一般从遥远的历史中驶来，带着小镇人的记忆与期待再驶向遥远的未来。作为芦青河河道上被挖出的战船，它在面世之初就是残缺不全的，其上的龙骨和船舷都在等待着被更新，一如需要被牵引着前行的洼狸镇。虽然在小镇里仍有隋不召、隋见素这样的人离开故土，去做传统意义上的异类，但作者却将回到最初的洼狸镇作为他们的共同归宿。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古船以搁浅于河滩上结束，小镇上的人也在留守与出走的博弈之后归于沉寂。

至于始终发出呜隆声响的老磨，它的数量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锐减，直至消亡被取代的历史，恰与洼狸镇被现代文明渗透后的经历形成互文。老磨房中的老磨是洼狸镇人走不出的传统和不得不承认的精神支柱，它磨出的浆液更是洼狸镇繁荣的直接原因。但在风云突变的大环境下，老磨永远慢悠悠地向着一个方向磨，这注定了它会落后于时代，也注定了依赖它的洼狸镇会被历史所抛弃。“意象是将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融为一体，在感性经验基础上而进行的理性创造”<sup>[9]</sup>，《古船》中各式各样的意象以归于静止或者迟钝地运转的结局，记录着小说中几代人在历史洪流中艰难前行的曲折历程。它们所反映的时代洪流与小镇现状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也早为文本中人物们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 3. 创作转型与时代语境：创伤记忆书写的动因探析

小说以现代视角回溯小镇人物的创伤记忆，并在叙述中有意加深人们对事件的伤痛感知，这并非偶然现象。这其中不仅有张炜个人创作风格转变的因素，也与故事发生的时空存在关联。

一方面，《古船》创作之时正值张炜写作风格转变的关键时期，此时的他由赞美田园生活转向反思乡土文明。在张炜之前的作品如《夜莺》《看野枣》《声音》中，他着力描写的是勤劳善良的农村人和清新诗意的乡土风光，但在创作《古船》时，他已然意识到“文学的诸多功能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唤起人类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关注”<sup>[10]</sup>。他仍然深爱着芦青河以及其周边的

一切,可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动情的土地上承载着许多人的痛苦记忆。因此在《古船》中,张炜通过全新的书写视角对自己过去的写作内容进行了反思,重新审视了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小说在描绘改革发展这一宏大背景时的叙事,对人性的复杂多面进行了书写。目睹了欲望的非理性表达在社会转型中逐渐显性化后,张炜甚至明确表态:“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再贫困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sup>[11]</sup>。这种无措的个人情绪直接改变了《古船》的叙事方向,也影响了他在80年代之后的创作路径。

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必然受制于时代语境,《古船》所呈现的一切离不开时代环境为张炜创作提供的可能性。“好的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正史不能替代的”<sup>[12]</sup>。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知识分子们刚经历了一段相对迷茫的时期,但很快又以“五四”精神为指引,借着重新阐释“五四”启蒙思想进行了现代化转型。刘再复曾从文化角度将80年代的思想解放程度与“五四”时期进行比较,认为“80年代的时代氛围相当宽松,对于思想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爱即可以有所作为的年代”<sup>[13]</sup>。《古船》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张炜对“人”与“历史”的主题进行重新思考的产物。小说中洼狸镇的人们刚从一系列特殊的事件中走出来,马上又被置身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变动之中。对于洼狸镇这个宁静偏远的小乡村而言,它显然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机遇。于是,镇上的人们盲目地追逐着经济效益,也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中伤了自己和身边人——自哀自怜的隋抱朴将阅读老书作为自己逃避世事的途径,敢闯敢拼的隋见素在大都市里撞得头破血流,追求自由的隋不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新时代车轮的运转。张炜一方面承认了小镇里弥漫着的进步气息,但同时也因为洼狸镇民众的茫然不安而惋惜悲叹。

现代性的发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明,但同时也破坏了洼狸镇的平衡与稳定。在粉丝厂由隋家易主至赵多多手中的同时,洼狸镇手工作坊的宗法制生产关系也随之瓦解。机械化生产方式固然提高了粉丝厂的经济效益,却也直接影响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经济秩序。隋抱朴在经历一场场变革后的精神瘫痪,以及当见素向他寻求支持时表现出的犹疑,这些行为代表着部分传统乡绅在现代文明入侵时的焦虑。就隋见素而言,在商品交换体系不完善的社会中,他走出小镇后的贸然投资行为也注定沦为资本游戏中的牺牲品。赵炳表里不一的形象更具象征意义:他表面上与世无争,是洼狸镇最德高望重的“大家长”,实际上却利用赵多多作为打手清除异己,早已将传统伦理权威转化为个人资本危害小镇文明,他的权力运作模式暴露出了乡土权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异化本质。《古船》所呈现的,正是在历史必然性与个人偶然性相悖时的小镇一角。

尽管作者痛惜于“洼狸镇人受的苦太多了,流的血太多了;他们饿得厉害,吃树叶吃草,最后把白土和石粉也填进嘴里”<sup>[7]205</sup>。但当洼狸镇的文明在现代性变革中逐步被解构后,小镇以及小镇中的人在走向未来前必然经历这样的沉浮过程。

## 4. 结语

小说将粉丝作坊的易主事件作为叙事起点,在作者的这种叙事安排下,读者对洼狸镇的最初印象就不可能只是一座平静惬意的小镇。在文本中,当个人思想意识崩解时,隋抱朴选择的固守老磨坊的处世方案,正是同一时代土地伦理被重新书写后,如他一般的无根漂泊者的创伤记忆。张炜在《古船》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sup>[14]</sup>。隋抱朴从赎罪到觉醒的转变,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因少时所受的精神创伤而历经的挣扎;隋见素反复走出小镇又回到小镇的经历,则演绎着现代化进程中商业理性与个人情感的悲剧性冲突。读者最终也未能知晓隋氏家族是否真正能够挖掘出地下暗河,也无从得知洼狸镇民众能否在大动荡后重回往昔的宁静。《古船》以文字为媒介,将人物创伤记忆作为文本材料建构小说。过去的记忆没有永远地困住隋氏兄弟,现在的我们亦应当相信,总有理想的未来在等待我们主动拥抱。

### 参考文献:

- [1] 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J].当代杂志,1987,(5): 232-239.
- [2] 郜元宝.命定视角与反讽基调——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一种艺术选择[J].当代作家评论,1990,(06):4-10.
- [3] 程光炜.张炜《古船》的主人公[J].文艺争鸣,2018,(11):6-14.
- [4] 翟二猛.论张炜小说中的人性善书写——以《古船》《九月寓言》和《你在高原》为例[J].文艺评

论,2016,(04):100-104.

[5] 姬玉侠.《古船》的历史叙事分析[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36(09):82-84.

[6]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20.

[7] 张伟.古船[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477.

[9] 李建中,李小兰主编; 孙盼盼,朱晓聪副主编.中国文论话语导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38.

[10] 张伟.张伟随笔精选[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4:52.

[11] 张伟.文学是生命的呼唤[J].作家,1994(4):32.

[12] 罗炯光编选. 现代作家书信[M].郑州:文心出版社,1993:593.

[13] 刘再复,黄平.回望八十年代——刘再复教授访谈录[J].现代中文学刊,2010,(05):17-27.

[14] [美]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 [J].青年文学,2005(1).

(校对: 吴宗译 排版: 袁骁)

# “可能的地图”与隔绝的“桃花源”：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

方立娟<sup>1</sup>

(<sup>1</sup>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却又有着本质区别。呈现在钟怡雯笔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并不是与外界完全隔绝，而是有一条通往“桃花源”的路径。钟怡雯的桃花源情结不仅源于其丰富的想象力，也与自然地理环境及地域文化有关。“隔离性”地理空间不仅是离散书写的重要载体，也融入了钟怡雯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学史意义。通过对“隔离性”地理空间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探究作者的情感特质与思想内涵。

**关键词：**钟怡雯；散文；“隔离性”；地理空间；桃花源

## "Possible Maps" and Isolated "Taohuayuan" : The "Isolated" Geographical Space in Zhong Yiwen's Essays

Fang Lijuan<sup>1</sup>

(<sup>1</sup>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isolated" geographical space in Zhong Yiwen's essays bears some resemblance to the "Taohuayuan" described by Tao Yuanming to a certain extent, yet 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ces. The "isolated" geographical space presented by Zhong Yiwen is not completely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ut rather has a path leading to a "Taohuayuan". The author's affection for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not only stems from his rich imagination, bu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culture. The "isolation" geographical spac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discrete writing, but also integrates into the author's spiritual world and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f "isolation", the emotional traits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author can be better explored.

**Keywords:** Zhong Yiwen ; Essays ; "Isolated" ; Geographical space ; Taohuayuan

### 引言

钟怡雯在《可能的地图》中写道：“此刻，聚落、白云和我，都在同一个时空的坐标上。属于祖父的，应当存在于另一个不同的时空。那是我无法落足的所在。它可能存在，也许消失。”<sup>[1]83</sup>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中，渔夫不经意间发现了桃花源，后来却找不到返回的通道。细味钟怡雯散文中的一些地理空间，与“桃花源”类似，有着隔绝的意味，却又并未完全隔绝。因有必要将钟怡雯笔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与桃花源进行比照，分析作者通往精神桃花源的路径，进而探究其独特的思想内涵。

- 103 -

作者简介：方立娟（1988-），女，江西赣州，博士，研究方向：文学地理学、华文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通信作者：方立娟，通信邮箱：2415386652@qq.com

www.shiharr.com

## 1. 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

钟怡雯在《河宴》中写道：“没有人的故事，河不过是个地理名词，当人们因它而牵动了生命的绳索，它便也懂得悲欢离合。”<sup>[1]22-23</sup>进入了文学文本之后的河流，并不仅仅可以作为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也是融入了情感与记忆的地理空间。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称：“文学作品地理空间各式各样，其内涵丰富多彩，其结构也不拘一格。”<sup>[2]</sup>关于文学地理空间类型的划分，学术界已有相关论述，本人曾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关于文学地理空间的类型，学术界的划分标准也不太一致，不过不同的文学作品，其文本中的文学地理空间构成要素亦不太一致。文学地理空间的构建应根据相关要素之特性进行，这样才能真正立足于文学文本，从而探寻相关文学现象，解决一些文学问题。”<sup>[3]</sup>细观钟怡雯散文，有着不少典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值得探究。

何谓“隔离性”地理空间？“隔离”一词既有“隔断”<sup>[4]212</sup>之含义，也有“分隔开来，使断绝来往”<sup>[4]212</sup>之含义。“隔离性”地理空间具有“隔离”的特性，有地理意义上的隔断，也有人心方面的隔绝意味。其实“隔离性”地理空间并非为钟怡雯散文中所特有，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即有类似的“隔离性”地理空间，“桃花源”即是典型代表。《诗经·召南·殷其雷》中的“山”也具有阻隔效应，然而“殷其雷，在南山之阳”<sup>[5]</sup>这样的句子多是由于起兴；苏轼《和陶杂诗十一首》中的“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sup>[6]</sup>则体现了山的阻隔功能，此处的“故山”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隔离性”地理空间。因为时空的距离，古代的游子们经常要面对真实的“隔离性”地理空间，这些地理空间也不免会写入文学中，富有情感内涵与审美意味。人生不乏聚合离散，地理空间也有连接与隔离之别，因而有必要提出“隔离性”地理空间这个概念，以便更好地对钟怡雯散文进行研究。

钟怡雯在《岛屿纪事》的开头说：“我已经失去了那座岛屿。”<sup>[1]3</sup>可是作者又说：“有时候，我又觉得并没有完全失去那一座岛屿。”<sup>[1]3</sup>这座岛屿还藏在作者的记忆里。作者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他们归去，惊见沧海已化桑田，原始的一切已无从寻觅。武陵渔夫至此已完全失去了桃花源，文明粉碎了他们完美的回忆。

我应该庆幸。庆幸自己的碧琉璃依然完好如昔。

我并没有失去那座岛屿。”<sup>[1]9</sup>

此处的岛屿即可归类为“隔离性”地理空间。这座岛屿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岛屿，也是含有作者情感记忆的岛屿。可是这些情感记忆并不一定能为旁人所理解，就像小时候写生时“李老师”不明白“我”为何每一次都画天空却不画相思林一样，“若时光可以重现，我会告诉他，其实每一张画里都隐藏着相思林变幻游移的阳光、叶涛和树影；每一张作业都糅合了两幅繁复的图像。我还要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我爱的是绿荫下、珍珠毡上、凉风徐徐的休闲和舒适”<sup>[1]5</sup>。哪怕是一起在岛上生活过的人，彼此的感受也有不同。作者认为有的人并没有找回那座岛屿，不过她认为自己的“碧琉璃”依然完好。

在《灶》中，作者写奶奶伴着灶，守着一个由井水、木碗柜等组合成的一个旧世界，“我无法跨过那无形的距离回到属于灶的时代去，只好遥观那飘忽的丝网，摇曳在腾空的记忆里”。<sup>[1]45</sup>

在《渐渐死去的房间》中，曾祖母因为年迈以及疾病等缘故，房间里有一种混浊的气味，让众多家人避之不及，这就有了第一层隔离意味。曾祖母因为畏光，还要把窗户的透光地带糊死，这是第二层隔离意味，属于地理意义上的隔离。当曾祖母去世时，丧礼上堂姐嘴角露出微笑，这属于人心层面的隔离。这里面的大部分人并不会去关心这样一个老人晚年生活的孤独与不易，更多的是在意老人带来的麻烦，此时此刻人心宛如那个被封闭起来的房间，宛如一座孤岛。

而满姑婆是曾祖母六十几岁时收养的孤女，她对于曾祖母怀有的那份感恩之心，却难以被旁人所理解，“她们的心思，都已经流放到另一个世人无法到达的地方”<sup>[1]61</sup>，这个地方明显具有了人心上的隔离意味。作者写道：“如今，满姑婆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曾祖母‘遗传’给她的房间。实在难以想象，她怎么能够与那种常人避之犹不及的空气一起生活。其实，她的寡言亦是另一种无形的房间，阻隔了她和家人的沟通，也同时封闭起她内心的秘密。”<sup>[1]61</sup>孤女的生活环境似乎也像一座孤岛一样，缺乏关爱，可是曾祖母的介入曾经让这座孤岛发生了变化。没有这样经历的旁人很难理解满姑婆对曾祖母的感情，这种感情已经跨越了地理的限制，直达人心的深处。《空间的诗学》认为：“一切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间都具备家宅概念的本质。”<sup>[7]3</sup>又：“我们应该证明家宅

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sup>[7]5</sup> 这样的隔离性空间增强了文本的神秘性，也尊重了人物情感上的独立性，是作者的妙笔所在。

除房间、灶、岛屿等外，钟怡雯散文中还涉及了天井、金宝小镇等隔离性地理空间。因为时间或空间又或是生活经验等的阻隔，造就了一个个“隔离性”的地理空间，这些地理空间标志着独特的情感记忆，又有着类似于“桃花源”的隔绝意味。然而这些地理空间并非完全隔绝于外界，“隔离性”地理空间与外界之间似乎也有一条通往“桃花源”的路径。

## 2. 通往“桃花源”的路径

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中，桃花源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场所。“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一作草），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sup>[8]</sup>，他继续前行探索：“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sup>[8]</sup>桃花源是可以被发现的，并不是完全隔绝于外界。而钟怡雯笔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也是可以看见的。

作者童年时的天井虽然不大，却给了作者想象的空间。井缘的苔藓更衬井水之幽静，作者在一片深邃与神秘中开拓了想象的天地，生活空间由此得到了延伸。对于童年时代的作者而言，这方天井本身就带着通往想象中的龙宫的意味。然而，当她后来告别天井时，天井又成了梦土，成了桃花源一般的存在。作者写道：“签下卖屋契约时，奶奶与我同时泪光闪烁。自此，永别那里的一景一物，也割断了系联着我与天井的脐带，那条血脉相连的脐带啊！天井从此成了梦土，一个水涌梦始，哺我育我滋养我的一块沃土。”<sup>[1]15</sup>即使告别了天井，作者也让天井以梦土的形式存在着，“梦土”即意味着作者即便离开了此地，可是在精神上还可以与此地产生链接。这与单纯的回忆不一样，这是高度的精神融合，作者在此处找到了这条通往“桃花源”的精神之路。由此可见，这条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即便是实体的，也带着精神赋予的意味。

钟怡雯在《人间》中说道：“这个青鸟不到的地方，确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即将离去，最牵绊我的，便是这片童年时心灵的避难所、完美的休憩地。”<sup>[1]21</sup>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如桃花源一般的地方，可是她并没有和这个地方真正“永别”，她又说：“明天，我也即将展翅，而这片温暖的土地，我拥抱着，在山巅，在水涯。”<sup>[1]21</sup>她离开了，她在奔赴远方的同时还能拥抱着这片土地。或许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有一个通道，可以跟这片“桃花源”建立深度的链接。杜华平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的论文《论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深进》中指出：“文学地理空间的深进，就是指写出‘地方灵魂’，其实质是作家与地理空间的深度契合。”<sup>[9]</sup>

《凝视》中的“我”很害怕曾祖父和曾祖母的遗照，以为被照片中的眼睛凝视着，直到有一次大扫除时，“我”在曾祖父的照片后面发现了那破壳而出的小壁虎，新生的力量打破了旧时的恐惧，作者于文末写道：“那次大扫除好像一个告别仪式，永别那段被凝视的日子。可是凝视的力量却从来未曾停止，每当我远眺夜空，总是看到那永恒的眼神，在遥远的时空里，与我相望。”<sup>[1]166</sup>纵然是相隔遥远的时空，还是可建立相望的通道。这些“隔离性”地理空间并不是完全隔绝人世，而是早就在一些人心里种下了种子，在某个契机中还可以生根发芽。荣格指出心理的根源可回到洪荒时代，他说：“我们的心里有一条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蜥蜴的尾巴，这条尾巴就是家庭、民族、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sup>[10]</sup>钟怡雯不仅没有否认集体记忆，还在作品中暗示了回望的通道。

在《可能的地图》中，“我”带着相机、记事本和口述的地图去寻找祖父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因时间流转，人事变迁，那个地方似乎也成了遗漏的所在。也许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消失，会布满野草和树林。可是作者却认为还是会有几个好记性的人忘不了，即便形躯腐朽，“剩下的，是一种干净透明的本质，充塞在天地之间。唯有天上的诸神见证了这些短暂的永恒”<sup>[1]83</sup>。记忆中的地方成为了可能存在也可能消失之处，就表示其并没有完全隔绝人世或者人心。

即便是在《渐渐死去的房间》中，作者自述多年后依然记得那种气味以及满姑婆“她养了我这么多年……”<sup>[1]58</sup>的话语，在此处，作者的笔墨给了人物充分的尊重，就像陶渊明写下通往桃花源的路一般，作者也以自己的笔触“复活”那个已经“死去”的房间，开拓了一条通往满姑婆和曾祖母精神世界的小径。

不管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是钟怡雯散文中的岛屿等，都可以归类为“隔离性”地

理空间,只不过二者的本质不一样,钟怡雯笔下的地理世界有着更丰富的情感记忆,而桃花源充满了更多理想浪漫的色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钟怡雯内心也是有着“桃花源”情结的,毕竟她多次在文中提及“桃花源”。从她笔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展开分析,也可以更好地探讨作者的情感内涵。

钟怡雯在高中时离家半年,称:“因为受不了家的管束,受不了油棕园把我当犯人一样囚禁在无边无际的绿海,受不了溺毙和窒息之感,遂成为逃家的人。”<sup>[11]9</sup>油棕园类似于一个桃花源,与世隔绝,而钟怡雯却并非那个寻不到路的渔人,离开之后,她还可以“在另一个岛,凝视我的半岛,凝视家人在我生命的位置”<sup>[11]13-14</sup>。这条通往桃花源之路,可以通过疏离与书写来打通。她在《北纬五度》中写道:“疏离对创作者是好的,疏离是创作的必要条件,从前在马来西亚视为理所当然的,那语言和人种混杂的世界,此刻都打上层叠的暗影,产生象征的意义。那个世界自有一种未被驯服的野气。当我在这个岛凝望三千里外的半岛,从此刻回首过去,那空间和地理在时间的幽暗长廊里发生了变化。镜头一个接一个在我眼前跑过,我捕捉,我书写,很怕它们跑远消失。我终于明白,为何沈从文要离开湘西凤凰,才能写他的从文自传。”<sup>[11]13-14</sup>这种书写不是简单的回忆,而是建构起与过往空间连接的通道,从而在并行空间中找到自我。

钟怡雯散文拓展了“隔离性”地理空间的内涵。在地域书写上,她以独特的油棕林记忆与赴台体验拓展了“隔离性”地理空间的内容,在情感表述上,她以自己不一样的笔触拥抱着过去的时空,奔向向往着的未来时空,为这个“隔离性”地理空间打通了一条通往精神桃花源的路径。

### 3. “隔离性”地理空间与作者的情感内涵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说:“创造家或故乡的感觉(见第五章)是写作中一个纯地理的构建,这样一个‘基地’对于认识帝国时代和当代世界的地理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中标准的地理,就像游记一样,是家的创建,不论是失去的家还是回归的家。”<sup>[12]60</sup>钟怡雯笔下的这些“隔离性”地理空间,亦不乏家的意味。那个“渐渐死去”的房间,对于曾祖母和满姑婆而言,有着家的味道,作者笔下的岛屿,是其心中的“碧琉璃”,亦是精神上的桃花源,一样有着家的味道。钟怡雯在《岛屿纪事》中认为父亲和叔叔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桃花源,其实也暗示了他们曾经拥有过类似于桃花源一般的家。

然而现实中的家或许难以达到完美的地步,陶渊明还乡后还得继续寻找其家园,“形态上的家不是永恒的”<sup>[13]</sup>,且“家庭成员或邻里之间的情感也并非永恒”<sup>[13]</sup>，“桃花源”或许更容易唤起心里的共鸣。

钟怡雯的“桃花源”情结不仅源于其丰富的想象力,还源于其童心以及对自然的亲近。她在《天井》中写道:“在小小的心灵里,那水深不可测处应也有另一个天地,也住着另一种亦可以名之为‘人类’的生物,同我们一般寻常饮水睡觉玩乐。或许里面藏卧一只水蛇精,哪一天修炼成龙,突然凌霄飞起,潜入翻腾的云阵中。”<sup>[11]</sup>现实的地理空间在此处也有了浪漫的成分。在《空中花园》一文中,失眠的夜里,作者靠着想象盖起一栋海市蜃楼:“叠床架屋,修整房舍,考虑得最详细的是庭院。”<sup>[12]34</sup>在这个花园里,大树有鸟窝蕨、鹿角蕨,兰花也是野生的,看上去是想象的地理空间,实际上却也夹杂着现实对过往的追忆或者惦念。钟怡雯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南洋的乡土空间给了她近乎原始蛮荒的体验,她曾著有《野蕨之梦》,自言对蕨类有种“近乎乡愁似的情感”<sup>[11]114</sup>,这些体验也延展到了其精神世界,又从精神世界照进现实生活。哪怕后来进入都市生活,她亦难忘那充满野性的自然。

刘勰《文心雕龙》言:“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sup>[14]</sup>沈德潜《芳庄诗序》曰:“予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sup>[15]</sup>自然地理环境对一个作者的影响也可以达到深远的程度,钟怡雯年少时期接触的油棕林足以引发她对于桃花源的思考。油棕林里面的植物生长茂盛,绵延浓黑,似黑洞一般,树林里有猫头鹰、夜鸟等等,自然地理空间的独有特质也给了她某种启发:“一直以为树林里并存第三度时空,类似异次元世界,或是桃花源,有缘之人方能寻得。”<sup>[12]61</sup>

除自然地理环境以外,地域文化也影响着文学家的创作。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指出:“一个文学家一生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复杂多变的,有出生成长之地的地域文化(简称‘本籍文化’)的影响,也有迁徙流动之地的地域文化(简称‘客籍文化’)的影响。”<sup>[16]</sup>钟怡雯赴台湾地区求学之后,难免受到台湾地区影响,但是她起初并未完全融

入台湾地区的环境，而是拥抱着自己的原乡记忆进入了新的生活。她在《我和我豢养的宇宙》中说：“乌托邦难以实现，就用文字打造，我的空中花园原来也只是梦，谁知道竟弄假成真。”<sup>[1]240</sup>又：“遗落的乌托邦碎片。我试图把它们重新捡起，拼凑，重建适于我居住的宇宙。”<sup>[1]240</sup>原本生活过的地理空间是很难被搬运到新的生活环境中的，但可以凭着记忆进行精神上的融合，而精神原乡的打造也不是依靠凭空的想象，更多的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体验与需求。“到达者还需继续寻找他的家。只是他所寻求者已奔赴前来欢迎他”<sup>[17]</sup>。

作者看似建构了第三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与第一空间有着高度的关联。在某种视角下，过去和将来所处的时空并不会冲突，可以并行存在。诚如作者所言：“如洗的水蓝天空，只有一朵胖胖的白云。地上的这个绿色聚落里，则有黝黑的我与它遥遥相望。此刻，聚落、白云和我，都在同一个时空的坐标上。属于祖父的，应当存在于另一个不同的时空。那是我无法落足的所在。它可能存在，也许消失。”<sup>[1]83</sup>

## 4. 结语

学界对于钟怡雯散文中的离散书写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可是从地理空间视角系统性地研究离散写作，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离散也需要地理载体，而地理空间不仅仅是离散书写的载体，也可以是作家真实生活过的地方，正如迈克·克朗所言：“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的外部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键问题。”<sup>[12]72</sup>文学地理空间也不仅仅是离散书写的载体，还可能融入了作家真实的情感体验。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并未完全隔绝于人世，那条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可以打开新的视角与新的世界，连接起新旧两个空间。

### 参考文献：

- [1]钟怡雯.岛屿纪事[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 [2]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77.
- [3]方立娟.书写与超越：陶渊明文学中的地理空间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22:36.
- [4]汉语大字典编纂处编著.60000词现代汉语大词典（第三版）[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
- [5]高亨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7.
- [6]（宋）苏轼著，（清）冯应榴注，黄任轲、朱怀春校.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192.
- [7]（法）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8]（晋）陶潜.陶渊明集[M].宋刻递修本.
- [9]杜华平.论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深进 [J] //曾大兴，夏汉宁，郑苏淮主编.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10.
- [10]刘耀中，李以洪.荣格心理学与佛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86.
- [11]钟怡雯.野半岛[M].中国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 [12]（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3]方立娟.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4(02):69-73.
- [14]（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94-695.
- [15]（清）沈德潜著，潘务正、李言编辑点校.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余集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526.
- [16]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8.
- [17]（德）海德格尔著，王作虹译，黎明校.存在与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93.

（校对：金字恒 排版：袁晓）

# 论新诗美学范式的重建——兼评《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

马兴艳<sup>1\*</sup>

(<sup>1\*</sup>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新诗美学范式的建构不仅关乎新诗诗学体系的良性发展, 更是维系中国现代诗歌生态健康平衡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 学界对新诗的研究重心多置于“历史脉络梳理”与“经典文本确立”, 这种研究取向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新诗诗学的学术根基, 却也客观上造成了对新诗美学方面的审美性遮蔽。这种遮蔽不仅限制了新诗诗学研究向审美本质的掘进, 也制约着新诗发展的理论拓深。《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的出版, 标志着新诗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该书以系统性的美学范畴体系为理论切入点, 通过对郭沫若、冯至等经典诗人, 以及自由体诗、象征派、现代派等关键诗学流派的深度考察, 抽绎出“崇高美”“丑”“怪诞”等新颖的诗美范畴, 拓展了新诗美学研究的维度, 打破了学界以“史性叙事”为主导的认知范式, 为新诗美学范式的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型, 展现出极高的学术创新意义。

**关键词:** 《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 新诗美学范式; 诗学生态

##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 Paradigm of New Poetry -- Commenting on "The Aesthetic Category of New Poetry and the Art of Poetry"

Ma Xingyan<sup>1\*</sup>

(<sup>1\*</sup>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 paradigm of new poetr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poetic system of new poetry, but also the key to maintaining the healthy balance of the ec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For a long ti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new poetry has been mostly on "comb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stablishing classic texts", although this research orientation has consolidated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of new poetry poetic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also objectively caused the aesthetic obscuration of new poetry. This kind of obscuration not only restrict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esthetic essence of the poetics of new poetry, but also restricts the theoretical deepe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esthetic Category of New Poetry and the Art of Poetry mark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new poetry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esthetic category system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classic poets such as Guo Moruo and Feng Zhi, as well as key poetic genres such as free-form poetry, symbolism, and modernism, the book extracts novel poetic categories such as "sublime beauty", "ugliness" and "grotesque", expands the dimension of new poetry aesthetic research, breaks the cognitive paradigm dominated by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aradigm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poetry aesthetic paradigm, showing extremely high academic innovation significance.

**Keywords:** "New Poetry Aesthetic Category and Poetic Art"; the aesthetic paradigm of new poetry;

## 引言

中国现代新诗的生成与演进,始终伴随着诗学理论的同步跟进与体系构建。在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新诗先后经历了初期对“形式与内容”的理论论争、中期对格律、音节等形式规则的重构,以及后期对“大众化”与“民族化”的探索深化,在文体形态与精神表达层面均朝向多元自由的方向发展。尽管在形式革新与思想开掘上取得显著突破,但学界对新诗美学范式的系统性建构与诗美艺术的深度研究仍显不足。当前研究多将新诗简单纳入现代文学艺术范畴,常以叙事文体的研究路径切入,聚焦于思想精神与语言技法的分析,这类研究难以充分阐释新诗的独特性,尤其是潜藏在诗歌思想与语言背后的诗美旨趣。因此,新诗“诗美”范畴的理论建构,对完善新诗艺术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值得关注的是,程国君教授的专著《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恰是聚焦于新诗美学艺术的力作。该著作以“诗美”为核心主线,突破了诗歌创作中的技术壁垒、派别分野与性别局限,以全景式研究视野,细细挖掘新诗的美学内蕴,填补了新诗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

## 1. 新诗美学建构的问题与意义——程著的理论起点

五四运动以来,新诗创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思想内涵呈现出多元交织的复杂格局。在思想维度上,“既有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分野,又有革命诗歌、国防诗歌、自我表现的诗歌等各种思潮的此起彼伏”<sup>[1]</sup>,持续拓展着新诗的精神疆域;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相继涌入,形成多元共生的艺术格局;诗歌流派方面,“自由体诗派、新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各种流派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太阳社、中国诗歌会等各种社团”<sup>[1]</sup>林立;形式上以白话诗为主体,衍生出自由体、民歌体、散文诗、新格律诗等多元文体形态。与创作实践的蓬勃态势相比,新诗理论建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初创期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形式与内容”的重构,这一取向源于双重历史语境:其一,旧体诗的格律体系已成为思想表达的桎梏。刘半农直指旧诗格律“束缚思想过甚”<sup>[2]</sup>,提出新诗创作的三原则:“一是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是增多诗体,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三是以方言填词,今话作曲”<sup>[2]</sup>。康白情亦批判旧诗格律为“桎梏人性底陈套”<sup>[3]</sup>,学界更将其视为文学革命需破除的“骸骨”<sup>[4]</sup>。这些批判既呼应着晚清“诗界革命”的变革逻辑,也凸显了新诗突破形式藩篱的内在诉求。胡适等留洋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学启发,认识到白话语言的民众亲和力,这一认知成为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其二,20世纪初的时代语境呼唤文学形式革新,对旧体诗的改造恰与知识分子的文学变革诉求相契合。不同于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的改良路径,民初知识分子在亲历西方现代文明后,更深刻认识到语言通俗化对文学启蒙的关键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直至1917年,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新诗仍未出现——即便被视为“白话新诗鼻祖”的胡适,其早期作品《沁园春·誓诗》仍残留旧体诗痕迹,尚未完全突破格律束缚。西方文学思潮的介入加速了新诗从“改良”到“革命”的质变。1914年胡适在《自杀篇》后记中提出“字句形式不为成法所拘”<sup>[5]</sup>的创作理念,此前他刚以白话文翻译苏格兰诗人安妮·林萨德的《老洛伯》。这种实践彻底颠覆了文言诗歌的表达范式。可以说,实现“形式革新”与“思想解放”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新诗草创期的核心历史任务。

新诗发展期的核心议题在于诗歌规则的系统建构与美学完善。草创期的形式解放虽打破了旧体诗格律桎梏,却也衍生出形式散文化的创作偏向,正如应修人所批判的“像写信,像新闻地随手写上分成行子的几行,就美其名曰诗,我实在怀疑得很”<sup>[6]</sup>的现象,这种创作随意性严重消解了诗歌的审美特质。针对这一困境,诗坛掀起了格律化运动:陆志伟提出“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sup>[7]</sup>的格律观,闻一多则系统建构“诗的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sup>[8]</sup>的理论体系,其“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理论成为新诗规则探索的核心范式。抗战语境下,新诗发展后期转向“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实践路径。民族存亡的时代危机催生了诗歌功能的现代转型,诗人们“为了鼓舞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与斗志,广泛开展诗歌大众化运动,开展了诗歌朗诵、街头诗活动”<sup>[1]</sup>将艺术表达与救亡图存深度结合。创作实践中,新诗通过双重下沉策略实现社会效能的最大化:一方面知识界主动介入抗战诗歌运动,以通俗化语言创作战地诗篇;另一方面唤醒民间创作力量,号召“广大大众中的‘无名氏’也起来参加这一运

动”<sup>[9]</sup>，形成“从全国各地开展伟大的抗战诗歌运动”的全民创作格局。这种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新诗突破文学场域的局限，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为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 2. 新诗美学的基本维度——从“范畴”到“诗美”

程国君教授的《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基于对中国现代新诗美学实践的深度考辨，构建了极具创新性的学术分析框架——现代新诗的双重美学维度：“美学范畴”与“诗美建构”。在此理论基石上，作者进行了系统化的学术推演：一方面以“崇高”为逻辑原点，建构起中国现代新诗的基本美学范畴体系；另一方面，提炼出“3个阶段7个关键步骤”动态模型，完整勾勒出新诗诗美建构的历史演进轨迹。该研究的学术创新体现为多重突破：其一，突破学界长期以来重“史”轻“论”的研究范式，将新诗从文学史叙述中剥离出来，还原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审美本体性，重新定义了研究的学科维度；其二，在美学层面对新诗史上“雄浑大诗”“审丑”等现象性存在进行体系化整合，使其摆脱传统研究中的碎片化状态，纳入完整的美学范畴谱系；其三，通过对徐志摩、艾青等诗人诗学理论的深度阐释，延展了新诗审美机制的实践路径，为当代新诗美学研究开辟了跨学科的学术生长点。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对冰心、陈敬容等女性诗人的美学特质进行专门考辨，这种性别视角的引入实为新诗美学研究的突破性尝试，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性别研究空白，更通过女性诗歌“柔婉崇高”等独特美学范畴的建构，为新诗美学体系注入了多元维度的理论活力。

首先，程国君教授的《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在学科定位上展现出鲜明的学术自觉。程教授在书中明确界定：“本着不是新诗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诗史》，当属陆耀东先生那样的资格写！），而属于新诗美学探索的史论”<sup>[10]</sup>。这一表述既彰显学术谦逊，更清晰划分了研究边界——相较于陆耀东先生三卷本《中国新诗史》以时间轴铺陈历史脉络的撰述方式，程则刻意剥离对“诗史编年”与“史实考据”的过度依赖，转而将研究锚点置于新诗诗美的历时性建构，在美学维度上重绘新诗的精神谱系。在新诗美学源流的考辨中，程打破学界对胡适的惯常认知——尽管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理论主张及其白话实践奠定了新诗的文体基础，但其散文化倾向客观上弱化了诗歌的审美特质。程教授创新性地将白话新诗美学范式的确立归功于郭沫若，提出“‘从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演变而来的现代新诗，形成以崇高美、忧郁美为主，优美、丑、怪诞、悲剧性、喜剧性等多元审美形态并存的审美格局”，并强调“郭沫若诗歌最早呈现出新诗独特的美学品格，故而从郭沫若诗歌美学研究开始”<sup>[10]</sup>。这一论断不仅重构了新诗美学的发生序列，更以“崇高美”为逻辑起点，建立起区别于文学史叙述的美学阐释框架。

在具体研究架构上，程构建了宏阔的诗人群像谱系：从徐志摩引领的新月诗派、冰心与湖畔诗人的“小诗”写作，到李金发、穆木天的象征主义实践、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探索，再到艾青的七月诗派与冯至、穆旦的西南联大诗群，依循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坐标，系统解构各阶段的美学特质：第一个十年以郭沫若的雄浑壮美开启新诗崇高审美，同时新月派“三美”原则确立优美的形式规范；第二个十年围绕“人之觉醒向生之吟唱”的主题转换，呈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织、崇高与丑怪荒诞并存的多元格局；第三个十年因应时代危机，通过内忧外患的现实书写与民族精神的群体表达，深化了雄豪悲壮的审美意象。这种将美学范畴与历史语境相勾连的研究路径，既突破了传统文学史的线性叙事，又通过“崇高——优美——荒诞”的范畴演进，构建起新诗美学的动态生成机制。

其次，程国君教授在《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中，以极具穿透力的问题意识切入现代新诗美学研究，通过对“关键词”的深度开掘，揭示了新诗美学中的多重维度。书中诸如第三章的“丑·悲剧性·象征性”、第十章的“纯粹·知性·非崇高”、第十二章的“大化·空灵·圆形之美”等核心概念的遴选与阐释，既彰显其对美学命题的敏锐捕捉，更折射出对新诗本质的深度叩问。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不仅激活了新诗美学的探究张力，更打破学界对“古典”与“现代”美学关系的二元认知，揭示二者间盘根错节的对话机制。

在核心美学范畴的建构中，程教授对“崇高”的阐释尤为亮眼。“崇高”虽源自希伯来文化与基督教传统，承载高洁圣洁的审美指向，但在中国美学语境中，其与古典诗歌的豪迈、雄浑等风格范畴存在深层关联。叶朗在《美学原理》中将“崇高美”纳入美学体系，却未深入探讨其本土化转化路径。程则创新性地指出，中国现代诗歌经历着从“古典和谐（优美）”向“近代崇高”的范式迁移，而“现代文学及其新诗的这一基本美学品格确立的标志，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论，

就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sup>[10]</sup>。此后，从革命诗歌、艾青的七月派创作到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探索，均延续着这一审美脉络。值得注意的是，程教授强调“崇高”并非西方美学的简单移植，而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结晶。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为例，其“大用外腴，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sup>[11]</sup>的诗学境界，通过空间的壮阔、力量的奔涌与气势的磅礴，展现出与“崇高”美学共通的民族审美基因。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危亡时刻，“崇高”美学的勃兴既是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契合时代启蒙需求的必然选择——当家国蒙难、士气低迷时，“崇高”不仅承载着明确的精神指向，其蕴含的现代性意识更成为唤醒国民的美学号角。由此可见，古典“雄浑”与现代“崇高”在诗歌创作中的嬗变，本质上是美学传统在时代浪潮中的赓续与新生。

程国君教授在《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中对“丑”与现代主义美学实践的阐释，揭示了中国现代新诗美学体系的多元维度。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重要范畴，“丑”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它并非对传统“崇高”与“优美”范式的简单颠覆，而是通过谐谑、荒诞、颓废等个体化抒情策略，构建起与传统美学既对抗又对话的张力关系。这种美学实践的现代性特质，首先体现为对现实的碎片化书写与颓废情调的审美转化。当早期白话诗因“作诗如作文”的理念陷入散文化危机时，李金发、穆木天等象征派诗人以“弃妇”“半死的月”等病态意象，将波德莱尔式的“审丑”传统植入中国诗坛。程指出，这一时期诗歌“主要审美形态是丑、悲剧性以及审美表现层面的象征性、隐喻性等等”<sup>[10]</sup>。这种突破并非否定崇高，而是“离开或牺牲个人的假大空的崇高”<sup>[10]</sup>，既解构了英雄叙事，又在平凡中建构起新的审美维度。与郭沫若的狂飙式崇高、艾青的土地厚重感不同，现代派诗人的“审丑”实践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伦理：“它们不是‘诅咒的歌’，它们不偏激，倒是相当中庸，是以美的眼光来诅咒的，它们诅咒，但有审美距离，是以美的眼光来看丑、恶、感伤、颓废等‘不愉快的现象’”<sup>[10]</sup>。这种中性姿态打破了传统审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典型如闻一多《死水》以华丽辞藻描绘腐臭景象，通过“翡翠似的白沫”“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等悖论式意象，将现实的丑恶转化为极具张力的审美对象。程教授的研究价值在于：他将“丑”从单纯的艺术手法提升至美学范畴高度，通过对李金发、冯至等诗人的文本细读，揭示出“审丑”实践背后的现代性焦虑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为我们理解新诗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新诗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 3. 新诗美学的深化与整合——程著的实践路径与学术启示

程国君教授在《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中构建的诗美理论体系，既立足理论建构的高度，又深植文本分析的沃土。其个案研究将抽象理论与具体诗学实践有机融合，通过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聚焦代表性诗人的美学特质，二是系统梳理诗潮诗派的艺术探索。这种双重研究范式不仅丰富了新诗美学的理论肌理，更通过可操作的评价路径，赋予理论以实践生命力。

首先，程教授以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穆旦、冯至八位诗人为研究坐标，通过文本细读揭示新诗美学的演进轨迹。他指出：“对于现代诗人的诗歌艺术美探索实践作较为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分析现代诗歌一些经典诗作的诗美创作实践，就可以初步勾勒新诗诗美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sup>[10]</sup>。这一研究路径催生出多重美学发现：从新月派“三美原则”到现代派“知性美”，从艾青的“散文美”到穆旦的“张力美”，构建起多元共生的美学谱系。具体来说，郭沫若以《凤凰涅槃》《天狗》等作品确立新诗崇高美学的基石，其“主情论”主张“真诗”主张：“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st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声地颤动，灵地叫喊，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sup>[12]</sup>，将五四浪漫主义推向高潮，开启白话新诗的美学探索；新月诗派通过节奏革新与语言重构，反驳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散文化倾向。程则特别指出，他们“吸纳旧诗词和古典语言中富有生命力的语汇使新诗语言‘繁复’起来，使初期新诗克服了那份‘大白话’的‘寒伧’，让新诗重新具有了典雅的风采”<sup>[10]</sup>，为新诗美学的本土化提供范式；艾青的“散文美”实践打破自由体、格律诗、民歌体的三足鼎立，以奔放的个性化表达激活五四精神，为文学转型注入新的美学可能；现代派诗人则开创“诗歌思维”，在戴望舒的朦胧隐喻、卞之琳的哲学静观中，实现情感表达与知性思考的融合，拓展了新诗的美学维度。

其次，程的另一重大创新在于对女性诗歌美学的系统发掘。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林徽因、

冰心、方令儒等女性诗人的创作常被男性中心的历史叙事遮蔽,学界长期存在结构性忽视。程教授作为女性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此前已通过《“你的想法更美些”——论〈城南旧事〉的叙事艺术》《论台湾女性散文的诗学建构》《女性生存的寓言和程序规范的书写——廖辉英小说创作论》《论曹禺对女性命运的沉思与冥想》等成果展现性别视角的洞察力,此次在《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中,他进一步将女性诗人群体纳入核心研究视野,聚焦于林徽因、冰心、方令儒、汪静之等女性诗人的创作实践。这些女性诗人在新诗创作中展现出的独特美学特质,不仅为新诗诗美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整体新诗美学的多样性构建提供了重要补充。她们作品中对个体生命的灵动体悟与敬畏之情的表达,与新诗美学体系中以“崇高美”“雄浑”为主的宏大叙事形成了有机互补,共同勾勒出新诗美学的完整图景。这种研究突破具有双重学术价值:一方面填补了女性诗歌美学研究的空白,将被历史湮没的创作实绩重新纳入诗学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性别视角的引入,打破了新诗美学单一的宏大叙事传统,揭示出“崇高”与“柔婉”“雄浑”与“细腻”的对话关系。

程国君教授的研究既以“美学范畴”建构理论大厦,又以“诗美艺术”夯实文本根基,通过经典诗人的个案解剖与性别视角的创新介入,使新诗美学研究摆脱了“史论分离”的困境,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批评的双向互动中,开辟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新境界。

#### 4. 结语

综上所述,一部兼具思想厚度与学术深度的著作,必然植根于作者深厚的知识积淀与长期的学术耕耘。程国君教授在诗歌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其学术生涯中涌现出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诗学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他将研究视域拓展至延安革命家的旧体诗词创作,其论文《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及史诗价值》不仅荣获《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度“好文章”称号,更标志着其学术探索从现代新诗向传统诗词的跨文体突破。从新诗美学范畴的体系建构到延安旧体诗词的诗史价值重估,程教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的范式跨越。这一学术转向不仅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的成熟演进,更折射出新文学理论与古典诗学的交融创新。他对现代新诗的艺术勘探,为百年新诗研究前半段的学理建构奠定了范畴基础;而对延安诗词的研究,则在前期成果之上,深入考察古典诗歌美学与西方现代诗学对中国现代表达的双重塑造——既敏锐发掘其中的民族文化基因,又精准把握其蕴含的现代性品格。程国君教授的研究正在打破现代诗体间的美学壁垒:通过将新诗的“崇高美”建构与延安诗词的“革命抒情”传统相贯通,推动现代诗美艺术的体系化整合。这种跨时代、跨文体的研究路径,既展现出学者纵贯古今的学术视野,更通过对“民族元素”与“现代品格”的辩证把握,为中国现代诗歌美学提供了兼具历史纵深感与理论创新性的研究范式。其学术实践不仅深化了对诗歌审美机制的理论探索,更为百年新诗美学范式的确立提供了关键的学理支撑,在现当代诗歌研究领域开辟出极具启示性的学术新维度。

#### 参考文献:

- [1] 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440.
- [2] 郑振铎.文学论争集[M].第2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46:63.
- [3] 王运熙.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50.
- [4] 叶圣陶.骸骨的迷恋[N].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9号,1921年11月2日.
- [5]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 3[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93-194.
- [6] 应修人,楼适夷,赵兴茂.修人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254.
- [7] 陆志伟.渡河[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8.
- [8] 闻一多.诗的格律[N].《晨报·诗镌副刊》第七号,1926年5月.
- [9] 《街头诗运动宣言》[N].《新中华报》1938年8月10日.
- [10] 程国君.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2.
- [11] (唐)司空图;罗仲鼎注,蔡乃中注.二十四诗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1.

[1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第 15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3.

(校对: 吴宗译 排版: 袁骁)

# 论杨义《京派海派综论》的研究方法

丁璇<sup>1\*</sup>

(<sup>1\*</sup>长沙理工大学 文新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杨义先生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的深入研究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思路。具体而言, 杨义的京派海派研究在方法上存在三大特点: 一是现象还原, 通过史料的严谨考证, 透过时代观念的遮蔽, 致力于还原文学现象的历史本真; 二是个案分析, 多维度的剖析京派海派的文化因缘, 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文化碰撞中的缩影; 三是大文学观的考察视角, 将文学放置于宏观的文化史之中, 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深度。杨义的京派海派研究不仅体现了他扎实的史料功底与开放的学术视野, 也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深化。

**关键词:** 京派; 海派; 史料; 现象还原; 大文学观

## On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Yang Yi's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Ding Xuan<sup>1\*</sup>

(<sup>1\*</sup>Wenxin College,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Mr. Yang Yi's in-depth study of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has provided valuable insights and depth for future researchers. Specifically, Yang Yi's research on the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exhibits three major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irst, phenomenon restoration, which involves rigorous textual research and penetrating the obscurity of era concepts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literary phenomena; second, case analysis, which delves into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vealing a microcos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midst cultural collisions; third, a macro-literary perspective, which places literature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cultural history, expanding the horizon and depth of literary research. Yang Yi's research on the 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not only demonstrates his solid founda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pen academic vision but also promotes innovation and deepening in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s:** Beijing School; Shanghai School; historical materials; phenomenon restoration; macro-literary view

## 引言

京派与海派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其文学色彩形成鲜明对照。自20世纪80年代起,杨义先生从比较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城市学等视角深入分析京派与海派复杂的精神谱系,直面文学作品本身,以广阔的视角不断推进和创新,给人以通达之感。本文拟从严谨的史料论证,多元的流派分析和融合的“大文学观”三个方面对杨义京派海派研究的方法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思考其研究方法为后来者提供思路的同时,是否又形成新一层的禁锢。

## 1. 严谨的史料论证

杨义强调史料的一手性,一方面体现在资料查证的严谨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强调直面文学作品,去除社会意识的遮蔽。杨义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证实阶段,受到了乾嘉学者严肃的治学态度影响,十分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敢于以怀疑的眼光治学。他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源头进行细读分析,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原始资料,强调史料的一手性,并进行多方面的论证。结合作家所受到的时代环境的影响、文学审美的取向、文化基因的传承等,寻找作家和流派的归属关系。史料越是翔实丰富,越能清楚地了解作家或作品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或影响。杨义提倡求真史观,“对于初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不下一番探幽索微、勘误辨伪的工夫,而一味地在研究方法上追求新奇,是很容易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沙滩上的。”[1]如在理解凌叔华作品中透出的文人写意画趣味及“高门巨族的精魂”时,杨义从家族历史和文化基因上入手,探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文本,辨析出其父亲为进士,曾任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等。这种精细的个体辨析体现出杨义对于治学的扎实态度,正如他所提到的,“现象还原和文化定位,是我对文学流派进行研究的两个基本点,我认为,这样做出来的学问是一种‘实学’”[2]。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研究在五六十年来受到政治影响极深,如凌叔华作为早期京派中颇具特色的小说家,却因为和新月派、现代评论派有所关联,而很少在五六十年的文学史著作中被提及。所以,杨义侧重于直面文学史,拨开先入为主的理论观念对于文学作品梳理的遮蔽,而重新从作品的真实意味和流派自然发展的历程出发,审视作家和流派的关系。

除了多方收集资料外,杨义还研究了许多勘误的方法,关注历史资料的“真相”。在真实性和可靠性有所保障的基础上,才能谈及研究的创造性。杨义擅长抓住文学思潮的主流,但是并不忽略支流或对立方面。“小说史才不因苏雪林在鲁迅逝世后发表过恶毒的鞭尸文章而将她有意识‘遗忘’,或加以情绪性的鞭挞,而是从艺术的视点出发,于清隽可读处首肯之,于因其依附政治而艺术味荡然处惋惜之。”[4]正因为杨义对待史料的态度严谨,并重视作品的艺术特征,才有此评价。《京派海派综论》中,杨义书写了极多对于两派作家作品的理解,对各个作家所受到的流派影响也厘出了清晰的脉络线索,对文学现象作出历史还原。杨义的文化视角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开放和先进的历史观。

## 2. 多元化的流派分析

《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是杨义治《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来,把京派和海派作为典型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总汇。“京海之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文化间发生的激烈碰撞的缩影。”[2]杨义从地域、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双城记”。京派作家群和上海现代派的名称分源自京派和海派戏剧。京派戏剧是由官邸演出,讲究精致规范的行当家法,一般被视为正统派,海派戏剧则是大批京师艺人来到上海,受到商埠繁华的刺激而形成,戏剧演出讲究情节性和娱乐性,也因此受到京派戏剧的讥讽。正如鲁迅《“京派”与“海派”》所言:“‘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2]京派理论讲究自然和谐,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他们的审美理想倾向于美好健全的人性,言必称希腊。海派则效法法、日,他们的艺术取向倾向于机械迅速发展而喷出的人类时髦色调。京派是指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群,包括20年代语丝派、新月派滞留北平的作家和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新秀,如周作人、杨振声、废名、沈从文、朱光潜、凌叔华、萧乾、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梁宗岱、李健吾等。海派则是多层面的文学混合体,既有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的现代派,也有张资平和章衣萍等侧重写两性心理的新式言情小说作家及鸳鸯蝴蝶派等。京派作品中沉浮着的是对自然人性的皈依,对虚伪荒芜的社会等级的拒斥,流淌着

对人性完善和生命重造的理想。废名从华中领略到“美在自然中”的理想，沈从文从湘西体悟到“神在生命中”的哲学。《竹林的故事》中，美好清新的三姑娘，春意盎然的溪水，绿团团的小坡，简单的讨菜对话，共同构筑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竹林，人性的美好在文章中被娓娓道来。而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以第一人称吐露都市男子的微妙内心，将一个初至洋场的东方男人下意识地陷入两性吸引之中又用残存的家庭道德理念压制自己欲望的心理描写地细致入微，朦胧的雨境和半梦半醒的意识交缠，描写性心理十分圆熟。如果说京派浸染着灵秀竹子中的绿意，那海派则是散发着躁动的疯狂爵士乐。

《京派海派综述》采用图文互动的方式更鲜明地呈现出了京派与海派的差异，既使逻辑更加严密，也增添意趣。比如北京和上海的漫画刊物对梅兰芳形象的展示，北京《立言画刊》第232期上登的是《宇宙锋》剧照，梅兰芳“妆容严整，明艳照人，俨然大家闺秀”[2]，而上海《中国漫画》第9期狂想专号登载的则是“乐而不淫”，梅兰芳“穿着比基尼载歌载舞，好像是百乐门舞厅的时髦女郎”[2]。两座不同文化大山的土地自然地孕育出不同的作品风格。图像中的元素也代表着当时的历史和文化，对文学史和图像史的双重分析，才能使图史互动，相得益彰，更体现出图志学的研究意义。

同时，杨义并不严格囿于流派的划分，而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杨义认为流派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作品之中也有相互呼应之处，一个流派内的作家，其作品并非完全是流派意识的体现，正如流派是流动的，作家的意识也是流动的，不同的作品审美从另一个侧面也构成了流派的艺术张力。京派之中，萧乾长篇小说《梦之谷》描绘了古都青年孤独、敏感的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萧乾转向海派，与海派笔下光怪陆离的洋场相比，萧乾笔下的人物仍带有东方沉静的气质，这里的性心理描写，情大于欲。萧乾的心理描写小说既使京派体现了差异融合的色彩，也表现出京派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因素。言必称法日的上海现代派之中也各有不同，刘呐鸥出之以乐天的心态，施蛰存侧重心理分析的目光，穆时英则怀有危机的心态和死亡的意识。但施蛰存的作品也存有对于乡土人生的眷恋，刘呐鸥所展现出的洋场人生样式较之施蛰存的描绘更为扭曲迷离。如《礼仪与卫生》中妻子为了让丈夫保持卫生时有人陪伴，便让自己的妹妹来陪伴丈夫，小说人物更显示出一种被外来文化价值观冲击浸染后高傲自得的态度。

### 3. 融合的“大文学观”

“大文学观”的方法并非杨义首创，他认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学、文化学、图志学问题，都隶属或者近于其大文学观，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观尤为值得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提倡“杂文学观”，“孔门四科”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当时文学多理解为文献经典，文学性和史学性杂糅一处。二十世纪则受到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杨义要求在兼容“杂文学观”和“纯文学”概念的基础上形成“大文学观”，以开放的眼光考察各界的相互交织。杨义对于京派海派的研究已经体现了其“大文学观”的实践，将文与史结合起来，打开新的视角。杨义写道：“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的编撰还在于文学史的创新，那么《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就是在文学史的基础上，把眼光放得更为广阔，目光所及已经不再限于文学史，而是关注到整个文化史。我一向提倡‘大文学观’或‘大文化观’，这也是这种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的尝试。”[2]这与杨义对于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的态度一致，他认为学科之间应该打破相对封闭的状态，而尝试各学科方法的移植借用，用新锐的眼光和态度开发出原先被忽略的区域，使广大研究者在感悟中产生新的契机，更深层次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如文史互相取法，将文学的关怀和历史的凝重结合，使文学研究更深入。

杨义以大文学观在探讨京派与海派的文化根源时，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是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作为帝都的北京和通商口岸的上海，这两座城市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了京派与海派文学的文化基因。例如，从陶渊明到李商隐，再到公安派，京派作家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史精神体系，同时也以开放的态度吸收了古希腊神话，英国的莎士比亚、哈代，以及俄国的屠格涅夫等外来文化，从中汲取与自身个性相契合的元素。而海派则主要受到日本新感觉派、法国现代派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其次是发展历程的视角，京派与海派并非静止不变，其内部结构和审美倾向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流动。例如，沈从文除了与废名相似的安宁平静的风格，还热衷于从边远地区探索初民文化的神秘与粗犷，比起废名作品中狭窄的境界更显宽阔。海派由哀感顽艳的鸳鸯蝴蝶派演变为追寻新感觉派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上海现代派，再到各具特色、承接现

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张资平和章衣萍的媚俗文学作品也是海派文学存在的一个侧面。京派之中周作人重史、朱光潜重论的理论异同，《梦之谷》和《心病》对于心理描写的探索，以及在一九三七年之后又形成了以巴金为核心的准作家群体等，都表现出京派、海派内部的不同风貌。三是比较文化学的视角，文学流派的异同性也恰说明其多元化，如京派与海派在色彩美学上的分野：沈从文笔下的色彩世界虽斑斓多姿，却以沉静的翠绿色为精神底色；而上海现代派则热衷于捕捉都市霓虹中酒绿灯红、变幻莫测的流光溢彩。再如京派发展速度平缓，海派发展历程急速等。

由于纯粹文学的过度净化以及一些人为的阉割，文学和整个文化的关联有所割裂。因此，将文学与文化社会结合起来，展示文学的巨大创造性融合，从而产生文化生活的完整性。大文学不能仅以文学来概括，而是一种以世界和文化为导向的文学。

#### 4. 结语

无论是从多维度的历史、文化、地域或图志学角度，还是“大文学观”的方法论，都揭示了杨义广泛的学术文化视野、严谨的研究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创造力，这表明杨义没有盲目遵循他人的研究视角，而建构出一套自己的文学流派研究方法，其开阔的文学视野和深刻的理论眼光为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诸多思路。杨义对于文学作品的细读和阐释及其严谨的治学作风，也为后来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范本，对学界中存在的先理论后文本的研究方式作了警示。同时，图文互动的研究方法虽有独到创新之处，但也为图文研究缚上了一道新枷锁，无关的图文之间是否会被强行架起联系，这一问题在部分学者论文中已稍显端倪，值得深思。

#### 参考文献：

- [1] 杨义.研究方法上的三个境界[J].文学评论,1984(6):12-16.
- [2] 杨义.京派海派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 沈从文.沫沫集·论冯文炳[M].上海:大东书局,1934.
- [4] 秦弓.文学史家杨义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5(4):263-270.
- [5] 梁竞男.杨义先生对京派海派的研究[J].文艺争鸣,2008(5):59-62.
- [6] 杨义.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 [7] 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 [8] 黄科安.杨义的文学研究及其特色[J].文艺争鸣,2007(9):108-118.

(校对：金宇恒 排版：袁骁)

# 以姐妹之名：论《她乡》杂糅的共同体迷思

古帆<sup>1</sup>

(<sup>1</sup>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作为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她乡》在解构女性气质、革除制度化母职等方面的进步意义已经得到诸多关注，但小说中与“母亲”形象如影随形的“姐妹情谊”却鲜被提及。作为母亲之间重要的聚合物，姐妹情谊既是形塑自然母亲与有机共同体的关键，也是配合社会机器对母亲实施控制的同谋。因其诞生于“隔离空间”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姐妹情谊在性别空间政治的影响下将共同体固化为仅依靠母性思维方能运作的孤岛。“姐妹情谊”对母亲特质的解构和塑造与这一乌托邦小说中呈现的共同体问题相辅相成，其游离于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性揭开了吉尔曼杂糅的共同体迷思。

**关键词：**《她乡》；共同体与社会；神话/迷思；姐妹情谊；母亲

## “In the Name of Sisterhood”: Approaching the Hybrid Myth of Community in *Herland*

Gu Fa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As a masterpiece of American feminist utopian literature, *Herland*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or its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in deconstructing femininity and dismantl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therhood, but little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sisterhood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and supportive of motherhood. As an important polymer among mothers, sisterhood is both a key to shaping natural motherhood as well as the organic community and an accomplice to the social apparatus exerting control over motherhood. Born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eparate Sphere” which is exemplified by the politics of gendered space, sisterhood consolidates an isolated country that can only operate through maternal thinking. The role of sisterhood in (de)constructing motherhood works in harmony with the question of community pondered in the novel. Its complex wandering between community and society unravels the hybrid myth of Gilman's community.

**Keywords:** *Herland*; community and society; myth; sisterhood; motherhood

### 引言

随着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兴起，沉寂多时的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和她最为人熟知的作品《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一样，其乌托邦小说《她乡》(*Herland*, 1915)作为同时期宣示女性主义观念及诉求的代表作，频频出现于当代美国大学课堂中。小说透过三名男子的视角，讨论“她乡”<sup>①</sup>在服饰、劳动、育儿、环境等方面的改革，为构想一种不同于父权秩序主导的现实提供了新的可能。学界多将目光置于吉尔曼如何利用“达尔文主义中有关生物——社会变化的观念来支持其对女性角色及责任的改革以及对女性未来诸多可能性的设想”<sup>①</sup>，并对小说中的母职乌托邦做出了详细论述，指出吉尔曼“认同母职的崇高性，同时提出必须改革社会环境，以便解决女性‘做母亲’和‘做人’的传统冲突，让女性充分发挥社会潜能”<sup>②</sup>。诸如此类研究要么着重考量吉尔曼对母亲形象的反思与修正，要

么将“她乡”作为一个理想共同体（乌托邦）来探索其优越性。他们聚焦的是共同体作为整体的呈现或共同体中个体的变化。但著名的共同体研究学者南希（Jean-Luc Nancy）恰恰反驳了此举。南希认为，个体仅仅是共同体瓦解之后的残余，其不可再分的原子性决定了单靠个体无法形成一个世界。他指出，“共同体至少是‘个体’的‘微偏’（clinamen）”，即“有[原子之间的]倾斜或倾向”<sup>[3]</sup>。“微偏”指向某种将个体聚集起来以构成共同生活形态的隐秘联结，是一种隐于言行背后、游离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保障了共同体的运作。尽管南希将这种关系推向了“人之有限性”的极端，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却借助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法将南希所谓的“微偏”阐释为一种有机关系。他指出：“共同体是持久的、真实共同生活，社会却只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与此对应，共同体本身应当被理解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社会则应当被视作一个机械的集合体和人为的制品”<sup>[4]</sup>。滕尼斯暗示，共同体中存在某些机械、人为聚合的“社会”背后所不存在之物，这让共同体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南希则用“神话”（myth）的概念为这种有机关系做出话语层面的注解。他指出，神话“隶属起源，也来自起源，它能回溯到一个神话的根基，正是经由这种关联，它方通过（某种意识、某民族、某种叙事）得以建立”<sup>[5]</sup>。神话是共同体得以运作的本体论基础，因为共同体神话书写了共同体中的独体能够共享的故事，形塑了他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指射了共同体中的共同观念、信仰或叙事从何而来。滕尼斯与南希对共同体的思考都将重心置于代表“关系”的“微偏”，旨在厘清个体间如何建立关联、建立了怎样的关联、这些关联如何影响共同体等问题。与此同时，南希又提出了“神话即迷思”（myth is a myth）的辩证，强调“神话”无论是作为奠基之物或共同体根基，都“不过是一个虚构物，一种简单的发明”<sup>[6]</sup>。南希对神话的解构旨在强调共同体的建构性，神话不是自然生成之物，而是神话讲述者的手笔。换言之，南希一面指出神话对共同体运作的重要性，一面强调神话本身的建构性可能中断共同体的运作，这在挑战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二分法之余，更凸显了共同体表现为共同生活这一形态时内部的复杂性。当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看作人类生活的不同阶段时，南希则通过神话将有机关系及其建构性视为共同体这枚硬币的两面，暗示着共同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囊括了更为复杂多元的关系。南希与滕尼斯对共同体的关照不仅为探索《她乡》的共同体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将代表关系、观念、情感的“微偏”纳入考察范畴，更有助于挖掘这一共同体在天然环境中的有机生成与文化层面的建构性，从而进一步审视吉尔曼共同体构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论及代表个体之“微偏”的关系，就无法忽视《她乡》中一个与母亲形象如影随形的概念：“姐妹情谊”。这一概念在过往研究中鲜有提及，但却密集参与了对颇富改革力量的母亲身份的形塑。事实上，小说每每提及母亲身份的构成，如母性（maternity）、母爱等要素，都势必提及姐妹情谊。在女性互助、互信、共同生活的表象下，姐妹情谊在小说中具备丰富的内涵。基于亲缘关系自然形成的姐妹情谊是共同体有机关系的内核，与国家人口计划共谋、操控母亲生育本能的姐妹情谊转化为一种规训力量参与共同体的权力话语建构，诞生于特定历史语境、具备孤立主义倾向的姐妹情谊推进了共同体改革也暴露其局限性。姐妹情谊所代表的正是共同体问题中令人兴奋的“微偏”，聚焦其在“她乡”的运作机制，挖掘其多元内涵，方能洞悉《她乡》的共同体问题。本文围绕姐妹情谊如何借助复杂的母亲形象对共同体进行构想与审思这一问题，力图提炼出姐妹情谊对母亲与共同体运作的成全、控制与催化作用，并考察其角色对母亲与共同体的影响。

## 1. 姐妹情谊的成全：自然母亲与有机共同体

三名男子探访“她乡”的旅程宛若寻访桃花源，他们翻山越岭，经一度春秋，终于到达那个传说中的神秘地带。这出寻访记暗示男子将要记录一场去往新世界的“解域”之旅，他们首先面对的便是母亲形象的转变。如一众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她乡”女性的内外着装都与维多利亚时期困于家庭生活的母亲形象大相径庭。她们个个“短发，脱帽，宽松的衣物泛着光泽；一套轻便结实的装束，束身衣，及膝短裤，打着绑腿”<sup>[5]</sup>。她们“矫健、轻盈而敏捷”，有着“渔妇和市场女人的力量，却不似那般粗糙笨重”，具有“大学教授、教师和作家等职业女性的智慧，却不比她们局促紧张”<sup>[6]</sup>。这一崭新的母亲形象正是女性摆脱维多利亚时期制度化母职的结果。她们无须再扮演家庭天使，也不必消费特定衣着以塑造取悦男性的女性气质。劳动重塑了她们的身分，赋予她们主奴辩证式的奴隶的自由。着装要义在于顺应女性生理条件，让她们在劳作中保持舒适

健康。当男子控诉她们不自然时,吉尔曼反而以这样的母亲形象颠覆自然的定义。如赫达克所说,自然的母亲形象“加强了母亲身上为‘人’的部分,淡化了社会规定的为‘母’的责任,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其‘人先于性别’的观念”<sup>[6]</sup>。

但吉尔曼的野心显然不止于仅仅将母亲还原为“自然的人”。在康奈尔看来,“吉尔曼的乌托邦愿景源于其对自由主义影响之下的社会状况的不满,<sup>[因为]</sup>在她看来,一个社会如若建立在无制约的个人主义之上,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sup>[7]</sup>。自然母亲所呈现的仅仅是“她乡”最显著的变化,但吉尔曼真正关心的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社群之间怎样形成不仅仅依靠个人主义支配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成就真正的共同体。于是在《她乡》中,除却母亲这种个体与“她乡”这一社群,还存在另一链接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群的要素——姐妹情谊。小说开篇即指出,姐妹情谊是“她乡”母亲之间独有的情感结构,因为叙述者范抱怨道:“有母亲的地方就找不到姐妹情——几乎找不到。”<sup>[8]</sup>在范的生活环境中,母亲身份与姐妹情谊水火不容,婚姻意味着将别人的姐妹锻造为一个家庭的母亲,从此她需要驯顺、谦卑、勤劳、无私地为家庭服务,告别与姐妹欢聚的少女时光。而在“她乡”,母亲身份却与姐妹情谊桴鼓相应。姐妹情谊绵延于女性的个体经验中,既构成了母亲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以一种民族的、社会的、难以理解的广博的爱将“她乡”的母亲紧密相连。而在三名男子踏足“她乡”即感受到的“和谐共存”的初印象中,姐妹情谊首先代表了一种兼具的亲缘、地缘与精神内核的主体间性,成全了自然母亲与有机共同体枝叶相持的局面。

滕尼斯指出,社会是“机械的”,而共同体却是“有机”的,因为社会中的个体遵从基于利益交换而形成的契约关系,但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间的关系源于本能、习惯、记忆等,是基于亲缘、地缘、精神的天然聚合物<sup>[4]</sup>。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讨论英国旧日乡村境况时更形象地描摹了这种关系。他指出:“在一些地方,有效的共同体(一个地方性的社群)仍然存在;在那里,小贩、佃户、手艺人 and 劳工首先成功地成为了邻居,而社会阶层只是次要的。”<sup>[8]</sup>由姐妹情谊凝结而成的“她乡”便是这一有机共同体的写照。“她乡”的建立和发展都得益于“姐妹”这一亲缘关系。这个民族的母亲生育下五个女儿,五个女儿又各生育五个女儿,女儿之间凝结起“神圣的姐妹情”<sup>[5]</sup>。她乡的人口由此呈指数增长,成为一个民族,姐妹们聚众而居建立文明。姐妹情谊的本质是爱,是一种“一种难以把握的、广泛的团结;一种民族的、种族的、人类的情感”<sup>[5]</sup>。这种爱不仅源自亲情,也涵盖了威廉斯笔下的邻里关系:“这里没有战争。她们没有国王,没有牧师,也没有贵族。她们是姐妹,当她们成长时她们便一起成长——她们不靠竞争而成长,她们在团结的行动中成长起来。”<sup>[5]</sup>“姐妹情”超越了社会阶级,遮蔽了社会中成王败寇的竞争,以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在“她乡”绵延。无论出于亲人间的天然情感,或是朝夕相处的习惯,亦或与日俱增的集体记忆,“她乡”的个体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聚合起来,比邻而居。

姐妹情谊所代表的有机关系不仅局限于亲人们和谐共存的表象,还具有核心价值,滕尼斯称之为“共同领会”。他将“共同领会”视为“一个共同体特有的意志”,一种“相互一致的、结合到一起的信念”,“一种特殊的社群力”和“一种相同的感受”<sup>[4]</sup>。“共同领会”强调通过相互理解、彼此影响而建立情与理的同一性,从而形成不言自明的默契。米勒(J. Hillis Miller)试图以“令人愉悦的主体间性”一词说明共同体中的个体如何形成这种共同领会,他强调共同体中的个体都“共享决定其定位的风俗与信仰”<sup>[9]</sup>,因此个体身份的形塑完全取决于共同体的意志与文化。在“她乡”中,姐妹是“我们”的代名词,姐妹情谊在“她乡”的运作恰恰展现了共同体对个体身份的形塑:“她们几乎缺乏个人的骄傲,总是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她们不会想要给孩子一个姓氏,因为孩子出生之后并非私人的产品;总而言之,“要让她们变得个人化是非常困难的”<sup>[5]</sup>。作为一种“民族的、种族的、人类的情感”,姐妹情谊消解了个体与社群的边界。“她乡”不存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冲突,姐妹们个个都从集体出发思考问题。正因如此,她们方能互相影响,相互渗透,形成共同领会。她乡最令人不解且最具进步性的集体育儿制度便是共同领会悄然运作的结果。在这里,育儿并非母亲的天职,相反的,这是一种如“牙医”一般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遵从优胜劣汰的竞争上岗制。男子对这一育儿模式颇为不解,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强行将母女分离,无法让竞争失败又希望做母亲的女孩得偿所愿。但她乡的女性坚持认为,这并非什么剥夺,她们放心将自己的孩子交由她人照顾,并为“孩子能得到最高级的教育倍感高兴”<sup>[5]</sup>。这种在局外人眼中可能引发剧烈争端的行为,在她乡却变得理所当然,因为她们是姐妹,那是她们共同的孩子。

姐妹情谊所蕴含的共同领会促使她们积极将集体规则内化为自身意志。集体规则就是主体间性，个人的主体性也诞生于此。集体育儿制度是姐妹情谊作为共同体精神内核的体现：个体之间天然的情感为形成共同领会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不言自明的默契使得集体育儿制度成为可能，从而将母亲从制度化母职中解放出来。

在“她乡”营造的和谐共存的初印象中，以姐妹情谊为名的聚合物成为了将母亲还原为“自然人”的必要前提和将“她乡”形塑为有机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它以其天然的情感属性、根深蒂固的亲缘与地缘关系以及构筑共同领会的精神内核重构了独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让二者呈现出水乳交融的相互性，谱写了有机共同体的神话。但随着三名男子对“她乡”观察的进一步深入，象征有机关系的姐妹情谊在参与“她乡”生育规则的运作时被授予了隐晦的权力。受到“为了孩子”的理念影响，姐妹情谊在不知不觉间操控了母亲身份的归属，修改其内涵，赋予有机共同体与“社会”共享的机械性。

## 2. 姐妹情谊的控制：母性与生育规则的冲突

表面看来，姐妹情谊作为一种有机的社会关系，是母亲回归为自然人的重要保障。但面对母性与生育规则的冲突，姐妹情谊却借母爱之名确立了规约母性的合法地位。母性在“她乡”代表生育的欲望，而生育情况决定了她乡作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稳定性。欲望可以自由流动，不受控制，国家的前景却必须遵循既定的发展轨迹，尽量可控。在重新界定母性与母爱的过程中，姐妹情谊从共同体的天然纽带转变为国家生育规则的同谋。

“她乡”公民的核心身份是母亲。她们频频提及母性与母爱是母亲身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母性与母爱的关系却并不明朗。母性被视为母亲身份的核心：“母亲身份，是的，那是母性，去生育孩子。”<sup>[5]</sup>生育孩子的欲望和经历被“她乡”的女性奉若珍宝。对她们而言，母性是“极致的喜悦，最高的荣耀，是最亲密、最私人也最珍贵的东西”<sup>[5]</sup>。然而，母性所代表的天性只是母爱的一部分，因为对她乡的个体而言，母爱“不是一种野蛮的热情，不仅仅是一种天性，一种私人情感，而是——宗教，它包含了无限的姐妹情谊”<sup>[5]</sup>。这一囊括了“母性”与“姐妹情谊”的母爱颠覆了社会生活中私密的母女情，转而被注入了象征宗教的信仰体系。在集体育儿制度中，姐妹情谊暗含的共同领会促成了母职社会化与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但涉及国家生育计划时，宗教式的姐妹情谊却迫使母亲做出选择与牺牲。当她乡人口膨胀，急需限时时，一部分妇女需要通过控制母性主动弃绝母亲身份：

生育之前有一段极喜状态——那段日子整个人都极想要个孩子。我们学会了以极谨慎的态度面对那一时期。那些尚未做母亲的年轻女子自愿将这段时期推迟。当心中涌起那种急需孩子的情感，她们便全身心投入到积极的工作中，尤其是投入到最重要的直接照顾孩子的工作中，便可平复那种渴望。<sup>[5]</sup>

这番解释本是为了阐明母爱能够跨越私人范畴，找到多样的表达渠道，却揭露了姐妹情谊与母性的对峙局面。考虑到国家的生育大局，获得孩子前夕的极度喜悦（母性）需要被控制，被转移，尤其是转移到照顾孩子的工作中。但如上文所述，母职作为一种专业技术，采用竞争上岗制，因而暂时弃绝母性的母亲若不具备照料孩子的资格，便无法投入照顾孩子的工作，她们的私人情感和欲望都缺乏表达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同气连枝的母性与姐妹情谊间展开了零和博弈，迫使母亲在两种情感中做出抉择。她们自愿牺牲了私人化的母性经验，将其让渡给代表共同体意志的姐妹情谊。在滕尼斯看来，这种以选择为基础的让渡过程正是抉择意志作用的结果，他称其为思虑。不同于共同体高度同质化的本质意志，思虑为社会实现某些特定目标奠定了基础。思虑的前提是面对“两种本性上敌对的观念”<sup>[4]</sup>，它们往往表现为目标达成的喜悦与手段实施过程的痛苦。思虑意味着权衡利弊：“只要意愿着的乐趣显得足够重大，这其中所遭受到的牺牲得到了补偿，那么这样的设定就是有必要的”<sup>[4]</sup>。在“她乡”中，国家的生育规则将母性与姐妹情谊转化成两种对抗性特质。姐妹情谊与生育规则合流，共同促成共同体实现控制人口的宏愿，同时又理所当然地对母性实施操控，以爱之名让弃绝母性又无法参与育儿工作的母亲噤声。尽管小说强调，弃绝母性是母亲的自愿行为，但这份自愿背后是为实现人口计划的目标而选择承担剥夺母性之痛的思虑，它不再与有机的共同体意志天然契合，而是权衡利弊的社会行为。由此，姐妹情谊从天然粘合剂转变为规训母性的“社会机器”<sup>②</sup>，而滕尼斯用以区别“共同体”的“社会”形态也在姐妹

情谊内涵的转变中与“她乡”这一共同体合二为一。

随着被冠以“母爱”之名的姐妹情谊逐渐实现对母性的合法操控，她乡逐渐陷入了一种滑坡谬误。在一切“为了孩子”这一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母性被完全裹挟到择优保优的意识形态中，母亲身份不取决于主体的选择，转而由集体的评估决定。小说毫不吝啬地歌颂她乡孩童的优越性。她们的孩子聪明、好学、性格温良，连叙述者范也忍不住夸赞道：“将她乡的孩子与我国的普通孩子相比就如同将培育得最好，开得最盛的玫瑰与杂草比较一般”<sup>[5]</sup>。孩子的优越性有赖教育，但更无法摆脱基因的决定性作用。优秀的孩子们都有最好的母亲，一旦有女子表现出不好的品质，她们便劝服她放弃母亲身份。“她乡”历史发展六百年来刚出现一例罪犯，她们便立刻剥夺了这个女孩的生育权，旨在“将最低档的人种铲除”<sup>[6]</sup>。更为奇幻的是，品德最恶劣的女子碰巧没有生育能力。珀西将此举认定为吉尔曼应对其时移民景观所采取的保守政策，指出优秀是纯种的隐喻，保留纯种的制度映射了同时期美国社会面对经济增长、都市扩张、移民涌入的繁盛景观，担心安格鲁—撒克逊血统将遭到玷污的焦虑<sup>[11]</sup>。赛特勒也指出这一复兴叙事“旨在解决秋风未动蝉先觉的现代性衰颓”，因此需要“保障白人女性在文化进化中的核心地位”<sup>[12]</sup>。基于此白人至上的优生学劣迹，吉尔曼进一步强调了“母亲”的生育功能对提高民族优越性的积极影响。早在其非小说《他和她的宗教中》（*His Religion and Hers*, 1923）中，吉尔曼便提到母亲对净化种族的积极作用：“种族羸弱了吗？她能让其强壮。种族愚笨了吗？她能让其聪颖。世间多灾难吗？她让其清明。仰仗其母亲身份，她能将所有她希求的品质扩散到整个种族中”<sup>[13]</sup>。换言之，母亲的生育功能不再受制于个人欲望，转而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隐喻。生育宛如机械复制，复制最优秀的品质，复制最高贵的人种。更重要的是，这种复制一边延续了女性之间天然的姐妹情谊，一面巩固了姐妹情谊所支撑的“择优保优”体制。姐妹情谊戴着主体间性的面具，让母亲们铭记她们拥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可以去爱，从而忘却自己的生育功能已经被工具化的事实。她们以共同领会做伪装，屏障了母亲作为个体在“择优保优”这种权力话语之下的牺牲。是否生育，是否成为母亲不再，也不可能再是母亲个人选择的结果。在确保人口数量稳定性和儿童优越性的生育计划面前，姐妹情谊彻底辖制了母性的自治权。

在姐妹情谊的包装下，“她乡”悄然完成了制度性话语的替换，从育儿问题中挣脱母职束缚的母亲再度落入了生育规则的钳制。以“姐妹情谊”冠名的有机粘合剂化身为国家生育规则的同谋，循序渐进地对母性实施了彻底操控。随着姐妹情谊显露出其扮演社会机器的角色，“她乡”的共同体图景遭到“社会”的入侵，有机的共同体神话糅合了社会的机械属性。有趣的是，这一兼具共同体与社会属性的姐妹情谊不仅撑持了吉尔曼的乌托邦愿景，还引申出了一种具体的合作生活模式。这种生活能否成为可供借鉴的共同体实践呢？这需要考察姐妹情谊的历史土壤。

### 3. 姐妹情谊的催化：母性思维与隔离空间的相互借鉴

她乡所呈现的合作生活模式在吉尔曼时代就已经赢得共鸣，不少地区出现了合作生活的共同体实践，赫利孔之家殖民地（*Helicon Home colony*）就是一例<sup>[14]</sup>。无论时人或后人，都相信这样的合作生活是打破隔离空间（*Separate Spheres*）的典范。吉尔曼构想“她乡”这一共同体的目的也在于此。姐妹情谊催生出的集体育儿模式与计划生育观念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女性从“隔离空间”所设定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但诚如《她乡》所呈现的那样，姐妹情谊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利用母性思维激进对抗“隔离空间”的同时，也因其孤立主义倾向画地为牢，将“她乡”打造为只属于母亲的隔离的空间。

吉尔曼个人就是隔离空间的受害者。这种基于性别差异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空间政治重挫了已婚女性继续成长的可能性。成婚后的吉尔曼被困于家中，女儿的出生更是斩断了她与外界社会的直接联系，失去自由创作空间的吉尔曼最终精神崩溃。在她的非小说《家庭：运作与影响》（*The Home: Its Works and Influence*, 1903）中，吉尔曼将家庭比作吸血鬼来描摹19世纪已婚妇女的普遍经历：“家庭远没有那么美好，它是那般负累神经，那般麻木心灵。家庭生活意味着照料、劳动和失望，仿佛一个静默不为人知的漩涡，偷偷吸干青春、美貌与热情，吸干男人日复一日的劳动和女人旷日持久的爱。”<sup>[15]</sup>吉尔曼认为，隔离空间制度下的家庭模式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家庭理应是让人放松、休息的舒适空间，却由于严格的社会分工降格为吞噬生命力的恐怖监狱。唯有破除以性别决定劳动分工的制度，方能想象一种良性的家庭关系，成就健康的

社会。“她乡”便是打破隔离空间的社会实践。姐妹情谊的有机关系与制度属性激励并保障母亲们将原本只能在家庭中施展的才能运用于公众事务，相信如此方能构筑更美好的社会。但“姐妹情谊”并非吉尔曼的想象物，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并与吉尔曼一直主张打破的历史桎梏——隔离空间——密切相关。

诚如诸多学者指出，在“隔离空间”的历史背景下，女性对其性别空间的感知往往是形成姐妹情谊的前提。罗森伯格通过研究 18 到 19 世纪家庭妇女的日记指出，“隔离空间”这一制度迫使家庭妇女互相分担怀孕、生儿育儿等情感负担，从而加强了女性间生理与心理上的亲近感，因而女性之间的忠诚和姐妹情谊变得格外重要<sup>[16]</sup>。科特在其专著《女性的缔结》(The Bonds of Womanhood) 中考察了 19 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女性空间行为守则”后指出，当时公共空间没有女性的位置，教堂等公益组织便成为她们与共同体唯一的联结，这些组织为女性建立起“通过女性友谊实现情感表达并获得安全感的范式”<sup>[17]</sup>。因此，“隔离空间”制度从某种意义上为姐妹情谊的生成书写了另一类历史。姐妹情谊源自弱者之间私密的联盟，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独属于妇女的情感经验。吉尔曼个人的经历也是“隔离空间——姐妹情谊”之间逻辑关系的映射。她与许多女伴保持着终身友谊，她们彼此间的支持、鼓励与情感帮助她度过了婚后最难熬的岁月。离异之后，吉尔曼更是积极组建并加入女性俱乐部，还在诸多场合发表演讲强调女性美德的社会功用<sup>[18]</sup>。但无论是与女性友人的私密通信，还是她频繁现身的女性俱乐部，都如隔离空间的家庭一般，彻底排除了男性进入的可能。诞生于隔离空间的姐妹情谊一开始就与孤立主义相伴相生，“她乡”也没有逃脱这一前提。这个乌托邦建立的前提是男性灭亡、与世隔绝、女性被迫隔离于孤立的空间。直到故事结尾，深入了解她乡的男性依旧是这里的他者。在他们离开之时，理想国的主人公们也保留了桃花源不足为外人道的立场，因为她们“不愿暴露自己的国家，不愿与外界交流”<sup>[5]</sup>。

在“她乡”这个孤立的国家中，姐妹情谊不仅展现出强大的聚合能力，还最大限度促成母亲们发挥其天性中的优势。与社会对女性群体的想象不同，《她乡》所呈现的姐妹景观中没有妒忌与竞争，不存在尔虞我诈，姐妹们团结一致为更高的理想——“美、健康、能力、智识、善”<sup>[5]</sup>——而奋斗。这样能量巨大的姐妹情谊本身就是依据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 构筑和平政治的体现。拉迪克(Sara Ruddick) 将母性思维概括为女性从育儿劳动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的一套“关怀理性”，其所崇尚的克己、抵抗、和解、调停的“非暴力行动主义”(nonviolent activism) 观念彰显了母亲保护世界，维护世界、修复世界的态度，因而有助于构建和平政治<sup>[19]</sup>。有趣的是，拉迪克提出“母性思维”这一概念的起点是修正诸如“母亲是局外人或受害者”、“母亲的事务就是照料生命”之类的本质主义假设<sup>[19]</sup>。她将“母性思维”视为可通过教育传授的技能，故而男性也可通过学习将“母性思维”应用于生活实践中。但经由姐妹情谊催化而成的和谐社会却假定母性思维是隶属于母亲的本质。在男性尚存时，她乡是充斥着战争、掠夺和压迫的双性世界。而当男性全部在战争中丧生后，女性很快便对“诸神之间的战争和掠夺失去了兴趣”<sup>[5]</sup>。仿佛只有将女性的天性用于国家治理之时，国家才能呈现出和平的政治局面。这种隶属于母亲本质的非暴力思想在个体与自然的关系中更为明显：“所有食物都取自种子、蛋及其副产品，皆是自然之母的果实。因为母亲她们方能出生，也依赖母亲她们才能生存——生活对她们而言，就是一场围绕母亲的循环。”<sup>[5]</sup>自然之母与人类之母一脉相承，个体与生存环境休戚与共。仿佛只有这样的“母性泛神主义”方能成就平静宁和的生存环境。她乡超乎寻常的洁净有序是女性卓越的家务能力在国家管理中得以施展的结果。而在她乡听不到一丝啼哭，则是因为独属于女性的关怀理性在这里发挥作用。如豪斯曼所说，“吉尔曼并非像大多数批评家所预想的那样讨论性别的建构问题，而仅仅讨论性本身的差异”<sup>[1]</sup>。“她乡”修改了拉迪克对于“母性思维”的寄望，在这里“母性思维”不再是性别建构问题中可习得的技能，而是隶属于女性的固有特质。将“母性思维”与女性天性绑定无疑落入了本质论的窠臼，这一令人心驰神往的乌托邦变成了只有母亲可以拥抱的天堂。

隔离空间在促成姐妹联合的同时也为这种联合涂抹上孤立主义色彩。在姐妹情谊的催化下，依据母性思维构筑和平政治的理念与隔离空间的孤立主义倾向相互借鉴，一面将“她乡”建构为“家”的避难所，赋予了女性之国无限的生命力与可能性，同时又以其孤立主义姿态巩固了社会对母亲的想象，将这个女儿国打造为与世隔绝的另一个家。姐妹情谊着力催化的共同体神话被困于孤立主义与本质主义的迷思中，难以为真实生活所效仿。

## 4. 结语

《她乡》的结尾提供了一个微妙的反讽：尽管小说中刻画的女性形象和国家面貌与当时的社会大相径庭，但小说中女性社群运作的效果却恰如现实世界对女性最初的想象，是一个“平静、和谐的姐妹团”<sup>[6]</sup>。这一细节回应了南希“神话即迷思”的观点。纵使“她乡”致力于书写一种有别于当时社会风貌的有机共同体神话，对她乡女性的想象却也嵌套于外界所建构的关于女性性格特质的迷思中。而贯穿于“她乡”共同体建构过程的姐妹情谊也以其混杂有机关系与社会机器的属性、支持母亲又控制母亲的能量、打破隔离又制造孤立的特质将吉尔曼的共同体神话改写为一种杂糅的共同体迷思。在这一过程中，有天然情感与机械规则的调和，平等理想与优生实践的并行，激进政治与保守观念的共存。姐妹情谊作为个体之间的微偏，在构筑共同体的过程中呈现出其聚合的粘性与改革的能量，却也在将共同体神话改写为迷思的过程中展现了这种聚合可能存在的危险及局限。作为一个世纪前的思想实验，这一杂糅的共同体迷思在20世纪至今的女性运动中屡屡重现：无论是女性平权运动中对有色人种与工人阶级的歧视，还是倡导身体自主与身份认同的解放过程中因性取向与文化差异带来的内部分歧，或是当今跨国女权强调多样性与多元背景下重构的“独立女性”气质，都呈现出团结与排他，赋权与规训交织的图景。这不仅解释了女性共同体内部固有的矛盾与局限，也反映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总是需要与既定权力话语斗争的困境。《她乡》杂糅的共同体迷思提醒我们，应当警惕共同体理想背后的规训话语及排他性，呼吁我们以更具批判眼光和更开放的想象推进女性团结解放的事业。

### 注释

① 小说名《她乡》与小说中构建的国家实体“她乡”(Herland)同名，下文以“她乡”指代小说中描绘的女儿国实体。

② 福柯将机器定义为“一套极度同质化的设备，包括话语、机构、建筑形式、规律性决定、法律、行政手段、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立场”<sup>[10]</sup>等。概言之，社会机器旨在通过无处不在的价值和政治机构控制人的思想行动。体制是社会机器的显形表达。

### 参考文献：

- [1] Hausman, Bernice L. Sex Before Gender: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the Evolutionary Paradigm of Utopia [J]. *Feminist Studies*, 1998, 24 (3): 488-510.
- [2] 曾桂娥. 乌托邦的女性想像：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小说研究[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 [3] Nancy, Jean-Luc.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M]. Peter Connor, et al., trans & ed. Minneapolis and Oxford: Minnesota UP, 1991.
- [4]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张巍卓,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5]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Herland* [M]//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The Yellow Wall-Paper, Herland, and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9: 1-146.
- [6] Hudak, Jennifer. The ‘Social Inventor’: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the (Re) Production of Perfection [J]. *Women’s Studies*, 2003, 32: 455-477.
- [7] Connell, Jeanne M.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An Examination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Utopian Vision [J].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5, 70 (4):19-33.
- [8]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M]. New York: Oxford UP, 1973.
- [9] Miller, J. Hillis. *Communities in Fiction*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0] Miller, J. Hillis.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11] Persey, Thomas. *Utopia & Cosmopolis: 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M]. Durham & London: Duke UP, 1998.
- [12] Seidler, Dana. Unnatural Selection: Mothers, Eugenic Feminism, an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Regeneration Narratives [J]. *American Quarterly*, 2003, 55(1):61-88.
- [13]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His Religion and Hers: A Study of the Faith of Our Fathers and the Work of Our Mothers* [M]. New York and London: Century Co, 1923.

- [14] Kaplan, Lawrence. A Utopia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Helicon Home Colony 1906-1907 [J]. American Studies, 1984, 25 (2): 59-73.
- [15]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The Home: Its Work and Influence [M]. New York: McClure, Phillips & Co, 1903.
- [16] 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7] Cott, Nancy F.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 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 [M]. New Haven: Yale UP, 1977
- [18] Hobbs, Amy. “The Women Woke Up” : Women’ s Clubs’ Progressive Rhetoric in Gilman’ s Early Utopian Novels [J]. Critic, 2008, 70(2): 31-45.
- [19] Ruddick, Sara.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校对：金宇恒 排版：袁骁)

# 战争、表演与性别：女性视角下《一把青》的创伤书写与叙事重构

毕博<sup>1\*</sup>，韩星晨<sup>1</sup>

(<sup>1</sup>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一把青》改编自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于2016年斩获了第51届中国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和第21届亚洲电视大奖多个奖项，该剧突破了传统战争剧的英雄主义叙事模式，借助女性视角铺陈战争风云和历史变化，为观众呈现了独特的战争生活画卷。本研究以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展演”理论和潘祥辉“以女为媒”的传播视角为框架，以剧中空军太太、遗眷等多位战场外的女性角色为研究对象，探究她们在战争大背景下、远离硝烟处的生存样态，进而拓宽大众洞察战争对个体冲击及社会影响的全新视角。研究表明，在战争语境中面临结构性压迫与个体化抵抗的女性是展现战争如何将个人变成暴力系统的囚徒的有力样本；在战争叙事中，创作者和研究者也可以从历史的褶皱处，以微观视角叩问时代伤痕，使得英雄背后承担“哀悼劳动”的女性完成从不可见到可见、从被述到自述的话语跃迁。

**关键词：**战争片；女性视角；叙事策略；《一把青》

## War, Performance, and Gender: Trauma Writing and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in “A Touch of Green” from The Female Perspective

Bi Bo<sup>1\*</sup>, Han Xingche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A Touch of Green is adapted from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Taipei People by Pai Hsien-yung, a writer from Taiwan, China. In 2016, it won multiple awards at the 51st Golden Bell Awards (Taiwan Region, China) and the 21st Asian Television Award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heroic narrative mode of traditional war dramas, the drama unfolds the turbulence of war and historical changes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presenting audiences with a unique panorama of life amid war. Taking Judith Butler's "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ory and Pan Xianghui's "female-as-medium"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focuses on multiple female characters outside the battlefield in the drama, such as the wives of air force officers and the families of the deceased. It explores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context of war, far from the smoke of battle, thereby expan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public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war on individuals and its social implica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 the context of war, women who face structural oppression while engaging in individual resistance serve as powerful examples demonstrating how war turns individuals into prisoners of the violent system. In war narratives, creators and researchers can also examine the scars of the era from a micro-perspective, delving into the "folds of history". This process enables women, who undertake the "mourning labor" behind heroes, to achieve a discursive

transition — from invisibility to visibility, and from being the "spoken-about" to becoming the "speakers".

**Keywords:** war film; female perspective; narrative strategy; "A Touch of Green"

## 引言

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人类的政治史是由男性主导的,女性远离政治。但是,女性作为一种“复合媒介”,既可以复制和传播基因信息,也可以复制和传播意识形态,女性其实从来就没有置身于政治之外<sup>[1]</sup>。恩格斯也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要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sup>[2]</sup>。在战争题材影视剧的浩瀚星空中,传统叙事大多围绕男性的英勇、战争的胜负与宏大的历史脉络展开,女性角色常如黯淡星辰,被边缘化且形象单一。对于战争片的研究,大多学者主要着眼于战争的宏观架构,笔墨也更侧重在男性主导的英雄主义叙事层面,主要突出男性角色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与成长历程<sup>[3]</sup>;而对于女性/女性角色展开的相关研究更多围绕在战争与性暴力、女性身体伤害和女性形象的变化等层面。总之,在战争题材剧的研究中,当下仅有的少部分关于战争片中女性角色的研究较为狭隘,对于战场外的女性角色在战争中的叙事功能具有一定的忽视。在全面展现女性与战争文化传承、社会心理塑造等方面,现有研究仍有一定的欠缺。因此,本研究围绕潘祥辉提出的“以女为媒”和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展演”理论,以《一把青》为例深入探究战场外的女性与宏大历史战争片在叙事与角色塑造上的处理方法,进而从战场外的女性在战时面临的困境、作出的牺牲和战后遭受的创伤等维度深入探究女性角色与战争之间的多元关系,进一步揭示女性如何成为战争叙事的关键动力,同时也为战争题材剧的创作与研究开辟新路径、新视野。

## 1. 《一把青》及其对传统战争叙事的颠覆

2015年,改编自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并斩获第51届中国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和第21届亚洲电视大奖多个奖项的电视剧《一把青》,风格独树一帜,将镜头聚焦于战争阴霾下生活在战场外的女性群体,该剧凭借细腻的笔触,以女性自述的方式呈现了一幅波谲云诡的战争画卷。《一把青》围绕朱青、秦芊仪、周玮训等女性角色的命运轨迹,深入探究女性角色在战争题材剧中所承载的叙事功能,为我们重新审视战争题材剧中女性角色的功能与表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潘祥辉曾提出“以女为媒”的观点,他认为女性身体在传统社会中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更是文化传播和政治权力运作的重要媒介<sup>[1]</sup>。在《一把青》的叙事中,空军眷村作为一个微型政治空间,其权力关系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身体的媒介功能。如遗眷交接制度,它印证了潘祥辉所提出的“亲属关系媒介”概念,战时女性既是文化规训的载体,又是权力再生产的工具。朱迪斯·巴特勒曾提出“性别展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她认为性别身份并非与生俱来的本质,而是通过社会规范下的重复表演建构而成的<sup>[4]</sup>。在战争这个暴力场域中,《一把青》以女性视角将性别展演推向了对权力本质的哲学追问,它向我们揭示了战争是如何与父权制共谋,将女性禁锢在特定身份之中,完成了对于战争剧中女性角色的突破性解读和话语颠覆<sup>[5]</sup>。

### 1.1. 边缘视角解构男性中心的战争史诗

《一把青》以战略性的视角位移,将叙事焦点锚定在传统战争叙事中不太常见的“幕后”女性群体——空军遗眷,以女性视角展现了个体在战争洪流中的挣扎、消解与蛰伏,打破了以往战争题材作品中以男性军人为主的局面。导演曹瑞原和编剧黄世鸣在进行影视化改编时,保留了作家白先勇大部分的文学表述与艺术美感,有意识地去叙述“历史的背面”。《一把青》以朱青、秦芊仪等女性角色的日常经验为切口,直接颠覆了以男性军人英雄事迹为核心的“战争史诗”范式。如第一集的片头旁白:“男人的战争打起来都很壮烈,课本里很爱写,你背都背不完。而女人的另一种,女人的战争细水长流,一辈子打不完。”这段旁白巧妙地引导观众从传统战争题材剧中对男性在战争中的关注转移到女性角色身上,将女性角色从宏大叙事中被忽略和遗忘的处境调转,突破性地将女性视角从补充叙事升格为核心叙事<sup>[6]</sup>。

## 1.2. 微观史中的身体政治与抵抗书写

《一把青》的叙事重心不在于“人的历史”，而在于“历史的人”，它关注每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挣扎沉浮的离散个体，在权力规训与个体抵抗的张力中，以史诗性与微观史的交织叙事，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流离命运的深刻诠释。朱青从“纯真的小茶花女”到“痴情的社交女郎”的自我异化过程，将历史灾难具象为个体生命经验，她的沉沦成为对战争暴力最尖锐的控诉。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张力，全方位地展示了女性角色在战争题材剧中的展演张力。正如学者彭小妍所说，战争语境下，女性的个人叙事呈现出平凡升斗小民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伤痛，彻底颠覆了官方历史叙事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战争话语<sup>[7]</sup>。

## 1.3. 女性“未说之语”重构战争创伤叙事

战争叙事的核心是创伤的表达，但传统战争叙事往往聚焦于男性英雄的壮烈牺牲与战场上的直接暴力，女性的战争创伤则被边缘化为“背景”或“补白”<sup>[8]</sup>。《一把青》以女性的“未说之语”将战争创伤还原为性别化的生命经验，开创了创伤表达的新范式，也挑战了战争叙事的男性霸权<sup>[9]</sup>。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曾在《无法言说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中提出，创伤的核心是无法被直接感知的过去对现在的持续入侵，其治愈依赖于叙事的命名，通过语言、表演将隐性的痛苦转化为可理解的经验。《一把青》中女性的创伤恰恰体现为这种无法言说式的展演，剧中女性的创伤没有爆发式展演，而是以日常化的细节、延迟性的流露传递，她们的抵抗没有暴力性，而是以生存性的行为、叙事性的诉说向观众展露。这种处理深化了战争创伤的性别维度，拓宽了创伤叙事的审美边界<sup>[10]</sup>，将“无法言说”转化为“未说之语”，在沉默中完成对战争暴力的批判。正如导演曹瑞原所说：“战争的伤害不是子弹，而是对人的心灵的摧毁。”

# 2. 女性角色与战争关系的立体化呈现

## 2.1. 身份的双重困境：朱青的自我异化与创伤展演

在战争环境中，女性不仅要以“中国人”身份与男性共同面对战争带来的混乱苦痛，还不得不以“女性”的身份面对传统文化在道德层面对自身进行“贞洁”问题的审判<sup>[11]</sup>。《一把青》围绕着女性的“中国人”与“女性”的双重身份展开，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剧中的女性与男性一同承受着战争所引发的种种磨难；作为“女性”又深陷传统文化的道德泥沼，被“贞洁”问题无情地审判着，时刻扮演着环境赋予的“贞洁烈女”的遗眷脚本。在传统观念的禁锢下，朱青失去爱人与孩子后，开始放浪形骸，酗酒、周旋于权贵之间，成为了他人眼中对“贞洁”的亵渎。但实际上，这是她在绝望与无助中对命运的一种无奈抗争，表面是道德堕落，实则是对战后创伤的消极抵抗——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拒绝社会的期待，看似堕落实为一种底层的抵抗武器，以自我物化为代价在夹缝中争取微小的生存空间。这种自我异化的矛盾性也是底层抵抗的典型特征——它不表现为英雄式的抗争，而是在妥协中寻找喘息的可能，在威权体制与经济困顿的双重压迫下，“堕落”成为无声的控诉，体现为对战争非人化逻辑的模仿。这种自我异化的悲剧性在于永远无法逃离社会群体的审判，它们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朱青”一样的遗眷群体紧紧束缚，使她们在追求生存和情感寄托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让她们在战争的创伤之上，又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 2.2. 权利再生产的媒介：周玮训的客体化流转

从历史上看，女性确实往往是战争中的重要资源或战利品，“共享女性”是古代战争的重要动力之一<sup>[1-3]</sup>。而战争中女性/女性的身体一直被作为“客体”和“流通物”，在对垒的男性群体间流通，也就是女人是可以被交换的<sup>[12]</sup>。《一把青》借周玮训的视角揭示了战争环境下漠视个体的集体意识对于女性的隐性压迫。剧中空军眷村内部存在着一种不成文的“传统”，当一位空军军官离世后，其遗眷往往会被托付给军队内的其他男性，在这样约定俗成的漠视个体差异的社会规约下周玮训是“嫁了四次人的周太太”。在战争背景下，空军群体仿佛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男性社会”，在这样的语境下，周玮训的身体与婚姻关系成为维持群体凝聚力的“复合媒介”——既承载着基因延续的生物学功能，更成为传播军人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载体<sup>[1]</sup>。微观层面上，周玮训的婚姻实质上是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媒介化操控”，通过婚姻关系的流转，空军群体完成了对个体命运的规训与再分配。宏观层面，这种流转机制构建了特殊的意识形态传播网络，个体身

份则被消解为群体象征。而这种媒介化过程的悖论性在于，表面上是女性作为资源被“流通”，实则是权力通过女性身体完成对男性群体的整合。每次的婚姻交接也都在强化“军人妻子必须服从群体安排”的隐性规则，最终形成闭环式的权力再生产机制。正如剧中周玮训劝说其他遗眷接受交接安排时所言：“这就是我们的命”，这种自我复制的媒介特性，使得女性在成为被支配对象的同时，又主动成为规约的维护者。

### 2.3. 沉默的牺牲：秦芊仪的哀悼劳动与无声置换

战争从未让女性走开，只是让她们隐形，在传统婚姻与家庭的文化秩序中，往往需要一个女性作为“置换物”将男性在家庭制度中的责任里置换出来，以助力自己去获取更广阔的“家国”话语系统中的主动权<sup>[13]</sup>。在战争创伤的叙事中，男性的创伤常被纳入英雄主义叙事（如牺牲、战斗精神），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而女性的创伤则被私人化、沉默化，成为不被公开言说的“哀悼劳动”。戴锦华指出，女性在战争中的苦难与哀悼往往不被纳入公共话语，而是作为“结构性缺席”存在于政治叙事中，情感表达常被压制为“不可见”的存在，她们的创伤应对行为被限定在家庭或私人空间，成为支撑男性主导的战争叙事与社会秩序的隐性实践<sup>[14]</sup>。这种对女性创伤的私人化、沉默化处理的本质是父权文化与战争语境下性别权力结构的产物<sup>[15]</sup>，最终导致女性创伤被排除在历史记忆之外，从而强化“男性英雄化—女性私人化”的叙事分工。《一把青》借师娘秦芊仪和邵墨婷的口吻撕开了战争叙事的华丽封皮，露出其性别化的血腥衬里，让性别差异和性别压迫赤裸裸地凸显出来<sup>[16]</sup>，将那些被定影为“背景”的女性缓缓浮现。如“后来我才懂，男人的战争打起来壮烈，课本里很爱写，你背都背不完。”“那时候课本上，女人的故事，不重要。”师娘秦芊仪是传统家庭中女性角色的典型代表，她作为空军大队长江伟成的妻子，成为了男性在家庭责任上的“置换物”，为家庭付出一切，让丈夫江伟成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投身于军队，去追求属于男人们的“家国大义”。在战争中，威权体制对女性情感劳动的征用体现为秦芊仪等人的“得体式悲伤”。作为师娘，在丈夫自杀后，秦芊仪困于结构赋予的框架，必须维持“坚强遗眷”的性别脚本，压抑个人情绪以稳定眷村秩序，她始终素净的旗袍、整齐的发型，成为体制要求的贞洁符号，而非自主的情感表达。

## 3. 总结

电视剧《一把青》凭借独树一帜的战争叙事范式，为战争题材剧的创作开辟了全新航道，它通过朱青、秦芊仪、小周等女性个体的视角来呈现战争，让观众从她们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和心理蜕变中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剥离。它以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为战争题材剧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通过细腻的表演和情节的娓娓道来，让观众沉浸在一个别样的战争世界。同时，《一把青》也纠正了传统历史叙事中对战争时期战场外的女性的忽视，让广大“非战士”的女性群体在历史的舞台上得到应有的展现，丰富了历史的呈现维度。《一把青》宛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女性故事于战争题材剧中的熠熠光辉与多元魅力，为该领域创作与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具深度与广度的样本。此外，它也启迪创作者重新审视女性力量，深耕多元表达，以更加细腻、深刻、动人的笔触，烛照人性光辉，铭刻历史记忆，推动战争题材剧在浩瀚海洋中破浪前行，驶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 参考文献：

- [1] 潘祥辉.“秦晋之好”：女性作为媒介及其政治传播功能考[J].国际新闻界,2018,40(01):109-127.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 [3] 陈默.嬗变中的战争英雄塑造——论国产战争剧类型化的形成与演进[J].当代电视,2013,(12):19-20.
- [4]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2.
- [5] 朱旭辉.话语·空间·意象·叙事:战争题材电影的话语生成与创新生产研究[J].电影文学,2024,(23):3.
- [6] 韩元.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红色经典抗战小说及改编影视剧中的妇女与民族国家[J].学术月刊,2019,51(04):139-148+173.

- [7] 彭小妍.认同、族群与女性——台湾文学七十年[J].文艺理论研究,1997,(02):39-44.
- [8] 路春艳,田佳悦.暴力、记忆与疗愈:波黑战争影像中的女性创伤叙事[J].电影评介,2024,(12):27-32.
- [9] 吴静之.叙述声音、叙述聚焦与重塑女性话语权威——再论《战争中没有女性》的视听叙事艺术[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4,35(01):103-112.
- [10] 俞巧珍.凡人故事,时代隐喻——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跨媒介分析[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13(01):132-140.
- [11] 俞巧珍.抗日战争中的女性日常生活:革命、技术与“贞洁”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3,18(03):270-286.
- [12] 贺桂梅.亲密的敌人——《生死谍变》《色·戒》中的性别/国族叙事[J].文艺争鸣,2010,(18):4-11.
- [13] 蒲彦任.浅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妇女解放问题[J].大众文艺,2023,(10):106-108.
- [14] 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J].当代电影,1994,(06):37-45.
- [15] 马宏伟.父权制下“他者”的反抗:维多利亚·希斯洛普战争小说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7:6.
- [16] 汤小丽.《金陵十三钗》的女性主义解读:战争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女性[J].今古文创,2022,(11):19-21.

(校对:吴宗译 排版:袁骁)

# 浅析新黄色新闻对新闻价值的破坏——以 Thurman 猫一杯“巴黎秦朗丢作业”事件为例

刘昕<sup>1\*</sup>

(<sup>1\*</sup>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80)

**摘要:** 新媒体时代下, 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多更广, 短视频凭借其声画结合的特点迅速地成为了大众喜爱的方式之一。但在短视频的“疯狂”传播下, 一方面大众可以迅速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另一方面又给大量“新黄色新闻”的滋生传播提供渠道。网红“Thurman 猫一杯”编造的“巴黎秦朗丢作业”事件正是通过短视频的传播成为网络热点, 后经核查后发现为人为炮制, 极大地消耗了社会公共资源和关注此事件的大众的热情。“新黄色新闻”的泛滥, 不仅损害了媒体机构的权威, 降低了公众的品味, 同时也逐渐消解了新闻的真正价值。本文通过对“猫一杯”事件的分析, 阐述了“新黄色新闻”的表现特点, 从流量、把关意识和公众的喜爱三方面分析“新黄色新闻”的成因, 并指出其泛滥的危害, 最后探究其解决办法, 冀望重塑新闻意义, 恢复因该事件而受到损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关键词:** 猫一杯; 黄色新闻; 新闻价值; 流量

##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struction of News Value by New Yellow Journalism – Taking the Thurman Cat a Cup "Qin Lang's lost homework in Paris" incident as an example

Liu Xi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25,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the ways in which the public accesses information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and widespread. Short videos, with their combination of sound and visuals, have quickl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methods for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However, under the "frenetic" spread of short videos, while the public can swiftly obtain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it also provides a channel for the prolifer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The incident fabricated by the influencer "Thurman Cat a Cup," titled "Qin Lang's lost homework in Paris" gain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rough short video platforms. After investigation, it was revealed to be a fabricated story, which not only wasted social resources but also dampened the public's enthusiasm for the event. The proliferation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not only undermines the authority of media institutions and lowers public taste but also gradually erodes the true value of new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t a Cup" incident to elucid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yellow journalism," examines its causes from three aspects — traffic, gatekeeping awareness, and public preference — highlights the harms of its proliferation, and explores potential solutions, aiming to restore the meaning of news and reestablish

- 131 -

基金项目: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校级课题项目《新媒体时代下新黄色新闻对新闻价值影响研究——以博主“Thurman 猫一杯”2.16 秦朗巴黎丢作业事件为例》(项目编号:2025XKZY13)

作者简介: 刘昕(1997-), 男, 黑龙江哈尔滨, 硕士, 研究方向: 新闻传播学

通信作者: 刘昕, 通信邮箱: 964438441@qq.com

www.shiharr.com

the fairness and authority damaged by this incident.

**Keywords:** Short videos; Cat A Cup; New Yellow Journalism; News Value; Traffic

## 引言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大众接收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广,短视频逐渐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10.40亿<sup>[1]</sup>。但人们获取的信息中,夹杂着大量的无意义甚至虚假的信息来影响人们的判断。在2024年2月16日,博主“Thurman猫一杯”(后称“猫一杯”)的一条“秦朗巴黎丢作业”的视频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多次登上热搜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在该事件持续发酵下,截止到2月19日下午该视频已经有超过500万的点赞。一条视频引得全网寻找秦朗,不仅让众多媒体号频频转发,而且在评论区还有很多网友认领“秦朗”,其中一名ip在江苏的网友自称是秦朗的舅舅,并表示秦朗就读于西场小学的评论更是引得众多网友前来围观。2月20日,央视网发文《“秦朗是谁”不重要,“新黄色新闻”泛滥很危险》,多家重点媒体就此事纷纷下场,将这类具有煽动性、不具备较大社会价值,博人眼球的“新闻”内容定性为“新黄色新闻”,并做出了严肃批评。4月12日,经杭州警方发布消息证实该事件为摆拍,博主“猫一杯”受到行政处罚及全网账号封禁的处罚。截止到2024年4月16日,“猫一杯”事件共吸引包括央广网、法制网等67家重要媒体参与,可见该事件影响力之大。但同时公众又不得不正视,短视频传播中夹杂的“新黄色新闻”带来的巨大危害。

## 1. “新黄色新闻”的前世今生

“新黄色新闻”和百年前的“黄色新闻”在根本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黄色新闻”源自于19世纪末期美国的《世界报》和《新闻报》两大报业竞争事件中。“黄色”指的不是色情,是来源于普利策《世界报》上的一个漫画专栏中一位发型稀疏,没有门牙,穿着黄色大睡衣的男孩。专栏借“黄孩子”的口讲述美国纽约发生的新闻事件,凭借博眼球的内容、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刺激读者的感官,从而获得了更多关注<sup>[2]</sup>。后来,《世界报》和《新闻报》竞争,抢夺以“黄孩子”为主角的连载漫画的作者群,并凭借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大肆策划刺激性报道来争夺受众。彼时著名记者华德曼将两报的新闻报道风格戏称为“黄色新闻”,这个概念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沿用至今<sup>[3]</sup>。

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新黄色新闻”的定义没有统一的共识,但其与“黄色新闻”的基本特征相同、缺少新闻要素、以热度来获取收益等是学者们一致认可的。其中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窦锋昌认为:相比于“新黄色新闻”的概念,“消遣型新闻”用来形容此类“新闻”更为贴切,消遣型新闻包含“新黄色新闻”,由各类网络新媒体为生产主体,主要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精心的包装和设计,给琐碎的新闻事件或生活趣事赋予鲜明的标签或文字,并搭配带有强烈感染力的音乐,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内容<sup>[4]</sup>。由此可见在短视频传播中,“新黄色新闻”延续了“黄色新闻”过度追求夸张和刺激的表现手法,搭配黄色字幕和硕大标题,加上一两句所谓当事人的采访,摇身一变就成了大众生活中最熟悉的一种短视频类型。这类视频质量低下,内容多以虚假、煽情、娱乐为主,同时以趣味性为核心要素,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被不断消融,新闻六要素残缺,甚至很多视频的真实性仍有待考察。而博主“猫一杯”编造的“巴黎秦朗丢作业”事件将有趣的情节和临近春节假期的热门时间点这两要素相结合,编造出了这一事件,虽成功在短时间收获了巨大的流量,但也在不久后收到了相应的惩罚,又何尝不是现在短视频网站上的一个缩影。

## 2. “新黄色新闻”的成因

“新黄色新闻”是“黄色新闻”在新媒体时代下的衍生物,二者虽然没有历史渊源,但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是十分相似的,甚至“新黄色新闻”带来的影响比“黄色新闻”带来的影响更为巨大。在百年前以报纸、广播为主的传统媒体时代,黄色新闻凭借醒目显眼,博人眼球的方式强烈刺激受众的感官,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在新媒体时代下,相比于纸媒的枯燥乏味,短视频传

播中声画结合的方式让信息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同时“新黄色新闻”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新时代特征,因此“新黄色新闻”的成因相较“黄色新闻”也有很大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 2.1. 追求热度,流量至上

“新黄色新闻”同“黄色新闻”一样,虽然出现的时代不同,但是二者均是流量和热度的产物。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晚报、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确立了高度商业化的运营机制,其经营方式和运营理念也主要以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为主。同时近年来的自媒体的发展也使新闻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量的商业信息也随之进入媒体,在此基础下,新闻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然而,生活中每天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数量是有限的,并且凭借新闻时效性的特点,也使得一部分媒体很难在新闻快速独家的报道中占据有利位置,从而逐渐失去读者和受众。在此背景下,部分媒体机构为了重新抢占市场份额、吸引公众,一味地以利润和受众为目的,却忽略内容的社会价值、真实性和可信性,选择容易引发受众关注的关键字眼和时间节点,开始制造和传播“新黄色新闻”,这种“便捷快速”的方式也成为了一部分自媒体参与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此事件中,博主“猫一杯”将丢作业和春节假期这个热点时段相结合制作出了这一个事件。在2月16日发布视频到4月12日被处罚这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秦朗”这个名字一直占据着热度居高不下的位置,不仅仅给博主猫一杯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和曝光度,甚至在其评论区的所谓“秦朗舅舅”也凭借一段给外甥买寒假作业的视频一夜吸粉十余万。在明知道事情是虚假的情况下,两人冒着不惜触犯相关法律的风险仍然将闹剧进行到底,究其原因就是热度和流量带来的高回报。

### 2.2. 把关意识的缺失

“把关”这个概念源自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劳因提出的“把关人”概念。劳因指出群体传播中需要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在传统媒体时代,把关人强调的是专业媒体,也就是传媒机构和专业传媒工作者的把关功能。然而,在新媒体时代下,网络传播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把关人机制。并且,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短视频平台除了专业媒体机构生产内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简称PGC),还出现了大量的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sup>[5]</sup>。此类内容的制作发布都属于个人而非专业媒体机构行为,不仅给平台“把关人”审核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也对自媒体用户的网络素养给予了更高的期望与要求。

在过分追求流量和热度的背景下,一部分专业媒体和自媒体认为流量大于一切,从而不再按照“先核查后发表”的方式来进行把关,导致事后把关和不把关的做法成为常态。同时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海量的信息让把关人的审查压力变得更大,内容发布前层层把关的方式难以应对如此庞大数量的新闻;另一方面随着大量自媒体的加入,新闻报道的权力下放到普通大众,受众不仅能选择看什么新闻,而且能传播想引起人们关注的新闻。在此背景下,发布者把关意识的欠缺也成为“新黄色新闻”泛滥的原因。

而在此事件中,为了所谓的话题和流量,猫一杯和所属公司在视频发布之间并没有做到媒体相关人员应尽的把关责任,而是放任这样的不实新闻肆意在网络中流通,以此来换取高流量和热度。而转载视频的媒体们在转载之前也并没有进行事件的审查,从而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狂欢”。如果猫一杯、所属公司和转载视频的媒体们能尽到自己的把关职责,那这个事件就不会有这么高的热度,也不会有后续的网络资源浪费和行政处罚。

### 2.3. 公众对于娱乐刺激等内容的偏好

1985年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娱乐至死”并认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宗教、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是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sup>[6]</sup>。”在“泛娱乐化”为常态化的现在,大多数的信息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娱乐色彩,而“新黄色新闻”与“黄色新闻”也正是迎合受众娱乐化需求的典型产物。并且在快速消费文化的影响下,现代社会中信息消费的快速化趋势使得大众对于深入、详细的内容产生疲劳和不耐烦的情绪,反而更倾向于获取短小、易读的内容片段。“新黄色新闻”正是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和高娱乐趣味的内容迎

合了这一趋势，更进一步推动了其流行。

人们追求娱乐无可厚非，但是，当新闻被过多包装成了一种供大众消遣和娱乐的形式后，虚假、蒙蔽和夸大就成为了新闻的常态。以猫一杯编造的“巴黎秦朗丢作业”事件为例，一个生活中平平无奇的小事经过互联网的无限传播和放大后，成为了霸占热搜数天的“重大新闻”。现在回看这个事件，其中不乏有很多漏洞：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将在卫生间捡到的物品随意交给博主等。然而，大众关注的重点是失主秦朗是谁，以及后续出现的“秦朗舅舅”真实身份，忽视了隐藏在闹剧后的真相。新闻本该传递事实和真相，但是“新黄色新闻”使得人们离娱乐狂欢越来越近，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最终使得真相反而变成最不重要的一点，这和新闻的意义完全背道而驰。

### 3. “新黄色新闻”的危害

“当时觉得有趣就拍了下来”、“当时感觉挺好玩的，就拍了下来，然后随手发到了网上，没想到第二天就火了”……这些短视频中常出现的话，揭露出了娱乐、猎奇和反常成为了“新黄色新闻”传播的重要因素。同时，因为视频内容大多是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不需要具有什么价值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产出，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 3.1. 解构真实，损害权威

真实性对于新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要素，坚持新闻真实同样也是对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生产者的重要要求。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做到绝对的真实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基于事实进行报道是全世界新闻工作者的共识。脱离了真实，就会使新闻变成谣言和故事。这类“新黄色新闻”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后，吸引一部分媒体和自媒体的转发和持续报道。当这些内容被证实存在不实内容后，会让一部分的受众感受到被欺骗的感觉，并对这些媒体的专业性存在质疑。

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论文对美国大选调查后提出议程设置概念，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功能，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的传达活动会赋予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sup>[7]</sup>。在本次事件的伊始，视频的评论区中有一部分质疑声音。然而一些媒体的相关跟进和自媒体的报道转发，产生了“破窗效应”，使得越来越多的公众丧失警觉性，不自觉地开始相信事件的真实性并进行转发分享<sup>[8]</sup>。在事件被证实是不实新闻后，报道转发过该新闻的媒体和相关账号会让公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自身权威性。

#### 3.2. 内容低俗，降低品味

“新黄色新闻”的首要目标是吸引眼球、获取流量，以此换取广告收入、平台分成或提升影响力指标（如阅读量、播放量、互动数等）。在这样的目的下，社交媒体和新闻聚合平台的算法倾向于推荐能引发强烈情绪反应（尤其是愤怒、惊奇、猎奇、八卦等）和促进用户长时间停留的内容。低俗、夸张、耸人听闻的内容更容易被算法选中并广泛推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在“猫一杯事件”中，部分用户对于事件的真伪并不在意，其关注点在于“西场小学秦朗”和后续出现的“秦朗舅舅”。甚至在猫一杯接受行政处罚和全网封禁后，评论区仍然多次出现诸如：“我一个普通人关心不了国家大事，这种事情看看还能让自己放松一下”“这个处罚是不是太严重了，本来就是为了娱乐粉丝”等评论。可以看到，猫一杯刻意截取事件中最具冲击力或最易引发误解的部分，进行夸张、耸动的概括，制造悬念引发全网接力寻找不存在的“秦朗”。这个事件虽娱乐了部分用户，但是长此以往，这些用户会逐渐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新闻失去关心，从而出现严肃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新闻被边缘化、公共讨论空间被明星八卦、狗血纠纷、低俗猎奇等内容占据的现象。同时此类公众长期接触夸张、煽情、低俗的内容，会提高情绪阈值，导致对真实但平淡的新闻失去兴趣，甚至对真正需要关注的社会悲剧也变得麻木，从而对重要议题的关注度和思考深度会逐渐降低这就导致新闻的社会价值传递意义逐渐被弱化，最后消解殆尽。

#### 3.3. 消解新闻意义

新闻的意义在于对普及信息、文化传递、舆论监管和社会责任与正能量的传递等内容。新闻的根基在于真实,即再精彩的新闻如果脱离了真实性那它就不具有任何意义。然而,“新黄色新闻”以虚构替代调查,让新闻的真实性变得微乎其微。猫一杯团队网购作业本、编造脚本、自导自演“巴黎拾作业”剧情,利用跨国场景制造猎奇感。当网友质疑时,猫一杯以“隐私保护”为由拒绝透露关键信息,仅用厚码聊天截图搪塞,试图将事件强行结束,转移大众视线,使真相沦为“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悬念。

同样的,新闻本应服务公共利益,但新黄色新闻试图通过低俗、娱乐、暴力等内容来获取公众更多的关注,达到以低俗娱乐置换公共性。在猫一杯事件结束后,央视网批评该事件为“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将公共话语场域转化为“作业寻人”的狗血剧场。在这场闹剧中,衍生的“秦朗舅舅”“秦朗老师”等蹭热度账号不约而同在获得热度后开播,试图获取更多利益。这样的情况若不加以干预制止,就会形成寄生性产业链,吞噬社会注意力资源,使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被人们主观和被动地忽略。

## 4. “新黄色新闻”的治理措施

“新黄色新闻”出现的时间虽然还不久,但凭借短视频平台的快速流通性,它所产生的危害远比百年前的黄色新闻要大的多。“新黄色新闻”缺乏新闻应有的价值取向,采用煽情、夸张、虚构的方式进行报道,消解新闻的价值和意义,阻碍普通受众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部分媒体和从业者虽然短时间内会获得大量的关注和流量,但最终会自食恶果,损害自己的媒体公信力,因此对“新黄色新闻”的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 4.1. 从业者坚守新闻专业初心

人们相信媒体,正是因为媒体机构和从业者们的权威性,又或是体现在媒体发布或转发信息的真实性。然而,“新黄色新闻”的出现让媒体机构和相关从业者的权威受到严重冲击,也间接地剥夺了受众的知情权。在流量的巨大诱惑下,部分媒体机构和相关从业者逐渐向“新黄色新闻”靠拢。虽然媒体机构和从业者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进行新闻生产和报道活动并没有问题,追求流量是为了更好地传递信息,这也可无可厚非。但不能被用户牵着鼻子走,从而失去了媒体和从业者最初的新闻专业主义。媒体机构和从业者应适当培养平台化的思维与时俱进,生产传递对公众有价值有意义的新闻,同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其次才应当考虑到如何顺应平台的发展,如何在损害公众的利益下更多地吸引公众注意力。如果媒体和从业者本末倒置,即使像“猫一杯”一样获得大量的流量和关注,但如果以损害公众的知情权、忽视新闻的真实性为前提,最终会自食恶果,成为流量时代下的牺牲品。

### 4.2. 平台加强监管和审核

相比传统媒体时代的报纸、广播、电视这几种载体,新媒体时代下的载体种类也愈加丰富,其中短视频平台尤为出众。平台作为新闻内容分发的主要“把关人”,本应该对平台的生态环境和内容分发起到监督审查的作用,但由于流量诱惑等因素,导致当下平台中新闻乱象丛生。因此平台既是治理主体,又是治理对象<sup>[2]</sup>。首先,媒介平台虽然不生产内容,但是却拥有分发内容和数据处理的巨大权力,所以平台有义务在内容的传播和扩散方面担负起把关责任,将更有价值的新闻推送到公众面前。其次,平台在当下的流量时代,追求关注本不是一个错误的事。然而,有一些平台构被“新黄色新闻”所裹挟,一味地模仿网络新闻传播的风格和流量,甚至走向“网络趣味崇拜”,逐渐丧失了根据用户的兴趣和喜好进行算法推荐和内容分发的职业道德,也同时失去了平台的议程设置功能和舆论引导等重大作用。

### 4.3. 公众提升媒介素养

新黄色新闻在各个平台上遍布,与新媒体语境下公众对于新闻需求越来越高是分不开的。大众社会向网络社会或平台社会的转变过程,伴随着集体身份向个体选择的转变。而现在公众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从集体身份中脱离出来,成为拥有有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的个体,也成为被个性化算法主导的消费者和生产者<sup>[9]</sup>。在此现象下,“短平快”成为现在主流内容,公众的

审美能力和新闻的阅读能力逐渐降低,这也给大量“新黄色新闻”的滋生带来了可乘之机。公众对于趣味性的追求是公众的权力,但公众作为新闻发布的接收者与数字时代的参与建设者,理应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对于新闻内容拥有是非的正确判断标准。而对于报道的内容,公众不要盲目相信,而要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从多个角度审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长此以往,公众才不会成为像此次事件一样再次沦为狂欢下的牺牲者。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闻传播的重大变革,丰富了信息传播渠道,加快了信息流通速度。作为一件“短视频传播”中的典型案例,其中包含的用户网络媒介素养良莠不齐、把关意识缺失和部分媒体一味追求流量导致专业主义缺失等因素,共同组成了这场火爆网络的“秦朗闹剧<sup>[10]</sup>”。伴随着“猫一杯”被央媒点名、行政处罚和全网封号后,这场全网轰动的“闹剧”也随即落幕。这给了众多媒体一次深度反思和惊醒的机会:在当今时代下,如何在满足用户需求和流量热度中进行平衡。“猫一杯”用不明显的表演手法、吸引用户眼球的关键事件节点等元素,策划出了这个极具迷惑又典型的“新黄色新闻”。如何抵制“新黄色新闻”的再次泛滥,如何让公众更好甄别“新黄色新闻”,如何在“新黄色新闻”泛滥下重构新闻媒体的权威和专业,是“秦朗”留给广大媒体和从业者的最后作业。

#### 参考文献:

- [1] 新华网.用户规模达 10.91 亿人——网络视听成为“数字空气”[EB/OL].[2025-04-09].
- [2] 潘姝昱,张顺军.“新黄色新闻”现象探析[J].新闻传播,2025,(08):44-46.
- [3] 代晓利,许洁.短视频时代“新黄色新闻”的兴起及治理策略[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5,42(01):110-118.
- [4] 窦锋昌,孙萌.消遣型新闻的新闻价值与底层逻辑[J].青年记者,2023,(13):13-16.
- [5] 董淑薇.遏制短视频平台“新黄色新闻”泛滥对策研究[J].西部学刊,2024,(14):59-62.
- [6]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
- [7] 齐波.议程设置理论在新闻类短视频中的应用研究[J].新闻传播,2025,(09):79-81.
- [8] 唐子麒.“新黄色新闻”表征、成因与治理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4,15(06):81-84.
- [9] 史启元,杜志红.短视频传播中的“新黄色新闻”现象及其治理[J].现代视听,2024,(08):69-72.
- [10] 李洋,陈奕秀.“新黄色新闻”的表演、合谋与失效——以网红“Thurman 猫一杯”塌房事件为例[J].新闻传播,2025,(04):29-31.

(校对:黄芊 排版:袁骁)

# 论《查理十二传》《哲学通信》与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形成

翟若朴<sup>1\*</sup>

(<sup>1\*</sup>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 湖北省 武汉市 430000)

**摘要:** 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奠定其历史学家地位, 而《查理十二传》与《哲学通信》对其意义重大。前者积累了史料方法, 树立了对伟大君主的评判标准, 激发了伏尔泰关注社会历史的动力, 后者明确了文化史要素与以文化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两书从实践与思想上为《时代》奠定史料处理方式、整体史的书写视角及理性主义历史观基础, 共同推动了伏尔泰史学思想的成熟。

**关键词:** 伏尔泰; 《查理十二传》; 《哲学通信》; 《路易十四时代》

## *Charles XII, Lettres Philosophiques and the Formation of Voltaire's Historical Thought*

Ruopu Zhai<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Voltaire's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established his reputation as a historian, while *Charles XII* and *Lettres Philosophiques* were of great personal significance to him. The former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d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great monarchs, inspiring Voltaire's interest in social history. The latter clarified the elements of cultural history and established cultural evaluation criteria. Together, these two works laid the practical and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history writing, and the rationalist view of history, collectively advancing the maturation of Voltaire's historical thought.

**Keywords:** Voltaire; Charles XII; *Lettres philosophiques*;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 引言

伏尔泰历史学家的地位是由《路易十四时代》(以下简称《时代》)奠定的, 它集中体现了伏尔泰著史的特点与创新性, 是研究伏尔泰史学思想的钥匙<sup>[1]</sup>, 从 18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 伏尔泰对《查理十二传》(以下简称《查理》)、《哲学通信》(以下简称《通信》)以及《时代》的构思几乎是同步的, 这两部著作显然对“历史学家伏尔泰”的出现具有某种推动作用。对于伏尔泰向史学家的转变这一问题, 布鲁姆菲特与马克·里维埃指出, 伏尔泰著史重在道德训诫与传播启蒙观念, 因此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其思想活动的结果<sup>[2]</sup>, 思想动态一旦落实到历史书写, 便展露为历史观, 因此他们也研究伏尔泰历史观或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但对《查理》与《通信》的论述并不集中, 更多关注于传记史学《查理》。鉴此, 本文以《查理十二传》、《哲学通信》为切入点,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揭示其对《时代》的奠基意义, 进一步理解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 1. 《查理十二传》：历史写作的经验与教训

伏尔泰于1731年出版的《查理》是其史学生涯的正式开端。这部作品虽未完全突破传统传记的框架，却为伏尔泰积累了关键的史学实践经验，并推动其史学观念发生初步转变。

作为伏尔泰史学创作的首次尝试，《查理》延续了欧洲人文主义传记的传统，内容以查理十二的个人经历为核心，佐以道德训诫。伏尔泰一贯不以想象力著称，历史才是他创造的活水<sup>[3]</sup>，而《查理》恰好释放了他取材历史的禀赋，故而这部书被打上了很强的文学烙印。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瑞典、莫斯科大公国的社会速写<sup>[4]</sup>，虽未独立成篇，却是对超越政治军事史的难得尝试。不过，《查理》的创新程度仍然有限。正如布鲁姆菲特所云：它在本质上还属于人文主义史学，伏尔泰还没有摒弃这一传统，亦未去阐释他自己的新方式<sup>[5]</sup>。它终究距离伏尔泰所开创的社会史、文化史还很遥远<sup>[6]</sup>。

《查理》的写作过程，是伏尔泰应用史料的探索与积累过程。一方面，他首次系统性探索了口述史料的收集与应用方式。因传主查理十二的故事最初源自其宠信法布里斯的口述<sup>[6-2]</sup>，伏尔泰意识到亲历者记忆的价值，随后通过跨国书信等方式，向更多亲历者征集口述资料。譬如他曾向友人写道：“我希望布朗卡斯先生能就他所了解的已故瑞典国王的相关细节为我指点。但关于那段历史，还有更多值得探究的趣事，我恳请您务必帮忙打听一下”<sup>[7]</sup>。《查理》成书的最后阶段离不开这种以信访补充文献不足的方法，这段经历以后，他便对处理口述史料游刃有余了<sup>[8]</sup>。另一方面，《查理》的写作也暴露出他对文献史料的处理尚不成熟。伏尔泰有时过度依赖二手资料，在创作《查理》时，部分内容直接照搬利米耶的记载，即便他也在努力收集一手证词，不过整体资料水平未达博学党史学家的要求，他一开始也不热衷广泛征引文献，对标注文献出处也不积极，导致不断有人质疑内容的可靠性<sup>[9]</sup>。伏尔泰以笛福1720年出版的《瑞典战争》为参考，但该书错漏百出，伏尔泰不仅沿袭其错误，还为笛福辩护，称这是真实的证词<sup>[9]</sup>。这些教训对历史学家伏尔泰的成长至关重要。批评者对史料真实性的质疑，推动他在后续写作中树立辨伪的原则。正如在《时代》中，他明确提出：“反驳公众意见的人，必须是目睹者，并且是开明的目睹者，并必须证明自己的见证准确无误”<sup>[10]</sup>，这正是对《查理》教训的回应。

《查理》的写作不仅积累了技术经验，更推动伏尔泰的史学观念发生关键转变。首先是对历史书写的内容。经历论争，伏尔泰对《查理》受到的吹毛求疵感到耿耿于怀，他将原因归咎于现有史学研究视野过于狭隘，由此伏尔泰开始看重社会范围内的历史，特别是与人们日常相关的事物，诸如艺术、科学、技术乃至文明间的差异，而不仅满足于《查理》所涉及的内容。1735年伏尔泰向友人发泄他对现有历史叙述的极端不满：“连接两海的运河水闸、普桑的画作、一部精彩的悲剧……这些事物比所有的宫廷编年史和所有的战地报告都要珍贵千百倍”<sup>[6-4]</sup>。这段文字记录了伏尔泰重塑史观的真实体验，他显然决心扩大自己的写作视角，既非围绕国王，也不局限在宫廷和战场，而是走向人与社会。显而易见的是，其思考成果在《时代》与《风俗论》中得到了精彩的展现，伏尔泰在写作《时代》时仍然讨厌记录细枝末节<sup>[5-2]</sup>，而热衷于讨论反映精神面貌的事物，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写作缘起大概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其次，历史观的转变集中体现在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君主的评判标准上。查理十二以穷兵黩武著称。在《查理》最后一章，伏尔泰对传主有一番定论：“他主要是个特立独行、举世无双的人，而不是个盖世无双、崇高伟大的人。他是个令人倾倒赞赏的人，而不是个值得效法的人。他的一生应该教导国王们，让他们认识到，一种和平而幸福的统治，远远高于纷至沓来、不胜枚举的光荣”<sup>[4-2]</sup>。这番评价的实质在于否定了战功与个人魅力为主导的评判标准，转而要求以君主的统治实效为准。与之相对，其敌手彼得大帝虽更甚于剥削人民，但他作为立法者和技术专家统治他的国家，为了使俄罗斯文明开化，彼得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兴建堡垒、要塞和办公场所，重金招揽外国专家、设立科学院，号召贵族青年出国留学，把外国风尚带回祖国，还计划开通运河、商路，努力提高俄国的商贸地位<sup>[4]</sup>。伏尔泰尽管对他的暴虐统治嗤之以鼻，但仍承认“在别的国家，各种科学经过长年累月的劳动早晚结出的果实，由于沙皇彼得的关怀照顾，尽善尽美地来到他的各个邦州”<sup>[4-4]</sup>。彼得创造了一个新兴的俄罗斯，瑞典却在查理十二以后荣光尽失。伏尔泰意识到，伟人不该汲汲于战争而应善于治理。从历史观上说，伏尔泰已经确立了评判君主的基本立足点——和平统治而非征服带来的荣耀。这种理性主义的评判标准促使他思考理想的君主及君主制、国家的作用，在写作《查理》时“路易十四史的概念已萦绕在他的脑海中”<sup>[5-3]</sup>，所以《时代》延续

了这份思考。因为路易十四时代更加战火朝天，而他亲历了这一时代悲惨的结尾。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使《时代》注定会呈现双重面貌：在战火中走下神坛的路易十四，在文明史中保持骄傲的法兰西。

## 2. 《哲学通信》：文化史的萌芽

如果说《查理》是伏尔泰在实践层面试炼了著史方法，那么1733年出版的《通信》则在思想层面为其注入文化史的灵魂。这部以英国见闻为核心的作品，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却明确了理性主义时代的两大标志：一是学术与科学的发达，如牛顿的物理学、洛克的哲学；二是开明的社会环境，如英国的宗教宽容、对学者的尊重。这两大要素成为他日后书写文化史的核心内容。

《通信》重构了伏尔泰对历史伟人的评价标准，引入文化的视角，奠定了《时代》文化史书写的思想基础。《查理》提出君主应和平统治的评判基础，《通信》则聚焦笛卡尔、牛顿、洛克等学者，将其定义为“真正伟大的人物”。他认定，政治家和征服者每个世纪都有，他们不过是鼎鼎大名的坏蛋<sup>[11]</sup>，并直言道：“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sup>[12-1]</sup>。这一论断是对传统史学价值逻辑的颠覆，伏尔泰不愿再将征服者视为真正的伟人，而是用文化创造者（学者、科学家、思想家）取代了前者的地位。在他看来，真理的生命力是无穷的，一部作品要比一场战役更伟大，文化比政治、军事更重要。这种评价尺度的革新，直接影响了《时代》的写作。基于对文化的重视，伏尔泰明确了“伟大时代”的定义。他在《时代》中提出“四个伟大时代”的说法，并指出文化进步是伟大时代的绝对标志<sup>[10-2]</sup>。这一结论的思想源头正是《通信》，书中对英国文化繁荣的观察，让他意识到文化成就而非军事扩张，才是时代伟大性的终极证明。论及路易十四，伏尔泰曾表示，路易十四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其根据不在于他的征服与胜利，而在于他吸引了众多有能之士来到法国，在于他在各个领域都鼓励学者并对诸伟大艺术家予以回报，在于他发起了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和探索项目，在于他建立了如此之多的设施，在于他使法语变为通用语言<sup>[5]</sup>。因而他认为，在他笔下，路易十四的成功，远非武功，而是文治。在写作《时代》的时候，他以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作为一个辉煌时代的证明，并强调路易十四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从而创造了讴歌开明君主专制的文化史章节。

《通信》还推动伏尔泰的史学视野从单一国家转向跨国比较，推动了《时代》中泛欧化文化史书写的出现。书中虽然以介绍英国事物为主，但隐含英、法两国的文化、政治与经济比较。在讨论商业时，他以英国为例，证明经济利益是国家实力的核心驱动力，讽刺法国漠视发展商业的短视<sup>[12-2]</sup>；在分析学术发展时，他对比牛顿受到国葬与笛卡尔死在异国他乡的境遇，揭示自由环境对文化的影响<sup>[12-3]</sup>。这种比较视角被《时代》继承并拓展。《通信》的地域范围限于英国，而《时代》涵盖大半个欧洲；《通信》基于个人见闻，《时代》围绕路易十四统治展开；《通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时代》则进一步解答文化发展的动力，如开明君主赞助文化事业。可以说，《通信》是《时代》跨国文化视野的雏形。《通信》的底层逻辑是主张进步的理性主义，它要求人们各取所长、美美与共，不可恪守偏见。伏尔泰虽夸赞英国的宗教自由、学术氛围，却并非绝对亲英，他书写英国事物，是为了努力将它的自由风气传播到法国去<sup>[13]</sup>。正如他所说，“对思想家而言，没有法语，没有英语；凡教导我们的人都是同胞”<sup>[14]</sup>。这种文化互鉴理念为《时代》解决了一个关键矛盾：如何协调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文艺崛起与英国科技、哲学发达的事实，伏尔泰的答案是将英国文化成就纳入“欧洲文化统一体”，强调法国对欧洲文化的整体推动作用<sup>[15]</sup>。这种世界主义视角，正是《通信》理性主义思想的延伸。

## 3. 两部作品对《路易十四时代》的奠基意义

《时代》使伏尔泰真正跻身史学大家之列，无疑最能体现其史学思想。《查理》与《通信》虽各有侧重，但与《时代》的创作具有重大关联性，共同推动伏尔泰的史学思想走向成熟。前者积累了史料方法，树立了对伟大君主的评判标准，激发了伏尔泰关注社会历史的动力，后者明确了文化史要素与以文化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二者各从实践与思想两重境界，为《时代》的创作提供了经验。

第一，史料方法的继承与升级。《查理》的口述史料收集经验，在《时代》中发展为系统的

史料处理原则。伏尔泰延续了口述加文献的史料构成,通过宫廷知情者获取路易十四的轶事,以回忆录等材料验证史实,并明确提出要用不同史料验证的原则,他指出,如果两个互相敌视的人都肯定同一事实,那么这一事实便无可置疑,相反,当他们谈论的内容互相矛盾时,那就必须加以质疑,要再考察其他人的记录以辨别真伪<sup>[10-3]</sup>。这正是对《查理》中偏信一文的反思。

第二,写作视角的丰富。《查理》中社会速写的碎片尝试,与《通信》的文化史倾向,在《时代》中整合为整体史。他从宏观视角出发构建了整体性兼分析性的书写框架,雅克·勒高夫评价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sup>[16]</sup>。在这种整体史的叙述框架下,伏尔泰既叙述路易十四的统治政策,也分析战争对国家的影响;既梳理艺术科学的成就,也探讨经济、宗教对社会的作用。这种整体视角的形成,与《查理》、《通信》奠定的实践与思想基础息息相关。

第三,历史观的定型。两部作品的思想成果,在《时代》中凝结为成熟的理性主义历史观。伏尔泰融合《查理》的统治贡献论与《通信》的文化价值论,形成双重评价标准:延续对查理十二穷兵黩武的反思,对路易十四,既批判其盲目扩张,又肯定其对文化的赞助;对时代,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同时强化对社会整体面貌的考察。伏尔泰深信是精神在指引大众,因此人类历史只能是人类精神的历史<sup>[3-2]</sup>。所以伏尔泰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将文艺、政治、军事等内容混同叙述,而是按照分析的层次,将政治、军事、外交和财政、商业、司法、制度以及科学、文化、艺术拆分各章,以此彰显不同事物的重要性,在这种编纂方式之下,最顶端的是文化成就,它构成了时代真正的顶峰。联系各章节的纽带则是路易十四的统治。伏尔泰试图为路易十四的统治披上理性主义的外衣,因之声称后者向往“一套超越一般政治与偏见的哲学体系”<sup>[10-4]</sup>,作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伏尔泰所倡导的启蒙路径是自上而下的——理性必须首先在首要人物头脑里确认,然后逐步下达,最后主宰百姓<sup>[10-5]</sup>。这种为启蒙而著史的理性主义史学观遂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

#### 参考文献:

- [1] 研究《路易十四时代》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 Marc Serge Rivière, *A Study of Voltaire's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Glasgow University, 1980; J. 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Glasg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Ch. Rihs, *Voltaire: 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Geneva: Droz, 1962; 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Morgan, *Sources Of Enlightenment: The Idealizing Of China In The Jesuits's Letters Édifiantes And Voltaire's Siècle De Louis, Romance Notes*, Vol. 37, No. 3, 1997, pp. 263-272; J. Quignard, *Un Établissement de text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de Voltaire, Les Lettres romanes*, vol. v, 1951; Siofra Pierse, *Voltaire Historiographer: Narrative Paradigms*,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8; John Leigh, *Voltaire, a sense of history*, SVEC, 2004.
- [2] 参见 J. 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Glasg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Marc Serge Rivière, Marc Serge Rivière. *The Age of Louis XIV: Voltaire's Coming of Age as a Philosopher/Historian*, *LiNQ*, 1995, 22(1): 78-90.
- [3] 勒内·波莫. 伏尔泰[M]. 孙桂荣、逸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72, 74.
- [4] 伏尔泰. 查理十二传[M]. 吴模信, 吴煜幽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1-26, 22-25, 24.
- [5] Marc Serge Rivière, *A Study of Voltaire's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1980, pp. 517, 25, 10, 138.
- [6] J. H. Brumfitt, *Voltaire: Histori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6, 10, 17-21, 46.
- [7] Theodore Besterman, *Voltai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76, p. 160.
- [8] Ragnhild Hatton, *The History Of Charles XII*, translated by Antonia White. London: The Folio Society, 1976, pp. ix-xxv.
- [9] Siofra Pierse, *Breaking Away from Battles: Voltaire and the Everyday in History, Eighteenth-Century Ireland / Iris an dá chultúr*, Vol. 24, no. 1 (January 2009), pp. 84-99.
- [10] 伏尔泰. 路易十四时代[M]. 吴模信, 沈怀洁, 梁守锵,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294, 1-2, 336, 411, 107.
- [11] 陈乐民. 敬畏思想家[M]. 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 2014: 195.

- [12] 伏尔泰.哲学通信[M].高达观, 徐仲年, 王燕生,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56, 48-50, 71.
- [13] Norma Perry, Voltaire's View Of England,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7, no.26(June 1977),pp.348-354.
- [14] Dan Edelstein, Biliana Kassabova, How England Fell Off The Map Of Voltaire' s Enlightenment,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Vol.17, no.1(March 2020), pp.29-53.
- [15] David A.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Inventing Nationalism, 1680-1800*, Cambridge, MA, 2001, pp.93-94.
- [16] 雅克·勒高夫, 皮埃尔·诺拉, 罗杰·夏蒂埃, 等.新史学[M].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19.

(校对: 范记川 排版: 袁骁)

# 从《新小说》探析中国近代小说启蒙思想的生成

宋朝红<sup>1\*</sup>

(<sup>1\*</sup>烟台理工学院 文法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 1902 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 其将小说提升为启蒙与救国的工具, 这体现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冲击下的民族意识。《新小说》的创刊背景、作者群体及内容呈现, 体现了小说启蒙思想的萌生、传播与实践的过程。《新小说》对推动小说革命、激发民众政治觉悟有着重要作用, 但同时由于市场导向、读者趣味及清政府压制, 使启蒙功能逐渐边缘化, 文学审美价值占据主导。这些反映晚清文学转型与知识分子救亡实践的复杂演变。

**关键词:** 《新小说》; 小说启蒙; 梁启超; 杂志

## Exploring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 Enlightenment Thought through *Xin Xiaoshuo*

Song Chaohong<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Chinese and Law, Yant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tai, Shandong 264000, China)

**Abstract:** In 1902, Liang Qichao founded *Xin Xiaoshuo*, elevating the novel into a tool for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reflecting the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 of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thought. The magazine's founding background, authorial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presentation illustrate the emergence, dissemination, and practice of novel-based enlightenment thought. *Xin Xiaoshu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novel revolution and raising public political awareness. However, due to market orientation, shifting reader tastes, and government censorship, its enlightenment function gradually became marginalized, whil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values came to dominate. These developments reflect the complex evolution of late Qing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efforts for national salvation.

**Key words:** *Xin Xiaoshuo*; Novel Enlightenment; Liang Qichao; magazine

## 引言

1902 年, 梁启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小说杂志《新小说》, 它是晚清文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彼时, 整个晚清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在艰难探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 而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中所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也正好印证了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影响影响下对于“公共空间”“民族共同想象”的重视。这也进一步表明, 《新小说》杂志的创办不是历史的偶然, 而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思想冲击后的一个必然选择。对于《新小说》的研究, 不仅是对现代中国文学转型的研究, 更是涉及到现代历史的考察, 对把握晚清小说作家以及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流有着重要的作用。

刘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小说〉杂志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sup>[1]</sup>中提到对于《新小说》的研究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都维持在一个峰值上,这实属罕见,直到近些年对《新小说》的研究才逐渐降温。对《新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做文献研究,对于创刊和出版细节进行考据梳理,如日本研究者樽本照雄的《〈新小说〉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点》<sup>[2]</sup>详实地考究了杂志的创办地点以及印刷日期等;二是对《新小说》出版内容进行研究,涉及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从中梳理出杂志的文学观,如王岩的《在〈新小说〉——小说观念研究》,其认为杂志的作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小说主题与题材进行创作实验;三是对《新小说》中体现的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思想进行研究,如张怀宇《启蒙的精神与救亡的努力——试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sup>[3]</sup>一文将《新小说》与梁启超的文艺思想结合,强调《新小说》在启蒙与救亡两个层面满足了政治上的需求。四是对《新小说》的历史地位以及影响等进行研究,如苟强诗在《小说界与现代小说概念的生成》<sup>[4]</sup>中强调《新小说》将文学与报刊联袂的首创性对报刊文学的意义深远。本文则是在历史、文学、出版的交叉学科背景下,从《新小说》这一载体出发,梳理小说启蒙思想发生的脉络,探寻二十世纪初知识精英群体对小说启蒙思想的接受、传播以及实践,分析他们如何通过文学创作、小说翻译等,将小说提升为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核心工具。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的主动回应,还彰显了《新小说》作为思想载体在推动小说革命的枢纽作用,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 1. 小说启蒙思想的萌生——《新小说》创刊

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梁启超看到依赖清政府救国遥遥无期,他开始思索新的救亡之路。当时由于西方思想的传入,梁启超发现了“群”的价值,也就是拯救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建立民族共同体则需要先拥有“新民”。他在《新民说》中提到:“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sup>[5]</sup>。所以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思考新的救国路径则是培养新民,由新民来一同构建新的中国。但是如何将晚清时期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民众培养成新民?他将目光投向了文学界,并将小说的地位从“娱乐功能”提升到了“救国救亡”的政治功能之上。追溯梁启超这种“小说救国”的启蒙思想,不难发现,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都萌生过类似思考。

比如1895年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登过一则小说征文广告《求著时新小说启》,文中说:“窃以感动人气,贬义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sup>[6]</sup>这则短文很明确地将小说提升为革除三害的良药,认为中国的旧习俗可以同通俗易懂的小说来进行改变。这则征文活动在《申报》刊登过5次,并且获奖者有奖金150元。广告的影响很大,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一个很明确的启示就是,小说不仅仅是消遣之物,还可用来开启民智。

另外,1897年11月,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曾提到:“夫说部之兴,其入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逐不免为说部之所持”<sup>[7]</sup>。此段话,说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越加认可小说可以移风易俗,革弊除害。

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曾道:“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于小说”<sup>[8]</sup>。他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并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另外,他在流亡日本时接触到了更多日本政治小说的范本如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并构想着小说与报刊的进一步联姻,以此来唤醒更多的民众,营造一个民族共同体。

1902年2月,梁启超先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刊登一篇文章《中国唯一之文学〈新小说〉》,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认为是《新小说》杂志的征稿启事:“……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器爱国精神,一切淫猥弊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sup>[9]</sup>几个月后,也就是1902年11月,梁启超经过了思想上的酝酿以及操作上的实践,终于在日本横滨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本小说杂志《新小说》。《新小说》发刊词中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梁启超认为小说有四种力熏、浸、刺、提。“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小说哉，可畏小说哉！”<sup>[10]</sup>

从相关讨论文章到《新民丛报》中的征文，再到《新小说》的创办，我们发现这一系列的轨迹最终完成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思想。他的小说“启民智”的思路一直贯穿在办刊始终，尤其强调小说的通俗性和普及性，要求所有来稿用俗语来写，这么做的直接目的是希望普通大众去阅读并接受小说，并且从小说中得到思想上的开蒙。但这种小说启蒙思想在办刊宗旨感召下如何真正去践行，则要看整个撰稿群体对这种思想的理解和转化程度。

## 2. 小说启蒙思想的传播者——《新小说》撰稿群体

在晚清甚至民国初期，一份文学杂志固定的撰稿群往往意味着这批人拥有相同的思想主张，相近的文学理念。一些学者认为，《新小说》的创刊意味着中层社会的启蒙运动拉开帷幕。因为《新小说》的发起人和稿件作者大多来自社会中间阶层，并且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一批知识精英。这批人大多数仕途不顺遂，与清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思想。

《新小说》的作者群体比较杂乱，很多来稿一直使用笔名，并且有些作者还不断地更换笔名，数据整理存一定偏差。本文主要根据付建舟《小说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整理的关于《新小说》作家状况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狄葆贤、罗普、周桂生、吴研人、雨尘子、周树人、南野浣白子、璵斋主人、无歆羨斋主，东莞方庆周、周祥俊、洪炳文、颐琐、川南波山人、啸天庐主、水月庵主<sup>[11]</sup>等。以下根据不同类别划分的数据：

根据作者各自的政治思想倾向来分类（总人数约 60 人）：

倾向的派别	维新派	革命派	民主进步人士
人数	9	13	2
百分比	15%	22%	3%

（参考付建舟《小说革命的兴起与发展》<sup>[11]</sup>）

从这组数据看出，《新小说》的作者队伍不仅限于维新派。当时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时，他不再局限派别，开始主动联合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精英，只要他们愿意参与这场小说救国的运动中，都进行吸纳接受。小说界革命是维新派发动，但却是由维新派，革命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如李伯元、吴研人等共同参与的一场文学革新运动。<sup>[12]</sup>这场波及晚清各个思想领域的爱国救亡的文学革新运动，也为《新小说》的发行打通了道路。

经过戊戌变法的沉痛教训，梁启超从“维新派”的小圈子开始转向了更广大的知识阶层，以“小说启蒙”这个点打破了晚清思想派别的局限，争取到了更广泛的来稿。我们从来稿作者的出生地来看：

出生区域	岭南知识群体	江浙知识群体
人数	16	14
百分比	27%	23%

（参考付建舟《小说革命的兴起于发展》<sup>[11]</sup>）

从以上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来稿作者主要来自岭南和江浙两大知识群体。岭南知识群体，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他们普遍接受西学和新思想比较早。放弃科举仕途之后，思想上更大胆，更具有创新精神，所以其小说的创作实验性更强。而在江浙的知识群体，他们一般接受传统的书院教育，学术功底深厚，注重理性精神。他们其中一些人已经是科举中第之人，因为官场黑暗，弃官教书，另外一些则是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属于当时知识界的精英。

笔者认为岭南知识群体代表着知识阶层的新生代，他们有活力、有魄力。而江浙的知识群体更多的代表知识阶层的前辈。他们严谨求实，国学功底深厚。来稿作者包含了老中青三代知识群体。这些作者们不仅开启了民国时期的小说繁荣，如吴研人；也开启了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文学繁荣，如周作人，陈独秀。

这两个地域的知识群体可以同时《新小说》上发表文章，可见在当时知识群体对“小说救国”思想认可度之高，参与愿望之强。这份杂志如同梁启超最初的愿景，为拯救中国创建一个共同的对话场域。

《新小说》是一个复杂思想的集合，它包括不同政见者、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以最大的包容度去吸收爱国的知识群体。它感召了全国的拥有新思想的知识精英们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去启迪这个民族，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整个知识界的思想脉动。

### 3. 小说启蒙思想的实践——《新小说》内容的呈现

《新小说》杂志从创刊到停办一共 24 期，其中“小说”标志的栏目有 13 种，涉及小说类别庞杂，比如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等。<sup>[13]</sup>梁启超在创办杂志的同时，也进行了小说创作的践行。比如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主人公黄克强是革命派，李去病是改良派，小说大量篇幅就在于两个人关于政治思想的论辩中展开。与其说这是一篇政治小说，不如说是一篇政论文。因为小说大约 2 万字，而对话论辩部分则有 1.6 万字左右。众所周知，小说的本质属性是叙事性，如果只是把小说当作政治的演说工具忽略故事和情节，那么就降低了小说的可读性。梁启超的这篇小说并未写完，但他将小说与报纸结合的理念以及小说启蒙的思想则对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小说》杂志开启了用创作小说来启蒙大众的新潮风气。一时间此类创作层出不穷，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作家有意识地以小说为武器，针砭社会时弊，大多数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为主。这样的风气下出了不少精品，像吴研人刊登在《新小说》的作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是这类小说的精品之作。尤其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引发了轰动效应。小说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视角展开，通过其社会上的游历见闻，集中揭示了晚清政治腐败、经济失序与道德沦丧，其“怪现状”实为社会常态。它在批评社会深层弊病的同时也透显了人情温暖。这部作品是观察晚清社会危机与文化转型的重要文本。又如政治小说《红祸水》，小说借法国大革命反思知识分子的角色，强调行动胜于空谈，主张以生命赴死换取自由，进而纠正维新失败的教训，提倡牺牲精神，以谭嗣同等人为榜样，号召民族为政治变革而奋斗。这篇小说突破了梁启超的改良思想，主张暴力革命救中国。当然除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以外，《新小说》刊登了大量的翻译小说，这也是介绍西方思想的重要窗口。

总体来讲，《新小说》开启了以报刊连载形式出现的文学杂志时代。杂志的兴起，稿费制度的建立，小说的需求量激增，尤其是小说救国这种思想的普及深入人心，晚清知识分子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投入这场不见刀枪，只有笔杆的救亡运动中。《新小说》创刊以后，带动了近代中国的报刊界大量文学期刊问世，如《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等。现代文学批评家阿英说，他们是利用了小说的形式，从事新思想的启蒙。在那个时期描写两性私生活的小说都不被重视，出版商直接拒绝刊印。比如《绣像小说》就明确拒绝印行此类的才子佳人小说。

民间社会开启了“不见刀光剑影”的革命，清政府很快洞察这种行为的危险性。1903 年，清政府颁布禁止“煽动性”文学的告示：《新小说》以及其他杂志和小册子，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寰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sup>[14]</sup>此番告示直接表明，《新小说》以及其带来的影响直接威胁到了清政府统治的思想基础。

不过，当时兴办的小说杂志在多重因素作用下逐渐改变了“小说启蒙”的立场。首先，市场导向和读者趣味的转变，使政治启蒙内容让位于通俗消费，原先充满“载道”功能的政治、科学小说逐渐让位于市场导向的通俗文艺作品；其次，小说启蒙功能被功利化工具化，小说成为改良社会、开发民智的工具，缺乏深层思想的反思，文学价值被弱化；再者，清政府高压政策限制言论出版，有启蒙倾向的作品被禁止刊出；另外，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文学在报纸杂志的传播下走向了大众视野，其审美性成为读者的重要需求。从《新小说》到《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我们发现小说由政治功利性到文学

本身审美性的逐步转变。不但在写作内容上有所转移,写作方法上有所提高,对小说本身的审美性的追求逐步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启蒙立场不再成为杂志的主导方向。

小说启蒙的思想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中从高潮走向了低估。但小说启蒙的思想仍然是深入人心的且是知识分子的拿起笔杆战斗的重要思想支撑,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小说启蒙思想的一种延续。

《新小说》杂志不仅是一份文学杂志,它还反应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技术、教育革新等综合因素背后的独有景观,其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对于“现代中国”转型的探索,也集中体现了整个精英阶层的“救亡”思维。不过,梁启超将小说提升到“救国”的地位,夸大了其政治功能,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小说本身的审美价值。虽然其文艺思想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其开创了文学杂志的先声,带动了后来知识群体用“杂志”的形式来作为阵地宣传新思想的风气。上文我们探索了《新小说》的创刊与发展,抓住小说启蒙这一思想去把握晚清至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脉动,从中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知识群体在救国道路上的不同尝试。钱穆先生说过,任何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都会一步步顺着时代和前人的思想,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将小说的思想启蒙这样一条线索放置在晚清社会中去考察,不仅能了解这时期文艺创作的思想也能顺着这条思路把握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脉络。

#### 参考文献:

- [1] 刘畅.《〈新小说〉杂志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2年,第1-125页.
- [2] [日]樽本照雄:《清末小说集稿》[M],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 [3] 张怀宇.《启蒙的精神与救亡的努力——试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69-73.
- [4] 苟强诗.《小说界与现代小说概念的生成》[D].重庆:西南大学2009年,第1-72页.
- [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55~657页.
- [6]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N].《万国公报》,1895年第77册.
- [7]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27页.
- [8] 米列娜编,伍晓明译.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 [9]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N].《新民丛报》,1902年第17号.
- [10] 梁启超.精读梁启超[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 [11] 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2] 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研究导论——以四大小说期刊为中心》[J].兰州学刊,2007,第151-153页.
- [13] 梁启超编.《新小说》(1-6卷)[M],上海:上海书店复印.1980.
- [14] 杨霞编.《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象”》[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141页

(校对:宋朝红 排版:袁骁)

# 新时代人民观的逻辑意蕴与实践导向

张雪<sup>1\*</sup>，周小红<sup>1</sup>

(<sup>1\*</sup>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东 广州，510000)

**摘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也是新时代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准则。这一重要思想以鲜明的人民立场，深刻反映了“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这一思想观念并非凭空而生，它有其深刻的价值认知源泉，即为其提供理论和文化源泉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使之蕴含了丰厚的伦理寓意。新时代人民观的精髓是人民中心论，即人民是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体，人民中心论的观点体现在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是真实和广泛的人民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政治、生态等各个方面都深刻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彰显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伦理意蕴；人民观

## The 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s of the People's View in the New Era

ZhangXue<sup>1\*</sup> ZhouXiaohong<sup>1</sup>

(<sup>1\*</sup>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ideological concept did not emerge out of thin air; it has a profound source of value cognition, namely, the Marxist people's view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which provide it with theoretical and cultural sources and endow it with rich ethical implications. The essence of the people's view in the new era is the people-centered theory, that is, the people are the main body in social life and the main body of the country. The people-centered theory is 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s a true and extensive people-oriente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ll aspects such as economy, politics, and ecology profound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truly demonstrate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People-centered; Ethical implications; People's view

##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党中央审时度势、锐意进取，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新论述，并最终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心为心”<sup>[1]</sup>。这一观点强调了人民群众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同时

- 147 -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校级科研青年项目《新时代对外增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25-018C）

**作者简介：**张雪（1998-），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周小红（1998-），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

也充分强调了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就会成为一座空中阁楼，所以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观的内涵不仅仅涉及民生问题，其影响范围涵盖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内政外交、国防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新时代的人民观有其深厚的理论和文化渊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吸收过程中坚持取精去糟的原则，对其进行创新发展，转化为更适应新时代的科学理论。在价值追求方面，新时代人民观坚持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切实保障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各项权益，并最终落实到实践中去。

## 1. 价值生成：“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认知来源

### 1.1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坚持人民性，既是无产阶级的根本价值立场，又显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以马克思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如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独立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sup>[2]</sup>。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研究人类的发展，他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作品中，深入讨论了人的生存、异化、价值、自由和解放等关键问题。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后，系统地阐述了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学说，是劳苦大众的学说，马克思的一生是为人类自由解放而奋斗的一生。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各路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信仰各种主义，崇尚各种制度，试图拯救中国，但唯有马克思主义呐喊着要拯救人民。

中国共产党一直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政治优势就是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旨归。无论是在号召群众参与土地革命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还是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同奋斗。以人民利益为一切工作的起点和终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深知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们党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要坚定人民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始终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理念。同时，我们必须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全心全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持续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努力奋斗。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坚持人民至上的观点，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这一理念作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这一重要思想，既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扬，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新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1.2 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涌现出了那么一批思想家，他们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思考人民群众与江山社稷之间的辩证关系，诸如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都认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基，根基不稳则地动山摇，后世将其概括为“民本思想”。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尚书五子歌》中，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定之本，国家长治久安，唯有民生安定，才能万无一失。这一思想，构成了儒家重要的理论基础——治国理政学说。儒家的古代贤人对此进行了深入阐释：孔子主张治国应实现“君民一体”，而《贞观政要》则强调“为政之要，首在安民”，即施政的关键在于安抚人民，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荀子通过“水舟之喻”生动地阐述了君与民之间的关系，他将百姓比作水，将君主比作扁舟，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哲学家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都指向一个治国真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以人民的安定为基础。这些朴素的民本思想，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不仅没有过时褪色，反而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所蕴含的“民本”治国智慧，以及强调国家发展与民生福祉紧密联系的政治伦理，显示出了其真理的光辉。十九大以来，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在全面建设小康的道路上秉持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准则，在小康路上坚决不抛弃不放弃每个公民，无数干部奋斗在扶贫一线，涌现出了诸如黄文秀书记等先锋模范，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开创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吸收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而且创造性地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发展，赋予古老朴素的民本思想以新的时

## 2. 价值旨归：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 2.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进入新时代，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等挑战，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和战略部署，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甚至短时间内放弃经济发展，全心全意保障人民的利益。新时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人们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物质和文化，而转向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智能家居、5G 通讯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广泛应用，让人民对于便携和智能生活的憧憬更上一层楼，对此，我们党和政府也在不断更新科技，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sup>[3]</sup>。

自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发展模式体现了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同时也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党和国家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环境优美等多方面协调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核心和核心。

### 2.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代表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就不代表任何利益群体的利益，也不代表任何权力群体的利益，更不代表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更不代表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的利益，更不代表任何一个特权阶层的利益”<sup>[4]</sup>。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历史的混沌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的指导思想、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了历史的信赖，赢得了人民的信赖。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始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体，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六项注意”“八大纪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造福人民，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的理论，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成为了最深层次的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建立新中国，底层民众实现了翻身解放，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实现了“事情做得好不好，人民说了算”的政治生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深化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取得了全面小康社会等一系列伟大成就，逐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增进了人民的福祉，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得以不断提高。

### 2.3 激发人民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追求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5]</sup>，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命题，这一重要命题，内在地包含了人民中心论。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建设，因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创精神，积极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历史上潮流中善于把巨大的人口潜能转化为力量优势。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带领人民逐步攻坚克难，实现了一个个足以载入史册的任务，完成了一项项重大突破，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这些突破和成就，归根到底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做到“准确引导人民群众明确斗争方向，协助他们亲自行动，争取并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sup>[6]</sup>。自近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得到了激发，他们在冲锋陷阵和建设社会主义等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目标的引导下，人民的创造力得

到了充分释放，形成了一个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乐于担当的良好社会氛围。特别是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重视人民的创新精神，进一步激发人民的创造力，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 3. 价值实践：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3.1 经济意蕴：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追求，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发展目标上，而且在实际发展中体现得更加真切。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各位领导干部要明确“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根本问题，多次强调党员干部和共产党人要坚持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sup>[7]</sup>。这一理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包含了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内涵，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引领，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遵循。

自十九大以来，我们党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视为新时代发展的根本方向，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民生领域的短板。坚定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而且为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提供了科学指引。发展方式的选择与发展成果的分配虽然属于不同维度，但最终目标都是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一致。新发展理念能够有效应对发展不平衡和不足的问题，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使每个人在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切实获得实惠，不断增强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 3.2 政治意蕴：切实保障人民权益

道德规范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它规范着社会组织和成员在政治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规范，是指引社会组织和成员的道德行为，是政治思想和行为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规定了我国在政治生活中的“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落实了权力属于人民，彰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真实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蕴含着以维护人民平等权利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意义。

这种观念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理论的新成果，使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政治伦理的价值视角来把握，就是以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为本的发展，就是为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就是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发展，这一发展体现着鲜明的政治伦理精神，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性所在<sup>[8]</sup>。新时代以来，我们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力，让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

#### 3.3 生态意蕴：奋力创建美丽中国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规范，对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价值导向。过去，世界上多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事迹，直接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我们的发展，必须以人的生命为核心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创新性地回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包含着尊重自然规律、保障人民生态权益的深刻伦理内涵。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正确价值理念，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生态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sup>[9]</sup>。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关乎当代民生，更影响民族长远发展。首先，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人类不仅需要增强对生态保护的意识，还必须遵循自然法则，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第二,实现代际公平必然要求,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是良好生态环境的根本保证。生态环境保护是泽被当代、惠及子孙的崇高事业。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N].人民日报, 2021-03-02(01)
-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9.
- [3]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年3月15日,北京)[N].人民日报,2023-03-16(2).
- [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6.
-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 [6] 邓小平文选: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7.
- [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85.
- [8] 阎钢.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政治伦理精神[J].党政研究,2021(05):52-57.
- [9] 贺新春,刘飞燕.新时代人民观的伦理意蕴[J].老区建设,2020(08):24-29.

(校对:王芳芳 排版:袁骁)

# 特色小镇建设对人口流出区居民地方感的影响研究——以长官杂技小镇为例

毛翰臣<sup>1</sup>, 杨开路<sup>1\*</sup>

(<sup>1</sup> 云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在我国中部人口持续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 特色小镇建设成为中部人口流出区破解发展困境、助力中部崛起的重要探索。选取位于中部黄淮平原腹地、具有典型人口流出特征的安徽省临泉县长官杂技文化小镇为案例, 运用扎根理论方法, 系统探究特色小镇建设对镇域居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发现: 特色小镇建设主要通过重塑居民的文化感受、景观感受与人际感受三个维度体验共同影响地方感变化, 其中人际互动体验的改善对积极地方感的形成作用最为直接显著;居民个体的时空对比机制是理解地方感变迁的核心内生调节变量。揭示了特色小镇建设在重塑地方感、促进‘人回流’与‘业振兴’协同方面的潜力与挑战, 为中部人口流出区依托特色小镇建设激活内生动力、助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地方感; 人口流出区; 扎根理论; 时空对比机制; 长官镇杂技小镇

## The Impact of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on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n Population Outflow Areas: A Case Study of Changguan Acrobatics Town

Mao Hanchen<sup>1</sup>, Yang Kailu<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ersistent population outflow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s in Central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strategy for these outflow areas to overcom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initiative. This study selects Changguan Acrobatic Culture Town in Linquan County, Anhui Province—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Huanghuai Plain in Central China and exhibiting typical population outflow characteristics—as a case study. Employing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i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on the sense of place among town resid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primarily influences changes in the sense of place by collectively reshaping residents' experienc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perception,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perception. Among these, the improvement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plays the most direct and significant role in fostering a positive sense of place. The individual temporal-spatial comparativ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serves as the core endogenous moderating variable for understanding shifts in the sense of plac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of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in reshaping the sense of place and fostering synergy between "population return"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t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activat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through

- 152 -

基金项目: 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项目《滇南云水——基于云南建水茶罐的新形态文创研究》(项目编号: S202310673203X)

作者简介: 毛翰臣 (2005-), 男, 天津, 本科, 研究方向: 人文地理学

杨开路 (1995-), 男, 安徽阜阳, 硕士, 研究方向: 人文地理学

通讯作者: 杨开路, lqhny@foxmail.com

characteristic town construction in population outflow areas of Central China, thereby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strategy.

**Keywords:** Sense of place; Population outflow area; Grounded Theory; Temporal-spatial comparative mechanism; Changguan Acrobatic Town

## 引言

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其崛起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一环<sup>[1]</sup>。然而,就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中部地区面临显著的人口外流压力,尤其是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劳务输出规模巨大。城乡间劳动人口流动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社会现象之一<sup>[2]</sup>,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不仅导致中部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乡村“空心化”加剧、本地消费市场萎缩,更深层次地削弱了地方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形成“人才流失-发展乏力-吸引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成为制约中部崛起的关键瓶颈。在此背景下,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明确提出要“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并特别强调要“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sup>[3]</sup>。

特色小镇建设作为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挖掘地方特色资源、优化人居环境、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被中部各省寄予厚望,被视为破解人口流出困境、激活内生动力、服务中部崛起战略的关键举措之一。临泉县地处中部黄淮平原腹地,是典型的人口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在区域经济版图上处于双重边缘化地位<sup>[4]</sup>,长期存在资源分配边缘化、区域经济联动断裂的问题,呈现“农业主导、工业薄弱、服务业滞后”的特征,在中部众多农业县中具有普遍代表性。近年来,临泉县依托其悠久的“中国杂技之乡”文化底蕴,大力推进长官杂技文化特色小镇建设,旨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地方发展与文化振兴。

地方感作为人文地理学核心概念,指人与特定地方间的情感联系与意义赋予<sup>[5]</sup>。其作为个体对特定地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体现是维系社会稳定与文化遗产的重要情感纽带,其意义日益凸显<sup>[6]</sup>。自段义孚引入“地方”概念并强调其情感属性与依附感以来<sup>[7,8]</sup>,其内涵不断深化与多维化:Cresswell 强调地方的社会文化建构性<sup>[9]</sup>;Shamai 关注人地关系的整体性<sup>[10]</sup>;Massey 提出“全球地方感”,突出了地方感的开放性与动态性<sup>[11]</sup>;Relph 将地方感的研究领域拓展到“无地方”和“非地方”<sup>[12]</sup>。国内学者如朱竑等<sup>[13,14]</sup>则延续段义孚的关于“地方”的定义,着重测度人民对地方的情感依附;李如铁等引入“消极地方感”概念,将疏远、厌恶等感官体验引入地方感研究<sup>[15]</sup>;楚晗等基于 Massey 的研究提出内向型与外向型地方感及其交互作用<sup>[16]</sup>,共同促进地方感成为一个包容、动态的概念<sup>[17]</sup>。

现有地方感研究多集中于地理学、传播学以及旅游学领域,跨学科应用广泛,关注人与地方的情感互动。在地理学研究中,主要研究地区变化和居民地方感变化的交互关系,谢涿湘等<sup>[18]</sup>探究生态保护区的和村民地方感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卢志霖等<sup>[19]</sup>探究行政区划调整对居民地方感建构机理。旅游学研究游客旅行中的目的地情感体验与认同如何影响其决策和行为。王泓砚<sup>[20]</sup>解释游客地方感与旅游场之间的关系,吴德<sup>[21]</sup>探讨了艺术旅游与游客地方感的影响路径。在传播学中则侧重于关注基于媒介技术为中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变革。如与欢等<sup>[22]</sup>探究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感生成逻辑;杨帆等探究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知识型移民的地方感影响。

目前研究涉及主体多元,虽视角多元但存在局限:针对人口流出地,尤其是中部地区在特色小镇建设背景下居民地方感动态变化的研究尚显不足;对居民个体基于流动经历与生命历程所形成的内在参照系如何调节环境变化与地方感关系的探讨有待深化。因此,深入探究特色小镇建设对这类典型中部人口流出区居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不仅关乎单个小镇的可持续发展,更对理解中部地区如何通过地方性实践重塑居民认同、增强本地吸引力、进而服务“人才回流”与“产业振兴”协同发展的中部崛起核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选取安徽省临泉县长官杂技文化小镇为典型案例,借鉴李如铁等<sup>[15]</sup>的消极地方感概念与楚晗等<sup>[16]</sup>的内向/外向型地方感理论框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系统解析特色小镇建设如何通过多维感知体验影响镇域居民地方感,并着重探究个体化的“时空对比机制”在其中的核心调节作用。

## 1. 案例地和数据来源

1.1. 案例地概况

本文的案例地长官杂技小镇位于临泉县长官镇(图 1),临泉县是我国户籍人口最多的县之一,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其二三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由此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此外,临泉县素有“中国杂技之乡”的美誉,杂技艺术在此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史遗存表明当地杂技活动可追溯至两千年前。近年来,临泉杂技影响力不断扩大。而长官镇则是临泉县内具有代表性的乡镇之一,其区域内的长官杂技小镇项目总体规划用地面积为 148.65 亩,总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总投资 5.03 亿元。项目包括育才阁红色文化区、山陕会馆古文化区、杂技文化表演区、特色美食体验街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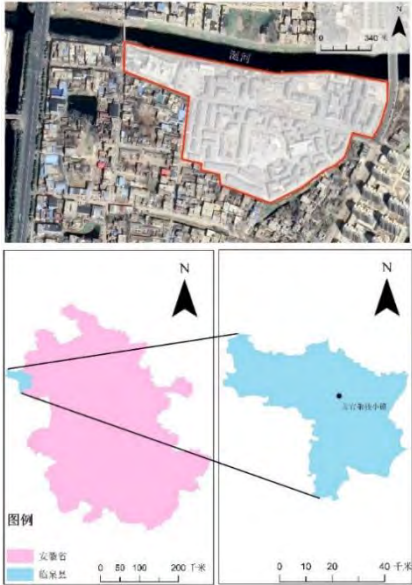


图 1 长官杂技小镇区位

1.2. 数据来源

表 1 长官杂技小镇访谈样本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特征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特征
K1	男	44	杂技小镇工作人员	F1	男	53	附近居民
K2	女	31	杂技小镇工作人员	F2	男	21	附近居民
K3	女	20	杂技小镇工作人员	F3	男	29	附近居民
K4	女	20	杂技小镇工作人员	F4	男	21	附近居民
J1	男	60	商贩	F5	男	29	附近居民
J2	男	38	商贩	F6	男	24	附近居民
J3	男	60	商贩	F7	男	47	附近居民
J4	男	60	商贩	F8	男	40	附近居民
J5	男	24	商贩	F9	男	47	附近居民
J6	男	52	商贩	F10	男	64	附近居民
J7	男	51	商贩	F11	女	44	附近居民
J8	男	56	商贩	F12	女	24	附近居民
J9	男	27	商贩	F13	女	23	附近居民
J10	女	18	商贩	F14	女	33	附近居民
J11	女	63	商贩	F15	女	20	附近居民
J12	女	29	商贩	F16	女	57	附近居民
J13	女	69	商贩	F17	女	24	附近居民
J14	女	53	商贩	F18	女	18	附近居民
J15	女	19	商贩	F19	女	57	附近居民
J16	女	63	商贩	F20	女	22	附近居民

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资料收集等社会调查方法获取相关资料。在 2024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0 日为期约 1 个月的田野调查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访谈了 40 名受访者(表 1),针对本文案例地的特点及研究问题,所选取的受访者均为在长官镇居住时间不少于 10 年的居民,他们见证了杂技小镇设立前后长官镇的发展演变。受访者男女比例为 1:1;年龄主体为 21-40 岁(19 人)和 31-60 岁(14 人),20 岁以下和 61 岁以上分别为 3 人和 4 人;包括 4 名杂技小镇工作人员、20 名居民、16 名集市商贩。每段访谈时长均在 20 分钟以上,转录文字材料达 9 万字。访谈内容包括其在杂技小镇设立前后景观变化、赶集体验以及地方情感的变化等。

2. 研究方法和过程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 1967 年由社会学家 Glaser 等<sup>[23]</sup>最先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它允许在没有先验性假设和结论的情况下开放性地收集与分析资料,是质性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sup>[24]</sup>。区别于定量研究,质性方法注重对事物本质的微观探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主要通过提炼概念,归纳范畴,挖掘范畴之间的关联,不断建构与修正理论。一些研究将扎根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多重对应分析等定量方法相结合,进行分析或验证<sup>[25,26]</sup>。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利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了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的关系、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等<sup>[27]</sup>。参考上述研究以及谢涤湘等[18]的编码方法,本文的分析路径包括:开放式编码:采用深度访谈,抽象化、概念化反映杂技小镇设立对居民地方感影响的问题。主轴编码:不断比较概念,建立概念、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使其具有指向性、逻辑性、理论性<sup>[28]</sup>。选择性编码:分析范畴之间关系后搭建核心模型。

2.1. 开放式编码

对访谈文稿的原始文本逐句阅读和分析,经过两次编码和多次修正后,最终提取出 438 个代码,然后进一步缩编,形成了 30 个概念。开放性编码形成的概念实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开放性编码形成的范畴示例

编号	原始语句	概念化	范畴提取
T1	搞了这个杂技小镇,赶集热闹多了,人咋恁多哎!	热闹	文化感受
T6	街头还搞了个大门,花篮嘞,真好看!	好看	景观感受
T22	咱这以往没盖(指街旁仿古建筑)之前集上没恁好看,盖了以后看着不赖。	好看	景观感受
...	...	...	...

2.2. 主轴编码

本阶段对开放性编码中相互独立的范畴进一步归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回到案例地现场,进行持续性地分析和比较,最终确定主轴编码<sup>[29]</sup>。主轴编码结果显示,上一步所形成的范畴可归纳为文化感受、景观感受、购物感受、娱乐感受、交际体验和地方感(图 2)。访谈发现,设立特色小镇对居民文化感受、景观感受和交际体验的影响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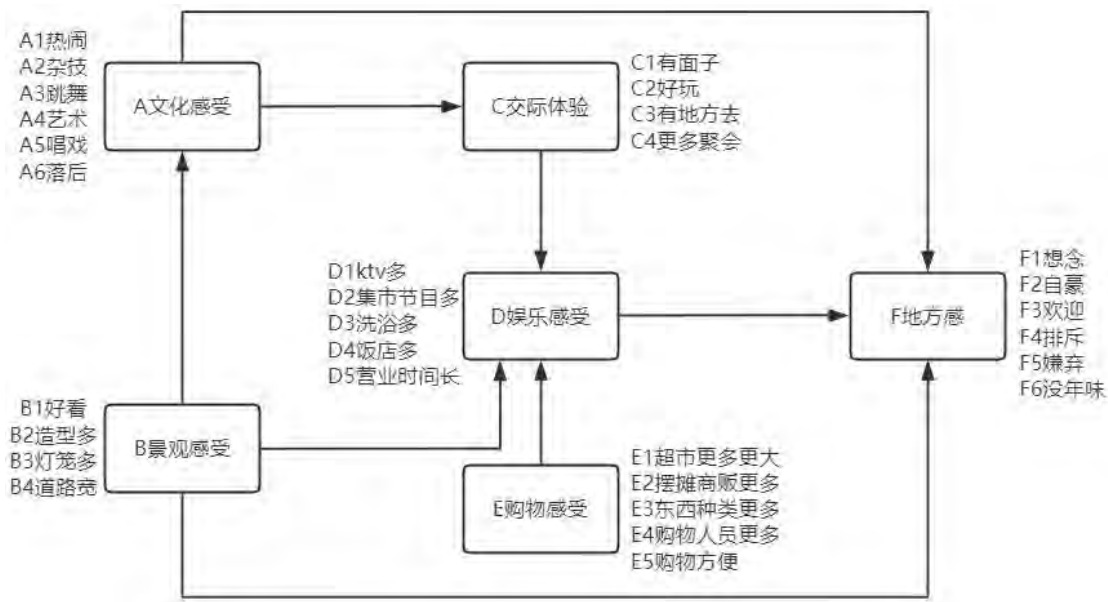


图 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在所发现的概念类属中选择核心类属概念，通过不断地分析，将与之相关的次要类属概念集中起来，以系统地说明和验证主要类属概念与次要类属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填充未来需要完善的类属概念的过程<sup>[30]</sup>。分析主、副范畴后发现，杂技小镇的设立促使当地文化感受、景观感受、购物感受以及娱乐感受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当地居民的文化体验、景观视觉体验和购物体验，并进而影响居民的地方感(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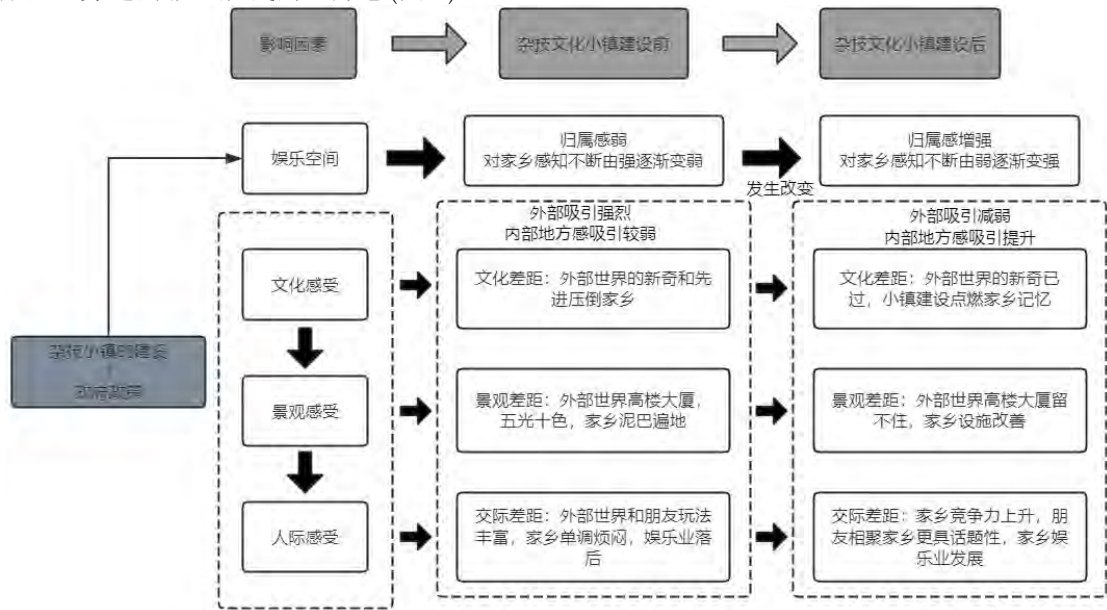


图 3 居民地方感变化分析

3. 结果分析

基于选择性编码的分析发现，杂技文化小镇的建设虽改善了镇中心基础设施，但受限于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乃至省内较发达区域长期存在的显著发展差距，其变化规模对居民而言相对有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规模务工群体将长三角核心区的繁华景象作为重要参照系，显著提高了其对家乡变化的感知阈值。这使得小镇的局部改善难以达到其心理预期的“震撼”程度，进而导致居民对设施升级的整体感知趋于平淡。“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正都是这样，看起来花里胡哨的，有没有多大让长官发展起来”(J4)；“(建筑样式)比以前肯定强些，毕竟用房子啥的都搞的不赖，

但是我觉得没啥大变化,我天天搁这摆摊,都看习惯了”(J6);“亳州的也有杂技小镇,都差不多嘛”(F4)。除了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感知阻断外,拆迁原油房屋也引起一部分拆迁居民的不满,“按理说搞哩不赖,但是没有想的那么好,(街道建筑)外观上看着好看,里面还是那样,换汤不换药”(F2)。因此,杂技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较少直接地影响当地居民地方感的变化,更多的是通过对居民赶集时获得的文化氛围、娱乐感受和赶集体验的改变而影响居民的地方感。

### 3.1. 居民地方感变化主要原因

#### 3.1.1. 文化感受的重塑

小镇通过常态化杂技表演、技艺传承活动及文化展示,使一度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边缘化的传统杂技文化重新获得关注和重视。这促使居民重新认识并珍视其文化根源,激发了对地方传统的自豪感,如:“过去……好多年了,这儿的小伙子不上学了都去学杂技……,文化还是有用哩,长官就靠杂技小镇宣传起来了”(K1)。这种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肯定,是地方认同感的核心组成部分。

小镇不仅提供观赏性表演,更引入了手工艺体验、互动展览等项目。居民从被动观察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通过沉浸式体验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内涵。这种参与式文化实践增强了文化亲近感和主人翁意识,丰富了地方依恋(的情感维度。此外,以现代方式呈现传统,也为年轻居民提供了接触和理解本地文化的新渠道,有助于弥合代际文化认知差距,为地方感的代际传承注入活力。

因此小镇也随之成为本地居民共同的文化活动中心和话题来源。居民在参与活动、交流体验的过程中,共享文化记忆,强化了基于共同文化遗产的社区纽带。这种基于地方性文化的社会互动,促进了社区归属感,进一步巩固了地方感的社会基础。

#### 3.1.2. 景观环境的再造

古风景观的引入美化了原本可能单调或杂乱的镇区环境,如F1描述:“房子都跟庙一样,还挂上了各种颜色的灯,晚上可好看”。这种视觉愉悦感和审美认同,直接提升了居民对所处物理环境的满意度,是地方满意度的重要方面。仿古建筑和特色景观成为长官镇新的、鲜明的视觉标识。它们作为杂技文化的物质象征,将抽象的文化传统具象化、空间化,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直观感受到地方特色的彰显,强化了地方独特感。

改造后的街道和广场更具吸引力,成为居民日常散步、聚集、闲聊的场所。环境品质的提升激活了公共空间的使用,间接促进了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为人际感受的变化提供了空间支持。同时,古风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居民对历史和地方传统的联想,有助于联结当下空间与集体记忆,增强地方的连续性与深度感。

#### 3.1.3. 人际网络的活化

小镇的建设及随之而来的集市繁荣、活动增多,显著提升了本地的社交吸引力和活力。居民不再需要远赴外地聚会。朋友邻里更频繁地在本地相聚、交流,谈论家乡新变化,这种本地化社交的回归与活跃极大增强了居民的社区融入感和“在地方”的归属感,是积极地方感最直接的体现。

杂技小镇成为家乡的“新名片”和共同的骄傲源泉。居民在对外介绍或内部交流时,拥有了值得谈论的“地方亮点”。如:“过去都说咱这落后,现在大不一样,都发展起来了……”(F6)。这种共享的地方话题提升了居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尤其是在与外地亲友或他乡比较时。

小镇带动的集市、商铺等商业、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更多本地就业和创业机会。尤其是部分原可能外出务工的居民有了在本地谋生和发展的可能,经济上的在地化显著增强了其扎根家乡、建设家乡的意愿和信心,是地方依赖的重要基础。

随着本地文化活动的兴盛,居民娱乐、休闲选择丰富,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缓解,居民有更多时间和意愿在家乡陪伴家人,享受家庭生活。家庭作为最核心的初级社会群体,其活动空间向本地的回归,深刻强化了基于亲情纽带的地方依恋。

### 3.2. 地方感变化的调节机制——时空对比视角

特色小镇建设带来的物质与文化环境变化并非直接、均质地转化为居民的地方感。居民个体基于自身生命历程和空间流动经验进行的时空对比,构成理解其地方感变迁的关键调节机制。这

种对比的核心在于居民评估当下家乡状态时，所参照的内在标尺，即其对过往家乡的记忆、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以及对社交网络的依恋程度，由此产生“相对获得感”或“相对失去感”，进而形塑积极或消极的地方感。

从时间维度对比而言，居民将当前家乡环境、生活条件、文化氛围与自身记忆中的过往进行纵向比较。若感知到显著改善，如收入提高、环境美化、文化活力增强，则易产生满足、自豪等积极情感。若感知到某些珍贵元素的消逝或未达预期，如传统氛围淡化、社区关系疏远，则易产生失落、怀旧等消极情感，如 F13 所言：“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家里年味足……现在过年都没有年味了……”。这种“失去”往往关联着对传统连续性或集体记忆载体减弱的忧虑。

空间维度的对比主要基于大规模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尤其是务工群体的居民将长三角等发达地区作为强大的外部参照系。发达地区的繁华景象显著提高了其对家乡变化的心理预期和“震撼”阈值。小镇局部的、渐进式的改善，在与“他者”的横向对比中，可能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强化了“相对滞后”的认知，如受访者 J4, J6, F4 对变化“平淡”的感知。这是消极地方感的重要来源。另外，社交圈主要在本地、家庭依恋深厚的居民，更容易聚焦于本地的积极变化，产生相对获得感。相反，长期在外、家乡社交网络薄弱的居民，更易受外部参照系影响，对家乡的“不足”更为敏感，产生相对失去感。

此外，对家乡亲人的情感依恋强度是时空对比中一个稳定的情感参照点。深厚的家庭纽带往往能缓冲外部对比带来的消极影响，增强对家乡积极变化的地方依恋。反之，家庭纽带弱化则可能放大相对失去感。

####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中部人口流出区面临的普遍性挑战——如何通过地方建设重塑居民地方感以增强本地吸引力、服务人才与产业回流，以临泉长官杂技文化小镇为典型案例，揭示了特色小镇建设影响居民地方感的多维路径及其核心调节机制——“时空对比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特色小镇建设通过重塑居民的文化感受、景观感受与人际感受三个维度的体验共同重塑地方感，三者相互交织。其中，人际互动体验的改善对积极地方感的形成作用最为直接和显著，其效应超越了文化和景观环境的改善。这凸显了在人口流失背景下，重建富有活力的本地社会联结与人际互动是重新锚定居民地方归属感、激发“留乡”或“返乡”意愿的更强劲引擎。（2）“时空对比机制”是理解地方感变迁的关键内生变量。居民地方感的变化不仅源于外部环境改变，更深刻受制于其个体化的“时空对比机制”。时间维度上居民将当下家乡与过往记忆进行对比，产生相对获得感或相对失去感。空间维度上居民基于外出务工经历，将家乡现状与发达地区进行对比（J4, J6, F4）。大规模务工群体带回的外部见闻，使得他们对家乡“小规模”变化的感知阈值提高，对设施改善的震撼感减弱，甚至产生“相对滞后感”。情感维度中对家乡亲人的依恋强度变化，以及本地社交网络的稳固程度，深刻影响对比结果。个体的过往经历、家庭情感依恋及外部参照系共同构成了地方感评价的内在标尺，积极地方感（与消极地方感常在此对比中并存甚至相互消解。这一机制深刻揭示了中部人口流出区居民在评估家乡变化时面临的独特心理逻辑——交织着对“过往家乡”的记忆、对“发达他者”的认知以及对“家庭情感”的依恋。积极地方感与消极地方感常在此复杂的时空情感坐标中并存甚至相互消解。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1）揭示了中部人口流出区特色小镇建设影响地方感的特殊路径与核心价值。区别于一般旅游或商业开发，面向人口流出地的文化特色小镇建设，其核心价值在不仅在于硬件改善与文化展示，更在于通过激活本地人际网络、创造在地化互动机会来重建社区归属感与社会凝聚力。这对于资源相对有限的中部地区优化特色小镇建设重点——从“造景”转向“聚人”、从“硬件投入”转向“社会资本培育”——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是服务中部崛起“人才回流”与“本地产业培育”目标的关键。（2）提出并验证了“时空对比机制”的核心作用，为理解中部居民地方感复杂性提供了精细理论透镜。本研究创新性地将居民个体生活史、空间流动经验及家庭情感依恋整合为“时空对比机制”，强调其对地方感形成与变迁的内生性、动态性影响。特别是揭示了外部发达地区作为强参照系对居民感知阈值和心理预期的深刻塑造作用，这为中部地区制定特色小镇宣传策略、设定合理发展预期和弥合“官方叙事”与“民间感知”的鸿沟，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依据。同时，机制中对时间维度和情感维度的关注，也提示中部地区在建设需注重保护承载集体记忆的场所与元素，并重视家庭作为地方情感核心锚点的作

用。(3) 为中部人口流出区依托特色小镇建设助力崛起提供实践启示。基于研究发现, 特色小镇建设要深耕“人际土壤”, 服务“人回流”与“业振兴”, 促进本地社群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作为核心目标之一。积极组织基于本地文化的社群活动、搭建返乡青年与留守居民的交流平台、支持本地化的小微商业与社交空间。这不仅能提升地方感, 更是营造“留得住”的社会环境, 为返乡创业就业提供社会网络支持, 直接服务于中部崛起所需的“人才回流”和“本地产业培育”。还应正视“时空对比”, 实施包容性策略。理解并尊重居民基于自身经历的多元感知。避免过度宣传“翻天覆地”, 注重渐进式、有温度的更新, 保留承载集体记忆的场所与元素。针对务工群体, 可建立信息桥梁, 使其更深入理解家乡变化的细节与意义, 并探索为其返乡创业、参与本地事务创造便利。更要持续运营与文化活化, 铸牢“文化自信”。确保特色小镇“软件”内涵的持续挖掘与维护, 定期推出高质量、参与性强的文化活动, 让文化体验真正融入居民生活, 而非仅服务于游客。这将巩固地方文化作为认同核心符号的地位, 培育具有中部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和居民自豪感, 直接服务于中部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建设。

总之, 在服务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宏大背景下, 特色小镇建设对地方感的影响远非简单的环境改造工程, 而是一个涉及地方认同重塑、社会网络激活、个体心理调适的复杂社会过程。对于中部人口流出区而言, 能否有效利用特色小镇这一载体, 关键在于能否深刻理解并积极引导居民的“时空对比”逻辑, 能否将建设重心从物质空间转向社会空间与情感空间的培育。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以特色小镇凝聚人心、以地方认同吸引人才、以人才与产业协同激活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 为中部崛起注入持久而深厚的内生动力。

#### 参考文献:

- [1] 程必定,陈耀,秦尊文,等.新时代站在更高起点推动中部地区崛起[J].区域经济评论,2024,(04):5-20.
- [2] 张广胜,韩雪.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流动的实证性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4,(05):45-55.
-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部崛起战略与对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 [4] 封凯栋,刘星圻,陈俊廷,等.行政边界对振兴连片特困区的影响:区域增长极扩散效应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2,(02):65-73.
- [5] EYLES J .Senses of place[M]. London: Pion,1985.
- [6] KYLE 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sense of place[J].Leisure Science,2007,29: 209-225.
- [7] TYAN, Y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6-8
- [8] 段义孚,志丞,左一鸥.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J].地理科学进展,2006,25(2):1-7
- [9] CRESSWELL T .Place:An introduction[M].Hoboken: JohnWiley&Sons, 2014.
- [10] SHAMAI S .Sense of place:An empirical measurement[J]. Geoforum ,1991,22(3):347-358.
- [11] MASSEY D B .Space,place,and gender[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146-173.
- [12] RELPH E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Pion, 1976.
- [13] 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3(1):1-8.
- [14] 谢涤湘,常江,朱雪梅,等.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的地方感特征:以广州荔枝湾涌为例[J].热带地理, 2014,34(4):482-488.
- [15] 李如铁,朱竑,唐蕾.城乡迁移背景下“消极”地方感研究:以广州市棠下村为例[J].人文地理,2017,32(3):27-35.
- [16] 楚晗,谢涤湘,常江.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关系研究: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人文地理, 2019,34(4):54-62,72.
- [17] 郑昌辉.在城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地方感:概念与研究进展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 2020,27(5):116-124.
- [18] 谢涤湘,简慧敏,楚晗.生态保护区设立对周边村民地方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 2023,42(12):2401-2413.
- [19] 卢志霖,殷冠文,罗存菁,等.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的居民地方感建构——以济南莱芜合并为例[J].人文地理, 2025,40(01):45-52.
- [20] 王泓砚,谢彦君,王俊亮.凝视性景观与互动性景观——旅游场景类型对游客地方感的结构性影响[J].旅游学刊, 2021,36(11):80-94.

- [21] 吴偲,朱竑,李军.艺术旅游与地方感的相互关系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群组为例[J].旅游学刊, 2022,37(04):116-127.
- [22] 余欢.从在地到在线: 非遗的媒介化呈现与地方感重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64(02):129-138.
- [23]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icago: Aldine Aldine Pub, 1967:18-48.
- [24] 吕蕊,石培基,聂晓英,等.河西走廊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J].地理科学, 2017,37(5):718-727.
- [25] 王腾飞,马仁锋.宁波老工业区创意空间孕育机制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11):1567-1580.
- [26] 仇梦娜,张捷,杨加猛.新健康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地多维康复景观构成要素与作用机制研究:以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5):927-943.
- [27] 黄坤,吴文恒,杨毕红,等.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J].热带地理, 2022, 42(5):751-761.
- [28] FASSINGER R E .Paradigms, praxis, problems, and promise:Grounded theory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search[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5, 52(2):156-166.
- [29]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 18(4):58-63, 73.
- [30] 陶伟,王绍续,朱竑.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J].地理研究,2015,34(06):1173-1187.

(校对: 周钰淮 排版: 袁骁)